

沈志华 著

#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

## 1956—1957年的中国



在中国，
1956年春光洒满大地，
1957年……

廣東省出版集團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共固然不如苏共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但就领袖魅力而言，赫鲁晓夫则完全不能同毛泽东相比。至少在中共眼中，斯大林倒下了，站起来的应该是毛泽东！从历史过程来看，导致中苏同盟最终破裂的种子大概埋藏在这里。

—— 中共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

1957年5月中旬发现民主党派的言论有“危险企图”和“错误倾向”后，毛泽东本来可以采取一种怀柔的应付办法，但这不符合毛泽东的秉性——他从来不会在压力面前低头示弱。所以毛泽东决心继续鼓励鸣放。他就是要看一看，经过近八年的宣传、教育和改造，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面对小小的风浪，究竟是继续跟着共产党走，还是会被这几个社会名流引入歧途；就是要向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怀疑论者证明，他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英明正确。然而，随后二十多天的风云变幻令他十分失望，由失望转而愤怒，毛泽东决心结束党内整风，而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右运动。

—— 中共中央决心全面开展反右运动

苏共二十大所面临的局面是，长期以来的残酷镇压手段和疯狂造神运动已经使斯大林成为真理和理想的化身，如果不解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任何理论创新和政策调整都会遇到重重阻力，更不用说要改变斯大林体制和模式了。但正因为个人崇拜的病毒已经渗透到苏联社会的骨髓和细胞，所以任何细小的手术都必须谨慎从事，否则就会引起整个功能紊乱。这种混乱的局面，加上舆论压力和党内本来就存在的意见分歧，苏共在召开二十大后不久便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方针，放慢甚至停止了解冻的步伐。

—— 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实质

上架建议：近代史 · 社科 · 历史

ISBN 978-7-218-08481-7

9 787218 084817 >

定价：58.00元

汉唐阳光官网：www.htreading.com
汉唐阳光微博：www.weibo.com/htyghtzd

沈志华 著

#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

## 1956—1957年的中国

廣東省出版集團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 1956—1957年的中国 / 沈志华 著.
--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2
ISBN 978-7-218-08481-7

Ⅰ. ①处… Ⅱ. ①沈… Ⅲ. ①中国历史 - 历史事件 - 1956—1957
Ⅳ. ①K27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9029号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 1956—1957年的中国

CHUZAI SHIZILUKOU DE XUANZE 1956—1957 NIAN DE ZHONGGUO

沈志华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曾 莹

**策　　划：** 肖风华
**责任编辑：** 余小华 钱 丰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10）62142146
（020）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218-08481-7
**开　　本：** 65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380千
**印　　数：** 1—15000册
**版　　次：** 2013年 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0604 83791487　　邮购：（020）83781421

# 序　言

## 转折还是选择
## ——如何估计1956–1957年的中国

1956–1957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是不寻常的年度，其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这两年的反差极大。或许可以这样说，在中国，1956年春光洒满大地，1957年阴霾笼罩天空。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国人曾寄予无限希望，而中共领导人虽经历思考，最终却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选择。

所谓希望，是说1956年初基本完成所有制的改造以后，中共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积极动员和团结社会各阶层，全力投入经济发展，目标是在不远的将来，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富强、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共领导人这一代社会精英提出的宏伟理想和奋斗目标，国人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所谓思考，是说当中国宣布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针对在苏联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和批判，特别是揭露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斯大林在创建这种社会主义模式时所犯的种种错误。苏共中央的创举令很多共产党人深思：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应该如何走？斯大林建立的苏联模式是不是正确的或唯一的社会主义样

板？苏共提出的问题更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考虑，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怎样避免苏联已经犯过的错误，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社会主义道路？

所谓选择，是说1956年秋天波匈事件掀起的震动社会主义阵营的风浪刚刚停息，1957年夏季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派”运动，又把整个中国社会推上了政治舞台，中共重新提起“阶级斗争”，使人们再次陷入了“你死我活”的争斗。其结果，“百花齐放”变成一花独放，“长期共存”变得名存实亡。知识分子消极了，民主党派沉默了，肯于思考、热心报国的人群失望了。为了巩固政权，中共最后决定还是回到阶级斗争的道路上，并以此作为执政党今后的行动纲领，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体制由此确定了未来发展的基础。

为什么1956年的希望和期待会转变成1957年的失望和消沉；为什么中共八大在1956年确定了扩大民主、加强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到1957年却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到头来还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为什么中共一代精英百般思索却做出了如此选择，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本书试图利用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献史料，描述这一历史过程。

笔者的思考和写作，追寻了两条并行的线索：其一，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任务的认识；其二，中共对社会主义同盟特别是中苏关系的估计。作为一个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执政党，这是中共在1956–1957年所面临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这种认识和估计的结果，构成了他们制定对内和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决定了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最终选择。

## 一　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任务的认识

社会主义社会原本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境

界的一个大体设想，后来经列宁和斯大林的实践，逐步形成了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有共产党人便以此为奋斗目标。因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按照共产主义的理念，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过，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共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巩固政权，这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毛泽东读《甲申三百年祭》对李自成败落的思考，以及同黄炎培关于国家兴亡周期律的讨论，充分表明他对政权得而复失这一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在新政权立足未稳之时，毛泽东和中共高级干部内心考虑问题的思路，根本上还是受到中国传统社会改朝换代和“打天下、坐天下”一套理念的支配。革命具有惯性。中共是靠“枪杆子”打天下的，这种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必然采取革命的方式巩固政权，改造社会。借助朝鲜战争的特殊环境，通过武力镇压和群众运动的手段，中共基本完成了巩固新政权的几个主要任务：清除反动势力、变更所有制、改造社会及国民的思想。

到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制性质变了——官僚买办经济、地主经济和资本家经济已不复存在，社会成分变了——暗藏的特务和反革命消灭了，地主、资本家、富农正在从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也就是说，国内的敌对势力基本不存在了。这时，不仅工人、农民真心拥护共产党，就是大多数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也对共产党人心悦诚服，认为他们的确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巩固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那么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这一点，中共领导人是十分清楚的。他们连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其他一系列方针，甚至考虑采取某种新的政治模式，就是要调动一切社会积极因素，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在这个基础上，中共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

展”。中共的现时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认识到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从革命转向建设。[1] 这是中共思想政治路线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中共对自身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即取得执政合法化必要性的初步认识。

然而，这种认识似乎还是下意识的和模糊的。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中共的思路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下去。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引起的风波，特别是匈牙利动乱的后果，给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敲响了警钟，使他们看到，已经取得胜利的政权还是有可能丧失的。这种危险的国际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国外的反动势力，他们企图与国内的反革命力量相呼应，最终推翻共产党政权；其国内根源则在于执政党沾染的脱离群众的作风及其所采取的错误的方针政策，由此引发了人民大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其中，最令毛泽东和中共感到震撼的是后者。在中国，经过镇反、肃反和一系列改造运动，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即使还有一些残余力量，也不会翻起大浪。因此，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如何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于是，毛泽东向党和政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课题，同时决定开展整风运动，采用民主的和开放的方式，祛除一些共产党干部执政不久便沾染的不良作风和旧弊陋习。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反动势力已经基本清除，原有的剥削阶级正在被改造为新人，广大知识分子也表示拥护社会主义，就不会再有人对中共的执政地位提出挑战。但与此同时，在中共的干部中，贪图

---

〔1〕以上参见中共中央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72、809-820页。

享受、追求名利的思想正在滋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现象日益严重，而对这一切，仅靠党内思想教育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毛泽东决定发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并且亲自在党内外进行广泛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当时，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在内的一批热心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有识之士确实被发动起来了，他们仗义执言，针砭时弊，大胆地说出了许多过去不敢讲的话。令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有些批评的矛头竟然指向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方式提出质疑。看来，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想要翻天的还大有人在。毛泽东决定进行反击，而这个决定又恰恰迎合了党内基层干部对整风运动中诸多言论和做法的不满情绪。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很快就在全国铺开了，革命的暴风骤雨再次降临中国大地。

在这个背景下，中共八大的政治路线遭到否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重新被看做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在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经过不断的阶级斗争才能得到最后解决。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很容易做到。搞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本来就是中共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的工作方法。所以，"反右派"斗争很快取得了完全胜利。此后，毛泽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方面，并且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响亮口号。不过，这次开始的经济建设高潮，借助"反右派"的东风，继续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至于阶级斗争，到"大跃进"失败之后便转入了党内，后来就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

## 二　中共对社会主义同盟及中苏关系的估计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发展，与苏联有着极其密切和内在的联系。

中国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以及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意义，对于苏联来说，主要是一个安全问题，斯大林考虑的是利用中国作屏障，解除来自东方的美国威胁。而对于共产党的中国来说，巩固政权，组织社会，发展经济，这一切都需要依靠苏联的帮助。况且，就长期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在主观意识中，中共除了向苏联“一边倒”，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外，没有别的选择。

毛泽东做出与苏联结盟的决定，还有一个逻辑——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而社会主义只有苏联一个榜样，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以俄为师”。中共长期在农村和山沟里坚持武装斗争，没有管理城市和国家的经验，更不知道如何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所以，只能学习苏联。1952年底，国内外局势刚刚稳定下来，毛泽东便主张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提出了“全面学习苏联”的口号。不过，斯大林并不认为中国可以立即走上苏联的道路。在斯大林看来，中国要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差得很远。你那里刚刚把土地分给农民，怎么实行全盘集体化？你连起码的工业基础都没有，怎么实行计划经济？斯大林一再告诫毛泽东，不要急于学习苏联的榜样，向社会主义过渡要慢慢来。

斯大林去世以后，莫斯科新领导层一方面开始着手处理在斯大林时代积重难返的种种社会危机，一方面在赫鲁晓夫的主持下调整对华方针，向中国提供全面的援助。大批苏联专家的到来和“一五”计划的实施，使得中国从国家机构的设置、经济体制的建立、各种管理制度的形成，直到各大城市的规划以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大量照搬苏联的经验。但是，正在中国仿照苏联模式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大厦的时候，苏共召开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针。同时，毛泽东也感觉到苏联模式存在着弊病，提出“十大关系”问题，开始考虑走适合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思考都没有触及到当时社会主义所存在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层面的根本问题，但这种思考无疑已经蕴含了未来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

基础。

1956~1957年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时期，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相互支持，取长补短。总体说来，苏联在经济上援助中国：从“一五”计划的执行、工业化基础的建立直到核武器的研制，赫鲁晓夫向中国提供了巨大帮助；中国在政治上支持苏联：从平息苏共二十大给社会主义思想阵营带来的冲击，消除波匈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造成的震动，直到在六月事件和朱可夫事件中坚定地支持赫鲁晓夫，毛泽东也为苏联提供了巨大支持。尽管他们之间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毛泽东不满意苏联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做法，不同意苏共把和平过渡作为外交政策的总方针，而赫鲁晓夫则认为中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多有不妥，对中共带头指责苏联的大国和大党主义也暗中不满。但这些都是枝节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团结，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以共同对付和战胜美帝国主义，这是他们一致的和首要的目标。莫斯科会议就是中苏合作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经典之作。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苏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却逐步出现了一种隐患，即他们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正悄悄发生变化。中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敢于出兵朝鲜与美国对阵，又在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的国际风波中镇定自若，指挥有方，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及各国共产党对中共刮目相看，由衷钦佩。更何况斯大林去世以后，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无论讲革命资历和理论水平，还是讲政治经验和领袖魅力，毛泽东都越来越显示出其超人的优势地位，远非赫鲁晓夫之辈所能相比。于是，随着赫鲁晓夫和苏共屡次陷入在两代领导人交替过程中出现的政治危机，在中国党内和社会上渐渐形成了一种中共应取代苏共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看法，毛泽东本人也在言行举止中流露出这种情绪。这一点，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表露得十分明显。

不过，恰恰在1957年底，苏共的劣势已经走出低谷。赫鲁晓夫本人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巩固了他在国内的绝对权力，东欧危机的解

除使苏联恢复了传统上对那个地区的影响和控制，特别是苏联的经济发展也在这时显示出辉煌的成就：农业获得战后少有的连年丰收，先后两颗人造卫星上天，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这一切都让赫鲁晓夫感到骄傲，使他更坚信改善与西方的关系，集中精力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这一方针的正确性，也使他看到了通过和平竞赛战胜资本主义的光明前途。为此，他在莫斯科会议上洋洋得意地提出了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然而，毛泽东在此看到的却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是社会主义将要很快埋葬和取代资本主义的国际潮流。因此，他认为有必要采取更为激进的革命路线，鼓励和支持世界各国的进步力量，与帝国主义进行最后的斗争。显然，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已经不再适合新的形势需要，如果赫鲁晓夫不能及时修改苏共的指导思想，那么中共就必须站出来，挑起领导世界革命的重担。

毛泽东感到，中国要在社会主义阵营为首，唯一欠缺的就是经济实力，他早就憋着劲要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不过，毛泽东对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的认识，并没有超出苏共二十大文件指出的范围，所谓避免或少走苏联的弯路，也不是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有所质疑。毛泽东所要求的只是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超过苏联，其方法就是中共所熟悉的大搞群众运动。这种单靠高指标、高速度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搞经济建设的方针，在1956年下半年遭到周恩来等经济工作领导人的抵制，也受到苏联专家意见的制约，被作为“冒进”反下去了。到1957年情况就不同了，“反右派”运动以后没有谁还敢站出来唱对台戏，苏联专家的意见也退居次要地位，毛泽东就要大张旗鼓地开始经济跃进了。超英赶美变成了赶超苏联，以后的事情就是要看，到底是中国学习苏联，还是苏共服从中共了。

这就是本书所叙述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

如今，站在21世纪的角度来看1956–1957年这段历史，令人不胜感慨。在中国，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及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国家栋梁，都是经过大浪淘沙的社会精英。他们有善良的愿望

和伟大的抱负，一心想把中国领上一条走向理想王国的康庄大道。然而，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刚刚迈出第一步便停止了，或者说当时他们进行了一次不彻底、不成功的探索。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中包括自身思想认识的限制和客观环境的制约，由暴风骤雨般革命时代造就的绝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习惯于以那个时代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习惯于用那个时代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们很难否定自我，很难放弃传统的斗争思维和革命方式，很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现代社会。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过去研究者常用“转折”这个概念给1957年的中国历史定位，似乎1956年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1957年又转向了另一条错误的道路。笔者以为，这个定位不够准确。首先，1956年中共主要还是在思考，八大所确定的路线也只是展示了一个前景，至多是刚刚开始起步。其次，1957年中共的选择并非突发奇想，而是与1956年以前的传统思维和习惯以及1956年的思考有着内在的联系。应该说，到1956年初，中共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苏共二十大提出新方针，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历史确实提供了一个机会。社会主义道路究竟走向何方，这时需要并有可能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比较，中共领导人也确实开始了探索。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波匈事件，以及中国社会的骚动，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因真心参与共产党整风而提出的尖锐意见，使中共难以承受，终于在1957年夏天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选择。所以，这里不是转折，而是稍有停顿和观望，便沿着中共传统的和熟悉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了。

就共和国的发展道路而言，真正的转折出现在80年代。说句史学研究者一般不大讲的话，如果——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并且支持、参与苏联和东欧的改革，继续广开言路，扩大民主，招贤纳士，改弦更张，那么——就有可能在社会主义阵营看到各国独立自主多元发展、不同模式竞争前进的局面，就有可能在50年代

的中国出现人们在80年代才看到的“转折”。

作为历史研究的成果，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本书所使用的文献和史料。

第一，广泛引用已出版的档案文献。

从目前中国的档案管理制度看，一般学者是无法进入中央档案馆的。因此，也就很难通过查阅和疏理高层档案文件，特别是各种会议记录，了解中共的决策过程。不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其他一些中央研究机构编辑、出版了大量文献及年谱、大事记等史料集，其来源主要是中央档案馆。这是研究共和国历史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料。笔者在引用这些文献时注意到以下几点：（1）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文献中，注释特别重要，其中使用了大量档案资料，极有价值。有的文献本身只有几个字，注释却长达几页；（2）不少文献在发表前进行过修改，在编辑时又做了删节，有的有说明，有的没有说明，稍不小心就可能误入歧途。因此，笔者尽量找到原始文件进行比较；（3）在引用重要文献时，需要对比不同时期出版的不同版本，因其中不仅注释，甚至正文都可能有差别；（4）笔者能够看到的中共文献并不完全，需要时必须靠其他史料补充之。

第二，尽量挖掘地方档案馆的有用资料。

过去，学者对中国的档案开放政策多有抱怨，感到难以进行历史研究。目前情况已经有所改观，例如，有外交部档案馆引领，部委一级的档案正在考虑解密。特别是近几年，各省市档案馆均已开放，原则上可以任研究者查阅。地方档案内容极其丰富，涉及社会生活各方各面、各行各业，虽缺乏中央决策的内容，但是从中央与地方、高层与基层互动的角度观察，对于决策的结果及执行情况，却有十分详细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各级党政机构贯彻中央决策的方式和办法，社会基层对国家各项政策方针的反应，不同群体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在这里是应有尽有。只要研究者肯花时间，肯下功夫，就能够观察到

整个社会乃至每个细胞的动向。

第三，大量转引过去公开的和内部的报刊资料。

转引当年报刊资料的重要作用无需赘言，笔者在梳理史料时就是逐日对照《人民日报》，从而解决了大量问题。这里主要谈一个极有史料价值的内部刊物——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编辑发行的《内部参考》。这个刊物当年是仅供中共高级干部阅读的，其中报道的国内外重要新闻，一般都是公开报纸甚至《参考消息》上都不予刊载的。除了对国外情况的报道外，《内部参考》还大量刊登了国内各地区的民情，既有各级党政军和社会团体的工作情况，也有社会各阶层的情绪和反应。尤其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前，这个刊物提供的信息不仅数量极大，而且内容真实，是了解社会基层活动的绝佳材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所幸《内部参考》现在已经成为公开史料，在海外一些图书馆或资料室都有收藏，并可以大量复印。

第四，谨慎使用回忆录和口述史料。

目前中国出版的大量回忆录以及作者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是当代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在历史研究中，需要研究者本人找到对历史的感觉，而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场景、气氛和当事人的感受，却往往无法见诸于档案文献的白纸黑字。所以，这种感觉在呆板的档案文献中是很难找到的，这就需要依赖当事人的叙述进行弥补。毛泽东过去还有个习惯，他本人召集的一些重要会议，包括政治局会议，不允许做记录。所幸是为工作需要有时与会者可以做个人记录，这些材料也是查阅档案无法替代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吴冷西的回忆录。但是，回忆和口述史料也有一个重大缺陷，很可能因时间久远，记忆模糊，或受到个人情感和立场的干扰，当事人所述情况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有些人写回忆录，有条件核对档案记载，又具平常心态，这比较让人放心。但也有很多人是单凭自己的记忆或好恶，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引用时特别谨慎，办法就是尽量与相关的文献史料进行比较和鉴别。

第五，充分利用俄国解密的档案文件。

近年来俄国档案解密和利用的情况已为众所周知，其重要性对于研究50–60年代中国的历史尤其值得注意。这不仅在于中国此期的发展与苏联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受苏联影响甚大，而且在于中国档案资料的缺憾往往可以从俄国档案中得到弥补。且不说斯大林在世时，中苏两党会谈时，不许中方当场做记录，就是后来有了记录，中国目前公布的也是极少数。例如，在笔者收集的俄国档案中，有关1949–1952年刘少奇的谈话记录和电报共17件，而目前中国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4卷本只收入了2–3件。再有，对比中苏双方的记录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时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大量使用俄国档案研究中国史，或许也可以看做笔者在史料引用方面的特点之一。

# 目录

序　言　转折还是选择——如何估计1956-1957年的中国

第一章　知识分子会议：中共的认识和政策调整

中共对知识分子地位的再认识 / 003

动员全党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 / 014

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政策调整 / 026

知识分子的双重反应和精神诉求 / 037

第二章　非斯大林化：苏共二十大及中共的反应

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实质 / 053

非斯大林化现象的由来 / 061

中共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 / 080

第三章　反冒进：中共关于经济建设方针争论

毛泽东主张反“右倾保守” / 106

周恩来提出反“急躁冒进” / 113

中央决定改变经济建设方针 / 121

来自莫斯科的意见支持周恩来 / 132
反冒进在中共全会的集中表现 / 139

第四章　中共八大：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本人提出和赞同的建议 / 147
来自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压力 / 150
中共对反“个人崇拜”的态度 / 154

第五章　“波匈事件”：中国的反应及态度转变
苏联要求中共协助处理东欧问题 / 166
中共对波兰危机的看法和立场 / 174
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中的作用 / 202

第六章　周恩来穿梭外交：中国开始介入东欧事务
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动乱的余波 / 229
周恩来三国之行急需解决的问题 / 243
在新的基础上巩固社会主义阵营 / 255

第七章　人民内部矛盾：中共对东欧危机的思考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不同声音 / 279
“波匈事件”和斯大林问题再讨论 / 288
中国社会的反应和“少数人闹事” / 296
中共采取的各种让步和安抚措施 / 301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 / 308

**第八章　“开门整风”：毛泽东决心整顿共产党**

毛泽东着手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 314

整风动员引起两种根本对立的反应 / 320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不同关注 / 328

毛泽东决定提前进行“开门整风” / 338

**第九章　莫斯科会议：走到顶点的中苏同盟关系**

毛泽东主张开会解决问题 / 350

中共为开好会议所做的努力 / 366

毛泽东在莫斯科“指点江山” / 386

**附录一　征引和参考文献 / 401**

**附录二　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 / 429**

**后　记 / 433**

第一章

# 知识分子会议：中共的认识和政策调整



1956年，毛泽东与钱学森在宴会上交谈

1956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尽管冰雪尚未融化，中国大地已经显示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说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动态。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就像一支报春花，预示了中共领导人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充满理想和信心的蓝图，也标志着中共将对其执政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关于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中国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1] 不过，正如美国的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说："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争执不休的问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一点，那只不过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2] 的确，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在任何国家都是纠缠不清的，而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共政权的关系尤其如此。以往对1956年初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的讨论，重点在

〔1〕作为整体性描述的论著，值得注意的有何晓明：《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龚育之：《周恩来和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3期等。其中不少涉及到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关于1956年1月中共知识分子会议，早有专题档案文献（《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文献选载》）和相关的论文发表（熊华源：《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情况介绍》），见《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

〔2〕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341页。

于说明中共，特别是周恩来表现出来的纠“左”倾向，这对于历史研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本章加入这一讨论，主要是围绕这次会议的前提、过程和结果，着重分析中共领导层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变化和政策调整的局限性，以及知识分子反应的双重性。

## 中共对知识分子地位的再认识

知识分子会议前夕，毛泽东正在筹划一个新的宏伟蓝图，即在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三大改造将要提前结束的形势下，掀起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尽快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从合作化到工商业改造，汹涌而来的全国社会主义热潮，强化了毛泽东改造中国的自信。同时，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党内各级领导人的头脑也开始发热。国务院各部委召开专业会议，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1] 中共掌权后的第一次经济“跃进”，由此发轫。毛泽东清醒地知道，“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2] 然而，与广大农民、工人和干部摩拳擦掌的热情相比，作为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主力军之一，知识分子则多少显得有些不够振奋。

在中国社会，知识分子问题向来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对于执政者来说，也是一个难题。中国的历代君王通过确立儒家学说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规范了知识分子的思维，又通过科举制度把他们纳入官僚体制，使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逐步影响了中国社会，加上科学的发展，其结果使大部分知识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31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

分子游离于政府或统治者外围。共产党执掌政权后，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使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转换观念，为新社会服务。经过1950—1955年几番思想教育和改造运动，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或者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大部分表示了愿意为新政权服务的意愿。但是，他们中间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感到压抑，内心存在不满情绪。[1]

在中国，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早年投奔延安或在白区参加地下党，成为党内知识分子。这部分人数不多，且后来大都脱离知识界走上仕途。另一部分是占多数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有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背景。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多数高级知识分子选择了留在大陆。[2] 据统计，在

---

〔1〕近年来关于50年代初期共产党改造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颇多，如谢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始末》，《党的文献》1997年第5期；王文：《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共党史资料》总第66辑（1998年6月）；杨凤城：《1949—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翟志成：《冯友兰的抉择及其转变》：（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0期（2002年）；黎汉基：《金岳霖的思想改造》：（台湾）《新史学》第13卷第1期（2002年3月）；王善中：《论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2期；王先俊：《建国初期的社会变迁与党对思想文化的整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还可参见黄一兵：《马哈伊斯基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之缘起》，《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苏利军：《西方关于新中国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述评》，《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4期。

〔2〕1948年当选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81人，留在大陆或新中国建立初期回到大陆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去美国的12人，占院士总数的15%；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的仅有9人，占院士总数11%。〔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6—7页。〕按照195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收集高级知识分子统计数字办法的规定》的说法，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一般是指具有大学毕业程度，具有几年工作经验，能够独立工作的知识分子"，如"高等学校中讲师以上的教师，研究机构中助理研究员以上的研究人员"。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23页。

1956年初10万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外知识分子占93%，建国后增加的人数约占35%。[1] 其中有不少是海外归来者。[2] 这些留下或归来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和政治信仰多么复杂、多么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传统，就是爱国。虽然不一定认同共产主义，甚至对此存有疑惧，但他们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却是实情。因此，多数人倾向于中共新政权，希望有机会为国家效力。

进城之初，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相当宽厚。原来在大专院校教书的，仍然教书，原来在政府机关任职的，也续任其职，一切维持原状，失业知识分子的基本生活反而得到前所未有的照顾。中共还把知识分子分别编入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或新闻工作者等协会。其中比较特殊的是文学艺术界的社会团体，如参加作家协会者，不但不用缴纳会费，反而像进入政府机关一样，有固定薪资可领，作品也有该团体的刊物可供发表，甚至一年半载没有创作，也用不着担心饥寒冻馁。[3] 台湾学者陈永发院士认为，中共通过“包”下来的政策，变成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衣食父母，使那些名声

---

〔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810页；郭沫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1956年1月31日、1956年2月1日《人民日报》。

〔2〕1950年到1953年，约有2000名留学生回国。〔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10—11页。〕至1955年11月，回国的海外高级知识分子多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1041人。〔知识分子工作安排小组：《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1955年12月27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92页。〕他们后来大多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骨干，甚至是各学科的奠基人或学术泰斗。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8—79页；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661页。

显赫的知识分子颇有知遇之恩的感觉。[1]

不过，在共产党看来，这批知识分子毕竟是旧社会过来的，要让他们为新社会服务，就必须对其进行改造。对于建国之初中共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知识界究竟是被迫承受还是主动反省？有一种估计是比较客观的：大概在运动之初，主动反省成分多于被动承受。正是由于愧疚感和感恩情结，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承认有自我改造的需要，自愿地接受了中共起初比较温和的思想改造要求。还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前，1949年11月，美学家朱光潜率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进行检讨，随后社会学家费孝通和哲学家冯友兰等人，也都纷纷自我批判，公开宣布与旧的自我及旧的社会一刀两断，并决心按照新社会的需要重新创造自我。[2] 的确，1951年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是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先在北大师生中发起的。北大12位教授自发组成“教师学习会”，并通过马寅初请周恩来到校讲演。9月29日，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北京、天津各高校1700多位教师听取报告。周恩来的谦虚谨慎、谆谆善诱，坦言自己的家庭身世及自我改造的心路历程，使听者莫不感动。[3] 正如陈永发所说：“知识分子因为心中的愧疚而承认自己需要改造。因此他们对中共的思想改造工作，与其说是抗拒，毋宁说

---

〔1〕陈举例说，罗隆基投奔中共后享受四级干部的待遇，拥有秘书、厨师、司机、护士、保姆、警卫，外加一部汽车及私人四合院住宅。这种优渥的待遇，加上官位和职务，决非国民党时期“贫穷化”以后的罗隆基所能想象。重庆时代因为反蒋而遭囚禁的经济学家马寅初，于1951年被中共延揽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他也有同样的感觉。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第661页。

〔2〕1949年11月27日、1950年1月3日、1月22日、10月11日、2月2日《人民日报》。

〔3〕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188—1191页。另参见王先俊：《建国初期的社会变迁与党对思想文化的整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42页。

是欢迎。”[1]

然而，接下来的运动却日趋激烈。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梁漱溟的“九天九地”，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俞平伯的红学研究，一步步形成了政治围攻，知识界感到的压力与日俱增。这些运动未必能打碎知识分子埋在心底的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但可以迫使大多数人屈服于权威，至少暂时接受新的立场和观念。显然，毛泽东要使资产阶级思想“名声扫地”，事实上也就要先使知识分子“名声扫地”。最严重的和令人不寒而栗的，是1955年由追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引起的肃反运动。根据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苏联通报的情况，在中共中央划定的范围内，工人、职员、现役军人、科学工作者、大学生，一直到乡一级的所有干部，都属于肃反审查之列，拟定全国总共审查1200万人。到9月中旬时，已经“仔细审查了”222万人，其中已查明的反革命分子、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有11.8万人，揭露出11000个集团和派别。[2]这里，最受“关注”的是“500万知识分子和干部”。不但一般知识分子必须参加肃反，而且大学和中专的学生也必须参加坦白检举运动。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历史、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受审查、被牵连的人也就更多。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反革命分子一般地控制在5%左右。[3]这在运动中实际上成了各部门、各地区必须达到的最低目标，而实际人数则远远超出了这个比例。据1956年1月各地向中央汇报的数字，在参加肃反运动人员中被斗争的人，在山西为5.5%，河北6.4%，贵州7.5%，云南9.6%，广西14.1%，有的专区（福建龙溪）内定的斗争对象高达30.9%。特别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斗争面更大，如河北省20.9%的教

---

〔1〕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第658—659页。

〔2〕陆定一与苏联使馆官员的谈话记录，1955年10月22日，АВПРФ，ф.0100，оп.48，д.9，п.393，л.195—197。转引自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ИДВ РАН，2000，с.148—149。

〔3〕罗瑞卿在各省市委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56年7月5日，陕西省档案馆，123—40—15，第78—87页。

授、20.97%的工程师，都被列为重点斗争对象。这个比例，在贵州省工业厅工程师中竟高达58%。[1] 即使那些“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学者也不能幸免，按照陆定一的通报，在对学术机关进行清查的过程中，拟定受审的著名学者就有250名。不过，“对这些人的审查将通过特殊方法进行”，不让他们参加斗争大会。他们还有用，“对他们应该容忍”[2]。尽管如此，知识分子的情绪还是由不满转化为恐惧，许多人“心惊胆跳”，“畏罪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3] 过了近30年，作家巴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说：这使“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4]。

1955年秋天以后，声讨胡风和肃反运动最狂暴的阶段过去了。然而，“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5] 他们不理解共产党为什么要把知识分子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为什么思想改造要采取如此暴烈的方式。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著名数学家傅种孙后来回忆说，肃反以后，“最令人伤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学间几乎不敢来往，象一盘散沙，没有粘性”[6]。北师大教授董渭川也谈到：“肃反过后，使有些人有了顾虑，愈是相熟的人，见了面，除掉谈谈天气之外，国事、校事一概‘三缄其口’，唯恐被人抓住小辫子，说不定哪一天挨整

---

〔1〕《情况简报》第91号，1956年1月，陕西省档案馆，123—40—43，第19—21页。

〔2〕陆定一与苏联使馆官员的谈话记录，1955年10月22日，АВПРФ，ф.0100，оп.48，д.9，п.393，л.195—197。转引自Б.Т.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148—149。

〔3〕中央十人小组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承认：在肃反中自杀的情况比较严重。陕西省档案馆，123—40—1，第128—132页。

〔4〕转引自《文汇月刊》1986年10月。

〔5〕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429—430页。

〔6〕《师大教学》，第123期，转引自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429页。

一番”。[1]肃反运动也打击了知识分子钻研业务的积极性。肃反后期，批判“单纯业务观点”，强调“突出政治”，许多“只问业务、不问政治”的著名学者受到批评，被迫公开检讨。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不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停止了研究，那些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也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这种现象在文艺界特别突出。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不写，解放区来的作家也屡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主题思想概念化，人物刻画公式化，作家“只能撷取生活中的一些片断现象，敷衍成一篇小说”[2]。文艺批评家们更陷入动辄挨批的境地，有的人“处处担心，唯恐‘失足’”，表现出“可惊的慎重”。[3]总之，人们“失去了对社会、对文学事业的责任心”。[4]

显然，这种状况对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极为不利。于是，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便提上了中共领导人的议事日程。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动议，来自于周恩来和李维汉，这不是偶然的。周恩来的出身、修养和秉赋，以及在上海和重庆工作时期同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界的密切交往，使他对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的理解和沟通，并与许多高层文化名人私交甚笃。建国初期大量高级知识分子从海外回来，主要就是他的努力结果。早在1955年初，周恩来就有意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5]但这个想法与即将开展的批判胡风和肃反运动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直到肃反运动的高潮告一段落，问题才有可能提上

---

〔1〕《师大教学》，第114期，转引自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429页。

〔2〕林默涵：《两年来的短篇小说》，《文艺报》1956年第4号，转引自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430页。

〔3〕赵易：《五十度的微温》，《文艺报》1956年第3号，转引自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430页。

〔4〕陈骢：《“跑道”内外》，《文艺报》1956年第3号，转引自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430页。

〔5〕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195页。

日程。[1]

由于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党外，所以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举动必须首先从民主党派开始。1955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决定把知识分子问题作为近期工作的重点，推动民主党派，主要是中国民主同盟，去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李先把社会学家费孝通请来商议，随后通过费孝通的积极串联，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搞调查，获得了一大批第一手材料”。材料送到统战部，整理归纳出六个方面的问题，简称“六不”，即“一是估计不足，包括对他们的政治进步和业务水平都估计不足；二是信任不够，如他们应该看的资料不让他们看等；三是安排不妥；四是使用不当，该用的，有的没有用或用非所长；五是待遇不公；六是帮助不够。”李维汉听过汇报后，立即与周恩来进行面谈。[2] 过了几天，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章伯钧在11月9日又直接向周恩来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章伯钧说，农业合作化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了，这两翼都配合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主体前进了，那么，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应该讨论一下。[3]

这些材料为周恩来正式向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依据。11月22日，周恩来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这些情况，并表露了他本人对知识分子受到伤害的忧虑：“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为此，周恩来提出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

〔1〕肃反运动从1955年夏天到1958年底共分四个阶段进行，1955年夏秋的第一阶段是高潮。对运动进行总结时，中共注意到肃反中出现了“斗争面过宽”和“处理上有偏严现象”的问题。见各省市、中央直属机关、军事系统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简报（之一），1956年1月22日，陕西省档案馆，123—40—43，第19—21页。

〔2〕1983年12月12日访问于刚谈话记录，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194—1195页。

〔3〕周恩来在政协一届十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1月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11月24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195页。

上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表示："我们应该先在党内很好地讨论，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商议，并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还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开始会议的筹备工作。[1]

11月2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向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布置各地开展调查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要求各地在党中央开会之前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像中央那样成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领导小组。周恩来说，"因为建设就需要知识分子"，要进一步让高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服务，要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还说，对知识分子要坚持用而不疑，给予信任。[2]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要求各省市委在12月都召开一次知识分子会议。[3]

但是，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并非没有阻力。中共领导人早就意识到缺乏知识分子对于经济建设来说是一个严重问题。[4]但是，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中下层干部，就是在最高层领导人眼里，也大都把知识分子看做"异类"。[5]实际

〔1〕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195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19—520页。

〔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11月24日。凡未注明文件出处的，均为笔者在社会上收集到的史料。下同。

〔4〕罗申与陈云谈话记录，1949年10月28日，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58—62。

〔5〕有研究者考察过，在红军的时候，"'知识分子'一度是一个不中听的骂人的话"。〔杜蒲：《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3页。〕这就难怪在中共干部对知识分子的称谓中，往往习惯性地加上一个定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上，这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正是毛泽东本人的思想。[1] 近年来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来源于他早年的经历，以及后来由此产生的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心理。[2] 这种看法是否准确，值得怀疑。毛泽东在感情上确与知识分子有相当隔膜，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与其说源于他早起受到伤害的心理阴影，不如说源于中国革命走过的独特道路以及由此而强化的党内民粹主义思想。毛泽东从来不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体的一部分，他的著名的"皮毛"论就是非常典型的说法。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工农，知识分子只有通过思想和感情的痛苦转变，实现与工农相结合，才能对中国革命有所贡献。而在旧社会，知识分子就其多数来说，由于其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生活态度，基本上是依附于地主、资产阶级，依附于旧政权的一群人，让这些具有独立意识和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实现这种转变谈何容易。[3] 因此，新政权建立以后，毛泽东首先把知识分子看做是共产党整合意识形态的主要障碍和对象，就不难理解了。

毛泽东的看法在中共党内有相当的代表性。最近披露的一份俄国档案记载说："同陈云对工业战线的资产阶级专家不满一样，郭沫若也对国民党留下的专家表示忧虑。他在1949年10月28日同苏联大使讲过：'这里有20多所高校。这些大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地主和城市资

〔1〕有学者考证，作为《毛泽东选集》开篇文章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是经过大量删节的，所删去的就是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分析。在那里，毛泽东称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派"。当时此文影响极大，致使部分北伐军竟提出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39页。〕

〔2〕参见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第191—193页。

〔3〕毛泽东关于"皮毛"理论最经典的论述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52—454页，其他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76—1681、1683—1695页。

产阶级的孩子。高校学生中不仅没有工农子弟，甚至连富农的子弟都很少。’郭沫若还对罗申说：‘最糟糕的是科学院的状况，这里聚集了不少旧的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1〕但是，中国缺少的就是知识分子，尽管在政治上对他们不信任，却又不得不使用。〔2〕于是，就要强迫“皮毛相附”，对他们进行强制性的思想改造。1955年1月8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谈时，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种意图。毛泽东说：“（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缺乏联系。他们头脑里有一大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还处在资产阶级思想，尤其是从美国人那里继承而来的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共中央制定了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准备在科学、艺术、文学整个基本方向上，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毛泽东还表示了这样的决心：“我们一定要使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在党员的心目中和人民群众、非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名声扫地，即使不能做到彻底，至少也得使其极大地名声扫地。”〔3〕他确实这样做了。

无论实际效果如何，在毛泽东看来，到1955年底，他的目标基本上是达到了。经过改造，多数知识分子已经表现出服从的态度。然而，这种改造也带来了一个不良后果，就是知识分子的普遍消沉。这对实现毛泽东的宏伟设想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毛泽东认为，面对新中国的建设，现在农业取得了主动，资本主义工商业取得了主动，“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4〕显然，现在轮到知识分

〔1〕罗申与郭沫若谈话备忘录，1949年10月28日以后。АВПРФ，ф.100，оп.42，п.288，д.19，л.63—65。

〔2〕1955年底，据统计，在科研、工程技术、教育、卫生、文艺五个方面工作的知识分子，共有384万人，包括高级知识分子10万人，其中共产党员仅占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810页。〕

〔3〕尤金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55年1月8日。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3，д.9，л.24—30。

〔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0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69页。

子“主动”了。

## 动员全党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

中央十人小组成立的第二天，周恩来就邀请中国科学院、建筑工程设计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中国戏剧学院的有关人员座谈，了解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知识分子的现状。又请了各门学科的第一流科学家谈话，核实情况。[1] 周恩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武汉、重庆等大城市，全面调查建国6年来知识分子的变化情况，收集整理出材料。同时要求中央各办、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指定专人研究这个问题。11月25日，周恩来召集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动员民盟、民革、九三学社、民进、民建等各民主党派搜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2] 11月30日，周恩来起草了《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并审定了一份《关于收集知识分子问题材料的题目单》，其中包括对政治和业务状况的估计、对知识分子的信任等12个方面的问题。[3] 对于多少有些急功近利的发展需求来说，中共领导人关注的似乎主要是10万高级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195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发出的《关于收集高级知识分子统计数字办法的规定》明确指出，“此次调查统计仅仅限于

〔1〕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196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22—523页。

〔3〕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197页。1956年1月10日十人小组又发出通知，对调查材料提出了具体要求，即应有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卫生部门、文化艺术界、工程技术部门、中小学校六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要有好、中、差三类典型，并且要包括几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对知识分子队伍所发生变化做出基本估计和提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具体意见等三项基本内容。〔熊华源：《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第15页。〕

高级知识分子。”[1]

由于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和过问，知识分子问题自然引起各地和中央各部门的重视，在全党上下形成了检讨知识分子工作问题的氛围。12月1日，张闻天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作报告，专门谈了“大知识分子问题”。他提出，“我们对大知识分子是否信任？……我看对到过美国、英国的就不够信任，肃反运动一来对他们就更加警惕。”他还说，大知识分子人数很少，十分可贵，如使用不当就是浪费。一些人就是入不了党，看戏的时候他们坐后面，首长坐前面，对他们尊重不够。应该尊重知识分子，不要对有技术的人总是看不顺眼，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能强求一致。[2]中央统战部在召开对资产阶级改造座谈会期间，也专门讨论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李维汉指出，知识分子属于脑力劳动者，以自己劳动收入为生活来源，同资产阶级有根本的区别。应当同志式地帮助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知识专长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提出，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需要经过长期耐心细致的工作，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强制的办法。在学术思想批判中，要鼓励自由辩论，允许批评与反批评，允许保留个人的意见，不要急于作结论。李维汉还强调，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对立的思想体系，但是不能把具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专家学者作为“思想敌人”对待。[3]这些都表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重点开始从“改造”转为“使用和培养”。

12月16日，中央十人小组拟就《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以下简称《指示（草案）》〕，并下发征求意见。《指示（草案）》明确写道：“目前，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较之全国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23页。

〔2〕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003—1004页。

〔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810页。

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他们的政治变化估计不足，不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立场把他们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了解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亲密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因而同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隔阂。……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每一项工作愈来愈多地依靠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就是愈来愈多地依靠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1]《指示（草案）》强调了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培养，至于思想改造，则相应放宽了政策：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应该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而应该采取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使他们逐步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毛泽东在此处加了一段话：“对于这种人，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2]由此看出，毛泽东此时对解决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表现出足够的自信和耐心。

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中央十人小组一鼓作气起草了“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问题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理论教育工作规划（1956—1967）的初步意见”、“关于解决在党外科学家、教授、医生、作家、艺术家中一部分人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关于高等学校未开课教师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关于城市失业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等11个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报告。与此同时，周恩来将在大会所作的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1〕《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1955年12月16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197—1198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76页。

也准备好了。1956年1月中旬，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1]准备提交大会的还有一些地方和部门上报中央的调查报告。[2]

根据中央的指示，各省市都成立了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小组，于1955年底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向中央提交了调查研究报告。虽然目前研究者还很难看到这些报告，但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从1955年12月底到1956年1月，陆续刊登了新华社驻各地分社发出的电讯，充分反映了山西、江苏、湖南、广西、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哈尔滨等地区和城市知识分子状况和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情况。[3]1956年1月21日第10期刊登了"各地知识分子工作中的问题"的综合报道。笔者还在上海市、吉林省档案馆看到一些调查报告和总结发言。这些报道或报告都是在《指示（草案）》下发后写出来的，对于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没有超出中央的口径，检查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偏向"，也基本上限于"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六个方面。尽管如此，仍然为研究者了解当时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

各地检查知识分子的工作都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判断，即认为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1955年12

〔1〕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200页；熊华源：《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第15—16页。

〔2〕谢泳说："我在旧书摊上见到过一部分散落的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简报，从编号上看，会上印发过大量的材料，这些东西对于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是有价值的。"〔谢泳：《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四个著名知识分子五十年代的言论》，见国际互联网"谢泳居"网页。〕

〔3〕参见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5年第253、254期；1956年第2、3、5、6、10、12、15期。《内部参考》，1949年创刊，1964年停刊。当时只供中共高级干部阅读，现已成为公开史料，在一些海外图书馆即可看到，笔者就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查阅的相关资料。

月25日在省委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全省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仅和解放以前不同，和解放后的初期，都有所不同”。全省1699名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分子大体上要占40%左右，中间分子大约占35%左右，落后分子大约占20%左右。反革命分子和思想反动分子一般不超出5%到10%。[1] 来自重庆市的报告说，重庆246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其中“积极分子和中间分子占绝大多数”。重庆大学讲师以上人员114人，其中进步分子54人，占47.4%；中间分子43人，占37.7%；落后分子12人，占10.5%；坏分子和反革命嫌疑分子仅占4.4%。[2] 云南省的估计比较悲观，认为全省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的仅占20%—30%；中间的占30%—40%；落后的仍占20%—30%；反革命分子约占5%。[3] 江苏省的估计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约占50%，中间的约占35%，落后的（包括少数反革命分子在内）约占15%。[4] 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和可靠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政治排队的做法本身，就说明中共在整体上还是把高级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的。不过，有一点与以往不同：各地的分析都承认，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与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相比有了很大进步，积极分子和中间分子增多，落后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大为减少。正是基于这种估计，各级党委的关注点，从警惕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转向检查自己在知识分子工作中的“缺点和偏向”。

各地反映出来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一是政治上的信任问题，即所谓“估计不足、信任不够”。从各地反映的情况看出，尽管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或主动或被动地表示了对新制度的顺从，仍然难以取得中共各级党组织的信任。普遍

〔1〕宋振庭：《关于几年来对知识分子进行工作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工作意见》，1955年12月25日。吉林省档案馆，1—11/1—1955.55，第57—70张。

〔2〕《内部参考》，1956年1月10日第2期，第28—30页。

〔3〕《内部参考》，1956年1月11日第3期，第45—47页。

〔4〕《内部参考》，1956年1月11日第3期，第38—41页。

的反映是，干部对知识分子建国以来政治上思想上的进步“估计不足”。一些人以“江山好改，本性难移”的思想一成不变地看待知识分子。[1] 上海的材料反映，对知识分子中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常常不加分析地与反革命问题混淆在一起，对“落后表现与反革命表现常常区别不清”，“运动中打击面过宽”，“可以不伤感情的人也伤了感情”。“三反”时，华东纺织管理局的技术人员“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被不同程度斗争过”。[2] 不仅对高级知识分子不信任，对中、小知识分子包括农村中小学教师也同样如此，甚至更为严重。如1955年12月江苏省第三次农村宣传工作会议上反映，“一般干部都认为知识分子是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出身，历史复杂，不可信任”。“邳县有200多小学教师无选举权”。有些地方谈到知识分子时“先问成份”，如是地主、富农成分，则“罪加一等”。[3]

这种普遍而又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除了受中共对知识分子总体估计的影响外，也来自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感情上的隔膜。在那些干部中，对知识分子普遍存在双重心理：一是轻视，二是害怕。江苏的材料反映，有些人一方面把曾在英、美等国家留过学的老教授、研究员、工程师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样子，官僚主义的架子”，工程师是“签签到，批批号，到期拿钞票”的人；一方面又“认为知识分子难领导、难相处”，“不敢对知识分子做报告，不敢和高级知识分子接触”。南通县宣传部部长说：“到中学去有顾虑，感到没话讲。”[4] 陕西流传的一个说法十分典型：许多党员负责人认为，高级知识分子“看起来不顺眼，用起来不顺手”。[5]

〔1〕《内部参考》，1956年1月11日第3期，第38—41页。

〔2〕华东纺织管理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检查报告，1956年1月3日。上海市档案馆，A22—2—516，第219—224张。

〔3〕《内部参考》，1955年12月29日第253期，第284—290页。

〔4〕《内部参考》，1956年1月11日第3期，第38—41页；1955年12月29日第253期，第284—290页。

〔5〕《内部参考》，1955年12月29日第253期，第284—290页。

中共干部的不信任，使知识分子，包括积极靠近党的知识分子，都感到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华东纺织管理局一级机电总工程师陆芙塘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我们和领导之间，总有一条鸿沟，虽宽窄不一，但都是有的，有些同志很想靠近党，（但）好像党有些不愿伸手的样子。"纺织一厂一个技术人员说的更直接一些："我们和领导同志之间是面和心不和，见面都很客气，但从来没有深谈过。"华东纺织管理局的调查报告认为，"这些话相当普遍地反映了目前我们党的领导者和技术人员之间的一般关系"。[1] 重庆市反映，不少高级知识分子认为"领导上把自己当外人看"，"组织上不信任"，因而"作客思想"甚为普遍，"好像只是帮党的忙似的"。[2] 广西民盟副主委石兆棠说："在新时代里，知识分子像一个新嫁娘，又喜欢，又害怕，想骄傲，又自卑。翁姑、小姑那么多，找缺点的人毕竟多，给予同情关怀的人毕竟少，这样三天下厨打烂碗的机会也毕竟多一些了。"[3]

各地反映的另一个情况是，在高级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的问题上，中共各级组织普遍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政策。北京市高级知识分子最多，有15000人以上，其中许多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工程师、医师、作家、艺术家，仅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就有153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有400多人加入了共产党，在全国是最多的。但即使如此，同样存在着关门主义的倾向，不少人虽"再三申请入党，也没有被接受"。如北京大学，只发展了极少数的教授入党，且以种种原因使他们四五年不能转正。[4] 其他省、市更是如此。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曾有16位教授写了入党申请书，不少老教授表示"以余年献给党"，却始终没有得到党组织

〔1〕华东纺织管理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检查报告，1956年1月3日。上海市档案馆，A22—2—516，第219—224张。

〔2〕《内部参考》，1956年1月10日第2期，第28—30页。

〔3〕《内部参考》，1956年1月11日第3期，第49页。

〔4〕《内部参考》，1956年1月21日第10期，第131—139页。

的青睐，不少单位没有发展一个党员。全市8所大专学校的259名教授中，只发展了一个党员。[1] 南京市9个高等学校没有吸收一名教授入党。[2] 湖南也是全省没有吸收一名教授。[3] 河南省也只发展了一名教授。[4] 江苏有些县委组织部甚至在布置工作时公然宣布“在教师中不建党”。[5] 这种关门主义使许多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很受挫折，哈尔滨就有高级知识分子说怪话：“捧着猪头进不了庙”。[6]

二是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即所谓“安排不妥、使用不当”。政治上的不信任，自然影响到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高级知识分子用非所学，专业知识和技术专长得不到发挥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更不可思议的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失业现象。据薄一波讲，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写出了许多有关的专题报告。如一位擅长水墨花鸟画教学的著名画家、教授，所在美术学院却不让他开课，而派他到图书馆去写书签，到陶瓷科去画瓷碗，后来干脆由工会安排他去给教职员工买戏票。上海第一重工业局业务处有23名工程师，其中16人被安排做行政工作。一位在学术上有建树的甾体化学家（属医药学领域），却被分配做应用化学方面的工作，使他有“硬逼木匠去种田”之感。有些科学家、教授的社会活动过多，如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当时很少有时间从事科研工作，内心十分苦闷；协和医学院妇产科教授林巧稚在校外兼职多达13项，严重影响她的医疗、教学和研究工作。据北京、天津、广州等128个城市统计，失业的高级知识分子竟有3005人。[7] 这种现象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中也有大量反映，失业或用非所学的情况如：广东大埔县有一个留学比利时的工程师得不到工作安置；

[1]《内部参考》，1956年1月10日第2期，第28—30页。
[2]《内部参考》，1956年1月11日第3期，第38—41页。
[3]《内部参考》，1956年1月10日第2期，第18—22页。
[4]《内部参考》，1956年1月21日第10期，第131—139页。
[5]《内部参考》，1955年12月29日第253期，第284—290页。
[6]《内部参考》，1956年1月10日第2期，第32—35页。
[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01—503页。

佛山市重修“祖庙”时，本来应负责雕塑墙画的雕塑家布柏生，却在建筑工会里当一名杂工；海丰县有9个大学生当了售货员；佛山市共有24名大学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其中有14人失业。海南地区有的部门分配大学生做记账、收发或挂号工作。[1] 马祖铭曾在北京大学做过中文教授，江苏徐州地委却分配他在工农干部学校教初小的语文，结果学员们在上课时听不懂，就批评他：“大学教授连初小都教不好”。苏州市把做过大学教授的沈维钧，分配在园林管理处做办事员。[2] 兼职或社会活动过多的情况如：江南水泥厂的工程师张阳谷，一个星期参加了29个大小会议；南京大学校长潘菽，身兼11职，经常在外面跑；南京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身兼16职，一个学期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校工作；南京农学院院长金善宝，过去身兼18职，现在兼13职，别人都说他是“会议校长”。[3] 而西北医学院院长侯宗濂，兼职竟达24个，一年有七八个月在外面开会。[4] 有的老教授因为科学研究时间太少，心情十分苦闷。天津棉纺二厂的技术干部的技术工作时间仅占20%—30%，有时一个人一天开五六个会，有的车间主任四天不下车间，光开会。[5] 如此等等。

这种高级知识分子用非所学甚至失业的状况，是对奇缺的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还有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隐形浪费现象，就是许多知识分子虽在其位，却不能谋其事。武汉市反映，“在工厂内部，有的工程师可以参加画圈，但不能下现场。在学校中有的可以在课堂上教课，但不能到工厂实习，使一批人惶惑不安。大学里系主任不如系秘书（党团员）有权。”[6] 哈尔滨市反映，“在学校中，有些非党系主任的意见，党员干部说‘没接到党的通知’就不执行”。有的工厂

〔1〕《内部参考》，1956年1月16日第6期，第91—92页。
〔2〕《内部参考》，1956年1月11日第3期，第38—41页。
〔3〕《内部参考》，1956年1月11日第3期，第38—41页。
〔4〕《内部参考》，1956年1月11日第3期，第43—45页。
〔5〕《内部参考》，1956年1月10日第2期，第22—25页。
〔6〕《内部参考》，1956年1月10日第2期，第25—28页。

“高等技术人员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往往不研究，不采纳，一律认为是不愿学习苏联先进经验”。[1] 山西省的材料说，太原矿山机器厂科研人员的成果得不到尊重，“有的对技术问题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进行表决”。[2]

三是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涉及这个问题的材料不太多，反映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的省市认为在这方面问题不大，如重庆市反映，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对生活待遇没有大的意见，他们认为，“国家的钱的确用到建设上去了，一般党、政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生活也是艰苦朴素的，今天的生活比起解放前十来年，已经算不错了”。天津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也认为，生活待遇“比抗日战争前是降低了，但比供给制干部就没话可说了”。但这很有可能是不真实或不全面的反映，因为在同一篇报道中还谈到：家庭人口多生活有困难的，“虽有意见，但不敢公开讲”。[3] 有些省、市则反映出强烈的不满情绪，所提意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没有正常的晋级制度，一是待遇差别不合理。江苏省有些人对6年来不晋级“很不高兴”。[4] 太原钢铁厂32个工程师中只有两人升了级，20多个一级技术员没有一人升级。[5] 安徽、河南等省也都反映，缺乏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等级标准和妥善的晋级制度，很多人长期得不到晋级。[6] 此外，武汉的工程师、教授普遍反映，工资待遇地区差别和工程之间差别很大，东北、上海同一级别的工程师、教授的待遇比武汉高。[7] 相对于高级知识分子，中、小知识分子，特别是小学教师的生活要清苦得多。江苏江都县湾头区58个小学教师，只有一个中心小学的校长拿月薪36.3元（比国

〔1〕《内部参考》，1956年1月10日第2期，第32—35页。
〔2〕《内部参考》，1955年12月31日第254期，第303—305页。
〔3〕《内部参考》，1956年1月10日第2期，第22—25页。
〔4〕《内部参考》，1956年1月11日第3期，第38—41页。
〔5〕《内部参考》，1955年12月31日第254期，第303—305页。
〔6〕《内部参考》，1956年1月21日第10期，第131—139页。
〔7〕《内部参考》，1956年1月10日第2期，第25—28页。

家机关24级干部待遇还低），其余有3人拿32元（相当于25级干部待遇）；22人拿26元（相当于26级勤杂人员待遇）；还有21人只拿20元左右。所得薪金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甚至靠借贷度日。他们自嘲："光荣愉快伟大的嘴，悲观失望痉挛的心。"[1]

仔细翻阅和对比这些材料不难发现，尽管遵照中央的指示，各地都在刻意检查知识分子工作中的问题，但都回避了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造成的伤痛，以及知识分子最为珍重的学术思想自由的问题。就目前笔者所见，只有江苏省的两份材料谨慎地提到了知识分子在以往政治运动中承受打击及其后果的问题。如有些单位在肃反运动中，打击面太宽，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有的人怕"祸从口出"，不敢讲话，不敢与人往来；苏北师范专科学校在肃反中对教师采取"普遍地大胆怀疑的态度"，结果是"不讲不斗，愈讲愈斗"，打击面扩大到14.8%。[2]"很多县初步排队，中、小学教师中有问题的达百分之四、五、六十，凡是过去自觉交代的材料都当做罪行，认为中央提出的百分之五左右根本不可能。"[3]其他省、市的材料则一概回避了这个问题，有的报道甚至以赞同的口气谈到，在肃反运动中，"高级知识分子中的重点对象平均在百分之十以上"。[4]对于批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造成的知识分子群体性的压抑和恐惧状况，在1955年底中共各级组织所作的知识分子问题调查中，没有得到正确的反映。究其原因，中共干部的认识局限是一个问题，更主要的恐怕是被调查者不敢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5]

---

〔1〕《内部参考》，1956年1月11日第3期，第38—41页。

〔2〕《内部参考》，1956年1月11日第3期，第38—41页。

〔3〕《内部参考》，1955年12月29日第253期，第284—290页。

〔4〕《内部参考》，1956年1月11日第3期，第47—49页。

〔5〕许多人抱定了不说话的态度，昆明市教育界人士的心态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共产党对我们的办法是三年一大整，一年一小整"。他们估计共产党到1958年又会大整一次，因此订了个人的三年计划，"三年内不发牢骚，不出风头，不暴露思想"。〔《内部参考》，1956年1月11日第3期，第45—47页。〕

这种现象是不难理解的，在中共干部的理念中，承认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取得了极大进步，正是以完全肯定以往针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改造运动为前提的，而把这种进步看做是这些运动的积极成果。况且，即便是经历了如此深刻的改造，按照各地党委的估算，在知识分子中仍然有20%左右的落后分子，5%左右的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有的地区（如云南）的估计，这两种知识分子竟达到25%—35%！[1]如果按照一般的比例来计算，那么在全国10万名高级知识分子中，就有2万个落后分子，5000个敌对分子。这个结果是否符合实际状况暂且不论，就凭这种思维模式，是否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知识分子政策、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值得怀疑。

正是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尽管意识到知识分子工作存在严重问题，但中共并没有放松对“反动”知识分子的警惕。就在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前夕，1955年12月底中共吉林省委召开知识分子工作干部会议的情况很说明问题。省委书记处书记富振声在谈到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时指出，承认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是不是就认为高级知识分子中在政治立场、思想观点上都没有问题了呢？就可以忽视对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任务呢？不是的”。因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中的说法，“必须看到，不但中间分子，就是进步分子，在思想上一般地也还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还必须对他们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和必要的思想上的斗争，以便继续帮助他们改造自己，逐步地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所以，省委强调，“我们要反对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右倾保守主义，但也不能否认过去‘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所起的重大作用；过去的成绩是主要的，不能因为过去工作中有某些缺点，就否定一切。……肃反中，许多单位检查，斗争面过宽，重点对象大大超过了中央指示的百分之五左右的控制数字。各单位应立即根

〔1〕《内部参考》，1956年1月11日第3期，第45—47页。

据中央指示精神，进行复查，重新排队，端正政策；但同时在具体单位，又要根据中央指示草案中规定的界限，实事求是地加以区分，不要使反革命分子漏网。工矿企业的专案小组，按中央规定，应吸收党员工程师参加，不应吸收非党知识分子参加。各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工厂矿山、基建单位必须按中央指示，认真领导肃反斗争，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1]

这种态度和立场，预定了即将开始调整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限度，同时也决定了已经进行的知识分子问题调查的内容。总之，以往对知识分子的打击以及由此给他们造成的痛苦，是中共干部和知识分子本身都不愿或不敢启口的。至于知识分子追求的学术思想上的自由问题，更是人们绝口不谈的——大概高级知识分子不敢有此奢望，估计中共干部也不会给予理解。无论如何，这次大规模调查反映了不少情况，但与知识分子的真实思想状况还是有相当距离的。没有真实的和客观的信息为依据，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

## 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政策调整

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279人，包括57位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上海局、各省委、市、自治区党委和27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国家机关各部门、全国性群众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党员负责人。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主题报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

〔1〕富振声在中共吉林省委知识分子工作干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5年12月30日。吉林省档案馆，1—11/1—1955.55，第11—19张。

作了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说明。1月16日至20日，会议展开讨论，主要是大会发言，发言者前后达61人之多（另有29人印发了发言稿）。周恩来的报告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和11个专题报告也是讨论的主要议题。在大会最后一天，陆定一、陈伯达、李富春、彭真、陈云先后在会上发言，毛泽东到会作重要讲话，最后由周恩来作结论。[1] 召开如此规模、如此规格的大会，建国以后是不多见的。杨尚昆日记记载："从去年下半年起，中央连续开了几个大会，以这次大会的人最多、方面最广。"[2] 足见中共动员之广泛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心之坚定。

中共中央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周恩来作的报告中。这个报告是由周恩来主持、胡乔木执笔写成的。周恩来自己先草拟了一份《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后约胡乔木谈报告起草问题。1月上旬，胡乔木写出报告初稿后，周恩来召集中央十人领导小组会议进行了三天的讨论修改。最后，周恩来又亲自修改并增写了一些内容。[3] 目前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毛泽东是否看过这个报告稿，或者有什么具体意见。毛泽东当时关注的是他主持起草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6年1月8日和9日，周恩来先后收到毛泽东的两封来信，都是关于要求中央政治局讨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并要求"发给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到会各同志"。[4] 按常规，周恩来的报告一定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到通过才能提交大会，但目前看到的材料不能为此提供证明。查《毛泽东传》、《周恩来年谱》和《刘少奇年谱》以及其他文献，都没有发现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过这份报告以及其他

---

〔1〕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200—1201页；熊华源：《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第15—16页。

〔2〕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28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38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37页。

有关的会议文件，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1] 显然，报告贯穿了周恩来本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想法，但它毕竟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意见，因此其中必然会协调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各种不同看法。[2]

周恩来的报告首先坦言，国家面临的一个矛盾就是各类专业人才的匮乏。报告认为，当前知识分子的力量，在各个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的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周恩来明确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正是为了“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报告把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必要性确立在三个基点上：

第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中国必须急起直追。报告用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讲科学工作。在报告中，周恩来提醒代表们说，“世界科学技术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其意义“远远超过蒸气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周恩来以异常紧迫的心情呼吁：“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大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

第二，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有很大进步，其阶级属性发生了重大变化。报告确认，“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这里，

---

〔1〕或许毛泽东当时的注意力不在于此，或许他对报告的某些提法有不同意见，这个问题只能等待相关的档案文献披露出来才能回答。

〔2〕以下关于周恩来报告的引文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1—45页。

周恩来提出了两条依据：一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一是政治上、思想上“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前者是一个事实陈述，知识分子被“包下来”，也就自然成为拿国家工资，为国家服务的“工作人员”，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后者则是一个大胆的政治性判断，而且在党内是有不同看法的。为了证明这个判断，周恩来用相当的篇幅来说明知识分子何以发生了“根本变化”，还试图用一些统计数据来说服全党。这就是，目前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进步分子约占40%左右，中间分子也约占40%，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当然，周恩来看来，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变化是对其思想改造的成果。

第三，中共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周恩来指出，党内对待知识分子存在麻痹迁就和宗派主义两种倾向，但主要倾向是低估了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周恩来特别批评说，在“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的今天，普遍存在的“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的想法是要不得的。

针对这些问题，周恩来提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周恩来还提出要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

关于学位、学衔、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了分工：在国务院内准备设立一个中国专家局，负责需要中央统一解决的行政管理工作，但各部门不能减少他们直接处理的责任；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处理反革命分子等政治性质的问题仍由各有关部门直接负责，中宣部负责统一监督；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则由中央组织部负责。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他首先谈的还是在经济建设中反对右倾保守的问题，说到要在科学技术方面有计划地赶上外国时，提出了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批评党内存在着一种情绪："老子打了一辈子仗，没有你也行！"毛泽东还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没有文化，文化很低，无知，愚蠢，要革这个命，要技术革命，没有你也行呀，没有他们就不行了，这个很清楚，单是我们这些老粗那就不行。毛泽东强调，关于这方面要向党员进行广泛教育。还说，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造出大批的知识分子，高级的知识分子。[1]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没有提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强调的只是使用知识分子以及培养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根据和条件而言，周恩来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阶级属性已经改变的现状出发，突出的是问题的合理性，而毛泽东重点是谈使用知识分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给人的感觉是更具功利性。

尽管中共内部在认识上存在分歧，但目标是一致的，因此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心仍然很大。会议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步骤。2月24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地不足以适应国家的需要，因而要求全党"进一步地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提出改进

〔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20日。

意见，并及时向中央作报告。[1] 4—5月间，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了组织部《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情况的报告》、统战部《关于解决高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士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5月，国务院成立了专家局，专门管理高级知识分子，负责督促、检查各部门对专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情况，负责解决需要统一处理的有关专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同时，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分别成立了有关办事机构。7月20日，国务院转发了由研究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小组提出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以下简称《情况和意见》）以及关于这个文件的《通知》。《情况和意见》就有关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14个问题（图书、资料、情报、学术交流、仪器、试剂、实验用土地、研究经费、工作室、助手、工作时间等），分别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和措施。《通知》开列了一个很长的应办理的有关事务的目录，要求各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关于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2]

贯穿于1956年全年的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的工作，成为中共地方各级党委紧跟中央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央会议结束后，各地纷纷进行传达贯彻，并制定出自己的知识分子工作纲要。中共上海市委于2月制定了《上海市1956—1957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要求上海各级党组织在3月底以前对知识分子工作作一次全面的检查，切实解决全市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工作安排、思想改造、生活待遇以及建党等各方面存在的主要

〔1〕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1956年2月24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132—147页。

〔2〕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250—251页；国务院办公厅大事记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送审稿）》第4卷，1991年，未刊，第61—62页。

问题。[1]根据中共上呼下应的惯例，不仅省一级，地县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党组也都制定了知识分子工作纲要。如中共佛山市委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于2月22日发出《佛山知识分子工作规划（1956—1957）》。[2]中共北京建筑工程委员会也制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规划》。[3]在舆论上，“全国大小报刊上的大批判文章迅速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对知识分子重要作用的宣传，对著名知识分子近况的报道。”[4]

中央和各地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做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4月1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对当地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医师、文学家、艺术家的工作条件作一次检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一是迅速解决高级知识分子缺少助手的困难；二是积极地解决所缺房屋、所需实验用土地和基本建设的地皮等问题；三是切实改善图书、文物、档案和各种资料的收集、保管、整理、利用的状况。[5]在1956年的工资改革中，提高了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上海市的规定更加具体，如要求市卫生局半年内首先改善3000余名学术地位较高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医疗条件；市房管局先拨出宿舍房屋500户，分配给著名学者、专家、作家、艺术家居住；市工联利用已有工人休养所来扩大高级知识分子的休养名额；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负责解决年老体弱、工作繁重的“第一流专家”的交通问题；市合作总社

〔1〕《上海市1956—1957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1956年2月。上海市档案馆，A22—2—515，第2—6张。

〔2〕见国际互联网，佛山市图书馆，www.fslib.com.cn。

〔3〕见国际互联网，北京党建，www.bjdj.gov.cn。

〔4〕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442页。

〔5〕国务院办公厅大事记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送审稿）》第3卷，1991年，未刊，第316—317页。

做好高级知识分子各种副食品的供应工作，等等。[1]各地在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医科大学都为教授们专辟了阅览室。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准备补订200种外文期刊和3000种外文书籍。北京大学的教学辅助人员将增加一倍，即110人。复旦大学各系配备了科研秘书，并且准备给老科学家配备助手和增加实验室人员。许多高等学校还采取各种办法改善教师们的生活条件。清华大学实行了"优待通用证"的办法，教授、副教授等拿着"优待通用证"到校医室看病、到食堂吃饭和到消费合作社买东西，都可以受到优先和其他照顾。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对教师吃饭、理发、看病、购买东西等也订出了照顾办法。中国医科大学为教授和部分讲师增加了住宅面积。东北药学院在食堂给教授讲师设立了专席，等等。[2]中国科学院图书经费也由原来80万元增为546万元，增订的书刊中有资本主义国家期刊2000种。正式成立了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搜集、研究并传播国内外科学发展的情况与最新成就。[3]对于中共的这种努力，罗隆基在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的发言中给予了充分评价。他认为："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四个多月来，在解决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有了很显著的成绩"。并特别提到："最近国务院改革工资的决定实施以后，对知识分子，特别对科学技术工作者们的工资都将有较多的提高。"[4]

第二，解决知识分子失业和使用不当问题。据各地调查，社会上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就业。如据北京市1956年5月以前的调查，具有大学程度而没有就业的就有2321人，其中大学毕业的1482人，大

〔1〕《上海市1956—1957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1956年2月。上海市档案馆，A22—2—515，第2—6张。

〔2〕1956年3月14日《人民日报》。

〔3〕钱临照、谷羽主编：《中国科学院》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69页。

〔4〕罗隆基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学肄业的771人，其他68人。就学科划分而言，研究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有375人，社会科学和语文、教育的有1349人，其他科系的597人。同时，还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用非所学，使用不当。为解决这个问题，各地纷纷成立了招聘工作人员委员会。北京市走得快一些，截至7月底，已确定录用317人，还有1508人准备录用。[1] 8月11日，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国家技术委员会、国务院专家局等五个机关，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发布联合通告，向社会招聘科学研究人员、高等和中等学校教学和教育行政人员、技术人员以及翻译人员。招聘对象首先是社会上还没有就业的高级知识分子，其次是安排不当的在职专家。8月12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充分发挥我国知识界的潜在力量》。招聘工作开始后，仅北京市在两周内便有1500多人报名应聘，其中应聘科研人员、翻译人员、高校教员的有700多人。各地进展大体相同，如辽宁省截至10月上旬，有3000多名社会知识分子报名申请就业，招聘工作委员会发出了1500多份应聘书。此项工作延至1957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结束。[2] 与此同时，一些用非所学的专家的工作也作了调整。

第三，大力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中共把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视为争取知识分子“进步”和合作的重要途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要求彻底纠正“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4月，中共中央批准下达了由中央组织部制定的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计划，提出到1962年，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党员应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3]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号召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针对党内的质疑，社论指出，决不能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政治经历和社会关系复杂，就不在知识分子中发

〔1〕1956年8月12日《人民日报》。

〔2〕刘国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76页；1956年8月12日《人民日报》。

〔3〕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1956年2月24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146页。

展党员。社论甚至认为，对那些在思想作风上有比较严重缺点的知识分子，也要热情地帮助他们，“把他们逐步地提高到共产党员的水平”。[1] 根据中央的精神，各地都制定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计划。上海市规定，全市在1956、1957两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新党员11%左右，在一般知识分子中发展新党员7%左右，并要求年内完成上述建党指标的50%。[2] “从3月开始，全国刮起了一阵竞相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旋风。用多快的速度、发展多少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似乎成了紧跟中央的一个标志，有些地方党委甚至为此而打破了正常的入党程序。”[3] 官方媒体不断报道各地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消息。到建党日七一前夕，全国各地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入党，仅上海、北京两地，几个月内就有30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著名的物理学家邓稼先，物理学家谢希德，植物病理学家戴芳澜，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翻译家曹靖华，电影导演蔡楚生、张骏祥，中医赵锡武等，都是这个时候入党的。[4] 1956年上半年，中共各级组织共接收了2592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知识分子党员达到125万人，占1700多万中共党员总数的11.7%。[5]

第四，培养和扩大知识分子队伍。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有两个着眼点：一是充分使用现有知识分子，一是大力培养新生力量，以迅速扩大知识分子队伍。在中共中央拟定的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规划中，希望在12年内至少培养出100多万高级知识分子。[6] 规划提出，“必

---

〔1〕社论：《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1956年3月21日《人民日报》。

〔2〕《上海市1956—1957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1956年2月。上海市档案馆，A22—2—515，第2—6张。

〔3〕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442页。

〔4〕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352—353页。

〔5〕1956年9月14日《人民日报》。

〔6〕郭沫若：《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

须培养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足以独立地解决我国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卫生事业和其他各个部门的技术问题的专家”。同时必须“培养出一定数量的接近现代先进水平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理论科学家”。[1]中共中央所以特别重视高级知识分子，就在于他们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是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一是为国家培养新专家。因此，需要急切地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他们配助手。郭沫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殷切地提出：“我们希望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上，作到最紧张的努力，把潜在力量进一步发挥出来。”他认为，“培养专家要用带徒弟即个别指导的方式”。他要求科学院的每位导师带研究生从5个增加到10个，这样科学院12年内培养研究生就可以比原定10500多名增加一倍。[2]除了自己加紧培养，中共还从两个途径扩大高级知识分子队伍：一是委托苏联代为培养，一是继续争取仍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回国。1950年以后，中国就开始派留学生赴苏联学习，主要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据《人民日报》报道，截至1956年上半年，有1300多名中国留苏学生完成学业，已有300多名回国，其余的人也将于最近陆续回国。[3]此后，中国一面向苏联派遣留学生，一面继续不遗余力地争取滞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据当时官方摸底，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大约有7000人，他们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具有专门知识，不少人已经是科学家和高级技术人员。1956年2月22日，周恩来审阅批准了《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随后，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并作出批示，确定“普遍争取而又以在美国的留学生为重点”的方针，要求各有关部门都必须动员起来，“在大约三年时间内把尚

〔1〕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1956年2月24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141—142页。

〔2〕郭沫若：《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

〔3〕1956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可以回国的留学生基本上争取回国，今年要求争取一千人”。[1]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确实尽了极大努力，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以上涉及政策转变和调整的种种措施，如果是针对当时的工农大众的，自然完美无缺，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诉求。

## 知识分子的双重反应和精神诉求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努力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党外，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去。中央和各地都动员舆论进行了大量宣传，以造成声势。1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月30日至2月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除原有545位委员外，增加了119位新委员，还邀请了626位各界人士列席，参加会议的共计1290人。[2] 到会委员和列席人员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其中不乏知识界的名流，包括受到批判的梁漱溟、梁思成以及旧派学者陈寅恪等人。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3] 举行如此规模的会议，显然是为了展示统一战线“更加广泛”、“更加强大”和空前未有的“团结”。中共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把有关知识分子的新方针广泛传达到党外，并在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引起讨论，以达到全面动员的目的。

尽管会议安排的报告主要是谈中国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以及当前面临的新任务，但在实际进程中着重讨论的还是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从执政者的角度讲述了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

〔1〕刘国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下），第1389页。
〔2〕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
〔3〕1956年2月8日、9日《人民日报》。

的立场和决心，郭沫若则在专题报告《在社会主义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中对此做出回应。不过，郭沫若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又是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代言人。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并营造热烈反应的氛围，在仅一周时间的大会讨论中，安排了235人作“响应性”发言。全部代表发言均由新华社发了通稿，而《人民日报》则从2月3日至13日每天以几个版面，全文刊登了226篇大会发言（含联合发言）。2月6日发表的梁漱溟发言达4000余字，2月9日再发消息，“补加一段”，以显示对其发言的尊重。[1]

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新政策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发言中不乏“兴奋”、“激动”、“欣喜”、“愉快”、“光荣”、“荣幸”、“幸福”的用语，显然已经超出了“响应性”发言所必须表现的热度。许多知识分子为自己能成为这次会议的座上宾而感到受宠若惊，也是真实的。不过，应该说他们的这种热情主要还是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共领导的新中国在短短几年内的迅速成长，使知识分子感到扬眉吐气。季羡林的发言表达了这种心境。他说：对一个旧知识分子来说，接受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有许多“苦难”，“恐怕比唐僧的八十一难还要加上一难”。但知识分子没有“垂头丧气”、“愁眉苦脸”。“根据我的体验和观察，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简直是愈来愈高兴，愈来愈年轻，愈来愈容光焕发，愈来愈精神抖擞。我们都彷佛吃了返老还童的仙丹，身体里面时时产生着新的力量。”[2]冯友兰说：眼看祖国几年之间，一跃而为世界强国，“真是如旭日方升，光芒万丈”，我们都是欢欣鼓舞，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添上一分力量”。[3]知识分子当然渴望在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中一显身手。数学家华罗庚说：“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能够生长在这毛泽东

〔1〕见1956年2月3日至13日《人民日报》。

〔2〕季羡林：《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看法》，1956年1月13日《人民日报》。

〔3〕冯友兰：《发挥知识分子的潜在力》，1956年1月15日《人民日报》。

时代是无上的幸福，无上的光荣。因为就在这一代，我们将亲眼看到我国的科学事业将从落后的状态飞跃地进入世界水平。”[1] 历史学家顾颉刚建议，要组织力量搜集整理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史料，他满怀信心地说：史料整理“在12年的规划里必然被列为一个重要的部门”，“我们大有工作可做”。[2]

二是对于中共改善知识分子境遇的诚意，尽管许多人心中疑惧难消，却不得不为之动容。几年来，知识分子在新社会一直处于被改造的地位，因而处处有“做客”和被冷落的感觉。现在中共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要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号召“向科学进军”。这使不少知识分子感动和兴奋，从而激发出主人翁感和参与的热忱。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说：看过周恩来的报告后，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不为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深切关怀而受到深深感动”。[3] 章伯钧说：中共知识分子会议前，“中国民主同盟做了一系列串联工作，向党反映了文教界有代表性的意见和要求。在这次周恩来主席的报告中，我们看到所有的正确意见和合理要求都得到了解决，更叫我们感动的是报告中还有关于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检查批评”。[4] 陈垣则为其老友、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入党振奋不已，说：“共产党是不拒绝任何人的……每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应当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努力要求自己”，希望党“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不能使任何一个爱国的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向隅”。[5] 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当时民主党派欢欣鼓舞，从大学教授到小学教师都认为：随着新时期来临，新民主主义各项政策不再适用，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至少是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中）

〔1〕华罗庚的发言，1956年2月6日《人民日报》。
〔2〕顾颉刚的发言，1956年2月8日《人民日报》。
〔3〕黄琪翔的发言，1956年2月5日《人民日报》。
〔4〕章伯钧的发言，1956年2月4日《人民日报》。
〔5〕陈垣：《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意见》，1956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会有更大的发言权，知识分子甚至有权参与新纲领的制定。”[1]

中共动员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出力的心情不可谓不急切，知识分子的反应也不能说不热烈，但在仔细阅读并揣摩政协会议的发言后，笔者感到，此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为有机会为国效力，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和期待，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仍然谨言慎行，心中还是疑虑重重。

从1月12日开始，在会议召开之前和会议期间，《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石景山钢铁厂总工程师安朝俊、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季羡林、协和医学院外科主任吴英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同济大学副教务长吴之瀚、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张维、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中国科学院学部常务委员葛廷燧、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茅以升等著名人士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显然是为配合中共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舆论宣传，但文章本身也并非完全是应景之作，其中透露出对中共的坦诚批评和期盼。季羡林认为，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无论其背景如何，“一般都非常爱国”。“他们现在对党有无限的信任，无限的敬仰”，他们的政治觉悟的进步速度“是很高的，是空前的”。他还批评说，“一部分同志”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不够正确的”，这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是“没有好处的”。[2]茅以升说，知识分子“都毫不例外地信任党，拥护党”。年老的知识分子都在进步，“都想成为劳动知识分子”。[3]冯友兰也说，“我敢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接受党的领导为莫大的光荣”。[4]显然，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和评价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和政治地位。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知识分子本身的估计与中共后来的评价

---

〔1〕金观涛、刘青峰：《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第27页。

〔2〕季羡林：《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看法》，1956年1月13日《人民日报》。

〔3〕茅以升：《我们年老科学家的愿望》，1956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4〕冯友兰：《发挥知识分子的潜在力》，1956年1月15日《人民日报》。

是有很大差距的。在知识分子看来，如同季、冯、茅所说，他们“绝大多数”、“毫不例外”地信任党，拥护党。而中共的估计是，还有40%的中间分子、百分之十几的落后分子和5%左右的反动分子。季、冯、茅等人的文章事实上在为知识分子进行辩护。至于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茅以升认为，党与非党人士之间有“尊而不亲”的现象。[1] 吴之瀚进一步指出，造成这种隔阂的原因，在于党员对“群众”的进步“重视不够”，“估计不足”。党员干部对教学“一知半解”，或者“强不知以为知”，处理问题不同党外业务领导商量。他还批评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生硬粗暴做法说，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由于领导运动的个别干部对于思想的发展规律认识不够，未能多采取以理服人的方式而流于生硬粗暴，使少数知识分子产生了一些消极情绪，造成一定的损失。”[2] 吴英恺则含蓄地提出，政治运动造成了对业务和技术工作的消极影响。[3] 茅以升还批评了学习苏联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以及把苏联专家的结论“当做金科玉律”，而把所有英美书籍束之高阁的现象。[4] 这些文章无疑表现出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共调整政策的期盼所在。

相比之下，中共宣布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以后，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这方面的批评和建议就少得多了。何思源以他在四川考察看到的情况，批评某些地区、单位和干部“以一种关门主义倾向对待知识分子”。年纪较大的知识分子，因历史比较复杂，“在政治上得不到信任，使这些人抬不起头来”，“甚至在业务上也对知识分子加以怀疑”。[5] 罗隆基提到，6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安排和使用遇到了困难，极少数从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闲散在社会，因而，有比较多的苦闷，有人产生了“不如归去”的想法。他还说，“现在

〔1〕茅以升：《我们年老科学家的愿望》，1956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2〕吴之瀚：《要团结得更好一些》，1956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3〕吴英恺：《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体会》，1956年1月14日《人民日报》。
〔4〕茅以升：《我们年老科学家的愿望》，1956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5〕何思源的发言，1956年2月6日《人民日报》。

还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作客思想”。[1]不过，即使像这种从局部和基层角度提出的批评，在200多篇发言中也是凤毛麟角。这表明知识分子对中共政策的调整力度是有保留意见的，至少在发言中是有顾虑的。由于中共没有对过去的政治运动作出检讨性总结，知识分子即使心存疑问和不满也不敢表露出来，更不可能对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提出总体性评价。例如批胡风和肃反运动，这在当时是严重摧残知识分子心灵的政治斗争，执政者本应对此有所检讨。但就在这次政协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在有关肃反的专题报告中，却对这场运动给予全面肯定，甚至提出要“继续坚决地、深入地进行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2]结果，在会上听到的是一片自我批评和检讨之声。梁漱溟自责“抗拒批评……真是不堪造就！”“深深抱恨自己过去是太辜负主席爱厚之意了！”[3]梁思成批判自己在都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一贯地与党对抗”，积极传播“错误理论”，“使得建筑界中刮起了一阵乌烟瘴气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歪风”种种。[4]这些明显地自我上纲的做法，很难说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态度。许多发言都集中于反躬自省，检讨自己头脑中还存在着“虚伪的个人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骄傲自大”、“自以为是”的思想作风，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因为正如地质学家李四光所说：“只有继续不断地自我改造，才能不落后于时代”。[5]这不能不说是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失望心情。

其原因大概主要有两点：

第一，没有反思和总结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的过火现象，更

〔1〕罗隆基的发言，1956年2月11日《人民日报》。

〔2〕董必武：《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2月1日《人民日报》。

〔3〕梁漱溟的发言，1956年2月8日《人民日报》。

〔4〕梁思成的发言，1956年2月4日《人民日报》。

〔5〕李四光的发言，1956年2月5日《人民日报》。

没有触及知识分子关心的肃反问题。客观地看，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感情压抑，情绪低落，主要并不是什么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问题，而是在政治上、精神上受到的挫伤。因此，中共要真正解开他们的思想疙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要对执政后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进行反思和总结，切实消除其负面影响。但是，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没有这样做，反而继续肯定几年来所有政治运动的正确性。关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周恩来的报告虽然主要倾向是承认“用粗暴的方法对待科学家和科学问题的现象，最近还有发现”，并指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应通过社会实践和业务实践以及一般的理论学习“三条道路”来实现，但不得不紧接着指出，在政治上“不可能没有相当的斗争”，思想上“也不可能没有尖锐的斗争”。报告仅仅指出了党内“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这一现象，而对产生“宗派情绪”的根源却未作进一步的分析。至于知识分子同党之间存在的“某种隔膜”的原因，虽然指出来自“我们的同志”与知识分子两方面，但对前者，只以“没有去接近他们，了解他们”一笔带过，而着重指出的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采取了保留态度甚至反对态度”，且列举其表现达9条之多。[1]

陆定一在大会发言中更是不加区别地对发生在1955年的一系列

---

〔1〕这9条错误是：（1）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不分敌我；（2）不满意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留恋资本主义甚至留恋封建主义；（3）反对苏联，不愿意学习苏联；（4）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5）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轻视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不愿意同工人农民和工农干部接近；（6）不愿意看见新生力量的生长，认为进步分子是投机；（7）不但常常在知识分子和党之间制造纠纷和对立，而且也在知识分子中间制造纠纷和对立；（8）妄自尊大，自以为天下第一，不能够接受任何人的领导和任何人的批评；（9）否认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看一切问题都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合乎自己利益的就赞成，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反对。〔《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28—33页。〕

批判大加肯定，如在文艺方面批判胡风、陈企霞、丁玲、俞平伯；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批判胡适、杜威、梁漱溟；在卫生工作中批判贺诚、王斌；在自然科学方面批判“反动的生物学家胡先骕”；在建筑学方面批判“梁思成的复古主度形式主义”，以及肃反运动等。陆定一认为，“这些工作，都是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平道路，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经过斗争，文艺教育和科学事业是欣欣向荣的而不是枯萎下去了，团结是增强了而不是瓦解了，新生力量是成长了而不是被压制了”，文艺界“出现了新的气象”，“从前所谓‘创作枯萎’的悲观论调已经破产”了。[1] 中央政治局最后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除了批评党内存在宗派主义倾向以外，同时也批评了“缺乏革命的警惕性”的迁就麻痹倾向。在提出要在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作适当的安排”的同时，还强调要“继续改造他们”，继续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纯洁知识分子的队伍”。[2] 而以中国科学院院长身份在政协会议作报告的郭沫若，也强调知识分子与领导的关系“不够密切”，问题的“另一面依然在于知识分子自己”。在轻描淡写地谈到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震撼后，郭沫若说：“无论怎样的微风细雨，总不免要吹动头发，打湿衣裳。如果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连微风细雨的批评都不能接受，那就证明他还没有进行自我批评的决心。”[3] 正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这种对中共意识形态工作丝毫不作反思的态度，使得这次会议没有真正把握知识分子的思想脉搏，“没有触及知识分子所苦闷、所焦虑、所痛心、所希望解决的迫切问题”。[4]

---

〔1〕陆定一在中共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一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66页。

〔2〕《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一册，第207—214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132—147页。

〔3〕1956年2月1日《人民日报》。

〔4〕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434页。

第二，没有触及思想和学术自由问题。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而知识分子更把对社会的发言权视为自己存在的理由和价值。然而，在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中，不仅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发言权逐渐丧失，代之以对自身的不断反省、改造，而且在纯学术领域中自由讨论的环境也遭到毁坏。对于这种现象，周恩来的报告基本上没有触及，倒是陆定一的发言谈到了学术上自由讨论的问题。作为宣传部长，陆定一试图划清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与学术问题三者的界限。他在发言中指出，政治问题、思想问题都不能放过，但两者之间也应有所区别，“对于没有政治问题，但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要坚决进行思想斗争，但要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包括等待）”。至于“学术性质的问题、艺术性质问题、技术性质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树立（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展严格区别开来）”。“为了发展自由讨论，又必须与党内党外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门户之见进行适当的斗争”。陆定一认为，“我们这样做，就不会在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上成为‘瞎子’，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成为‘盖子’。”[1] 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否能够以及怎样才能划分清楚，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这都是一个应该解决而从未解决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没有、也没想进行讨论。周恩来1月20日的总结发言，以及2月24日最后修订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到，或许正是为了回避这个问题，周恩来的报告以及整个会议似乎主要在强调自然科学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而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则较少提及。

问题的症结还在于中共对知识分子政治地位和阶级属性的认识，

〔1〕陆定一在中共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1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一册，第168页。

而对这一点，党内并没有达成共识。从过去认为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到现在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一味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到批评党内存在着不信任、不支持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倾向，反映了执政党认识的重大转变和提高。周恩来在报告中比较突出的就是这一点。然而，毛泽东的看法更具影响力，在党内也更有代表性。目前没有材料可以说明毛泽东本人是否赞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提法，但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分歧，则是当事人的明确感受。〔1〕此外，还有文字材料可以佐证。当时高等教育部为准备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编写了一份《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重点分析的就是两种类型的“中间分子”和“反动分子”。作为“中间分子”，点了北大教授王瑶、傅鹰的名，并描述了他们复杂的历史和摇摆的思想状态。作为“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的反动教授，特别列举了钱锺书的各种“反动言论”。〔2〕这份材料表明，党内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判断仍然有相当的保留。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大会后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里，报告中“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3〕虽然两种提法精神大体一致，但这显然也透露出一个信息，要全党接受周恩来的提法是有困难和阻力的。

〔1〕龚育之在《周恩来和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文中说：“前些年，我曾问胡乔木，为什么八大报告没有重申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报告的新结论？乔木也记不大清楚，但他记得，知识分子会议时已有不同意见。”〔《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5页。〕

〔2〕高等教育部：《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印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1956年1月，未刊，第52页。

〔3〕《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1956年2月24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133—134页。

**简短的结论**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对于中共和知识分子两方面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按照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的说法，“就有把知识分子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危险。[1] 其实，这里不只是可能性，而是必然的结果。试想，知识分子掌握着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知识和技术，而这种资源（或曰知识产权）却不像资本家和地主的生产资料那样可以剥夺。那么，从理念上讲，共产党人要实现社会公有化，就必然把“异己”的知识分子本身作为革命对象。执政党不把知识分子当做“自己人”，甚至还要作为革命对象，其结果无异于在“自毁长城”。周恩来并非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他的报告也试图解决这个矛盾。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总体状况时，报告认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了，但在具体分析知识分子状况时，报告仍然指出，其中落后分子占百分之几，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更何况还有与先进分子数量相等的中间分子。这与“绝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总体判断明显地是相互矛盾的。很可能，周恩来这样讲是考虑到了党内多数人的估计。陆定一在发言中说得十分明白：“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了使我国变成为先进的国家，而来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3] 从整体上看，1956年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着眼于如何争取知识分子为我所用，因而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

知识分子本来是具有爱国主义情感和立场的社会主体的一部分，却偏偏要把他们看成是依附于某个阶级的“毛”，非经过一番“脱胎

---

〔1〕龚育之：《周恩来和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4页。

〔2〕这个结论是周恩来在修改报告稿时亲笔加写的。龚育之：《周恩来和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4页。

〔3〕陆定一在中共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1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一册，第166页。

换骨”乃至“急风暴雨”的思想改造就不能为国家社稷贡献自己的知识，这种从本质上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理念就决定了中共这次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不可能是彻底的。正因为如此，当1957年知识分子受到党的鼓励和动员，又一次表现出独立思考的本性时，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钟摆立即就回到了1955年，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10年后“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陆横扫一切“臭老九”的种种举动，则是把中共对知识分子怀疑和敌视的“左”倾错误发挥到了顶点。

本章曾以论文形式发表于《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第二章

# 非斯大林化：苏共二十大及中共的反应



赫鲁晓夫（前中）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及斯大林问题的提出，无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冷战进程中最具震撼力、最令人感兴趣的历史事件之一。其结果，不仅引起了一系列有关各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发展的深刻问题，也对中苏关系的演变乃至冷战格局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因此，对于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的讨论理应列为国际冷战史和中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如果说在20世纪50—60年代苏共二十大问题主要是作为现实政治进入专家和学者的研究视野的，那么使其成为历史研究对象则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因为只是在这一时期，相关的档案文献才陆续解密并披露出来。有关苏共二十大，过去公布的只是会议代表的公开报告和发言，以及苏共的部分决议，而对于当时震动世界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几十年来在各国流传有许多文本，但始终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更不用说，还有大量涉及这次大会的主席团会议和中央全会的会议记录、决议以及各部门和地区的请示、报告尚不为人知。直到1989年，苏联才在复刊的《苏共中央通报》（第3期）上首次发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文本。[1] 随着俄国档案的开放，特别是到

〔1〕见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3，1989，с.128—170。这个文本就是当时在苏联各级党团组织中传达用的印刷小册子，与赫鲁晓夫1956年2月25日在秘密会议上宣读的报告有些区别。3月1日赫鲁晓夫对宣读的报告文本进行了修改，主要是补充了部分即席发挥的内容，对引用文献做了技术性加工，增加反应会场效果的内容（如全场起立，鼓掌等），以及少量的文字修订。见Аймермахер К.（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с.42—44。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以前在苏联民间流通的有关秘密报告的俄文版本，大都是从国外英文本转译的。见裘实编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三种俄文版本》，《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87年第2期，第82—83页。

199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40周年）以后，俄国学者发表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使用了大量在档案馆中发现的历史文献。[1] 从史料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2002年莫斯科出版的关于苏共二十大的专题档案文献集，其中公布了当年秘密报告起草时的3个文本，以及有关这次大会筹备、酝酿情况以及苏联国内外和社会反应的198个文件。[2] 此后不久出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文件汇编，又补充了一些相关的档案文献。[3] 在此基础上，俄国学者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和发展起来。[4]

---

〔1〕在笔者看来，比较重要的有：Пихоя Р.Г.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в совет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1945—1958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6；Наумов В.П. Борьба Н.С.Хрущё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Наумов В.П.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 Н.С.Хрущев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Барсуков Н. Как создавался 《закрытый доклад》 Хрущева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21/02/1996；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XX съезд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8，№2；Пыжиков А. XX Съезд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00，№8。

〔2〕Аймермахер，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在此之前出版的有关为政治受害者平反的文件集，已经公布了一些相关档案，见Артизов А. и т.д.（сост.）Реабилитация：как это было，Документы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материалы，Март 1953—Февраль 1956，Том 1，Москва：МФД，2000。

〔3〕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

〔4〕目前已经发表的重要成果有Аксютин Ю.В.，Пыжиков А.В. 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закрытого доклада Н.С. Хрущева XX съезду КПСС в свете нов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2，№2；Рейман М.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и конфликты в советск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3，№3；Пыжиков А.В. Проблема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в годы хрущевской оттепели//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3，№4。А.Пыжиков的另外两篇论文则着重研究了二十大以后苏联社会的心理和思想变化。见：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в годы 《оттепели》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03，№6；Истоки диссидентства：Молодёжь после XX съезда КПСС//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03，№12。

由此可以断言，从真正学术意义上讲，对于苏共二十大这一课题的研究是最近十几年才开始的。[1]

至于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发展的影响，始终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其研究的切入角度有两个：中国现代史和国际冷战史。从中国史方面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对来说多一些，其重点集中在中共对苏联经济发展道路的反思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探索。[2] 从中苏关系

---

〔1〕在英语世界，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学者对苏联史的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在社会史、文化史方面。对政治史的研究则出现了新概念（New Soviet Political History），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杂志《评论》（Kritika）甚至出版专号讨论了这个问题（Volume 5，Number 1，Winter 2004）。至于对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的研究，William Taubman最近出版并获普利策传记奖的专著（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NY & London：W. W. North & Company，2003）值得一读，其中有专门章节讨论这些问题。此外，吕德量（Lorenz Lüthi）不久前完成的博士论文（The Sino—Soviet Split，1956—1966，Ph.D. Dissertation：Yale University，2003）对此也有较深入的研究。笔者不久前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得到了吕德量赠送的这部未发表的文稿，在此致谢。中国学者中已有人摆脱了以往政治理念的羁绊，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参见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再版的《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和陆南泉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不过，与俄国学者的研究相比，上述著作使用的材料均显得比较陈旧。

〔2〕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董志凯：《毛泽东在“八大”前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设想》，《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王真：《50年代中期我国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武力：《论八大对苏联工业化模式认识的深化及其历史局限》，《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6期；孔寒冰：《苏联经济模式是如何在中国确立起来的》，《俄罗斯研究》2000年第1期；刑和明：《1956年中共对苏联模式认识的转变及启示》，《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12期；林蕴晖：《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中的矛盾及其逆转之原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林蕴晖：《苏共二十大与毛泽东走自己的路》，《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对个人崇拜和思想解冻问题的专门研究不多，只有石仲泉的《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等少数论著。由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全面的论述。西方学者从中国史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的代表作应属R.MacFarquhar1979年出版的专著，中文本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翻译组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史方面进行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体现在李丹慧主编的《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论文集）里，应该说是代表了21世纪初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1]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不搞清楚，中国50年代中期的事情就很难说明白。

本章利用的史料，除现有的公开文献外，主要是最近俄国发表的历史档案，以及相关的中方文献。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对史料的重新梳理，拟回答三个问题：第一，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以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实质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比较中共当时的政策方针，才可以看清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本质的区别。第二，二十大纲领和斯大林问题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以此观察苏联历史的发展，才可以判断其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第三，毛泽东最初对于批判斯大林的问题是什么心态，是怎样考虑的，并以此分析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的发展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

## 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实质

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对于苏共二十大路线的认识及评价无疑是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而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中苏论战时中共中央的看法。在1963年9月6日发表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文中，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做了全面评述。文章断言，在二十大会议上，苏共“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苏共的错误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

〔1〕该文集2002年10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相关的论文有：杨奎松的《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李丹慧的《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1954—1960）》，牛大勇的《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杨奎松、陈兼的《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的兴衰》，李捷的《从同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等。

义”。关于斯大林问题，文章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而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文章认为，赫鲁晓夫提出的由于世界形势发生变化现在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1] 这种盖棺定论的说法在很长一个时期成为中国历史叙事的主流，影响很深。[2] 最近几年，中共官方史学关于苏共二十大及其对中苏关系影响的评价有了一些修正，比较客观全面了，但问题似乎还需要进一步说明。[3]

观点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仅就内容而言，把苏共二十大的主要精神归结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和平过渡”理论，既不准确，也不完整，因而很难对其实质做出正确和全面的判断。所以有必要首先对二十大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然后对其实质做出评判。现在所有相关的文件几乎都已经公开，总括起来看，苏共二十大是从国际、国内和党内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确与斯大林主持的十九大完全不同的方针、路线或纲领性意见。

在国际方面，苏共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这样一套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和总路线。

苏联对外政策新理论的前提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当前时代的特点是帝国主义作为“无所不包的世界制度”已经瓦解，而社会主义

〔1〕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5—63页。

〔2〕特别是关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说法，仍为官方所使用。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9—360页。

〔3〕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496—506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77—379页。

已经越出一国范围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由于掌握了核武器的秘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有道义的手段，而且也有了“物质的手段来阻止侵略”。于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虽然继续有效，但“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核武器时代，未来的世界“不是和平共处，就是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没有第三条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看到，“历史已经把这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事实上，两个制度和平共处的原则“日益广泛地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它不仅是中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也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主要的目的是消除战争的威胁和保卫全世界的和平”。同样由于国际形势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前景”。依照列宁关于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不同形式的观点，苏共中央指出，“除了依照社会主义方针改造社会的苏维埃形式以外，还有人民民主的形式”，其中还特别提到中国实行私营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并逐步使其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的政策，认为中国“正在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许多独特的贡献”。因此，不应该“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改造社会的唯一途径”。从理论上讲，“这种过渡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制度革命式地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因而，任何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就是革命，激烈的程度有轻有重，然而都是各国人民进行的革命。人民夺取政权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就是历史上最大的变革”。在右翼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越来越多地遭到破产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可以团结其他爱国力量通过议会斗争改变政权的性质，而在反动势力仍然强大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则只能伴随着“尖锐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重要的是，“无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如何，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是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首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没有这种领导就不可能有向社会主

义的过渡”。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的胜利也不是通过武装干涉内政的办法，而是取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这样一个事实”，即通过和平竞赛的方式。“在和平竞赛中，社会主义必将胜利”，但不是通过“革命输出”，“不是用大炮和侵略，而是由于它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因此它能够保证人类达到比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大会通过的决议全面肯定了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理论，认为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是“一些根本的、带有原则性的、有关现代国际局势发展的问题，在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

今天看来，苏共中央在几十年前提出的这一整套方针和路线，应该说还是颇具时代精神和历史意义的，正如许多俄国学者现在认为的那样，“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成果首先是制定了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方针，而这个方针是与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本人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2〕当然，这种具有内在逻辑的新思维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时局认识逐步成熟的考虑。

在国内方面，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改变经济发展及管理体制的方针和措施，这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1〕赫鲁晓夫关于苏共中央工作总结的报告，1956年2月18日《人民日报》；米高扬在大会上的发言，1956年2月22日《人民日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在大会上的发言，1956年2月23日《人民日报》；苏共中央关于工作总结报告的决议，1956年2月26日《人民日报》。1956年1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对二十大总结报告的文稿进行了深入讨论，并集中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只有莫洛托夫和卡岗诺维奇提出不同意见，而多数人完全支持报告的观点和结论，并批评了莫洛托夫和卡岗诺维奇的看法。卡岗诺维奇最后表示放弃自己的意见，而莫洛托夫没有表态。详见РГАНИ，ф.3，оп.8，д.389，л.43—51 о б.，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88—93。

〔2〕Пыжиков А. Хрущевская《оттепель》，Москва：ОЛМА—ПРЕСС，2002，с.15.

1. 在继续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前提下，“迅速发展消费品的生产”。

2. 把不断提高生产技术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必须坚决地、有计划地在工业和运输业中采用最新的科学成就、技术和先进经验，使现有设备现代化，改善和改进劳动和生产组织，更广泛地在工业中实行专业化和协作，以便在这一基础上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

3. 加强“生产力的合理配置”，其基本路线是加快东部地区的开发，今后10年到15年间，在那里建立起采煤和电力生产的最大基地、第三个大冶金基地以及新的机器制造中心。

4. 在所采取的措施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消灭农业的落后现象和消除由此产生的工农业发展之间不均衡的现象”，为此需要在农业中实行可以发挥集体农庄庄员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新的计划制度；在增加农产品的生产中，加强对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物质鼓励；从城市和工业中心派遣人员到农村，加强集体农庄的领导干部和专门人才队伍；进一步加强农业的技术装备，增加机器拖拉机站的领导人员和工程技术干部；增加国家对发展农业的拨款；继续集中力量大力发展谷物业，开垦生荒地和扩大玉米播种面积。

5. 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为此，除进一步提高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以及集体农民的收入外，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措施，如实行七小时（特殊行业六小时）工作制或每周五天工作制；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将住宅建设增加一倍；国家为老年人建立房屋和设置相应的养老金；实行免费教育；普遍设立托儿所和幼儿园，以及其他改善保健和国民教育事业的种种措施。

6. 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其主要内容有：“同官僚主义的集中化作无情的斗争，充分确立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和加强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把中央所属的大量工业企业转交给地方机关管理”；加强地方苏维埃和企业的自主权利；“吸引工人群众广泛参加拟定和审查经济计划的工作、更加积极地参与决定生产管理的

问题”等。

7.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进国家机关工作，加强苏维埃法制。建立党和政府对国家保安机关和其他权力机构的监督，完全恢复并且加强检察机构的监察权力。[1]

可以看出，与对外政策相比，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对内政策显得缺乏系统性和过于表面化，根本没有触及苏联经济乃至政治制度本身，给人的感觉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际情况恐怕也确实如此，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国内问题，只是苏联新领导人感受到而不是深刻认识到的问题，或者是已经有所认识但不敢坦白讲出的问题。

在党内方面，除了加强组织和思想工作等一般号召外，引人注意的是苏共二十大提出了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

问题是赫鲁晓夫在工作报告中首先提出的：在党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重新建立和尽力加强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苏共中央严厉地“谴责个人崇拜”，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个人崇拜的危害在于“使得某一个领袖变成英雄和创造奇迹的人”，同时却“缩小党和群众的作用”，“贬低他们的创造性的努力”，并曾使党的工作“发生严重的缺点”。[2] 不过，这个问题在大会上并没有占据突出地位。尽管全体代表通过的决议指出，“中央委员会反对个人崇拜是完全正确的”[3]，但是从整个会议发言的情况看，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还没有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有人统计过，在大会上发言的共126人，直接提到“个人崇拜”问题的只有8人，其中6人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即阿里斯托夫、苏斯洛夫、米高扬、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其他2人是达吉斯坦州委

〔1〕赫鲁晓夫关于苏共中央工作总结的报告，1956年2月18日《人民日报》；米高扬在大会上的发言，1956年2月22日《人民日报》；马林科夫在大会上的发言，1956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布尔加宁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的报告，1956年2月25日《人民日报》。

〔2〕1956年2月18日《人民日报》。

〔3〕1956年2月26日《人民日报》。

第一书记达尼亚洛夫和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1] 而在所有公开发言中，点名批评斯大林的只有米高扬一人。按照米高扬的说法，斯大林在其得意之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分析"未必能对我们有所帮助，未必是正确的"；实际上由斯大林授意和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则没有全面、正确地反映党的历史。[2] 目前还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米高扬何以会有如此惊人之举——几十年来在苏联第一次公开点名批评斯大林，以至许多外国共产党代表当时认为他与赫鲁晓夫或其他苏联领导人在评价斯大林的问题意见分歧。[3] 不过人们很快就了解到，赫鲁晓夫的看法不仅与米高扬没有分歧，而且很可能还对他轻描淡写的批评方式感到不满。如果不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斯大林的问题确实不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和震动。

10月25日上午，赫鲁晓夫在一次只有苏联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讲演。[4] 在这个冗长和充满激情的秘密报告中，作为个人崇拜现象的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列举

---

〔1〕尼古拉·津科维奇：《权力与争斗》，郅友昌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03—204页；Пыжиков Проблема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c.51。在苏联领导人中，只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发言时没有提及个人崇拜问题。见Аксютин Новое о XX съезде，c.110—111。

〔2〕1956年2月22日《人民日报》。著名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在发言中也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提出了批评。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2月23日第32期，第235—237页。

〔3〕如见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的回忆录。АПРФ，ф.3，оп.83，д.117，л.2504—2575，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9，№1，c.6；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17—18页。

〔4〕几乎所有的中文论著都说秘密报告的时间是在24—25日夜间，不知根据何在。而在俄国档案的记载中，24日晚间进行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选举，由布尔加宁主持和赫鲁晓夫报告的秘密会议是在25日上午举行的。РГАНИ，ф.1，оп.2，д.17，л.89—90，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c.250—251。另见Аксютин Новое о XX съезде，c.111—113。

了斯大林在30年代大清洗期间、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错误。这些内容已经有太多的论著讲述，因此没有必要在此重复了。[1] 为了评判和对比中共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这里要强调说明的只有两点：第一，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一开始就声明，“这篇报告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与活动做出全面的评价”。“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是尽人皆知”。最后又谈到，“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而且他的逻辑、力量和意志对干部、对党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过去斯大林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对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功劳”。[2] 此外，报告对斯大林的批评仅仅集中在大清洗及军事指挥错误等少数几个问题上，而对于斯大林其他许许多多的错误，如对党内反对派的无情镇压、推行全盘集体化的严重后果、消灭富农的残酷政策、对内实行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对外实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蛮横专断和老子作风（毛泽东对此最为愤恨）等等，报告或者根本没有涉及，或者是以赞同的口气提到的。第

〔1〕关于这个报告公开出版的中文本至少已经有三个。1988年2月，东方出版社出版了《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同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拉齐奇所著《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夏平译），这两本书作为附录收入的报告文本都是来自西方久已流传的1956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英文本，而199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麦德维杰夫著《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述弢译）所附录的报告文本则译自苏联1989年首次公布的俄文本。经过核对，笔者发现俄文本与英文本的内容和文字几乎也是完全一致的。俄国学者从文本来源考证得出的结论与此相同（见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30）。尽管如前所说，这个文本与赫鲁晓夫宣读的报告有些差别，但并不影响人们对报告实质和基本内容的了解。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据新华社查对，美联社和合众社播发的报告原文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6日印发的那本文件。除个别用词外，“段落和文字都相同”。《内部参考》，1956年6月9日第1903期，第229页。

〔2〕本文使用的秘密报告原文，均引自《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一书的附录，以下不再注明。

二，报告在谈到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时，仅仅将其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的性格和道德缺陷，如“疑神疑鬼的病态心理”，经常性的“滥用权力”和“恣意妄为”，“最肆无忌惮的专横”作风，以及性格粗暴、缺乏耐心、好大喜功等等，而没有深刻地分析个人崇拜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更没有从制度层面阐述斯大林问题的要害——高度集权的官僚和独裁体制。很显然，既然在这种政治体制里没有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和民主选举，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现象，而报告中所谓“党内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法制”也只能是天方夜谭而已。赫鲁晓夫甚至认为，斯大林所犯的一切错误，都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的立场出发”的，“真正的悲剧”就在这里。如此推理的结论自然是好心办坏事：动机是好的，只是方法和手段有问题。

由此看来，苏共二十大确实从国际、国内和党内三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非斯大林化的方针，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不过，从中苏关系的角度观察，麻烦并不在于提出了非斯大林化的问题，而是在于提出问题的方式，特别是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方式。

## 非斯大林化现象的由来

综上所述，苏共二十大提出的纲领和路线，无论其认识是否正确，思考是否到位，都是针对斯大林时期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所以称之为“非斯大林化”现象毫不为过。这里要强调的是，由苏联自身开始的非斯大林化的过程，并不是赫鲁晓夫个人心血来潮、突发奇想的结果，而是从斯大林去世以后就在莫斯科新领导层逐步形成的共识。本来这些对内对外政策的新方针是在不公开批评斯大林的情况下悄悄推行的，但在筹备苏共二十大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了为成千上万

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的问题，于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的批判便被提到了苏共二十大的议事日程。

还是先看对外政策。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新的国际局势就已经显示出来。由于战时合作而形成的国际关系重组，以联合国、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为标志的统一的国际体系相继建立，以及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功能趋向成熟，为修正苏联传统的对外政策创造了国际环境和基本条件。雅尔塔体系区别于凡尔赛体系的根本标志之一是建立了各大国认同的国际体系和平等的游戏规则，而莫斯科也是这种体系和规则的倡导人和缔造者。因此，斯大林陆续地、不自觉地从战略上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方式和安全观念。从战争后期到战后初期，解散共产国际这个对苏联外交已经不起作用的工具，以求得资本主义世界的谅解；强调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合作，表明苏联已经感受到其可以对世界命运发挥主体作用；促进欧洲各国及中国通过选举成立共产党与其他各党的联合政府，说明苏联已经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认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经验；最后，放弃世界革命的主张——如在伊朗、希腊和中国表现的那样，不再是推翻旧世界，而是要改造旧社会。所有这些政策的本质及其归宿就是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然而，因意识形态对立而产生的东西方之间的猜疑和敌对，因美苏各自的过度反应而采取的过激措施，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互动作用，终于使冷战思维成为双方政策的出发点，同美国一样，苏联也很快就回到了战前发展的老路。斯大林不仅在国内继续高唱军事共产主义的“凯歌”，进一步巩固标榜为苏联模式的经济制度，加紧对社会的控制和镇压，而且重新调整了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在东欧各国推行苏联体制并建立起类似共产国际的情报局组织。欧洲的紧张局势随着柏林危机的爆发而加剧，朝鲜战争则把苏联与西方的对抗从欧洲扩展到亚洲，并推至极限。

斯大林的去世为苏联改变传统政策提供了机会。及时地劝说中

国接受美国条件、结束朝鲜战争是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意图的第一次显示，也是克里姆林宫新主人集体做出的非斯大林化的第一次尝试。[1] 1954年3月12日，马林科夫在对选民演说时宣称，朝鲜停战是国际紧张局势走向缓和的标志，“苏联政府坚持进一步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坚持牢固而持久的和平，坚决反对冷战政策，因为这个政策是一个准备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政策，而在拥有现代武器的条件下，这样一场战争将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毁灭。”苏联主张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经济竞赛”。[2]这种表述不仅在观点上，甚至在话语上，已经与斯大林所坚持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学说大相径庭了。由于党内继承权的斗争，马林科夫公开发表的惊人言论受到指责，并成为其被罢黜的理由之一。[3] 但实际上，这个理论框架和思维逻辑是苏联新领导人普遍接受的。苏共二十大在提出“三和路线”时只从政治角度强调了时代变化的背景，而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问题则欲言又止，一笔带过，但这并不说明赫鲁晓夫没有把这个问题也作为苏共改变外交政策的根据之一。

自1949年8月29日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苏联的核武器研制得到迅速发展，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美国。据俄国的解密档案，在国家银行特别账户的秘密用途拨款中，按当时价格统计，1947—1949年苏联研制核武器的开支为145亿卢布，而在1951—1955年期间，仅用于原子工业和火箭技术的科研和试验设计单位的计划开支就有648

〔1〕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相关的档案文献见沈志华编：《关于朝鲜停战的俄国档案选编》，《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4期，第150—175页。

〔2〕Правда，13 Март 1954г..

〔3〕Рейман М. Решение январского（1955г.）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о Г.М. Маленков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1，с.31.

亿卢布。[1] 在1953年7月3日苏共中央全会上，中型机械制造部副部长扎文亚金骄傲地宣称：美国人将看到他们的核优势正在消失。苏联即将爆炸的氢弹威力比普通原子弹要大数十倍，“它的爆炸意味着美国人正在准备的第二次核垄断已被打破，这将是世界政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果然，8月12日苏联成功地试验了世界上第一枚可运载氢弹，而美国的氢弹爆炸是在7个月之后。[2] 与此同时，苏联核武器的运载能力也在不断提高。1947—1949年，Р-1型导弹（射程300公里）和Р—2型导弹（射程600公里）相继试制成功并装备部队。而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1956年2月20日，Р-5型导弹携带着核弹头，以1500米/秒的速度飞越1000公里，在预定时间内将其“有效负载”送达目的地。[3] 这个射程还不足以把原子弹送到美国本土，但打到欧洲则绰绰有余。[4] 自然，知道核武器的威力同时也了解核战争危害的并非马林科夫一个人。1954年4月1日，苏联有关部门向赫鲁晓夫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报告了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等著名物理学家关于热核武器的出现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看法：战后短短的几年，从原子弹到氢弹，从核裂变到核聚变，核武器的杀伤力已经发展到惊人的地步，从而使核军备竞赛达到了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阶段。科学家们在一系列文章中生动而有力地论证说，建立在利用热核反应基础上的核弹，实际上可以无限制地增加一枚炸弹中所包含的爆破能量，而对这种武器的防御从根本上讲是不可能的。所以很明显，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将导致交战双方的毁灭。核爆炸发展的速度如此之

〔1〕Симонов Н.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е годы：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структура，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6，с.242—244.

〔2〕Y. Smirnov and V. Zubok，“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Moscow Enters the H—Bomb Age”，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 4，fall 1994，pp.14.

〔3〕Симонов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с.239—240、248。

〔4〕1957年8月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Р—7型）。

快，以至过不了多少年，其数量将足以使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活成为不可能。人类正面临着毁灭地球上全部生命的威胁。[1] 无疑，这使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人感到震惊。9月22日，在关于防止核扩散谈判中一直采取对峙立场的苏联政府向美国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表示愿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上继续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不久，苏联又提出了一项禁止核试验的新建议。[2]

因此，苏联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新方针，一方面是基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也是对核武器发展及其后果有了明确认识的结果。于是，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两年的时间里，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以实现与西方的缓和：提出苏联作为新成员加入北约的要求，采取主动措施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赞同奥地利中立并同意从那里撤退苏联占领军，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发动的起义采取冷漠态度，积极推动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的外交谈判，主动提出裁减军队并单独实现裁军，向美国建议签署苏美友好与合作条约，如此等等。[3] 在1956年1月30日主席团会议研究大会工作总结报告草稿

〔1〕1954年4月1日马里舍夫给赫鲁晓夫的备忘录，TsKhSD，f.5，op.3，d.126，ll.39—41，转引自Smirnov and Zubok，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pp.14—15。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卡皮察的文章及其给赫鲁晓夫的信件。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65—488页。

〔2〕详见沈志华：《援助与限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3〕Vojtech Mastny，"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Warsaw Pact in 1955"，Niels E. Rosenfeldt，Bent Jensen，and Erik Kulavig（eds.），Mechanisms of Power in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0，pp.243—254；Csaba Béké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16，1996；Matthew Evangelista，"Why Keep Such an Army?：Khrushchev's Troop Reductions"，CWIHP Working Paper，№19，1997；Обичкина Е.О.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и война в алжире，1954—1962гг.，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МИД РФ//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0，№1，c.19—24；Катасонова Е. Советско—японс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时，最集中讨论的就是议会道路、和平共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经过一番争论，所有人一致赞同报告的宗旨——和平，会议的结论是："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寻求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但不是经过战争。"[1] 尽管苏联的举动在美国没有立即看到积极反应，但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却是"深入人心"的。[2] 确如美国情报分析专家所说，"苏共二十大的整个旋律给人的印象是，苏联领导人似乎确信，只有和平才是世界共产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3] 无论如何，1950年代"被合情合理地认为是东西方缓和的第一时期"。[4] 这是苏共中央提出的"三和路线"的结果，也是苏共二十大试图改变国内政策、加快经济发展的前提。

1917年的革命导致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俄国的政权，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开始在一片贫穷落后的土地上建构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囿于历史的条件和战争的环境，布尔什维克选择了军事共产主义的发展模式，并准备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为了巩固革命的政权，列宁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是当时历史环境为苏联提供的第一次制度转型（或曰改革）的机会。但是，由于严酷的党内斗争，以及共产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的发展道路，在苏联建立起一套以集权统治为标志的社会主义

---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1955—1956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3, №5, с.121—132; 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69—71、906—908。《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587—608页。

〔1〕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88—95.

〔2〕Афиани В.Ю. Иванов Н.С.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Суэц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ЦХСД, 复印自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room保存的手稿；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达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第27—28页。

〔3〕1956年6月22日，国务院情报研究办的报告："苏共二十大与'战争不可避免'论"，MF2524607—0807，Main Library，University of Hong Kong。

〔4〕Béké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

制度和发展模式。[1]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模式在各方面的弊病已经暴露出来，政治动荡不安，经济畸形发展，生活贫穷落后。是战争掩盖了苏联的社会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挽救了斯大林模式，因为它的军事共产主义（战时经济）性质恰恰适合了战争的环境和需要。但战争也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数百万穿着军装的苏联工人和农民随着战线推进走出国门后才发现，他们生活其间的“社会主义天堂”简直无法同“资本主义地狱”相比，甚至战败的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也要高于战胜的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人们开始抱怨，社会开始思考。然而，斯大林却陷入了一种理论误区，他认为苏联在战争中显示的力量和取得的胜利证明了他所创造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正确性和优越性——1946年2月斯大林在选民大会上的演说充分表明了这一点。[2] 再加上冷战爆发和国际关系趋向紧张，刚刚开启的通向世界的窗口被关闭了，铁幕再次降临俄罗斯大地。拟议于1948年召开的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宗旨的苏共十九大无声无息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改革经济体制的尝试尚未启动便夭折了。与此同时，党内和社会生活也悄悄地再次笼罩在政治清洗和镇压的乌云之中。一切又恢复到战前的状态。[3]

---

〔1〕关于斯大林模式的研究著述颇丰，在中国学者的论著中，笔者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有：姜长斌主编：《斯大林政治评传（1879—1953）》，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至于对苏联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可参见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2〕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41—454页。

〔3〕关于战后苏联社会状况的详细史料可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2、23、25、26、28、30卷，也参见俄国学者的论著：Пыжиков А.В. Советско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хрущевских рефор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2，с.33—43；Наумов В.П.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7，№4，с.29—30；Зубкова Е. Кад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чистки в КПСС，1949—1953//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1999，№3，№4，№6；Зубкова 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俄国学者说的不错，1953年的苏维埃国家确实已经处于社会大爆炸的前夕。[1] 人们不仅要在恐惧和惊慌中煎熬，还要忍受物质生活的贫乏。斯大林的逝世给那些一向视沙皇为神明的俄罗斯人带来了由衷的悲伤，也使许多善于思考的人们产生了希望。这种思考首先是从直接承担着社会责任的党和国家的高层开始的——他们感受到了改变国内政策的必要性。

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是国民生活水平低下，食物、日用品和住房的短缺严重困扰着苏联人民。以食品为例，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社会主义搞了30多年，直到1952年，苏联人均消费的主要食品才接近（牛奶及乳制品、鱼类及水产品）甚至还低于（面粉、大米、肉类及油脂）1913年的水平。[2]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轻工业和农业生产严重落后。统计资料显示，按1926—1927年不变价格计算，与1945年相比，尽管消费资料产品的增长率（169%）要大大高于生产资料产品（57%），但是直到1950年，在工业总产值（2400亿卢布）中，生产资料产品（1620亿卢布）仍占67.5%，而消费资料产品（780亿卢布）仅占32.5%。[3] 至于农业，问题就更加严重了——斯大林去世前后的主要生产指标几乎都低于十月革命前。如谷物总产量（按1939年以后疆界计算），1913年为8600万吨，1953年为8250万吨，1946—1950年平均为6480万吨。谷物单位面积产量也是如此，1913年为8.2公担/公顷，1953年为7.8公担/公顷，1946—1950年平均为6.7公担/公顷。谷物出口量差得就更远了，1913年出口910万吨，到1953年只有310万吨。与美国农业相比，也能看出同样的问题。1949—1953年苏联平均谷物产量8090万吨，仅为美国同期产量

---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политика и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1945—1953，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0。

〔1〕Наумов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c.29.

〔2〕《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694页。

〔3〕РГАЭ，ф.4372，оп.96，д.693，л.161—162，转引自Симонов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c.201。百分比为笔者计算所得。

（13350万吨）的60%。[1]

苏联领导人正是从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开始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马林科夫在1953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八月会议上关于必须优先生产日常生活消费品的讲话和赫鲁晓夫在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提出农业改革纲要，可以被看做是经济政策“解冻”的第一个信号，是修正苏联传统经济模式的初步尝试。虽然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之间的政治较量正在暗中进行，但必须改变经济政策以解决社会生活急需的问题则是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增加日用品生产，发展居民住宅建设，扩大商业销售网点，降低农业税收标准，加速开垦生荒地，所有这些措施，无论最初是谁提出的，其结果都是为苏共二十大进一步提出的改革方针提供了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2] 不过同时必须指出，苏共中央当时的认识是很有限的，并没有从根本上对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提出挑战。可以对此做出注解的是，1955年1月马林科夫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罪名之一就是引导经济界“在苏联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上宣扬明显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3]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对国内政策（主要是经济政策）的修改才局限于一些治标不治本、治表不治里的零星措施。这里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人

〔1〕李仁峰主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35、41、135—137、164—165页。

〔2〕关于1953年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争先提出经济改革措施的情况，详见Зубкова Е.Ю. Маленков и Хрущев: личный фактор в политике 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4, с.109—111; Пихоя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с.8—11。

〔3〕苏共中央决议指出，马林科夫在1953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九月会议上的发言“将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与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速度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作为重要的结论，他还提出了加快轻工业发展的口号。因此，某些可怜的经济学家抓住马林科夫同志的这个错误讲话，在苏联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上宣扬明显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要求优先发展轻工业，并不是偶然的”。见Рейман Решение январского（1955г.）пленума, с.31。

们的认识能力和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超越被斯大林注释和僵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曰斯大林主义）的程度，而不在于对斯大林本人的畏惧，否则就无法解释苏共领导人在党内民主问题上对斯大林的点名批判了。

如前所说，赫鲁晓夫及苏共中央在二十大期间对个人崇拜现象的认识水平，显然还停留在非常肤浅的层面。即使这样，在全党和全世界面前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是极富冒险性和挑战性的，因为从本质上讲，批判斯大林无疑就意味着以其为标志的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那么苏共中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问题又是怎样提出的？实际情况并不像赫鲁晓夫本人回忆和一些研究者认定的那样，似乎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秘密报告只是在代表大会期间由赫鲁晓夫个人突然提出来的。〔1〕同国际和国内问题一样，二十大在党内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而且得到了高层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

对斯大林产生恐惧感的首先是他身边的人，特别是到斯大林晚年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已经处于一种人人自危、难以容忍的紧张状态。通过1952年10月召开的苏共十九大，斯大林把与自己同辈的“老近卫军”全部赶出了新的领导核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实际上都是在斯大林郊外别墅的晚宴上决定的，而能够被召来出席晚宴的只有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少数第二代领导人。即便是他们几人也整日战战兢兢，不知哪一天就会被从晚宴邀请名单中除名。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突然中风倒下。虽然导致斯大林最后死亡的真实原因目前仍无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斯大林能够再次站起来。在斯大林昏迷和弥留之际召开的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以及会议做出的对

〔1〕《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00—511页；拉齐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第4—8页；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60页；尼古拉·津科维奇：《权力与斗争》，第210页。

党和国际进行机构及人事调整的决议，充分证明了党内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1] 在斯大林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便通过了关于“实行集体领导”的决定，并形成一个共识：今后在党的领导层中，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担任可以凌驾于中央主席团其他委员之上的职务。[2] 这里当然有克里姆林宫继任者相互制衡的考虑，但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人们对斯大林式独裁统治的恐惧。应该说，苏联领导层的“非斯大林化”实际上早在斯大林刚刚倒下时就开始了，尽管步履蹒跚并充满了自相矛盾。

最先针对斯大林采取个人行动的是贝利亚。斯大林去世才一个星期，3月13日，内务部长贝利亚就命令成立若干侦查小组，负责重新审理包括著名的“医生案件”在内的一些重大案件，而这些案件都是斯大林生前组织的大规模政治镇压的重要内容。不到1个月的时间，“医生案件”得到平反，主席团还通过决议，赞成贝利亚采取措施揭露过去国家安全机构制造冤假错案的罪行，“消除由于破坏苏联法律所造成的后果”。尔后，根据贝利亚的倡议，在5月9日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节日期间禁止游行队伍抬举领导人画像的决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并由此谈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性。[3] 虽然这些措施没有直接联系到斯大林，但是其逻辑的指向是清楚的。6月22日贝利亚的被捕当然不是因为他所平反的案件大多是由斯大林批准的，不过处理贝利亚事件却为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提供了一个讨论斯大林问题的机会。

---

〔1〕有关史料见Медведев Ж.А. Загадка смерти Сталин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0, №1; Пихоя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Рейман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370—377页，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2〕Наумов В.П.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1953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5, с.19.

〔3〕《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380—409页；ЦХСД, ф.3, оп.10, д.22, л.3—4; д.20, л.11, 转引自Наумов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 с.20—22、27—28。

有学者认为逮捕和处决贝利亚“实际上导致了非斯大林化的停止，甚至出现了恢复斯大林化的现象”。[1] 实际情况未必如此。7月中央全会形成的决议承认，苏联无论是在“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领域”和“共产主义教育”方面，还是在遵守“列宁制定的党的准则”和“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错误。特别是在党的政治生活中，“积累了许多极其不正常的现象”。例如，一再推迟十九大的召开，连续几年不召集中央全会，主席团“长时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国家和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决议往往也没有按党章规定那样事先在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讨论”。决议还特别指出了“另一种不正常现象”，即“近几年来的宣传工作”“走上了宣扬个人崇拜的邪路，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很显然，这是在不点名地批评斯大林。然而，笔锋一转，决议把本来应由斯大林承担的这一切罪过都转嫁到了贝利亚头上。[2] 鉴于斯大林在党内的崇高威望，这样做是完全正常的。令人感兴趣的是，除了向党内传达会议精神外，苏共中央还安排了三次会议，分别向中共、东欧各党及意共和法共介绍情况，而在这里，斯大林受到了点名批评。据参加会议的意共代表带回的材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出席了通报会。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长篇解释性讲话中，列举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通过许多具体事例，莫洛托夫描绘出一个头脑简单、性情粗暴、处事偏执、权欲熏心、甚至还有些疯癫的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苏联领导人要改变斯大林生前的一些作法，自然需提出理由，但莫洛托夫强调他只是在讲述一个伟人的错误，并把这些错误归结为斯大林晚年的“病态”。莫洛托夫最后告诫说，

---

〔1〕Рейман Решение январского（1955г.）пленума，c.29—30.

〔2〕《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47—72页。这里根据原文对译文做了一些修改。原文见Наумов В.，Сигачев Ю.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1999，c.265—273。

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1] 显然，此时个人崇拜的概念表面上还是没有直接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起来。同全会的精神一样，在舆论宣传上，所有的指责都是针对贝利亚的。苏共领导人这样做，很可能是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接受能力。尽管在党内讨论会上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个人崇拜具体讲是对谁的崇拜？宣传个人崇拜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但是在社会上，民众仍然像神一样供奉着斯大林。1953—1955年，各种报刊杂志继续连篇累牍、一如既往地颂扬和赞美斯大林。特别是1954年12月斯大林诞辰75周年时，各地关于斯大林的展览、集会、颁奖等纪念活动达到了高潮。[2] 在这样的氛围中，1955年1月被罢免的马林科夫的罪名有很大一部分是指责他违背了斯大林生前制定的方针和政策，并骗取了"伟大领袖"的信任。不过，中央全会决议的最后还是没有忘记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3]

当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纷纷落马以后，召开苏共二十大的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55年4月7日，赫鲁晓夫提议10个月后召开苏共二十大，其议程是常规性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这项建议，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在会议上提出斯大林问题。[4] 然而，在为苏共二十大准备材料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关于30年代大规模政治镇压的问题。平反工作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已经开始，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只是进展缓慢。而党的代表大会不仅要对一系列历史问题做出结论，还要给

〔1〕R.J.Service, "The Road to the Twentieth Party Congress", Soviet Studies, Vol.33, №2, April 1981, pp.240—242.高岗代表中共听取了情况通报，遗憾的是目前有关的中方材料尚未解密。

〔2〕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 л.20, 转引自Пыжиков Проблема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с.47—49。

〔3〕Рейман Решение январского（1955 г.）пленума, с.30—32.

〔4〕РГАНИ, ф.1, оп.2, д.1, л.7、4—5, 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с.167—168。

千百万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镇压、迫害和牵连的人及其家属一个交代。于是，国家安全机关积极地开展了对在1936—1939年期间被判罪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的重新审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系列阴谋伪造的假案和通过粗暴手段制造的冤案，揭发材料如潮水般涌来。1955年3月14日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向苏共中央报告，苏联检察院特别案件处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1—2月份，共审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其中由于在原审判中“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而由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达7727件。此外，根据被判刑人员及其家属的申诉书正在进行核查的案件还有1万多件，而尚未处理的申诉书则有3万多份。[1]

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着手对这些案件进行认真研究，并考虑为无辜受害者的平反问题。到1955年的秋天，关于30年代大清洗，以及斯大林应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2] 在这种情况下，1955年11月5日举行的主席团会议做出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斯大林诞辰时，不再像往常那样召开隆重的集会进行庆祝，而仅在报刊上刊登一个消息。[3] 由于社会的压力，必须进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院长波斯佩洛夫为首的新的专门委员会。会上还宣读了当事人沙图诺夫斯卡娅给米高扬的信，信中讲述了有关调查谋杀基洛夫案件的情况：在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办公室，凶手尼古拉耶夫当着斯大林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亚戈达的面，讲出他的背后指使者

---

〔1〕Артизов А. и т.д.（сост.）Реабилитация：как это было，с.196、201.

〔2〕Наумов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с.27；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第62—63页。

〔3〕РГАНИ，ф.3，оп.8，д.389，л.33—34；д.388，л.61—62，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169—172。参见Наумов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с.27。

竟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随即遭到一顿毒打。受到极大震动的主席团成员要求继续调查。[1]

1个月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在2月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尖锐地谈到斯大林和个人崇拜问题，并且引起了领导层的争论。这一天，苏联国家安全部前特大要案侦察员罗多斯从监狱被带到主席团会议，他被要求如实地回答所有主席团成员的问话。与之交谈后，多数人都不再怀疑：镇压和刑讯都是斯大林本人亲自设计、亲自领导的消灭异己的活动。米高扬、波斯佩洛夫和谢罗夫还谈到了一些具体事实，表明斯大林确曾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甚至规定了各地逮捕人员的名额。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提出一个尖锐而直率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赫鲁晓夫提议将这些事实真相补充到他在苏共二十大的工作总结报告里。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赞同他的建议。莫洛托夫虽然也同意说出事实真相，但他坚持在报告里必须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随后的发言中，米高扬、萨布罗夫、马林科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苏斯洛夫明确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认为"有责任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向党说明这一切"，"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危害"，"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应该采取这样的路线，不能再糊涂下去了"。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支持莫洛托夫，尽管他们也同意"党应该了解真相"。伏罗希洛夫建议，因事关重大，"应该考虑周全"，"一步一步地来"。莫洛托夫坚持认为，"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至于那些"可耻的事情"，"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来得及搞清楚"。最后，赫鲁晓夫总结说："为了党的利

[1] РГАНИ，ф.3，оп.8，д.389，л.30—35，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79、171—172、912；Соколов А.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17—1940г.，Москва：Высшая школа，1999，с.200.

益应该做出决定”，必须认识到，“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斯大林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因此，赫鲁晓夫提出，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手段的问题”，但“应该确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置于应有的地位”，以后在宣传画和文学作品中，“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并“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1] 两天以后，斯大林的名字第一次从官方公开的政治语汇中消失了。在2月3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纪念伏罗希洛夫75岁生日而发布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命令中，只称其为“伟大列宁的忠实学生”，而在以往的标准用语中是一定要提及“斯大林”的。[2]

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认为大会前未必能够搞清楚的事情，没过多长时间就有了明确答案。2月9日，主席团讨论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此前提交的一份长达70页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反党、反苏和反革命案件都是侦查机关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种非法手段逼供的结果。令人震惊的还有如下统计数字：1935—1940年，因被指控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而遭到逮捕的苏联公民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镇压主要集中在1937—1938年（逮捕1548366人，处决681692人）。大清洗的浪潮波及到全国所有地区和部门，“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在苏共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之中，有98人被逮捕并无一例外地被枪决，在1966名拥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大会代表之中，遭到逮捕的有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报告提出的充分证据表明，不仅大规模

〔1〕РГАНИ，ф.3，оп.8，д.389，л.52—54，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175—177.参见Наумов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с.156—157。

〔2〕Правда，4 февраля 1956г..

镇压运动是斯大林直接推动的，其中许多重大案件还是他亲自过问和决定的，甚至采取“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无耻的破坏”的酷刑和“最野蛮拷打”的方式进行审讯，也曾经两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励。报告最后总结说：“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这种‘个人崇拜’无限度地、无止境地赞美和夸大了斯大林的作用。”[1]

所有看到报告的人都震惊了，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事实是如此地令人恐怖，当他（波斯佩洛夫）汇报时，特别是讲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他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声音也颤抖了。我们大家都惊呆了，虽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情况，但委员会所汇报的一切，我们当然是不了解的。而现在，这一切都经过了核查并被文件所证实。”[2]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材料。主席团会议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的场面。赫鲁晓夫首先表态：应该有勇气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需要考虑的是怎样讲，由谁来讲，但不讲是不诚实的。赫鲁晓夫建议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重点是讲个人崇拜问题，还提议将列宁表示要与斯大林分手的“政治遗嘱”等未公开的历史文件分发给大会代表。同2月1日的会议一样，莫洛托夫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斯大

〔1〕АПРФ，ф.3，оп，24，д.489，л.23—91，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185—230。根据90年代初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披露的数字，1930—1953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和处罚的有3778234人，其中处决了786098人。已经查出的被镇压者的坟场约有100个。见姜长斌主编：《斯大林政治评传》，第546页。关于在苏联遭到政治镇压的具体人数，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这恐怕与中国当年右派的人数统计一样，很难说得十分准确。不过，如果有人以为只要把受害者人数减少一些，就可以改变“大清洗”和斯大林罪行的性质，那实在是太可笑了。原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说的好：无论如何，斯大林杀死的共产党人比世界上所有法西斯独裁者所杀死的加起来还多，提醒这一点对当今斯大林分子是有益的。见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321页。

〔2〕Наумов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с.157；Наумов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с.27—28.

林是列宁的继承人，而且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个人崇拜是存在的，但我们也是这样谈论列宁和马克思的。”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倾向于莫洛托夫的立场，虽然同意向大会说明真相，但强调要“保持冷静”，“谨慎行事”。其他所有的人则明确支持赫鲁晓夫的意见，反对莫洛托夫的立场。关于个人崇拜，阿里斯托夫的话很有哲理：斯大林时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人们想把他变成神，最后却得到了一个魔鬼”。萨布罗夫也指出，斯大林的问题“不是缺点”，“而是犯罪”。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说明事实真相，已经没有分歧，差别是细微的，并强调不必害怕，也不要“犹豫不决”，而应该“彻底揭露”个人崇拜问题。至于由谁来报告，赫鲁晓夫建议提交中央全会讨论。〔1〕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在2月13日下午召开中央全会和让苏共二十大代表了解未发表的列宁文件的决议。〔2〕

2月13日首先召开的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向中央全会提交议案，说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3〕赫鲁晓夫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所做的说明很简单，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内容，只是提到“为了使代表们正确地理解出现在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问题上的重大转折，为了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具体材料，应该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主席团的议案。〔4〕这就是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已经确定，由赫鲁晓夫

〔1〕РГАНИ，ф.3，оп.8，д.389，л.56—62 о 6，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234—237。

〔2〕РГАНИ，ф.1，оп.2，д.182，л.1；ф.3，оп.10，д.223，л.25，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238。

〔3〕РГАНИ，ф.3，оп.8，д.389，л.64—66；ф.1，оп.2，д.1，л.64，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239—240。

〔4〕РГАНИ，ф.2，оп.1，д.184，л.6—8，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241—243。

本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只是，中央委员并不了解报告的具体内容，报告的文本或提纲也没有提交会议讨论。原因很简单：报告文稿还没有形成。直到大会召开了几天以后，2月18日，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才提交了他们起草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初稿，其主要内容是关于30年代实行政治镇压的大量具体事实。赫鲁晓夫显然感到不足，第二天又向速记员口授了一些需要补充的内容。在这份口授记录中，不仅增加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对党内领导人实行清洗的事例，而且用词也显得更加尖锐和激烈。[1]随后在这两个文本以及其他人提供的文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最后的文本，并分发给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征求意见。在2月22日临时召集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了宣读秘密报告的时间——24日大会选举结束以后。25日以前，报告的最后文本终于准备好了。目前知道的有苏斯洛夫、谢皮洛夫的修改文本，所做改动都不大，主要集中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赫鲁晓夫补充的部分事例被删掉了。最后文本吸收并综合了这些意见。[2]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这样出笼的。[3]

苏共二十大路线及其产生的过程告诉人们：第一，苏共二十大提

---

〔1〕АПРФ，ф.52，оп.1，д.169，л.1—28 о 6 、29—63，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120—133、134—150。参见Наумов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с.163—164。有学者认为，秘密报告是赫鲁晓夫私下秘密完成的（Барсуков Н. Как создавался《закрытый доклад》 Хрущева），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2〕参见Аксютин и Пыжиков Оподготовке закрытого доклада，с.114；Наумов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с.163—164；Наумов Борьба Н.С.Хрущёва，с.15。各种修改文本似乎尚未发表，但在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文件汇编中收入了有关目录。见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119。

〔3〕据俄国学者考证，赫鲁晓夫做报告时有一些即席发挥的内容，在会后整理并传达的小册子里，只有少数保留了下来，同时还对引文做了技术性加工，基本上就是会前准备的和目前人们看到的那个报告文本。Аксютин и Пыжиков Оподготовке закрытого доклада，с.116；Наумов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с.165—166.

出的问题，绝不是某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时代前进的体现，社会发展的要求，人民生活的需要。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党内活动和社会趋向预示了改革的基础，包括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内苏共新领导人的措施反映了变革的必要。因此，其理论前提是客观存在的。第二，对斯大林的崇拜是苏联社会变革的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就其根本目的而言，并不是个人或小集团谋求权力的工具（尽管不排除在党内斗争中有人利用之），而是要以此为铺垫改变斯大林的某些政策和做法，平反历史冤案的社会浪潮不过是为赫鲁晓夫提供了一个机会。苏联要摆脱危机，必须破除个人崇拜的罗网。这是苏共中央集体的决定，分歧只在于问题的提法和批判的程度。第三，囿于认识能力和传统思想，苏共二十大并没有从社会变革的层面提出改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任务，而仅限于政策性调整和某些具体措施的实施。赫鲁晓夫正是利用传统力量击败了政治对手，而他本人也受到传统势力的束缚。赫鲁晓夫并非要、也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第四，无论如何，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新一代苏联领导人虽然在政治上很不成熟，毕竟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了。更准确地说，苏共二十大提供了一种改弦易辙的可能性，一个摆脱斯大林模式束缚的历史机会。然而，赫鲁晓夫的惊人之举在共产党世界引起的反应却是复杂的，其命运也是难以预测的。

## 中共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时，中共就提出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1]这种看法直到今天仍然为很多研究者所坚持，他们认为苏共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了严重分裂，甚至“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

〔1〕《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55—56页。

点”。[1] 如果说中共当时出于政治目的提出这样的看法尚可理解的话，那么现在的历史研究者还保持这种观点就多少有些令人可笑了——作为学者，对于基本的史实岂能视而不见。需要面对的问题是，赫鲁晓夫提出的新方针与中国当时的国内外政策究竟有多少区别？苏共二十大路线与中共八大路线到底有多大分歧？

首先是和平过渡问题。对于苏共二十大的提法，毛泽东心里显然是不满意的，因为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共自认为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得意之作，是中共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的宝贵经验。[2]但是，无论在任何场合，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没有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其原因在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方针上都是一个整体，而自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实行的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和方针。[3] 因此，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三和路线”在中共高层是得到了广泛共鸣的。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张闻天在2月21日外交部部务会议上指出，“战争必不可免的论点是需要修改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的多样性，是已经存在着的现实。例如，应该容许南斯拉夫采取自己的过渡方式。至于通过议会斗争是否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也不能说一定不能。在理论问题上，要打破教条主义对我们的束缚，理论要用实践来检验，

---

〔1〕如见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9—240页。

〔2〕这里有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1954年3月29日，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准备删去《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的第一、二两节。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复信同意了英共的意见。毛泽东在审阅复信时指出，中宣部和英共都犯了错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30—532页）。值得注意的是，被删去的两节文字所论述的核心思想恰恰是：“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见《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506—512页。

〔3〕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应该注意到，苏联强调的是全面缓和，而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更注重的是与周边国家的和平相处。

不能认为斯大林讲过的话就不能修改。”“在党内生活中强调集体领导是对的。斯大林的功绩不能否认，也没有否认；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缺点的，集体领导不够，会造成许多不良后果。”[1] 周恩来也多次谈到和平共处的问题。如在3月4日的一次专业会议上，周恩来作报告说：国际国内形势都有利于我们的和平建设。国际紧张局势更会趋向于和缓。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个估计是正确的。当世界形势发生这样大变化，和平更加为全世界人民掌握了，战争是可以制止的。正是为了争取和平，制止战争，就更需要加强我们的力量，利用有利于和平建设的条件，加快加紧地建设，包括国防建设。在5月3日国务院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又说，在国际关系上，“要和平共处，要用和平方法竞赛，比谁的制度优越，比谁的制度好，让人民来选择”。[2] 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又以“促进和平共处的一个重要方式”、“和平中立趋向的发展”等为题，连续刊登文章和消息。[3] 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自然不便提出反对和平过渡的意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个人内心的不满是有的，但中苏之间的政策性分歧是不存在的。直到1957年底的莫斯科会议，中共才有分寸地提出对和平过渡问题有不同意见。[4]

至于国内经济方针，毛泽东当时对“以苏为鉴”思考的集大成者

---

〔1〕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013页；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631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54、579、648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84—85页；《党的文献》1993年第1期，第12页。

〔3〕1956年7月2日、7日《人民日报》。

〔4〕关于中共在莫斯科会议提出《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的情况，参见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0—11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44页。俄国档案见РГАНИ，ф.3，оп.12，д.1008，л.28—28 о б.，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280—281、1022。

就是他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1] 如果把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布尔加宁的"六五"计划报告与毛泽东的论述逐条进行对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从调整农、轻、重投资比例，改变工业布局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各项经济措施，中苏之间没有任何分歧。苏联驻华使馆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分析后做出的评论是有根据的：在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方针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强调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福利和进一步发扬民主问题等方面。[2] 当然，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的思考，在这方面都没有突破斯大林的模式，都没有从改变或改革制度的层面思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的经验看，否定斯大林模式必须过两道关口，即经济体制的市场关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关，而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当时的思考都在这两道关口面前止步了。中国经济建设采用的做法都是斯大林时期，特别是战后恢复时期苏联的经验，所以毛泽东认为需要引为借鉴的也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病，而这正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已经考虑并在苏共二十大正式提出的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1956年毛泽东所谓的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从本质上讲还是没有摆脱斯大林所指引的苏联道路，只是中国要通过采用哪些适合自己国情的方法比苏联走得更快些。再者，同苏共领导人一样，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模式的原则没有错，只是方法有问题。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中共八大继续探索而产生的思想火花，很轻易地就在突然爆发的波匈事件和反右派运动中熄灭了。总之可以说，在苏共二十大路线提出的初期，中苏两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共同探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

〔1〕该报告当时只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中进行过传达，1965年底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印发到县、团级以上党委。1975年又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再次整理成文，并经毛泽东亲自审定。1976年12月26日公开发表，随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汪裕尧执笔：《关于〈论十大关系〉的产生、整理和发表》，《文献和研究》，1982年第8期，第18—19页。

〔2〕1956年8月22日利哈乔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ЦХСД，ф.5，оп.28，д.407，р.5174，л.129—147。

何谈“根本的分歧”乃至“严重的分裂”？

问题似乎集中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的确形成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冲击波。但是要说到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事情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首先对苏共二十大做出反应的当然是出席大会的苏联代表，反应最强烈的当然是斯大林问题。据会议参加者证明，如往常一样，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受到普遍赞同，人们继续对党歌功颂德。但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在大会讨论的过程中，除潘克拉托娃外，米高扬关于个人崇拜的发言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还在会议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某地方组织负责人就发来电报称：“我不同意米高扬的右倾讲话，这一讲话是对活在整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心中的斯大林光辉形象的一种亵渎，并且将会为整个资产阶级所欣然接受。”[1] 人们做出如此反应，显然是不了解米高扬发言的背景。因此，当赫鲁晓夫作为中央第一书记宣读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了从未经历过的意外和震惊，会场的气氛异常压抑和紧张，甚至有人当场晕倒。[2] 这种局面本该使苏共领导人意识到处理斯大林问题应当特别慎重，但苏共中央的做法却是从党内到党外，从国内到国外，不断扩大秘密报告传播的范围，以至最后引火烧身。

在1956年2月19日赫鲁晓夫对报告的补充提纲中，强调指出的是，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不能超出党的代表大会的范围。[3] 但是在2月25日的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便把知情者的范围扩大到会议代表

---

〔1〕ЦХСД，ф.1，оп.2，д.81，л.228，转引自Наумов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с.147。

〔2〕Аксютин，Новое о XX съезде，с.113—114；Пыжиков Хрущевская《оттепель》，с.48.

〔3〕АПРФ，ф.52，оп.1，д.196，л.29—63，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4—134—150。

之外："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泄露到党外，更不能上报纸"。[1] 主持人布尔加宁在大会通过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后再次强调，目前还不公布报告和决议，但"这些材料将寄发给各级党组织"。这个建议也被一致通过。[2] 不久，范围又扩大到党外。3月5日，主席团的决议通知，"让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无党派积极分子"了解报告的内容，并决定取消下发材料上的"绝密"标志。[3] 3月7日，根据主席团的决议，将赫鲁晓夫于3月1日提交给主席团的、经过校订的报告文本寄发给了各级党组织。[4] 据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报告，"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是很快的，到3月20日左右就普遍传达到了基层组织"，而各种流言传播得更快。[5] 或许像俄国学者估计的，最初莫斯科希望对国外"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6] 但无论如何这个界限很快就取消了。3月24日，苏共中央联络部建议，在各民主国家，可以向党团中央及各地区和部门主管干部介绍秘密报告。[7] 3月28日，联络部又建议，向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各民主国家兄弟党的党员和预备党员介绍和宣讲秘密报告。[8] 主席团则做出决议：向16名在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活动家介绍《关于个人崇拜及其

[1] 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第259页。

[2] РГАНИ，ф.1，оп.2，д.17，л.89—90，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250—251。

[3] РГАНИ，ф.3，оп.14，д.4，л.66，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253。

[4]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43—44.

[5] 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101，第2张。

[6]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18.

[7] РГАНИ，ф.5，оп.28，д.381，л.81—82，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646—647。

[8] РГАНИ，ф.5，оп.28，д.381，л.83—83 о 6，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654—655。

后果》的报告。[1] 就在3月28日这一天，《真理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为什么个人崇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格格不入？》，第一次正式地指出所谓批判个人崇拜，就是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2] 于是，秘密报告不再秘密，斯大林问题的冲击波在秘密报告那颗炸弹爆炸后1个月产生了最大的震荡力。

几乎没有人怀疑，积极推动将斯大林问题从党内高层扩展到基层和一般民众乃至国外的，正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本人。[3] 赫鲁晓夫的目的，究竟是想以此打击政治对手，为个人争夺统治地位[4]，还是要排除保守派的干扰，为进一步改变传统政策打开通道，亦或纯粹为形势所迫而身不由己[5]，这些都只能是研究者的推断。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斯大林问题如此迅速而无限制地扩散和传播，用长远的历史眼光看，是引发了人们的思考——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还要按照斯大林指引的方向和方式走下去？[6] 不过，从现实的角度观察，苏共的做法也确实造成了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极大的思想混乱，其结果反而给继续推行改革政策和非斯大林化方针带来了诸多困难和阻力。

受到最大冲击的自然是苏联社会本身。目前已披露的大量档案

---

〔1〕РГАНИ，ф.3，оп.14，д.12，л.71、118，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253—254。

〔2〕1956年3月30日《人民日报》。

〔3〕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郭家申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97—99页；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赵敏善等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44—45页。

〔4〕参见Наумов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с.30—31。

〔5〕关于国内外共产党员强烈要求知道内情的材料，参见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20—21、623—624；Пыжиков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с.60。

〔6〕无论是在苏共党内还是年轻的一代中，新的思潮和不同政见就是从此开始出现的。详见Пыжиков 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Истоки диссидентства；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8—9。

文献显示，在广泛的讨论中，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疑问和意见，有些是十分尖锐和激烈的。很多人认为斯大林身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是“国家的罪人”，“没有资格葬在列宁墓里”。更极端的意见认为，30年来的苏联社会是“高度独裁的专制国家”，还不如“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甚至有人提出应取缔苏联共产党，烧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所有著作。[1] 但更多的人认为，把一切罪过都推给斯大林一个人“是不公平的”，秘密报告是“对斯大林的诽谤”，“一切都是胡说八道”，“斯大林将永远活在历史上，永远活在整个进步人类的心中”。[2] 尽管观察者和研究者对当时苏联社会的主流倾向有不同的判断，但明显的是，斯大林问题在如此广泛的层面展开讨论，其结果是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社会的分裂和混乱。[3] 这一现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3月7—9日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市发生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在这次布尔什维克掌权以来发生的最大一次自发性示威游行中，对批判斯大林强烈不满的人群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大批人被判处1—10年的徒刑。[4]

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反应同样十分强烈。在刚刚被纳入阵营的南斯拉夫可以听到一派赞扬声，而在西欧和美国共产党却出现了严重分

---

〔1〕Аксютин Новое о XX съезде, с.114—118；Пыжиков А. XX Съезд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0, №8, с.78—81。第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托洛茨基的亲属致信苏共二十大主席团，请求为托洛茨基及其他在20年代受到镇压的反对派成员恢复名誉。РГАНИ, ф.1, оп.2, д.14, л.48、68，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с.609、610。

〔2〕Пыжиков Хрущевская《оттепель》, с.60；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с.559—573；Аксютин Новое о XX съезде, с.119。

〔3〕Аксютин Новое о XX съезде, с.119；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101；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41页。

〔4〕关于第比利斯事件的档案资料见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929—930；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с.257—265；Наумов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с.33。由于事发突然，3月7日到达第比利斯访问的朱德也不得不取消原定计划，提前离开。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8—19页。

裂的局面。东欧各国的情况比较复杂，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迫不及待地公开发表文章赞扬和吹捧苏共的新精神，阿尔巴尼亚表面上赞同苏共二十大而在私下则表示了不满和否定的倾向，在波兰和匈牙利是改革派受到鼓舞而保守派垂头丧气，其他几个国家则是一片茫然不知所措。[1] 至于亚洲国家各党，则采取了比较保守的做法，如在朝鲜、越南和印尼共产党内，都严格限制了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和讨论。[2]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当时的心情很具代表性，她回忆说：得知苏联领导人揭露的令人痛苦的事实后，我们感到异常压抑和沉重，似乎还是茫然无知好些。[3] 究其原因，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斯大林问题的提出，而是提出问题的方式。对这一点，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当时的观察和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苏共在没有充分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的情况，贸然抛出斯大林问题，而且传达的范围

---

〔1〕详细材料见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22、28—29、31—32、611—612、613—621、625、704—705；Орехов А.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с.222—224；Мусатов В.Л.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г.：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1，с.4—6；Путилин Б.Г.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год 1956—й//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с.242—248；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8，с.28—30、35—40、85—87；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Н.С. Хрущев，Й. 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1，с. 12，以及《内部参考》，1956年3月16日第54期，第223页；1956年3月20日第58期，第340—341页；1956年3月21日第59期，第426—427页；1956年5月8日第117期，第494—497页。

〔2〕苏驻越大使齐米亚宁与越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阮维清谈话记录，1956年4月27日，АВПРФ，ф.079，оп.11，п.13，д.5，л.84—95，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27、30。

〔3〕Аксютин Новое о XX съезде，с.114.

太广，速度太快，事后又缺乏解释和教育工作。[1] 恐怕这才是造成混乱局面的主要根源。[2]

总之，苏共二十大所面临的局面是，长期以来的残酷镇压手段和疯狂造神运动已经使斯大林成为真理和理想的化身，如果不解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任何理论创新和政策调整都会遇到重重阻力，更不用说要改变斯大林体制和模式了。但正是因为个人崇拜的病毒已经渗透到苏联社会的骨髓和细胞，所以任何细小的手术都必须谨慎从事，否则就会引起整个功能紊乱。这种混乱的局面，加上舆论压力和党内本来就存在的意见分歧，苏共在召开二十大后不久便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方针，放慢甚至停止了解冻的步伐。4月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议，解散了苏联科学院热力工程实验室的党组织，将部分党员开除出党，并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其理由是在党的会议上有人对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进行恶意攻击，声称苏联社会是不民主的社会，而该党组织不仅没有奋起谴责这些言论，甚至还为部分发言者鼓掌。[3] 同时，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党的领导人不断发表讲话，批评各种“打着谴责个人崇拜的旗号企图怀疑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人。[4] 为政治镇压牺牲者平反的工作也受到极大限制，不仅拒绝重新审理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政治案件，甚至对许多在30年代大清洗中蒙受冤屈的人，虽然给予法律上的平反，却没有恢复他们的党籍，因为他们曾经为“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5] 6月30日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虽然保留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1〕《内部参考》，1956年4月8日第1861期，第385—390页。

〔2〕周恩来在7月8日接见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时曾表示过这样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认为，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利益着想，把这个问题放在党内解决更为有利。《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96—597页。

〔3〕РГАНИ，ф.3，оп.14，д.13，л.20、76—79，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288—290；Наумов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с.31.

〔4〕Пыжиков Проблема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с.52.

〔5〕Наумов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с.31.

的主要观点，但口气已经缓和了许多，并特意强调“如果从过去存在个人崇拜的事实中做出苏联的社会制度有了什么改变的结论，或是从苏维埃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寻找这种崇拜的根源，那就是严重的错误”。[1] 接着，很多人因发表了超出苏共二十大规定的讨论范围的言论而被扣上反苏反共的罪名关进监狱。[2] 笔者对50年代由苏联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反苏鼓动和宣传案件”的数量进行统计和对比的结果，特别能说明问题。1953年是最高峰，为1229件，1954年就猛降到151件，1955年为71件，1956年反而有所上升（93件），到1957年又猛增到1056件。[3] 难怪有人认为，“到1956年底，一切好像又回到旧的轨道上去了”。[4]

与苏联相比，中国当时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不同，因此，观察事物的角度和立场也就有很大的区别。总体的曲线是，苏共在二十大提出的非斯大林化方针并不坚定，而且在党内外的压力下日益趋向保守，直到1961年10月的苏共二十二大才真正开始推行非斯大林化运动。中共立场的变化历程恰好相反，一开始基本上是赞同苏共二十大的路线，波匈事件后有了新的思考，到1960年与苏联分歧公开化以后，才提出了一整套与苏共二十大对立的方针政策。无论如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并非像后来中苏论战时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持反对和否定态度，而是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

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包括米高扬发言在内的苏共公开发表的所有重要文件，而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则详细

〔1〕РГАНИ，ф.3，оп.14，д.39，л 1、30—34，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352—368，中译文见1956年7月6日《人民日报》。

〔2〕详见Пыжиков XX Съезд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с.82。

〔3〕1958年以后则迅速下降。具体数字的统计详见Козлова В.А. и Мироненко С.В.（пот. ред.）Надзор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рокуратуры СССР по делам об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й агитаций и пропаганде，март 1953—1991，Москва：МФД，1999。

〔4〕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54—62页。

报道了西方报纸对和平共处方针和米高扬发言的评论，以及苏联为大批30年代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的消息，这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1] 通过《内部参考》的报道可以看出，各地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都感到“吃惊和迷惑”，出现了“各种混乱思想”和“种种揣测”，甚至有人怀疑是翻译时出现了错误。议论主要集中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议会道路等一些理论问题上，普遍的要求是希望中央给予明确解释和指导。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4月上旬。[2]

实际上，对于苏共在斯大林评价方面发生变化的迹象，中共中央早就有所感觉和了解，并且持一种认同的态度。[3] 苏共也并非有意在斯大林问题上对中国搞“突然袭击”。鉴于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地位不断提高，赫鲁晓夫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后，特别重视发展与中共的关系。还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苏联党和国家的所有领导人不仅分别会见中共代表团，而且还暗示要在大会上批判斯大林。如2月6日赫鲁晓夫接见朱德和刘晓时，就大谈斯大林在农业问题上的错误。代表团急电请示中共中央，是否出席批判斯大林的会议。接到中央“照常参加”的电示后，代表团经研究一致决定，对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不表态、不发言，采取回避政策。[4] 很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朱德在

---

〔1〕《内部参考》，1956年2月20日第29期，第177—179、184—188、190—195、195—197、200—202页。

〔2〕《内部参考》，1956年2月25日至4月4日各期。

〔3〕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484—485页。不仅毛泽东本人提出了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甚至中共中央早于苏联提出了反对突出个人作用和个人崇拜的问题。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192、407、473、528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29页。

〔4〕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7页。赵仲元：《1956年随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第86—87页。师哲也回忆了一些赫鲁晓夫在会前的谈话内容。参见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95页。另见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87页。

大会发表的贺词中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而他代读的毛泽东的贺词则提到苏共是“斯大林及其亲密的战友所共同培育的”。[1] 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在19日宴会上又主动表示，会后将同中共代表团谈斯大林问题。对此，中共代表团确定的方针是“对斯大林的功过不表示意见”，但同意“提倡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2] 于是，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赫鲁晓夫的工作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以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总结了苏联的历史性成就，“规划了苏联人民继续前进的道路，同时也指明了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方向”。不过，社论没有提到个人崇拜问题，也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3]

关于中共中央何时以及如何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的情况，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据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在大会期间就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秘密报告。[4] 这显然与事实不符——秘密报告文本是会后交给中共代表团的。吴冷西说，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只念了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后来，新华社是根据3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报告文本连夜组织翻译并印发中央领导人的。[5] 这里也有记忆的错误——《纽约时报》是6月5日才刊登出秘密报告文本的，所以新华社翻译的很可能只是一些有关报告内容的消息。李、吴对研究中苏关系无疑是重要的当事人，但他们当时都不在莫斯科。据朱德的翻译赵仲元回忆，秘密会议召开之前，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就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情况，并解释说对中共没有保密的问题，但苏共不希望其他代表团参加秘密会议，因此也不便单独邀请中共代表团。2月26日，苏共中央联

---

〔1〕1956年2月9日《人民日报》。

〔2〕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30页。

〔3〕1956年2月19日《人民日报》。

〔4〕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87页。

〔5〕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俄文本交给了中共代表团，赵仲元等人连夜将报告译成了中文。[1] 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拉科西回忆说，他也是2月26日看到报告文本的。[2] 不过，俄国档案记载的情况是，2月27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将报告和决议文本（共印制30份）交给了参加大会但未被邀请出席秘密会议的13个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要求是"离开莫斯科之前应该将材料交回"。[3] 27日和28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主要内容就是通报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赫鲁晓夫反复强调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意义，认为不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党的生活准则和社会主义法制就不能恢复，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发展"。[4] 3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专门印制150份报告文本，并通过苏联驻外使馆寄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5] 于是，3月3日邓小平等从苏联回到北京时便带回一份报告文本。[6] 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书面报告邓小平：苏共中央交来一份经赫鲁晓夫本人校对过的秘密报告的正本，并告文本

〔1〕赵仲元：《1956年随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第89页。回忆中谈到所谓波兰代表团的贝鲁特和匈牙利代表团的拉科西出席了秘密会议，只是传言，没有得到证实。

〔2〕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9，№1，с.11—12.

〔3〕РГАНИ，ф.1，оп.2，д.18，л.116，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252—253、42。

〔4〕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第430页；赵仲元：《1956年随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第89页。

〔5〕РГАНИ，ф.1，оп.2，д.18，л.188、190—210，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43—44。

〔6〕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5页；Григорьев А.，Зазерская Т. 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Сталина，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П.Юд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с.101—111。刘晓的回忆也说，苏共中央把秘密报告复本分送给各兄弟党，也送了一份给中共代表团，还特地给他送了一份，封面印上了刘晓的名字。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4页。

不必退还，用后可以烧掉。[1] 另据薄一波回忆，米高扬4月6日访华时也带来一份秘密报告文本。[2] 总之，到3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已经了解到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而且先于西方得到了报告文本。不过，中共中央并没有及时做出任何公开反应，也没有在内部答复基层党政组织的各种猜测和疑问。在3月10日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汇报外国报刊对苏共二十大反应情况的报告中，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态度只是一些猜测。[3] 甚至那些密切注意毛泽东和中共对斯大林问题如何反应的美国专家也是一无所获。[4]

不仅如此，中共反而在得到报告文本后，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与朝鲜、越南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不仅在广大党员中照本宣科地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且将译文印成小三十六开的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两行字，随《参考资料》发放。同时，《参考消息》上也大量刊登各国对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的反应。这些内部刊物虽然发行范围有限，但并非机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至抢购一空。李慎之的印象是，看来毛泽东“并不反对让这个报告的内容从各种渠道泄漏出去”。[5] 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的一种心态：并不担心非

---

〔1〕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第431页。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72页。有人认为是米高扬正式将秘密报告带给中共中央的（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第242页），不知所据为何。

〔3〕РГАНИ，ф.5，оп.30，д.138，л.107—124，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613—621。

〔4〕《内部参考》，1956年3月20日第58期，第320—322页。

〔5〕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年，第4—5页；黎之：《文坛风云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页。据韦

斯大林化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

关于毛泽东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最初看法，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党内会议的讨论、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人之间的谈话。这三者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公开表态最为谨慎，内部讨论就开放一些，而私下谈话最为自由。由于目前中国相关的档案文献尚未开放，研究者所能利用的主要是吴冷西的回忆录——党内讨论，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公开表态，以及俄国的档案文献——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数次谈话。

中共高层对苏共二十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斯大林问题上。3月11—12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1] 在3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首先"破题"定了调子，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所谓揭盖子，就是破除了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思考和办事了。所谓捅娄子，就是指苏共对斯大林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人物"进行批判，事前没有同其他各国党商量，搞"突然袭击"，大家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毛泽东还提到对和平过渡问题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展开讲。在3月19日和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主要谈论的是斯大林在各个时期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毛泽东和刘少奇，详细讲述了斯大林在对待中国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邓小平主要谈批判个人崇拜问题，并强调指出，"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还提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前无古人，错误是难免的。会议决定，面对国际风波，

君宜回忆，她本人就听过两次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传达。韦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百年潮》1998年第2期，第25—26页。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51页。

中共应该表态，以支持苏共二十大的姿态，分析斯大林的错误，表明对共产主义前景的信心。4月4日毛泽东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即将发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强调指出，从苏共反斯大林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

所谓公开表态，就是指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2] 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一方面是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的局面，表明中共的观点和立场，扭转一些兄弟党悲观失望的情绪，而这个任务本来应该由已近“不惑之年”的苏联党来完成。[3] 另一方面是用中共中央对于斯大林问题的“全面分析”来教育和指导中国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解除他们中间的种种疑问和揣测。[4] 看来，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必须解决的历史性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苏联共产党提出但无法自己解决的。文章首先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接着便对斯大林问题展开了全面讨论。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文章突出强调的有以下几点：一、苏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强调集中，就会出现错误，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个人崇拜的错误在所难免。

---

〔1〕吴冷西：《十年论战》，第3—24页。

〔2〕见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毛泽东的修改部分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9—67页。

〔3〕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9—20页。

〔4〕文章发表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便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委立即在党团员中和党外人士中，广泛地进行切实的学习和讨论，并且随时将学习的情形和讨论中的问题报告中央宣传部”。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100，第43张。

二、斯大林在后期工作中“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因为他的骄傲和不谨慎，“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是说，斯大林错误的根源不在于个人崇拜而是思想认识问题。三、“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即使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和斗争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说，个人崇拜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四、吸取个人崇拜的教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这就是说，对书本上的东西和苏联的经验是需要分析和鉴别的。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相比，中共中央的认识的确前进了一步，分析也深入了一层。但是，很多人过分夸大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与苏共方针的区别，这显然是有误会的。苏共中央在6月30日的决议中，特意引证这篇文章来说明中共“拥护和支持我们党所采取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措施”。《真理报》出版社还将该文全文进行准确校对后，印成小册子，发行了20万册。[1]

如果说在报纸上更多地显示了中共比苏共高明的方面，那么在与苏联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则强调了中苏两党一致的方面。在3月31日与尤金进行的3个小时“情绪极佳”的谈话中，毛泽东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虽然在原则上承认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但就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而言，几乎没有正确的地方。毛泽东指出，“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共产国际实际上的领导人，他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1926年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人要依靠国民党，服从国民党。后来，

〔1〕1956年7月6日《人民日报》。

斯大林只相信王明的话，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在抗日战争中，王明总是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义为掩护，搞投降主义活动。共产国际只是在最后一段不长的工作时期才转变了看法，但毛泽东认为这是季米特洛夫的功劳。毛泽东特别讲到，共产国际解散后斯大林仍然错误地估计中国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他坚持主张中共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为此，斯大林以“俄共（布）”名义发来秘密电报，坚决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国共决战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却怀疑中国的革命力量，坚决主张同蒋介石讲和。中国革命已经胜利以后，斯大林对中共仍然持不信任的态度。毛泽东带有几分气愤地说，更有甚者，当时有许多议论，说什么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南斯拉夫道路，什么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接着，毛泽东又大谈他在莫斯科的遭遇，强烈批评斯大林对中国所犯的大国主义错误。同样，在苏联国内问题上，毛泽东虽然在总体上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忠实的革命家”，但对于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指出的斯大林的错误没有任何否定意见，反而对其进行了总结，并归纳为7个问题。看过以上记录，给人的印象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说法并无多大区别。当尤金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毛泽东还说，苏共二十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主动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许多问题。[1] 4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会见来访的米高扬，苏联代表团此行的主要任务是签订苏联援助中国再建55项重点工程的协定。会见中，米高扬通报了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有关情况。毛泽东感谢苏联的援助，并表示也将一如既往地尽力支持苏联。谈到斯大

〔1〕Григорьев А.，Зазерская Т. 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Сталина，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П.Юд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с.101—111.

林问题，毛泽东说，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1] 在5月2日与尤金的轻松谈话中，毛泽东继续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首先表示欢迎和完全赞同苏联对英国采取的缓和立场，而“过去错误地把英国同美国一样看待，把英国也看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敌人”。接着，毛泽东又指出了斯大林在中国和印度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毛泽东还认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于没有采取任何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措施，由于这个过错，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隔阂越来越深”。毛泽东称赞“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同时又指出，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毛泽东又一次说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犯过许多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毛泽东说他“可以写一本书”，只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对共同事业不利”。最后，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苏共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由于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说到中苏两党的看法，毛泽东笑着说，“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2]

在苏联人看来，直到是年9月召开中共八大，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问题总体上还是给予高度评价的。[3]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致开幕词时讲到：苏共二十大“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并断言苏共的工作“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刘少奇所作并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评价苏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

〔1〕吴冷西：《十年论战》，第3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63页。

〔2〕АВПРФ，ф.0100，оп.49，п.410，д.9，л.124—130.

〔3〕Сидихменов В.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 Новое время，1993，№2—3，с.38—39.

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而且对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 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则指出，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对个人神化严重恶果的揭露。[2]

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对于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倾向，毛泽东是心花怒放、举双手赞成的。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在革命问题上，斯大林长期以来指挥和训导中国共产党，怀疑和压制毛泽东本人，现在这个“盖子”被苏联人自己搬开了，中国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毛泽东终于有机会一吐积压心中多年的怨气了。[3] 按毛泽东本人的话说就是“气不平，理不顺，就要出气，就要讲道理”。[4] 毛泽东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5] 的确，毛泽东不仅在中国领导层内部，在苏联人面前，而且反复向中共广大干部数落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罪状”，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加深了对批判斯大林的理解。中共党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不仅苏联人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是满腹怨言的。[6] 第二，在建设问题上，斯大林模式一直是中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榜样，特别是对于毫无管理国家经验的中共来说，只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苏联有的，中

---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204、138页。

〔2〕《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2页。

〔3〕米高扬与毛泽东谈话后就有这种感觉。见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46页。

〔4〕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609—612页。

〔5〕尤金与毛泽东的谈话备忘录，1957年10月29日，АПРФ，ф.3，оп.65，д.589，л.173—179。

〔6〕黎之：《文坛风云录》，第54—56页；韦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第25—26页。

国也应该有，苏联没有的，中国也不能有，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1] 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苏联的做法正确与否，而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不能总是屈居莫斯科门下。如今斯大林已经不在，斯大林模式这个“紧箍”也被苏共自己摘除了，各国共产党终于可以按照各自的意志行事了。[2] 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共不仅在革命问题上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也会走到苏联的前面。因此，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非斯大林化无疑是为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条件，毛泽东没有理由不暗自高兴。[3]

其次，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也确有不满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有关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如上所述，毛泽东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是认为苏共批判斯大林在“原则上和方法上都是错误的”。所谓“原则上”的错误，就是说不能一般地反对个人崇拜。毛泽东后来指出，个人崇拜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分，正确的个人崇拜必须坚持，“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4] 说到底，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和未来世界革命的领袖，是需要个人崇拜的。但是，当苏联提出个人崇拜问题时，中国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很自然就联想到国内问题。河北省机关党员干部提出，“要说过

[1] 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如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65—371页。

[2] 在一次讨论会上，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不无兴奋地说：“这个报告（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者）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产党员自由思想了。”韦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百年潮》1998年第2期，第25—26页。

[3] 斯大林逝世的讣告广播后不久，苏共中央工作人员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曾听一位在中国党内地位很高的干部说：“鉴于斯大林的逝世，国际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就应当是毛泽东了。”Сидихменов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 с.38.

[4] 毛泽东1958年3月10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吉林省档案馆，1/1—14/68，第6—16张。

去歌颂斯大林是个人崇拜，那么我们还编了东方红歌颂毛主席，那也能说是个人崇拜？”[1] 天津市干部提出，“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说法应考虑改变一下。[2] 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3] 鞍山市干部、职工讨论时有人说：“什么是个人崇拜？中国对毛主席来说是否也是个人崇拜呢？”[4] 湖南一些高等学校的教师则直接提出了中国党是否也存在个人崇拜或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的问题。[5] 在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文章公开发表以后，黑龙江省机关干部中还有些人提出：歌颂毛主席的《东方红》民歌，在农业合作化中提出的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的路，以及以前讲的在毛泽东时代、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毛主席万岁等等，是否算个人崇拜？[6] 长春市干部中也有些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更有的人提议：“我们国家对党的领袖也应注意”“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7] 看到这些材料，不由得毛泽东不考虑。[8] 于是，毛泽东在10月31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时指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没有提出本质的问题”。“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反对的是主张沙文主义、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9] 显然，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可以的，

---

〔1〕《内部参考》，1956年3月7日第45期，第55—56页。

〔2〕《内部参考》，1956年2月28日第37期，第293—295页。

〔3〕《内部参考》，1956年3月13日第51期，第150—151页。

〔4〕《内部参考》，1956年3月20日第58期，第369—370页。

〔5〕《内部参考》，1956年3月23日第61期，第557—558页。

〔6〕《内部参考》，1956年4月10日第80期，第221—222页。

〔7〕《内部参考》，1956年4月18日第87期，第394—396页。

〔8〕或许正是担心这种情绪汇入整个共产党世界的迷惘和混乱当中，中共中央在4月12日专门发出通知，禁止主动与外国人谈斯大林问题，即使被问到，也“应避免深谈多谈”，“支吾过去”。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101。

〔9〕毛泽东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夫的谈话，1956年10月31日，转引自李捷：《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但不能在一般意义上否定个人崇拜。所谓“方法上”的错误，并不是指苏共过早地提出了斯大林问题，主要也不是说传达个人崇拜问题的范围过于扩大了，而是指责苏共中央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没有事先同中共商量并取得同意。关于这个问题，最早是朱德在莫斯科时向陪同他的苏共中央工作人员指出的，后来苏联驻中国外交官也听到了类似的指责。[1] 在毛泽东看来，正是因为苏共中央采取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使各国共产党没有做好准备，才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此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从道德层面提出了问题，批评“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2] 重庆市机关干部讨论时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否共产党内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马、恩死后，有考茨基等人歪曲，列宁死后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起而反攻，斯大林才死不久，又受到米高扬等人的攻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有的人说：“人生在世叫万岁，死后就把一切都否定了，实在令人寒心。”[3] 这或许也是引起毛泽东担忧的一个问题。至于中共一再强调的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不能“一棍子”打死云云，在当时多少有些无的放矢，因为无论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是3月28日的《真理报》文章，以及6月30日苏共中央的决议，都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意思。

最后，既然苏共二十大路线与中共的主张没有根本性的分歧，那么就可以断定，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并没有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严重分裂，反而更加紧密。实际情况是，

〔1〕Сидихменов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с.38；РГАНИ，ф.5，оп.28，д.409，л.108；оп.49，д.128，л.36，转引自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27—28。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102页。毛泽东后来又说，“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这叫“缺乏革命道德”。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3〕《内部参考》，1956年3月9日第47期，第81—83页。

从此后发生的波匈事件、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清除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乃至1958年上半年的种种合作情况看，中苏关系仍然处于“蜜月”时期。[1]当然，中苏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分歧。如果谈到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发展的不利影响，应该强调的是，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无疑是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其结果必然导致紧随苏联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中共固然不如苏共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但就领袖魅力而言，赫鲁晓夫则完全不能同毛泽东相比。至少在中共眼中，斯大林倒下了，站起来的应该是毛泽东！从历史过程来看，导致中苏同盟最终破裂的种子大概埋藏在这里。

本章曾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

（2004年冬季号），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1〕参见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31—264页。有关中苏在波匈事件中合作的情况，参见本书第五章。

第三章

# 反冒进：中共关于经济建设方针争论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1956年，中共高层在如何确定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和争论。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要求超速实现工业化的激进发展方针，一种是主张积极而稳妥的平衡发展方针。前者号召批右倾保守，首倡人是毛泽东，后者提出反急躁冒进，主导人是周恩来。在新中国历史上，这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少有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面冲突。

关于这次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中国学者早有专门研究，后来又有几部传记和经济史著作，增加了一些新史料及原因分析，但总体看来不够系统、完整。本章依据大量的档案文献和回忆史料，重新梳理了这一冲突的来龙去脉及其中的逻辑关系，特别是增加了对以往研究所忽视的国际背景的考察，即苏联政府和专家对中国制定“二五”计划和确定建设方针的影响，以及对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的主张能在党内争论中取得上风所起的客观作用，以便对中国经济建设方针形成的复杂过程，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历史背景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

## 毛泽东主张反“右倾保守”

1956年新年伊始，社会主义高潮便在中国大地迅猛发展起来。1月15日，北京市长彭真欣然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随后几天，天津、上海等118个大中城市，纷纷宣布资本主义

工商业公私合营全部完成。[1]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国有化，是中共建国的基本目标之一，但原来的设想并非一蹴而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期，中共领导人的头脑还是冷静的。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承认，中国情况复杂，经济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可能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2] 10月27日同工商界代表谈话时毛泽东还强调，“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3]

然而，农业合作化意外地取得成功改变了人们对工商业改造的最初设想。如何将分散的、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农民平稳地引导到合作化的道路上，这确实让中共领导人感到心中无数。当年苏联推行全盘集体化，从1929年开始到1936年全面完成，用了7年时间，而且引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国家不得不使用暴力镇压，甚至动用了飞机、大炮，结果近200万户富农被剥夺或驱逐到边远地区，死者近千万。[4] 南斯拉夫在40年代末强行推动集体化，也导致农民的全面反抗，后来不得不解散合作社。[5] 令人惊奇的是，中国的合作化速度不仅比苏联快，而且生产有所增长，社会秩序稳定。协助毛泽东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逄先知写道：“对毛来说，全国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早有准备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这样顺利，却出乎他的意料。”[6] 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助长了毛泽东对个人意志的自信，他开始把眼光转向工商业改造。

---

〔1〕1956年1月16日、22日《人民日报》。

〔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0页。

〔3〕《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88页。

〔4〕参见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有关苏联集体化运动的大量俄国档案文件，可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6、12、15卷。

〔5〕详见沈志华：《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6〕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4页。

1955年11月16—24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召开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并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改造进程大大提前。刘少奇在会议上的说法是："在两三年之内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搞出一个头绪来，公私合营要基本上完成"。[1]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再次号召全党要消除顾虑，加快改造步伐，并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实际。[2] 会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迅速传达、讨论和学习《决议（草案）》，并在1956年1月中旬以前提出规划和进一步措施。[3] 12月5日刘少奇在中央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的讲话说，到1957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公私合营达到90%，手工业合作化也要求达到70%—80%。[4] 于是，各地区和单位领导人相互攀比，争先恐后。很快，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便卷入了群众运动的洪流。[5] 原来设想15年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后来压缩到两三年，最后仅用一两月就完成了。形势发展之快，再次令毛泽东感到意外。他后来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6] 毛泽东无论如何也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在他看来，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前赴后继奋斗的目标，今天终于成为了现实。然而，与毛泽东的心情有所不同，当全国敲锣打鼓庆祝进入社会主义之时，在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感觉却并不轻松。

---

〔1〕《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6、182页。

〔2〕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82—783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79页。

〔3〕吉林省档案馆，1—11/1—1955.161，第102—104页。

〔4〕刘少奇在中央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的讲话，1955年12月5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第9页。

〔5〕各地改造的具体情况参见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5年12月10日、15日、20日、21日、23日及1956年1月7日、13日、24日；上海市档案馆，B163—2—279，第1—11页；C48—1—113，第11—15页。

〔6〕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457—458页。

对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周恩来隐约地表露出有些忧虑。1956年2月6日，他在全国政协二届十七次常委会上提出："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1] 在2月8日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又提醒说，"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对于毛泽东1月25日所说"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周恩来也作了限制性的解释。他说，"这只是讲大体上完成"，"不论从地区或部门看，都还会有不少尾巴"，"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周恩来强调："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2] 显然，从这时起周恩来就对这种超速发展方针持谨慎态度。

在推动提前完成所有制改造的同时，毛泽东已经在思考如何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问题了。他在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写道：农业合作化高潮"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毛泽东提出，现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已经不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而是体现在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方面了。[3] 11月30日、12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在各项工作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加快建设速度，并且提出，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反对右倾保守主义为中心。毛泽东认为，中国"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要求，是稳步前进"。12月5日，刘少奇召集中央座谈会，传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44页；熊华源：《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的探索》，《党的文献》1988年第2期，第9—10页。

〔2〕《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0—191页。毛泽东的讲话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22页。

〔3〕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二）》（1955年12月27日）。

达了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并要求以此作为中共八大的主题。[1]

毛泽东批评中央失职，国务院自然难脱其咎。周恩来当即在中央座谈会上做起检查：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周恩来多少有些自嘲地说，“我对毛主席指示的体会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2] 12月21日，周恩来和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不得不以反对保守主义的精神重新进行全面规划。周恩来说，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发展农业的十七条办法以后，政府的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推动，变化很大，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并且改变了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中的一些指标。周恩来要求，各部门都要考虑，需要扩大多少，于1月15日前提出来。文教、卫生、政法也要提出计划。我们原来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现在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3]

反“右倾保守思想”成为1956年初指导各项工作的基本方针，当时是受到党内一致拥护的。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加快经济发展的新方针，刘少奇、周恩来等其他中共领导人开始都是积极赞同的。除了认同毛泽东的权威和希望迅速摆脱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外，这里有一个共产党人的基本理念问题。大家都相信这样一个道理：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提高，相信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必定推动经济发展高潮的到来。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其中讲到：“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胜利，又给我们提供了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的有利条件。……在这种形势下，我国自然不应该再拘守原来的工业化规模和速度，而是要适当

〔1〕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第777—779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216—1217页。另见《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第8—9页。

〔2〕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217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2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3卷，第242—243页。

地把它扩大和加速了。”[1]这种看法在当时中共领导层无疑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首先起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后来被毛泽东大加赞赏并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口号——“多、快、好、省”，就是首先由周恩来、薄一波、李富春等人提出的。[2]据现在看到的材料，首先完整地使用“多、快、好、省”的提法，是1955年12月14日薄一波在全国农具工作者会议上作的报告——《改善企业管理，掌握新技术，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提高我国重工业的生产而奋斗》。[3]此后，“多、快、好、省”的方针逐渐宣传开来。对于经济建设而言，“多、快、好、省”的要求，即希望以高速度、高质量、低成本来取得多成果，当然是一个理想的方针，而且周恩来等人当初提出这个口号的用意，很可能就是为了以“好”和“省”去制约“多”和“快”。但在实际宣传和执行中，由于主旋律是反右倾保守，由于热火朝天的社会氛围，人们注重的只是“多”和“快”，而忽略了“好”和“省”，只讲数量、速度，不讲质量、成本。于是，这一方针后来事实上成为高速甚至超速实现工业化的代名词。《人民日报》1956年元旦社论明确地把反右倾保守的口号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并列提出，从标题到内容，充满了逼人的气息。毛泽东亲自审阅了社论，并肯定“写得很好”。[4]

反右倾保守造成了逼人形势，各级领导人的头脑也开始普遍发热。早在1955年1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十七条”传达下去后，许多省、市领导人就开始动起来。山西、江西、山东率先提出

---

〔1〕1956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26页；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77页。

〔3〕《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第76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第576页。

1956年就要完成1957年的指标，其他省、市随后跟进。浙江省委更加激进，提出要总结亩产“千斤粮、万斤薯、百斤棉”的增产经验加以推广。[1]各地加强了在农业生产上反右倾保守的宣传，从省、县直至农业合作社，都在提高自己的增产目标。如山东省许多农业合作社提出的增产目标“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十几甚至几十”。[2]头脑发热的不只是地方负责人，还有中央的各业务部门，急速修改、提高的也不只是农业指标，还有各种工业指标。1956年初，国务院各部门召开了21个专业会议，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1月14日，国家计委汇总报告中央、国务院。远景规划对1967年所要达到的目标做了大幅度修改：粮食9500亿斤（加上大豆实为10000亿斤），棉花1亿担，钢2400万吨，原煤3.3亿吨。与1955年夏天北戴河会议汇报的指标相比，粮食增加3500亿斤，棉花增加4400万担，钢增加600万吨，原煤增加5000万吨。不少部门的修改，是把原定1967年实现的指标，提早5年，改为1962年实现。[3]

如果说远景规划中的高指标还只是造成了一种“跃进”的气氛，那么，1956年年度计划的修改则直接影响到当年的经济工作。1955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即基本建设投资112.7亿元，比1955年的预计完成数增长30.4%，比“一五”计划中规定的1956年投资额增长12.4%。这已经是十分惊人的增长，但由于反右倾保守的压力和追求高速发展的热情，各省市和各部门还纷纷要求追加投资。据国家计委1956年1月5日报告，要求的投资总额已达153亿元，后来又增加到180亿、200多亿元，比1955年预计完成数增加了1倍以上。“一五”计划规定，5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其中建成项目455个；1956年初第一次全国基建会

〔1〕1955年11月28日、12月13日、12月14日、1956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2〕1956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1、527—528页。

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项目追加到477个；几个月以后，又分别追加到800个和500多个。于是，便出现了周恩来所说的“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的混乱局面。[1]

## 周恩来提出反“急躁冒进”

周恩来对冒进的疑虑，是在遇到具体问题时逐步形成的。

现在看到的周恩来最早提出防止冒进的问题，是他在1956年1月20日中共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时作的总结讲话，那时国务院刚刚接到国家计委关于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和15年远景规划的综合报告。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强调说：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他说，“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2]

毛泽东在当天会议的讲话中，也谈到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承认现在有些人“头脑不那么清醒了”，但同时又指出，在全党，在目前，这“恐怕也还不是一个主要的倾向”，而主要倾向是右倾保守。在讲话一开始，毛泽东就尖锐地提出了领导方法问题，他说，“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使得我们的事业进行得比较慢一些，比较差一些；另外一种使得我们的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他要求政府和党的各工作部门都“应该是使事业促进”，否则“就丧失了它这个职能”。讲到最后，毛泽东意气风发地说，中国人口多，地方大，现在又有了社会主义新制度，“应该搞成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一个国家”。什么美国，那么一点东西，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1—532页。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2页。

一万万吨钢，几百个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它。[1]

这种情绪立即感染了这时正在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会议伊始，代表们便情绪高涨，头脑发热。在1月25日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李富春汇报了经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的"二五"计划指标和15年远景规划控制数字，其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为：到1962年（"二五"计划期末），钢1200万吨，煤2.4亿吨，原油800万吨，发电量500亿度，化肥450万吨；到1967年，钢2400万吨，煤3.3亿吨，原油2000万吨，发电量1100亿度，化肥1000万吨。[2] 这使周恩来开始感到不安。

首先引起周恩来注意的，是1956年初出现的物资供应紧张的局面。1月13日，国家计委提出，1956年物资供需不平衡状况可能会比以前更加严重。国家统一分配的8类235种产品，除煤炭、木材、碱等少数产品基本平衡或有少量多余外，大部分是紧张或不足的。其中突出的缺口有：钢材75万吨、镀锌钢板5.5万吨、大口径无缝钢管4万吨、金属切削机床3569台、钻探机1509台。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1956年基本建设规模安排过大，对生产资料需求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3]

1月30日，周恩来针对这股盲目热情发出了不同声音。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只字未提在当时全国叫得很响的一个口号——"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鉴于这个口号是毛泽东提出的，而且是不久前刘少奇刚刚在中央座谈会上传达的，周恩来的报告明显地表露出与毛泽东的不同思路，以至一些会议代表为此提出了疑问。周恩来在闭幕会上解释说：讲提早完成工业化应慎重。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没有根据地提，要区别提，不要混同提。因此，《政治报告》中只说加快速度，

〔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1956年1月20日。
〔2〕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479—480页。
〔3〕《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80页。

而不说提前完成工业化。大家要认识到，工业化是需要时间和知识的。[1]

2月6日，在出席政协常委第十七次会议时，周恩来又谈到，我们不要随便提出提前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可能还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谨慎一点好，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握。同一天，周恩来在国务院工作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反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倾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能泼冷水，但各部门搞计划要实事求是，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各部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2]

2月8日，在主持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时，周恩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口气更加坚决："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还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考虑到当时的主流气氛，周恩来又补充说："当然反右倾保守是主要的，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3] 毛泽东一再告诫"不要泼冷水"，周恩来提出"用冷水洗洗"，两种不同的思路已经显现。此时，刘少奇表示了支持周恩来的态度。在2月17日听取交通部汇报时刘少奇指出："现在有些人脑子热了，提得太高了，而目前又没有条件做到，急躁冒进也要防止。"[4]

由于周恩来的坚决主张，全国计划会议开始考虑压缩计划指标。2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李富春提出，在完

---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42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44—545页。

〔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0—191页。

〔4〕转引自闻言实：《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第26页。

成计划方面要均衡地发展，不要单纯地追求快。地方工业要防止盲目性。今年基本建设投资需砍掉6%，从现在起对各部门不再增加新的基建项目。[1]会议同意李富春的意见，要求对各项主要指标尽可能压缩下来，其中决定：1956年度中央各部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6%，全国基建投资由170多亿元削减到147亿元。[2]会后，国家计委根据会议精神开始修订计划和纲要草案。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规定，195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1260亿元，工业总产值为653亿元，基本建设总投资为14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5.9%、19.7%和68.1%。[3]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修改稿）规定，到1957年、1962年、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将由1952年的827亿元分别增长到1471亿元、3114亿元、5469亿元，15年共增长5.6倍，每年递增13.4%（“二五”计划期间每年递增16.2%）。其中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到657亿元、1848亿元、3522亿元，15年共增长12倍，每年递增18.7%（“二五”计划期间每年递增23%）。粮食总产量分别增长到4350亿斤、6400亿斤、9500亿斤，15年共增长1.9倍，每年递增7.4%（“二五”计划期间每年递增8.2%）。[4]后来周恩来坦然承认，1956年2月召开的财政、计划会议就是“促退会议”。[5]不过，从上引数字对比看，除了1956年基建投资规模有所压缩外，其他指标变化不大。“促退”在这时还只是周恩来的愿望。

应该说，周恩来此时并没有直接对毛泽东所提倡的新方针提出质疑，1月30日的《政治报告》也没有从总体上抵制反“右倾保守”的指导思想。这个报告毕竟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和毛泽东审阅的，而不是周恩来的个人发言。《政治报告》回避了“提早实现工业化”的口号，但在基调上依然主张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报告虽然提

〔1〕《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3卷，第282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47页。
〔3〕《陈云年谱》中卷，第283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50页。
〔5〕《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103页。

出要同时防止犯“右倾保守的错误”和“盲目冒进的错误”，却并没有列举“盲目冒进”的具体事例，而是着重批评了“保守主义的潮流”。[1] 显然，周恩来没有、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对反右倾保守的方针提出异议，而只是委婉地表露了对已经出现的冒进苗头的担心。

正因为反右倾保守风头正劲，2 月的“促退会”并没有真正实现收缩。2月22日，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说，计划草案“是在国民经济全面高涨的新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保守主义，计划既要积极又要可靠的指示和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精神编制的”。1956年的计划指标再次修改为：工业总产值535.7亿元，农业总产值606.8亿元，基建投资总额147.35亿元。对于这样的指标，国家计委在报告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要完成1956年的计划任务，“是十分繁重和紧张的”，“特别是设备和建筑材料的供应同需要还有相当的差额，资金、技术力量和人民负担能力也有限度”。[2] 2月24日、2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这个计划草案。尽管经过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协调，计划草案只是对个别指标作了象征性的压缩，与上年相比，增长速度还是惊人的。周恩来无可奈何，只能要求各部门平衡物资，挖掘潜力，节约材料。3月25日该草案由国务院下达全国。[3] 尽管如此，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进入4月以后，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明显加大了。毛泽东主张进一步追加预算，一些地方和部门也相互争投资；国务院感受到经济生活中的矛盾日益突出，难以支撑高投资，因而提出必须压缩预定计划。毛、周之间的矛盾开始

---

〔1〕1956年2月1日《人民日报》。

〔2〕《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第83页。

〔3〕《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3卷，第289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52—553页。

明朗化。

从2月到4月，毛泽东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这时，正值苏共二十大召开，苏共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时期的问题，其中包括经济建设方面的一系列弊端。毛泽东由此提出“以苏为鉴”的口号，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想要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并确实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但是毛泽东从这里引申，却提出了在建设速度上也必须超过苏联的要求。薄一波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的插话，提出了一些“过急过快”和“不切实际”的要求。例如，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空二白”（发表时改成了“一穷二白”）的论点，他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1]这个说法反映了毛泽东独特的辩证法思想，尽管多少有些偏颇，却是十分鼓舞人心的。

主持财经工作的领导人却没有这么浪漫，他们必须每天面对现实，处理复杂而又具体的任务。4月上旬，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严峻形势。如同周恩来所说，由于“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大了一些”，国民经济各部门又出现了“齐头并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结果，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2]1956年基本建设比上年增长62%，而以生产资料为主要产品的重工业产值只增长了40%，结果虽然动用了70万吨库存，钢材仍然供不应求，其他建材和若干机械设备也显出短缺，结果使许多基建工程出现了停工待料和窝工现象，仅4月份，因建筑材料和设备供应不足而未能如期开工的项目即占同期计划开工项目的20%。薄一波回忆说，那时，下面普遍要求增加生产，而上面却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28页。
〔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19页。

不敢将物资紧张情况向下交代，工作十分被动。[1]

为扭转被动局面，国务院开始采取应急措施“动员生产，约束基建”。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1956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薄一波、陈云、周恩来等人都主张“降温”。薄一波说：年度计划不能和长远计划分开，现在各部门总想把长远计划完成的期限尽量往前赶，而没有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应该使大家头脑冷下来。陈云说：生产与基建的关系，首先决定于生产、材料，不是决定于财力。材料的来源首先决定于国内的生产，而不是进口。计划应该按比例发展，如基建超过了生产就不行。以后订计划应首先进行物资平衡，然后再进行财力平衡。周恩来赞成他们的意见，说：“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搞生产要联系到平衡”，甚至提出了“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的口号。[2] 这又是一个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对立的提法。

4月14日，国务院为此下达通知指出，“1956年度物资供应情况是很紧张的，钢材和水泥的供应情况尤为严重”。通知要求，全国投资总额仍维持147.3亿元的规模，并告诫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使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相结合，特别是同物资供应计划结合”，否则“就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停工、窝工现象，并且会使我们的计划有部分招致落空的危险”。国务院还要求：“从现在开始，各部门、各地方应该迅速组织力量深入实地检查，进一步摸清生产和基本建设情况，并作好准备工作，在今年5月下旬再把1956年度计划中需要修正的某些重要指标修正一次，使1956年度计划放在更积极和更可靠的基础上，以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所规定的建设和生产任务。”[3]

---

〔1〕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339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3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63—564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3页；《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3卷，第313页。

〔3〕《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第3—4页。

然而，毛泽东的主张却与周恩来恰恰相反，他要求国务院继续增加基建投资，以摆脱困难局面，解决物资平衡问题。为此，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当面争执。在4月下旬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再三说明这样做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与会大多数人也不赞成追加投资。但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胡乔木后来回忆说："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1〕

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4—5月，周恩来亲自到几个钢铁基地作实地调查。4月14日，周恩来乘火车到鞍山、抚顺、天津视察钢铁工业，18日飞回北京。19日，约重工业部副部长吕东同上海钢铁厂和重庆大渡口钢铁厂厂长商谈增产事宜。5月6日，又飞往太原视察全国唯一能生产矽钢的太原钢铁厂，次日飞抵唐山，视察那里的钢铁厂。通过实地考察，周恩来了解到各地钢厂不仅不能增加产量，有的甚至对完成现有的生产指标都感到没有把握。〔2〕

经过调查研究，周恩来心里更有底了，进一步把注意力放到了反对冒进问题上，并且公开讲出了不同意见。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6月1日，周恩来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首先得承认今年的计划搞得不十分妥帖，国务院有责任。"3月份下达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太高，"不可能完成"，"生产方面冒进少点"，但也"肯定完不成，因此要好好计算一

〔1〕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227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65、574页；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357页。

下”。[1]这时，刘少奇和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人都赞成他的意见，在京的中共领导人对经济形势也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1956年的计划“冒了”。由此，周恩来等人从担心和防止冒进转到了反对和纠正冒进，提出了改变建设方针的问题。

## 中央决定改变经济建设方针

6月3日，财政部向中央提交了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的初稿。这个报告是在周恩来指导下起草的，体现了他从年初以来一再提醒的防止冒进的思想。报告写道：“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2]6月4日，根据周恩来、陈云的建议，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预算报告初稿。会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急躁冒进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了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意见。会议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立即下马，并据此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3]这个方针的提出，显然已有取代毛泽东既定的建设方针的倾向：反保守是顾全毛泽东的威信，反冒进才是实质所在。当时毛泽东正在南方视察，未参加这次会议。

6月5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如何削减仍然不切

〔1〕《党的文献》1988年第2期，第6页。

〔2〕熊华源：《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提出的时间》，《党的文献》1992年第4期，第88—89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4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85页；《陈云年谱》中卷，第307—308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228页。

实际的1956年预算。周恩来说："预算数字一定要减一减"，"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周恩来最后明确指出，"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1〕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都赞成周恩来的意见。李先念在会上说，税收从1953年以来就没有完成，去年确定100亿，实收87亿。今年工商税要收102亿，"这么大的任务，很难完成"，"现在下马比年底再下马好"。薄一波也支持周恩来的看法，认为这个预算"拿出去确实不好"。他说，去年基建完成80多亿，今年计划是147亿，一看就知道不可能完成。基本建设不仅要有钱，而且必须有原材料。原材料缺口大，当然完不成了。薄一波也主张有些基建"非下马不可"，"半路改正错误总比到年底完不成改正好"。〔2〕会议最后决定：1956年预算收入在原定303亿元中减少5.86亿元。支出在原定317亿元中减少10亿元。预算中基本建设用款控制数由147亿元减为140亿元，削减出来的7亿元列为预备费。〔3〕

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经国务院修改的预算报告初稿。会后，胡乔木受刘少奇的委托，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预算报告进行修改。修改稿将原稿涉及指导方针的一段话改为："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4〕可以看出，经过政治局讨论后的修改稿，明显增加了反冒进的分量。两天后，周恩来

〔1〕《党的文献》1988年第2期，第7—8页；《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24页。

〔2〕《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第4—6页。

〔3〕《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24页。

〔4〕《陈云年谱》中卷，第308页。

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迎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现在"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1]

这时，毛泽东回到了北京。6月12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开会，讨论第八次最高国务会议的有关问题。[2]关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讨论修改1956年预算报告的情况，毛泽东是何时知晓，又作何反应，目前无从考察。但显而易见，削减1956年预算的做法与毛泽东4月提出追加投资的想法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后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激烈态度可以证明，他对此是极为不满的。实际上，毛泽东在这一期间也在积极地进行调查研究。继2—4月听取中央各部委的汇报之后，毛泽东在5月下旬开始收集和听取地方各省市、委的汇报，汇报内容涉及工业、交通、商业、农业乃至失业问题等十几个题目。毛泽东强调，汇报的问题重点在经济工作，而以工业"为主要的重点"，只要这个问题准备好了，即可汇报一次。毛泽东为此还亲自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各省市委向中央汇报的"通知"和"补充通知"。[3]可见，毛泽东并非不关注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他在此时之所以没有对国务院的主张明确表态，或者是因为考察的结果并不能支持自己的主张，或者是因为不愿直接否定中央多数人通过的新方针。但无论如何，面对既成事实的毛泽东，此时心情是不愉快的。[4]

6月15日，毛泽东出席了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李先念所作预算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主要文件，而这份文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87页。

〔2〕《陈云年谱》中卷，第309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116—619页。

〔4〕据邓力群回忆，毛泽东1957年7月5日在杭州对周恩来等人说：我过去一年心情受到压抑，就是由于反冒进。《邓力群谈有关中共八大到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重大事件》，1998年4月16日。

件的主题和基调就是反冒进。除了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指导思想外，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没有强调毛泽东年初着力推行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多、快、好、省”的方针。报告提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各项建设事业”时，增加了“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的限制词。其他涉及到这个口号的几处，也是着眼于纠正急躁冒进的偏差。报告说：目前在工业生产方面，“特别需要注意纠正一部分企业片面地追求‘多’和‘快’，而没有同样地着重‘好’和‘省’的倾向。许多厂矿虽然超额完成了产量计划，却没有完成质量计划和利润计划”。“在基本建设的工作中，也存在着片面地追求多、快，而忽视好、省和安全的倾向”。[1]

第二天，尚未经过大会讨论，《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就全文发表了这个预算报告，由此可以看出主管财经工作的领导人此时的急迫心情。尽管这种多少有些违反程序的做法受到许多代表的批评，但预算报告及其提出的方针，在会上似乎并没有遇到阻力。除李先念外，其他财经领导人在会上的发言，也都贯穿着反冒进的思想。如薄一波在分析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方面的缺点时说，“上述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在计划工作中，当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又产生了急躁冒进的情绪”。他强调说，“从这里得到的教训是：今后在编制计划时，必须对于我国现有的生产能力及其可能的增长程度进行认真的研究，同时经过反复的平衡计算，从而恰当确定各部门的比例关系。”[2] 曾被毛泽东指责为“小脚女人”的邓子恢指出，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工作中也存在着急躁冒进倾向的种种表现，李富春则谈到“在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特别是在组织农业生产的发展上曾经发生过某些急躁冒进的偏向”。交通部长章伯钧的发言进一步指出：“必须通过法律、法令、规章、制度和计划，来体现既要反对保守思

〔1〕195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6—537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第86页。

想，又要防止急躁冒进的方针，这才不会使下面感觉到今天一阵风，明天另外一阵风，有些无所适从。”陈云的发言没有直接谈到反冒进问题，但他提出了对资改造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事实上也涉及到指导思想。最后，大会关于预算报告的决议指出：“在执行1956年国家预算过程中，必须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必须全面地注意多、快、好、省和安全，不仅要做到多和快，而且要做到好和省，要做到安全生产。”决议甚至指出这是一个“总的方针”。[1] 这说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反右倾保守的方针，即使提到“多、快、好、省”，强调的也是“好”和“省”。

毛泽东对李先念的预算报告以及其他会议发言作何感想，目前尚无史料可以说明，唯一能够让人们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这种提法不满的，就是他看到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时的态度。其实，6月16日的社论已经强调了反冒进的主题。据薄一波分析，那篇社论“可能由于题目不鲜明，未引起毛主席的注意”。[2] 6月16日社论的题目是《读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而6月20日的社论题目就鲜明的多：《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不过，更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或许是这篇社论出台的背景。

社论最初的主调是同时反对右倾保守和急躁冒进。6月1日，陆定一在部分省市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讲话透露：“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中央要我们写篇社论把两个主义反一反。”后来，随着反冒进提法占据主导地位，陆定一认为原本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社论不能用了，要重新起草，便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要他根据6月10日政治局会议精神亲自组织起草。陆定一收到中宣部宣传处起草的社论初稿后，作了几处修

〔1〕依次见1956年6月20、19、29、19日《人民日报》，另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7页。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7页。

改，主要是删去了颂扬反保守主义的几句话，又在“农村的扫盲工作也是最突出的例子”这句话中的“也是”后面，加了“急躁冒进的”5个字。6月12日社论稿报送刘少奇处。

刘少奇收到初稿后又作了4处文字修改，更加重了反冒进的语气。如社论稿写道：“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些”，刘少奇将“急了些”的“些”字圈掉，并在这句话的后面增写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几个字。社论稿写道：反保守主义后出现了脱离实际的新问题，“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刘少奇在“注意”的前面加上了“严重”二字。社论稿指出：“扫盲工作是应当积极地进行的，但我们这次在很多地方又做得急了些”，刘少奇又把“些”字删掉了。最后，刘少奇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收到此稿后，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胡乔木收到社论稿后，按照刘少奇等人的思路又增写了几个关于急躁冒进的具体事例，如“由于片面的强调了粮、棉的增产，缩小了农村的副业生产，又由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投资过多，这样就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双轮双铧犁的计划定的太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在南方许多地方大量积压”；“许多基本建设计划的制定，也没有切实研究建筑材料和机器设备的供应，没有对设计力量安装力量作充分的准备，以致发生某些停工窝工的现象”。[1] 于是，本来是既反右倾又反冒进的社论，最后题目虽没有变，内容却变成只是反冒进了。胡乔木显然没有认真推敲“不看了”这三个字的含义，而恰恰是这三个字包含了毛泽东极大的不满情绪。毛泽东后来抱怨说：“文章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2]

---

[1] 以上所述社论稿的修改过程，参见张秋云、郑淑兰：《一篇反冒进社论的由来》，《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第11—12页；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443—444页。

[2] 李锐：《1958年那条“总路线”形成前后的党内斗争》，《炎黄春秋》1996年第8期，第17页。

毛泽东的感觉是不错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6月20日社论的矛头所向，都是针对反右倾保守和“农业四十条”的，而这恰恰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是他亲自发动和提倡的。在毛泽东看来，社论简直就是对他本人的批判。后来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把这篇社论作为反冒进的材料，做了许多批语，如“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社论中的“又由于缺少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心中无数，有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情当然就容易偏于一面、发生片面性”一句话旁，毛泽东划了三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又写道：“尖锐地针对我”。毛泽东还在会上拿着这篇社论，念一段，批一段。他说：“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1〕

不过，在6月20日社论发表时，毛泽东却没有做声，反而是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继续坚持反冒进的主张。

人大会议确定了反冒进的新方针以后，周恩来立即把精力转入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编制工作，这也是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的重要筹备工作之一。1955年10月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确定，在八大召开时，提出一个“二五”计划的建议，并由周恩来就这个“建议”向八大做出报告。〔2〕然而，由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反复，“二五”计划的控制数字一直确定不下来。

关于“二五”计划的编制，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在这年8月国务院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各部委提出了“二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国家计委汇总后，于10月5日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2月初，李富春又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国家计委的初步设想是：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700亿元，粮食产量达到4600亿斤，棉花产量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2—36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72—773页。

〔2〕吉林省档案馆，1—11/1—1955.139，第56张。

达到4300万担。也就是说，按照1957年的计划数字，在“二五”计划期间以上各项每年分别以9.9%、3.6%、5.6%的速度增长。李富春认为，这些预计数与后来实现的结果大体相符，其增长速度也基本上是符合客观实际的。[1]

然而，在1955年底开展反对右倾保守主义斗争以后，原定设想已经大大地“落后”于形势。各部委不约而同地否定了北戴河会议提出的“二五”计划指标，开始重新设计“二五”计划方案，有的甚至就直接把“三五”计划改成了“二五”计划。1956年1月14日，国家计委将各部修改后的“二五”计划方案汇总报告中央。毛泽东召集34个部委汇报时，各部和计委都是按照修改后的指标汇报的。毛泽东对各部委修改后的方案比较满意，但认为钢产量指标还低，他主张到1962年把钢搞到1500万吨，“三五”计划期间再翻一番，到3000万吨。[2]由于当时全国开展反保守主义斗争，计委1月方案仍然满足不了上下各方面的要求，控制数字继续提高。国家计委4月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1962年钢产量达到1400万吨，煤达到2.45亿吨，发电量达到550亿度，化肥达到600万吨。4月18—24日，李富春用了6天时间向毛泽东汇报“二五”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毛泽东保持沉默，没有再提出不同意见。[3]

到了6月，尽管周恩来等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但由于各地区和各部门热情高涨，仍然要求增加投资和基建项目，致使“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居高难下，甚至还一再攀升。这使正在编制“二五”计划的国家计委十分为难，感到财政收支、物资供应等方面根本无法平衡”。[4] 6月4日，李富春给各部部长写信指出：“现在

〔1〕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474页。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42—543页；房维中、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479—480页。

〔3〕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480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481页。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43页。

各部仍然在要求增加投资和基建事业项目，这是和国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所能发掘的人力、物力、财力有矛盾的。我们认为，不仅不能增加而且照原来向中央汇报的规模和速度，还需减少。在今日以前，各部一直在考虑如何增加的问题，今日以后则要请各部注意研究如何减少的问题。如果各部不从这一方面做准备，则第二个五年计划就难于制定，也难于进行平衡。”[1]

6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李富春按照“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再次修订“二五”计划草案。国家计委准备调整和补充原计划方案，即将财政拨款改为2900亿元，建设项目要保证重点、削减次要、个别调整，以此作为“二五”计划的第一方案。6月16日，李富春邀集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讨论“二五”计划草案的编制。他指出，计委在综合平衡中，深深感到第一方案仍有偏高偏大之处，准备拟制第二方案。这个方案的财政拨款准备定在2500亿元至2600亿元左右，对基本建设规模和进度都准备作必要的压缩和推迟。但不久，国家计委函报周恩来称，“二五”计划的财政收入和各种指标虽经削减，仍然偏高。[2]

虽然政治局和人大会议已经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但在全国上下头脑发热的状态下，有关部门却迟迟拿不出一个符合新方针的计划草案，整个计划编制工作陷入困境。离八大召开只剩一个多月，但向八大提交的关于“二五”计划建议和报告的起草工作还是无法展开。国家计委心急如焚，周恩来也很着急。[3]周恩来、陈云等人意识到，要搞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二五”计划方案，不能在已有的冒进方案上修修补补，而必须推倒重来，这首先要打通各部委负责人的思想。从7月3日起，周恩来连续三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

〔1〕见熊华源：《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提出的时间》，第88—89页。

〔2〕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481—482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94页。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43页。

论国家计委的第二方案。对于“二五”计划最后方案的确定，这是一次关键性、决策性的会议。

会议开始后，国家计委首先对“二五”计划制定的背景和困难作了说明：“自1955年8月开始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中间经过反对右倾保守的运动，因而虽然自今年年初起中央已经提出防止冒进、反对冒进，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盘子已经很大，很不易削减。”计委“请求中央对生产水平、财政框子、比例关系等几个主要问题，给予原则指示，以便使得各部门的领导同志们思想认识一致起来，编制出一个各方面平衡衔接的方案”。[1] 国家计委在报告中特别提到削减建设规模遇到了各部委的阻力，显然是希望国务院领导人出面帮助解决问题。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人在会上的发言，确实起到了说服作用。

周恩来首先严肃指出：制定新方案的目的，“是为了贯彻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接着说到“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确定粮食产量在1962年达到5500亿斤，也是“很不可靠的，有虚假的”，“是危险的”，就是定为5300亿斤“也值得考虑”。周恩来提出了他首先强调修改农业指标的理由：“农业生产一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受到影响。这是一个根，而这个根是我们最不容易掌握的。”这种缺乏根据假设的农业指标一旦不能实现，必然危及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

在财政收支指标问题上，周恩来等人一致认为：“二五”期间要求财政收入和支出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长，以实现5年累计2600亿元的指标，“实际上达不到”，结果会使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也无法保证，因此这个指标“应该压下来”。周恩来主张压到2350亿元，每年递增12%。为了实现财政平衡，周恩来要求大家注意三个问题，即生产收入和基建开支要平衡；基建投资要有个限度；预算收支不平衡就只有减少国防和基建指标。

〔1〕《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49页。

在工业生产指标问题上，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分别指出：设想到1967年钢铁产量达到2700万吨—3000万吨，“这是高的想法”。不能把钢产量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唯一尺度，“我国工业化的关键不在于钢能否达到这个数字，而在于我国的水平。（现在）英国、德国都没有达到二千万吨钢，但国内什么机器都能生产，就是工业国”。对于中国来说，“更重要的，也是要各种机器都能制造，技术高，有发展的余地”。因此，应该设想钢铁生产少一些，这样，煤炭生产指标、基本建设投资等相应地“都可以少些”。

经过认真讨论后，与会者一致同意继续精打细算，按5年财政总收支2350亿元—2400亿元来安排，相应地减少主要工农业产量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提出的“二五”计划建议。[1] 6月27日，已到莫斯科的李富春也致信毛泽东和党中央，建议降低第一方案的指标，放慢农业机械化的步骤，减少国防建设开支。[2]

7月4日、5日两个晚上，毛泽东连续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关于“二五”计划的基本数字和方针问题。会后，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留下谈话，直到凌晨一点。[3] 所谈内容不详，但看起来，毛泽东当时似乎没有再坚持己见。

这次会议是一个转折点。经过充分的思想交流，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取得了一致认识。会后，周恩来亲自主持编制“二五”计划。他指示国家计委，应根据“一五”计划已有的经验，做好各项平衡工作，留有余地，即要正确估计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总额；在此基础上安排积累和消费比例，妥善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

---

〔1〕以上所述会议过程，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224—1225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94—595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43页；《陈云年谱》中卷，第314页。

〔2〕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487—488页。

〔3〕《陈云年谱》中卷，第314页。

提出稳妥的投资总额，以此编制出可行的方案来。[1] 整个7月间，周恩来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薛暮桥等反复计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王光伟回忆说，在编制工作中，周恩来“总是辩证地考虑问题”，各项数字“都要经过反复平衡的”，对于重大项目从不自作主张，而是“全面考虑，集中各方意见”，特别是专家的意见，反复平衡后才确定。周恩来不仅过问每一个数字，而且经常计算到深夜，“风雨无阻，夜夜如此，紧张工作约个把月”。[2] 7月17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并委托国家经委代国务院起草一个文件，其中强调：“搞生产必须要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他条件。”[3]

7月下旬，国家计委编制出一个新方案。8月3—16日，周恩来、陈云在北戴河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查计委新方案，又对部分指标作了调整。同时，讨论修改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稿。8月16日，周恩来前往毛泽东处商谈“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8月1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建议。[4] 对于周恩来而言，说服国务院各部门及地方负责人接受新方案，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但要扭转毛泽东的思想，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就在周恩来绞尽脑汁考虑如何让“二五”计划的新方案得到毛泽东首肯的时候，李富春从莫斯科传来了苏联政府和专家的意见。

## 来自莫斯科的意见支持周恩来

“二五”计划的建设规模，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取决于苏联对华

〔1〕薛暮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书面发言，1979年3月15日。

〔2〕王光伟：《周总理与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怀念周总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3、44页。

〔3〕《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第6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07、609、610页。

援助的规模，以及能否如期提供设计方案，供应物资和设备。中国的“一五”计划就是依靠苏联专家的帮助制定的，工业化建设也是以苏联援建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展开的。[1] “二五”计划草案虽然是中国自主编制的，但依然离不开苏联的技术帮助和指导。特别是因为在“二五”计划的工业项目中，许多骨干工程还是苏联设计和指导实施的，这里不仅有相当一部分是“一五”计划期间开工而顺延至“二五”计划期间的，还有大量中国新增加的项目。因此，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二五”计划将征得苏联的同意，并与苏联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相协调。[2]

1956年年初，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出席苏联和东欧八党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派李富春、张闻天、黄克诚三人前往。周恩来为此专门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信说，派遣“富春同志去，对商定我们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规模和速度有好处”。1月4日，李富春一行出访苏联，征询对中国远景计划和“二五”计划的意见。同时还带去两项具体任务：提出请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188项建设项目；请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的远景规划和创立提供帮助。行前，周恩来两次致信李富春，指出这些都是作为“初步方案”向苏联和其他有关兄弟国家提出或者“试行提出”，“看他们如何反应”。2月6日，李富春回国后向周恩来报告了莫斯科之行的情况，没有提到苏联方面对“二五”计划的意见。[3]

实际上，早在1956年1月，正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已经对“二五”计划中存在的某些具体问题提出了倾向性意见。如在核编综合财政计划时，专家伊里因指出，按照苏联的经验，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应由计委基本建设计划局审核，各项费用由财政金融局审核。他

〔1〕关于“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项目的情况，可参见董志凯：《156项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

〔2〕费德林与刘晓会谈备忘录，1955年11月15日，ЦХСД，ф.5，оп.28，д.308，л.131—139。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34、544—545页。

特别提出，财政金融局应该主动些。“要估计到如果基本建设规模及其他支出计划过大，以至于不胜任时，那不仅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甚至可能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认为，“二五”综合财政计划总的看来“存在着很大的财政差额”，应“严格地审核”。在莫斯科的苏联财政局局长杜齐诺夫讲的更为直接，他指出：财政计划规定利润收入1417亿元，是“一五”计划的3倍，“这个指标偏高了”。“重工业部新企业投入生产的第一年利润率为老企业的40%，第二年为70%，这种计算有很大的假设性，因而不能将其运用到五年计划中”。按照中国的计算方法，石油部“二五”计划“利润增加到8倍，而生产增加到5倍，这是不正确的”。此外，在财政计划中没有考虑作为国家后备部分的预留费用，在信贷计划中只靠居民存款增加国民经济的信贷基金而没有考虑预算资金等。[1]

在莫斯科，苏联没有对“二五”计划草案提出总体性意见。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个计划的制定与苏联援助的新项目有直接关系，在项目谈判没有完成之前，很多具体指标无法确定，苏联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帕乌金在发言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二是中国的“二五”计划草案尚未完备。李富春回国后，3月29日国家计委办公厅下发了一个文件说，在华苏联专家组的书面意见认为，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初步方案，其中缺少很多指标，还有不少指标将有重大变化”，因此只能就“任务、方针的提法和文件的结构提出我们的意见”。[2]

4月6—8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率领政府代表团访华。这次访问主要是通报苏共二十大的情况，同时也商谈一些对华经济援助问题。访问期间，双方签订了两项协议：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55项新的工业企业协定，作为正在建设的156个项目的补充；关于修建从兰州—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铁路上的阿克斗站的铁路和从1960年起组织这条铁路联运的协定。这次接触仍然没有谈到中国

---

〔1〕《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1期，第18—22页。

〔2〕《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1期，第22、4页。

“二五”计划的编制问题。5月，国家计委派人赴苏，说明对年初提出的188项委托苏方设计的建设项目的详细情况，以为双方正式会谈做准备。[1]

6月18日李富春出国前与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谈话，继续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这时，苏联专家提出了对“二五”计划指示草案的初步意见。阿尔希波夫很委婉地指出：“五年计划的生产和建设规模很大，在这个条件下，工业、农业和基本建设所采取的增长速度也是很高的。因此，希望对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某些问题进一步加以研究，这两个方面就是：寻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部分发展中的较正确的比例关系；使计划在设备、原料资源和物力、财力方面有更可靠的保证。”总的讲，“五年计划各年的投资额分配得不够平衡”。经过初步计算，苏联专家认为1958年和1959年的投资要达到规定的增长速度，“在水泥和钢材方面恐怕没有保证，所以更有必要削减”，“其他几项指标的增长也不平衡”。阿尔希波夫还详细提出了对各项指标的意见，其中特别指出，希望各种经济作物的增长指标要从“现实性”出发；编制财政计划时“希望将收入规定得高于支出”；希望再检查一下“二五”计划期间拟进行建设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和其他部门的重大项目在原料资源，首先是地质储量方面是否有保证等等。[2]

人大会议确定了经济发展的新方针后，6月19日，李富春率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再次访苏，继续就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同时与苏联就中国“二五”计划期间的援建项目进行谈判。会谈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是分组会谈，交换意见，然后由苏联方面综合对“二五”计划轮廓草案提出初步意见，并对请求的援助项目做出初步答复。

李富春带去的是“二五”计划轮廓草案的第一方案，在交换意

〔1〕1956年4月8日《人民日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76页。
〔2〕《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1期，第9—15页。

见时，李富春解释说，这个方案只是轮廓草案，还要再作修改，并提交中共八大会议审查，作为党的建议通过。李富春诚恳地说明这次来是征求“我们的老师”意见的，希望苏方帮助把“二五”计划编制好。苏方在第一阶段综合小组会谈中认为，这个轮廓草案是积极的，但是过于紧张，计划的根据还不够充分，在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例太高（占26%），成本降低也太多，财政收入不可靠，物资平衡上缺口多，某些技术经济指标定得太紧，实现计划的物资保证也不够充分。李富春带去的中国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的方案中，原定在“二五”计划期间委托苏联设计的项目是236项。经过各专业小组的谈判和协商，确定为217项。会谈时，苏联方面各部的态度一般都是积极的，他们表示，可以承担设计同时供应设备的项目约占项目总数的80%；其他20%的项目，主要靠中国自己，而苏联和东欧各国给以援助。

8月17日，李富春同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和第一副主席帕乌金会谈。帕乌金转达了苏联方面对中国“二五”计划草案的意见。帕乌金表示，对这个草案所规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任务和基本道路没有意见，但是感到这个计划相当紧张，对草案规定“二五”时期积累率由“一五”时期的22%提高到26%，同时还要使居民收入增加三分之一表示怀疑；认为农业计划要超额完成是困难的，特别在农业的收获量方面；物资平衡方面有也很大差额，有些重要物资的平衡有赤字；基本建设投资比“一五”时期增加近两倍，这样的增长比例太大了。帕乌金建议减少基本建设的投资，并且首先从降低机器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和投资着手，以缓和整个计划的紧张情况。巴伊巴科夫主要谈了对中国请求苏联援助的答复，既表示要诚心诚意地援助中国，也解释了苏联在这方面存在的一定困难。李富春表示，计划指标过高，增长速度太快，基建投资过多，物资仍有缺口，这些问题此前中国党已着手解决。现在由苏联方面提出来，对中国党也有所裨益。尤其是苏联方面以自身的教训提醒要注意农业问题，

更有启示作用。李富春表态说，除个别问题外，99%都同意苏联的意见。[1] 李富春这样说自然是心里有底的，因为他带去的只是第一方案，而此时周恩来在国内已经拿出了新方案。

对于中国“二五”计划的宏大目标，苏联最高领导层也进行了讨论。俄国解密档案显示，8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的“二五”计划草案和苏联对中国的援建项目问题。根据会议记录，多数人都认为中国的计划是不现实的，苏斯洛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等人提出，中国提出的增长“速度过快了”，“中国人的出发点是过快的、不现实的工业化速度”，“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做的结论也过高了”。至于说到对中国的援助，许多人感到苏联的负担过重。马林科夫认为，苏联对于中国“二五”计划所承担的义务过多，应该进行修改，并向中国人解释清楚。赫鲁晓夫也说：“我们答应这些要求之后会出现什么样情形，应该仔细计算清楚。过重的负担会给我们自己的经济造成损失。”会议批准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委托巴伊巴科夫将这封信连同苏联国家计委对中国“二五”计划指示草案的意见，一并交给李富春。信中指出，在这份文件中阐述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而苏联方面的技术援助，尤其是在提供设备方面，多数项目要从1961年开始供应，有的可以从1960年开始供应。[2] 看来，毛泽东设想的高速度发展计划，不仅国务院主管人员和部门无法接受，而且已经超出了苏联提供援助的能力。

中共中央已定于8月下旬召开七届七中全会，“二五”计划和报告急待定稿，迫切需要了解苏联的意见和莫斯科商谈的结果。8月10日，周恩来致电李富春，要求张玺提前回国。18日再电，要求李富春一行月底赶回，参加八大预备会议。8月22日，从莫斯科返回的张玺

〔1〕以上所述会谈过程，参见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484—487页；阎明复：《我随李富春访问苏联》，《炎黄春秋》2005年第4期，第27页。

〔2〕РГАНИ，ф.3，оп.12，д.1005，л.24—27 о 6 .；ф.3，оп.14，д.54，л.2—3，ФурсенкоА.А.（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163—164，959.

向周恩来汇报了同苏联政府谈判的情况。[1] 9月3日，李富春回国，并带回了9月1日苏共中央正式给中共中央的复信。[2] 李富春后来报告说：这次谈判，我们提出的项目，苏共中央作了认真审查，尽最大努力也只能满足我们半数的要求。因为我们要他们援助的项目很多，占其国内生产的比例很大，原材料的供应能力不够，有些设备苏联自己也满足不了国内需要。李富春颇为感慨地承认：通过这次谈判感到，我们原来提的计划和方案确实冒了。[3]

莫斯科的意见是有分量的。苏联毕竟是老师，有长期的计划工作经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学苏联的，前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在苏联协助下编制而成的。更为重要的是，既然确知不可能从苏联那里得到所期望得到的援助规模，"二五"计划就只能作相应的压缩。薄一波回忆说："苏联的答复，对周总理主持修改的'二五'计划草案被中央采纳起了有利的作用"。[4] 另一方面，苏联的答复，还使中国不能不减少对苏联援助的依赖。李富春在后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要特别注意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不能完全依赖外国。要加强我国的新产品设计工作，充分利用原有的落后设备，先搞起来，逐步提高。在技术方面，要重点突破。"[5]

9月9日，周恩来经同张玺、薛暮桥等多次修改，形成《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案修正稿）》。国务院最后敲定并提交中共中央的"二五"计划方案规定，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000亿斤，棉花产量指标4800万担。这比1955年8月的最初设想略高，而比1956年初国家计委汇总上报的方案大为缩减。其中粮食指标减少1400亿斤，棉花指标减少2200万担。薄一波

---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08—609、613页。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44—545页；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488页。

〔3〕《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95页。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45页。

〔5〕《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95页。

后来指出，这个方案比较扎实。[1]

经过如此的反复和周折，国务院提交的“二五”计划方案，终于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9月13日9时半，毛泽东对周恩来送交的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报告批示：“看了一遍，很好。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11时又批示：“你的报告全文很好。”还特意在报告上加了一句：“对苏联和各国专家对我国帮助的功绩提一二句为好。”[2] 至此，《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最后形成。

## 反冒进在中共全会的集中表现

冒进的情绪很容易鼓动起来，而反冒进的精神要贯彻下去却颇有难度。尽管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得到确认，并写进了八大决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急躁冒进的情绪在党内已经完全得到克服，问题主要反映在编制1957年年度计划时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八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陈云等不得不继续反冒进，重点是压缩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控制的数字。

1957年的计划控制数字是国家经委从1956年7月开始编制的。当时各部门各地区向国家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汇总起来，高达243亿元，比1956年的140亿元还多103亿元。薄一波认为，1956年的计划已经冒了，1957年再冒这么多，当然不行。但应该如何压缩，经委一开始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压到150亿；一种意见认为应压到100亿元。薄一波提出了折中方案——125亿元。由于意见分歧较大，又相持不下，只好上报周恩来和陈云。[3] 面对这种情况，周恩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46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15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199页。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54—555页。

来认为，急躁冒进情绪还未平息，还得继续反冒进。周恩来对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我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有关问题。为了寻找根据，周恩来要范若愚代他查找一下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一段话的出处。周恩来认为发展速度应该再放慢一点，下决心要把基建投资压到大大低于1956年投资额的程度。[1]

10月20日至11月9日，周恩来连续召开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磋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针对还有人对急躁冒进的危害性估计不足的情况，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三大高潮一来，头脑热了，前进得快了。经济建设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了起来。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在11月9日的总结中，周恩来更是援引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来强调反冒进的重要性。他说：斯大林的经济理论有值得怀疑之处。中心就是一条，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周恩来尖锐地指出：“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周恩来还说，现在的速度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根据可能把原来设想的建设速度放慢，不能算是错误。总之，今年是冒了，明年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指标可能要退回到北戴河会议的方案上，目的是要保持平衡。[2]会议期间，批准了国家经委《关于1957年农业生产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说，由于1956年农业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其他种种原因，全国粮食生产只能完成98%。根据1956年预计，对1957年农业生产初步安排是：粮食总产量计划达到4000亿斤左右，增加7.2%；大豆计划总

〔1〕转引自熊华源：《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的探索》，第11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29—630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55—556页；《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103页。

产量达到200亿斤，增长17.6%。棉花总产量计划达到3620万担，增加400多万担。经过努力，国务院常务会议将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指标由各省市各部门汇总的243亿元压缩为111亿元，比1956年的实际完成数还减少了20%。[1]

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开幕。薄一波后来说，毛泽东把这次全会看成是反冒进的“集中表现”。[2]

开会的第一天，周恩来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了对原定规划进行调整和压缩的方针。报告强调，要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八大的决议上写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是恰当的。现在看，时间可能要长一点”。至于发展速度，“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周恩来特别指出，“要达到原来远景规划设想的生产指标，肯定时间要更长一些，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他还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只是一个建议，也是可以修改的。针对许多人存在的顾虑，周恩来鼓励大家坚持从实际出发，把思想从原先已定下过的框框里“解脱”出来。他说：“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在分组讨论中，除对某些具体指标安排有意见外，大家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3]

然而，毛泽东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在11月15日的讲话中，针对周恩来等人反复讲的保持计划平衡，毛泽东继续坚持他对计划经济的一贯看法：“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他警告说：“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针对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我们工业建设的速度

[1]《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第95页；《陈云年谱》中卷，第338页。

[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56页。

[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9—237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58页。

要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毛泽东说，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就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1]显然，毛泽东对于会议不再提反右倾保守是十分在意的。他在11月13日的小组会议上提出了七条措施，后来毛泽东解释说，这七条是个妥协方案，是筑一条堤坝，想挡一挡“反冒进”之水。[2]

不过，毛泽东最终还是同意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也没有反对把计划指标减下来。究其原因，一则，经济建设一片混乱的局面是客观事实；二则，反急躁冒进已经成为中央多数领导人的共识；三则，更重要的是，压缩经济建设指标的方针与莫斯科的意见完全吻合。毛泽东只能接受现实。当然，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即“波匈事件”的发生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力，这时毛泽东已经把主要精力用来考虑影响社会主义发展甚至存亡的更严重的问题——执政党的威信和地位问题。直到整风和反右运动胜利结束以后，毛泽东又回过头来重新考虑经济建设问题。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当毛泽东再次感到经济落后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发挥比苏联更大作用的瓶颈时，他当即公开提出了15年超过英国的口号，并由此吹响了“大跃进”的第一声号角。[3]在1958年初发动“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重新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问题，并且理所当然地把周恩来及其稳妥发展的主张当做了斗争的靶子。

1956年中共高层关于经济建设方针的分歧以及争论的结局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简单归纳一下，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

中共执掌政权初期，党内的民主空气还是比较浓厚的，不同的意见可以在各种层面反映出来。尽管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个人权威是不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3—316页。
〔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59—16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94页。
〔3〕详见本书第九章。

可动摇的，也从来没人对此有所觊觎，在毛泽东身边的那些人，毕竟是与他共同经历磨难、打下江山的“兄弟”，在一段时间内，这种感觉和情谊还在，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和中共八大提倡民主生活的氛围里，即使是与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有分歧，但只要是在自己分管的领域内，他们中的多数人出于责任感，还是愿意而且敢于仗义执言的。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论在党外还是党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了。

还需要提到的是，周恩来及其他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对于经济建设方针的不同主张，就其所追求的目标而言，都是为了尽快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但就问题的实质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仅仅是发展速度快慢之争和方法不同。周恩来等人的主张，实际上是在努力建立起计划经济的体制，维护和保障国民经济在稳定、平衡的轨道上运行。而毛泽东的主张，本质上是反计划经济体制的，是要打破平衡和四平八稳的状态，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和威力，推动经济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忽视或无视市场经济，而毛泽东这种后来又不断重复的做法，一方面给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完整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本章曾以论文形式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

收入本书时略有改动。

第四章

# 中共八大：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



1956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八大主席台上

关于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研究，是一个热门题目。对此，中国学术界和中共本身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中共八大提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而把此后20余年内中国激进和极端的发展道路及其后果，归结为对八大路线的背离，同时又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与八大连接起来。[1] 这种理解，大致说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作为历史研究者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八大开过不到一年，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拥护的八大路线就被抛弃了呢？历史存在惯性，那么在八大路线中，有哪些地方保留了“革命传统”，而恰恰在这些地方为后来中共的激进和极端政策埋下了伏笔？这个问题正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2] 本章选择其中一个虽然不大却很重要的方面——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以及当时风靡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进行考察，希望为寻找答案做些努力。

〔1〕1981年6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这样的评价：“八大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页。

〔2〕关于从政治角度对中共八大研究，可参阅石仲泉、沈正乐、杨先材、韩钢主编：《中共八大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王双梅：《刘少奇与中共八大政治路线的确立》，《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第22—28页；胡绳：《谈党的“八大悬案”》，《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65—67页；韩钢：《“八大悬案”释疑》，《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40—45页；龚育之：《毛泽东与八大党章的两个特点》，《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3—9页。

## 毛泽东本人提出和赞同的建议

中共八大期间有一件事十分引人注目，就是在所有大会文件和发言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是从中共七大正式宣布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写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1] 然而，在中共八大党章中却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只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2] 此外，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和八大决议中，都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一词，甚至所有的大会代表在发言时也不约而同地都不提“毛泽东思想”。

这个问题自然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注意，很多人在学习中共八大文件时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新党章为什么未提“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没有讲中国的个人崇拜问题？现在党章不提“毛泽东思想”，是否是反对个人崇拜？[3] 国外研究者也因此对毛泽东的地位做出了种种猜测。他们认为，新党章根本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而是强调集体领导，这“进一步证实毛大权旁落”。“对毛泽东威信的真正打击是从新党章中删节了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他们还猜测，“刘少奇可能的确试图减少毛泽东的作用”，甚至断定“把涉及

---

〔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2〕《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21页。

〔3〕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129，第65—95页；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0月8日第2013期，第819页。

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从新党章中删去的提议，最初来自彭德怀”。[1]中国史学界的研究已经否定了这些判断和推测。一般的看法是：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而且这个决定是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提议做出的。自1948年11月以后，毛泽东多次将送他审阅的文件中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删去，或改为别的说法。[2]从目前披露的大量文献和史料看，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其过程也是清楚的。

自中共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后，在中共党内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最早讲到这个问题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1948年11月，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打电报向毛泽东请示，要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提出在教员和学员中，“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给吴回电说：“那样说法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3]

1949年1月，毛泽东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指出：将草案中的“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

〔1〕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王弄笙等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40页；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翻译组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8—161页。

〔2〕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第203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534—535页。

〔3〕逄先知执笔整理：《关于毛泽东思想提出的历史过程》，《文献和研究》，1982年第1期，第12页。

毛泽东又强调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说如果平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样不好，我们请他们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1]

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送审的国庆社论提纲草稿作了两处修改：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同时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2]

在1953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被删去，其中有些就是毛泽东亲笔删改的。[3] 195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的一封信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5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报送的内务条令等文件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8月14日，毛泽东又将中共中央给中国驻越南顾问团的电报稿中“毛泽东思想”字样删去。[4]

这样，由于毛泽东本人一再反对，中共中央终于做出了正式决定并通知全党。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起草了一个《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说：“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

---

〔1〕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8—329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63页。

〔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8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192、238、304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通知》还特别说明，“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知稿时加了一句：“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1]这个《通知》的精神并没有限定在党内传达，12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向与会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打招呼说：“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2]

上述情况足以说明，那时不提“毛泽东思想”的确是毛泽东本人提出的，而且中共中央书记处也有明确指示，并在中共八大前已广泛告知党内外（只是没有传达到基层）。所以，在研究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时，追究起草文件时是否专门做过决定，是否有人建议或者是谁“最初提议”的，都已经没有意义了。莫说目前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史料，即使存在这样的决定和建议，相信其内容也不外如此。既然党内高层早已达成共识，中央也发过通知，那么这一切都是没有必要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并且一再强调不能提“毛泽东思想”？这是否如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毛泽东和中共早在赫鲁晓夫提出反对个人崇拜之前就有了这种主张和想法？

## 来自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压力

胡乔木后来解释说：“这与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有关。”“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623页。
〔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87页。

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1] 这就是说，毛泽东主张不提"毛泽东思想"是被迫的，他所顾忌的只是斯大林和苏共的态度及其对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的影响。

胡乔木的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1948年下半年，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苏南冲突，共产党情报局10月会议决定将南斯拉夫共产党逐出教门。斯大林决心与铁托分裂的根本原因，就是不能容忍南共的自作主张和在巴尔干独立门户的"民族主义倾向"。与此同时，针对东欧各党"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和主张，斯大林在共产党情报局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围剿"狭隘民族主义"的斗争。[2] 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当时，国共之间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已经开始，中共绝对需要苏联的全力支持和帮助。据苏共中央联络部观察，从1947年9月召开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后，中共就明显地表现出对苏联的好感，并广泛地利用会议材料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的斗争。[3] 所以，共产党情报局1948年对南共和民族主义的批判，立即得到了中共的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专门做出了关于南共的决议，指出：铁托集团由于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基本观点，因而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泥坑。11月1日，刘少奇撰写《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一切民族，要从帝国主义压迫下争求解放和保卫民族独立，取得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援助，乃是胜

〔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9页。

〔2〕详见沈志华：《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5—26页；《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3〕《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1948年1月23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73，л.1—37。

利的最重要的条件。”[1] 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提出对宣传“毛泽东思想”降温的，其目的和考虑不言而喻。

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的压力本来可以也应该解除，但他为什么仍然坚持不同意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其原因还在于苏联——苏共此时开始的反对个人崇拜的举动及其在中国党内的影响。斯大林死后不久，苏联报刊就开始从理论上谈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并提到个人崇拜问题。在1953年5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贝利亚的倡议，通过了关于在节日期间禁止游行队伍抬举领导人画像的决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并由此谈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性。[2]接着发生了贝利亚事件，苏共中央为此做出的7月决议特别指出了“另一种不正常现象”，即在“近几年来的宣传工作”中，“走上了一条宣扬个人崇拜的邪路，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3] 苏共中央还特意安排了三次会议，分别向中共、东欧各党及意共和法共介绍情况，而在这里，斯大林遭到了点名批评。据参加会议的意共代表带回的材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出席了通报会。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长篇解释性讲话中，列举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通过许多具体事例，莫洛托夫描绘出一个头脑简单、性情粗暴、处事偏执、权欲熏心、甚至有些疯癫的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莫洛托夫最后告诫说，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

---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65页；1948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2〕《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380—409页；ЦХСД，ф.3，оп.10，д.22，л.3—4；д.20，л.11，转引自Наумов В.П.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1953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5，с.20—22、27—28。

〔3〕《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47—72页。这里根据原文对译文做了一些修改。原文见Наумов В.，Сигачев Ю.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1999，с.265—273。

持集体领导”。[1]

此后，类似的消息不断传到国内。1953年12月25日中国驻苏使馆向中宣部报送了两个材料，介绍了苏联报刊和宣传中批判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情况，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1954年第3、4期刊载了这些材料。1954年3月27日，大使张闻天又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送了一份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材料。4月28日毛泽东批示刘少奇：这些都是“重要文件”，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在京有关人员。[2]鉴于苏共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其反对个人崇拜的做法在中共中央引起的反响是可以想见的。这年12月中宣部发出的那个关于如何解释“毛泽东思想”的通知，不能说与这些背景没有直接关系。

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在1956年7月《人民日报》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以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更加成为了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当时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大量登载了中国社会各界的种种议论。人们不仅为赫鲁晓夫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错误感到震惊和不解，而且已经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党内有没有个人崇拜？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颂领袖时应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词句，应考虑改变一下”。[3]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4]长春市干部中也有些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如开会时只给毛主席致敬电，不给党中央致敬电，电影里只提毛

〔1〕R.J.Service, “The Road to the Twentieth Party Congress”, Soviet Studies, Vol.33, №2, April 1981, pp.240—242. 代表中共出席通报会议的是高岗，但可惜至今没有看到中方有关这次会议的任何史料。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484—485页。

〔3〕《内部参考》，1956年2月28日第37期，第293—295页。

〔4〕《内部参考》，1956年3月13日第51期，第150—151页。

泽东军事思想，不提党的军事思想，农业发展纲要中只说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议："我们国家对党的领袖也应注意"，"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1] 一时间，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在减少对自己领导人的宣传，以避个人崇拜之嫌。东欧各党紧跟苏联自不待言，连法共和意共都赞成批判个人崇拜的现象。[2] 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则在7月10日发表社论，欢迎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3] 甚至朝鲜也逐渐减少了个人崇拜式的宣传，最先改变的是取消了"金日成万岁"这个口号。[4] 在这样的氛围下，毛泽东本人和中共高层领导人自然都不便再重新提出"毛泽东思想"。由此可见，在中共八大和有关文件中不提"毛泽东思想"，乃为客观形势所迫，而非主观愿望。

## 中共对反"个人崇拜"的态度

如此看来，中共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丝毫不能说明毛泽东本人和中共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和表述有任何怀疑，所谓毛泽东地位下降的推测更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从毛泽东历次谈到这个问题时的说法也可以看出，他所强调的只是不宜在公开场合使用"毛泽东思想"这种提法，而并非认为这种提法本身有何不妥。中共在建国后，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战争直到"三大改造"提前完成，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这使毛泽东在党内外的威望和影响空前提升。人们更加折服于他的雄才大略，没有人会怀疑其领导的正确，更不用说会有谁对毛的地位提出挑战。

从中共八大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这个关

〔1〕《内部参考》，1956年4月18日第87期，第394—396页。
〔2〕РГАНИ，ф.5，оп.28，д.415，л.165、167.
〔3〕《内部参考》，1956年7月11日第1930期，第259页。
〔4〕《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4日第2032期，第1180—1182页。

乎共产党发展大计的重要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苏共二十大以后，反对个人崇拜已经成为各国共产党通行的口号，中共当然不会公开提出异议。然而，中共八大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相当微妙。与半年前苏共二十大的情况不同，反对个人崇拜并没有成为中共八大的主要话题，众多大会发言对此都没有涉及，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报告也只是从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角度提到了个人崇拜问题。尽管在制度层面做出了一些加强集体领导的规定，但中共并不认为在中国存在着个人崇拜现象。邓小平在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说的：

> 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地执行。[1]

〔1〕《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1—92页。

邓小平报告的基本口径是：反对个人崇拜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中共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正是毛泽东自己反对对个人的歌功颂德；领袖是需要热爱的，这不是个人崇拜。这样，既接过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并间接地回答了人们对中国是否也存在个人崇拜现象的质疑。

当然，中共八大关于中共党内不存在个人崇拜现象的解释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个人崇拜现象从延安整风时就已经开始了。延安整风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授予了毛泽东独断专行的权力，神化了毛泽东的作用。在中共七大会上，不只是刘少奇，包括张闻天、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在内，对毛泽东都是一片颂扬、崇拜的言词。延安整风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迅速传遍延安，《东方红》也是这时传播开来的。[1]

不过，关键的问题还是毛泽东本人的态度。从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后的一系列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苏共批判个人崇拜的心情是双重的——既高兴又担心。毛泽东高兴的是，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解除了套在中共头上的“紧箍”，正如他后来对苏联大使尤金讲的：“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一个经常压抑我们和妨碍我们正确理解许多问题的盖子。是谁为我们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使我们大家更容易正确地理解个人崇拜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2] 毛泽东担心的是，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和取消个人崇拜的做法将导致中共党内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出现“蛇无头不行”的混乱局面，所以他才认为赫鲁晓夫“捅了篓子”。毛泽东并在“论十大关

〔1〕详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05—646页。

〔2〕毛泽东与尤金谈话备忘录，1957年10月30日，АПРФ，ф.3，оп.65，д.589，л.173—179。

系”的讲话中突然冒出的一句话，绝非偶然：“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1] 后来又说，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没有指出本质的问题”，“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反对的是主张沙文主义、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2] 中共八大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提法，正是反映了毛泽东的这种复杂心态。

看来，毛泽东反对的是对斯大林的崇拜，而不是对中共领袖的崇拜，欢迎的是苏联党批判个人崇拜，而不是中国党也批判个人崇拜。说到底，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还是需要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正是在这样的认识论的基础上，中共八大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和加强集体领导的制度规定便大大打了折扣。

苏共二十大以后，各国共产党，特别是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斯大林的错误为什么会发生和发展？潜在的问题更在于，各国党会不会重犯斯大林的错误？事实上，自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开始，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就力图对此做出回答。中共八大还试图从制度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实行集体领导，发展党内民主，中共八大除提倡重大问题和选举都必须经过会议或集体讨论，充分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外，还在制度上进行了改革，主要是实行党的全国和省、县代表大会的常任制。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省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县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二年。这三级代表大会一律每年开会一次。相应地取消原有的党的各级代表会议制度。目的是保证党的各级代表大会能够定期召集并充分发挥作用。邓小平承认，从中共七大以后，11年不开党代表大会，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不符合党章规定的。[3] “这是

---

〔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2页。

〔2〕毛泽东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夫的谈话，1956年10月31日，转引自李捷：《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3〕这种情况并非中共独有，可以比较的是，苏共1939年召开十八大，1952年召开十九大，相隔13年。

我们党的民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缺点”。虽然这些年份里召集了大量的干部会议，在很大的程度上起到了党的代表会议以至代表大会的作用，但是，“无论如何，召集这些会议在法律上究竟不能代替召集代表大会，不能弥补不经常召集代表大会的缺憾”。常任制的改革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缺憾”。邓小平对这项改革寄予很高期望，认为这是“一项根本的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1]

然而，毛泽东经常讲，民主从来都是相对的，而且只是一种手段。因此，中共八大所说的民主，指的是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在这里，民主与集中始终是一对矛盾，长期来看，其内在逻辑总是趋向于集中制。只有当“过分的”集中制严重地损害了党组织的活力时，党内民主问题才会被提出来，而发展党内民主最终还是为了更好的集中。邓小平说：“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2] 刘少奇说得更明白：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决不是减弱而恰恰是加强了“党的集中制”。[3] 这就难怪中共八大结束以后，除1958年召开过一次八大二次会议外，常任制就再没有真正实行过，而中共九大直到13年后才召开，其拖延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八大。

中共八大确有许多非凡之举，就改造共产党自身而言，在许多方面的主张和动议，甚至超过了苏共二十大，比如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分析、对经济发展方针的调整、对经济体制改进的设想、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等等。所以，这次会议能够鼓舞人心，激发全党的热情和干劲，使国人看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和美好前景。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和局限，中共领导人没有、也很难认识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究竟如何走，没

〔1〕《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0—91页。

〔2〕《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9页。

〔3〕《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71页。

有、也很难对师承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一代革命家，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大浪淘沙的中国社会精英，他们并非没有改造中国的雄心和能力，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革命年代，没有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转变。他们遇到了新问题，但最终只能用老办法去解决。1956年对于苏联、中国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十字路口。中共八大确实抓住了历史主题，却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这个历史主题，因此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就很可能会走到自己所熟悉的老路上去。不幸的是，中共八大刚刚开过一个月，暴风雨就来了——在东欧爆发了令人震惊的“波匈事件”，紧接着是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反右派”运动。就本章提出的问题而言，结论也是很清楚的：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并非出于抵制和反对个人崇拜的主旨。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最明确地表达出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赫鲁晓夫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这个压力，要学打倒个人崇拜，这是个别人，大多数人不赞成。这也是独创精神。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是崇拜真理，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人对于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对不正确的部分也赞成，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1]

〔1〕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吉林省档案馆，1/1—1/14，第6—10页。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08—125页。

唯其如此，才使个人崇拜现象在中国逐步升温，直至“文化大革命”造就了堪称世界之最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本章曾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历史教学》2005年第5期，

收入本书时略有改动。

第五章

# “波匈事件”：中国的反应及态度转变



匈牙利事件中，游行者推倒斯大林塑像

1956年10月爆发的震动世界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危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对1956—1957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突然转轨，在很大程度上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国正在走出亚洲，参与欧洲事务的处理，从而大大加强了其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影响，同时也开始了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地位的历程。因此，对于波匈事件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不仅是国际冷战史，同样也是当代中国史领域的重大课题。

1990年代初以来，有关波匈事件的各国档案文献相继解密和开放，并不断被整理后公布于世。[1] 就笔者所知，最初是俄国的《历史档案》、美国的《国际冷战史项目公报》、匈牙利的《年鉴》以及波兰的《今日》和《现代史年鉴》等专业刊物陆续零散刊出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俄国的有关档案文献。[2] 俄罗斯总统叶利

---

〔1〕目前历史学家查阅有关1956年危机的档案文献，除了去俄国、匈牙利、波兰的档案馆外，还可以去布拉格的中央国家档案馆（SUA）和军事历史档案馆（VHA），以及柏林的前东德共产党档案馆（SAPMDB）。此外，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也收藏了各种文字的有关这两次危机的档案文献。

〔2〕见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4、5、6；Csaba Békés，“New Findings on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CWIHP）Bulletin，Issue 2，1992；Mark Kramer，“Hungary and Poland 1956：Khrushchev's CPSU CC Presidium Meeting on East European Crises，24 October 1956”，CWIHP Bulletin，Issue 5，1995；Leszek Gluchowski，“Khrushchev，Gomulka，and the ‘Polish October’”，CWIHP Bulletin，Issue 5，1995；Mark Kramer，“The ‘Malin Notes’ on the Crisis in Hungary and Poland，1956”，CWIHP Bulletin，Issues 8—9，1996/1997；

钦在1992年11月访问布达佩斯时，把俄国档案馆中1956年4月到1957年7月的有关文献115件转交给匈牙利政府，在此基础上1993年匈牙利先后出版了两本文件集。[1] 作为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参考资料，1996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编辑了包括英文、匈牙利文和俄文在内的文献专集，提供给供各国学者使用。[2] 随后，在俄国、美国、匈牙利又分别以俄文和英文出版了两本较大篇幅的档案文献集，几乎囊括了有关匈牙利事件已经公布的全部俄国档案以及部分匈牙利和西方国家档案。[3]

正是在大量利用最新解密的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国际史学界，特别是在冷战史领域，展开了对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深入研究。[4] 可以说，过去被认为是一桩历史谜案的波匈事件，就其本身

---

A. Werblan and J. Stepien, "Rozmowy kierownictwa PZPR z delegacja KPZR. Nieznane dokumenty z pazdziernika 1956r.", Dzis, nr.4/1995; A. Werblan, "Rozmowy Wladyslawa Gomulki z Zhou Enlaiem w 1957r.", Dzieje Najnowsze, Rocznik XXIX, nr.4/1997。感谢波兰华沙大学扬·罗文斯基教授为笔者提供了波兰档案公布的情况。

〔1〕见Janos Rainer, "The Yeltsin Dossier: Soviet Documents on Hungary", CWIHP Bulletin, Issue 5, 1995, pp.22—24。

〔2〕Csaba Békés, Malcolm Byrne, and Christian Ostermann (eds.), The Hidden History of Hungary 1956: A Compendium of Declassified Documents,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1996.

〔3〕见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8; Csaba Békés, Malcolm Byrne, and Janos Rainer (eds.),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 History in Documents,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2。实际上，在研究中可以利用的还有东德、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档案文献。

〔4〕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特别值得重视的有以下一些：波兰学者Tony Kemp—Welch的论文讲述了波兰危机的起因（"Khrushchev's 'Secret Speech' and Polish Politics: The Spring of 1956",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8, No.2, 1996），而Leszek Gluchowski的文章则详细讨论了波兰危机的过程，特别是波兰内卫部队的作用（"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 The Situation in the Polish Internal Security Corps", CWIHP Working Paper, №17, 1997），俄国学者В.Л.Мусатов和Л.Я.Гибианский的

的发展进程，以及波兰、匈牙利、苏联乃至西方大国的政策变化而言，除个别细节外，现在已经基本上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遗憾的是，第一，在目前所有的重要研究中，对当时中国的反应、对策及其与事件的关系，很少见到专门讨论。[1] 第二，中国学者几乎还没有参加到对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学术讨论的国际行列中。[2] 究其原

---

两篇论文研究的是匈牙利事件以及苏联在其中的作用（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г.: 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1; Н.С.Хрущев, Й.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1），美国学者Mark Kramer的论文专门讨论了苏联在这两次危机中的决策过程（“New Evidence on Soviet Decision—Making and the 1956 Polish and Hungarian Crisis”，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1996/1997），匈牙利学者的论述集中反映在两本论文集中（Terry Cox（ed.），Hungary 1956——Forty Years On,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7; 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eds.），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9），而Csaba Békés的文章（“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CWIHP Working Paper, №16, 1996）和Johanna Granville的专著（The First Domino: International Decision Making during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1956,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4）则重点研究了西方大国对事件的政策及其影响。此外，Granville在另一篇文章（“1956 Reconsidered: Why Hungary and Not Poland?”，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80, No.4, October 2002）中，还对这两次事件进行了比较研究。

〔1〕例如Granville在其300多页的专著中，提到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地方仅有几处。就笔者所见，研究中国与波匈事件关系的，只有美籍华人学者陈兼（Chen Jian）在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1997年）提交的一篇论文（“Beijing and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1956”），后来被修改并扩展为他的一部在西方很有影响的专著（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中的一章。

〔2〕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除一些通史类著作对此略有涉及外，主要是一些回忆录，如在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期间担任翻译的师哲的回忆录（《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李海文整理，《百年潮》1997年第2期）、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的文章（《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的回忆》，《国际问题研究》1981年第1期）和当时驻波兰使馆工作人员骆亦粟的文章（《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比较集

因，一则是中国有关的档案文献长期没有对公众开放，二则是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似乎还有些观念上的禁区。[1] 这几年的情况有所变化，不仅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后披露了大量有关波匈事件的档案，而且中国学者也开始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了。[2] 无论如何，对这样一些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和中国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研究以探明事实真相，作为历史学家，尤其中国历史学家，是责无旁贷的。

---

中谈到中国对事件的反应和作用的是吴冷西的回忆录（《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至于研究著作，涉及波兰问题的有一些论著，如王逸舟的《波兰危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刘祖熙、刘邦义的《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等，其中论述十月事件的内容均比较简略，且使用的资料已显陈旧。利用最新解密档案研究匈牙利事件的惟一学术成果，应属胡舶刚刚出版的博士论文《冷战阴影下的匈牙利事件：大国的应策与互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可惜的是，所有中国人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中国问题。

〔1〕过去中国官方对匈牙利危机的定性是“反革命事件”，公开出版的史料也仅限于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当时公布的文献，如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局编的《匈牙利事件中的反革命势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和《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的反革命阴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等。其实，早在1980年代末匈牙利政府就已经为1956年的事件平反了（详见Terry Cox，“Reconsidering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in Hungary 1956，pp.1—13），外人又何必为此战战兢兢？至于这次事件能否算作“起义”或“革命”，那只是一个学术问题。

〔2〕2006年波匈事件50周年之际在华沙和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都可以看到中国学者的身影，而且他们提交的论文因大量使用中国档案而引起了国外同行的关注。参见Shen Zhihua and Li Danhui，“The Polish Crisis of 1956 and Polish—Chinese Relations Viewed from Beijing”，Jan Rowinski（ed.），The Polish October 1956 in World Politics，Warsaw：PISM，2007，pp.75—113；Shen Zhihua，“Mao and the 1956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János M. Rainer，Katalin Somlai（ed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Soviet Bloc Countries：Reactions and Repercussions，Budapest：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Hungarian State Security，2007，pp. 24—37。

综观事件的进程及其结果，涉及到中国问题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从国际角度看，在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重要成员的中国担当了什么角色，即中国对波匈事件的影响；第二，从国内角度看，这两次危机的爆发及其结局如何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原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和路线，即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这两者之间自然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联系，本章仅限于讨论第一个问题（本书第七章将讨论第二个问题），重点分析在波匈事件的进程中，特别是在苏联处理危机决策时，中国的态度和立场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

## 苏联要求中共协助处理东欧问题

从性质上讲，这两次事件是同时爆发在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危机，也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危机，又同样是苏联以社会主义阵营领袖身份予以处理的问题。显然，这是在欧洲地区发生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那么，中国因素在这里是如何体现的呢？作为理解这个问题的前提，首先需要对事件发生前苏联、东欧国家及中国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做出基本判断。

从战后到危机前十余年的时间里，苏联与东欧的关系有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斯大林解决战后东欧问题依据的是两个原则，为了保障俄罗斯帝国的安全利益而从内部强化对东欧各国的控制，为了与西方大国合作以求得和平发展的局面而在外表上给予东欧各国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作为这两项原则的政策体现，战后初期苏联在东欧各国主张组建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避免建立以苏联为首的利益集团，而宁愿通过签订双边条约来保证各国政府的亲苏政策，不鼓励东欧各国共产党采取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如此等等，这就是冷战态势形成以前苏联与东欧关系的基本框架。斯大林主

张的联合政府政策在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的失败，再加上美、英、法等国在推行马歇尔计划中的进逼方针，导致莫斯科迅速转变了对东欧的策略，作为国际性集团组织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应运而生。[1] 在冷战的格局下，斯大林首先在东欧推行两党合并，消灭社会民主党，继而操纵各国实现共产党一党统治，同时在东欧各国党内以消灭"铁托分子"为由开展大清洗，对土生土长的各党领导人大开杀戒，而以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莫斯科派干部取而代之。此后，苏联的军事顾问和国家安全顾问被大批派往东欧各国。到1952年10月联共（布）十九大召开的时候，东欧各执政党已经完全成为莫斯科的顺从奴隶，苏联与东欧关系进入冷冻状态。[2]

斯大林去世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东欧各国对苏联在本国代理人的不满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后，党内反对派的力量开始不断积聚，民众的反抗情绪也直接指向莫斯科。随着舆论的开放和政治的解冻，要求本国"斯大林分子"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状况在波兰和匈牙利尤为突出，尽管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早在1955年秋天，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就致函苏共中央，请求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38年8月16日无理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进行重新审理。12月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为波兰共产

---

〔1〕笔者对这一观点的论证详见《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和结果》（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有关战后初期苏联与东欧各国关系以及共产党情报局的俄国档案文献已有大量译成了中文，可参考《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17、19、22、23、24、26卷。

〔2〕有关资料除可以参见俄国学者近年发表的极其丰富的研究成果外，最值得注意的是俄国不久前出版的专题档案文献集：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Мурашко Г.П.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4—1953），Т.2，1949—1953，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

党平反的决议，有关声明也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刊登出来。[1] 1956年3月12日第一书记贝鲁特在莫斯科暴病身亡，使波兰党内的亲苏派势力大大削弱，波兰许多地方党组织在讨论苏共二十大报告时，更提出了追查1939年在卡廷发生的枪杀波兰军官案件、重新评价1944年华沙起义和苏联在波兰领土大量驻军与波兰主权的关系等问题。苏联外交官报告说，波兰的报刊有一种“错误地煽动修正主义和反苏情绪的企图”。[2] 贝鲁特的继承人最初是党内的中间派代表奥哈布，由于他继续推行原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引起很多人不满。[3] 到1956年5月，在改革派的压力下，曾经作为“右倾民族主义分子”被关进监狱的哥穆尔卡复出的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不久，党内高层便在改革问题上形成了一致看法，奥哈布也逐渐转向改革派。而6月底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游行事件以及政府的镇压措施，进一步引起人们的不满，并为把波兰改革和独立发展推上了日程。[4] 由于波兰党内改革派力量强大，又得到全国民众的一致拥护，莫斯科虽心急如焚，却感到无从下手。[5]

---

〔1〕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с.906。

〔2〕АВПРФ，ф.0122，оп.40—1956 г，п.336，д.10，л.31—32；Орехов А.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с.222—224。

〔3〕3月15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来到华沙，并参加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六中全会。有材料说，奥哈布由于其在党内的中间立场而备受苏共中央的青睐，尽管赫鲁晓夫本人有自己的考虑。但重要的是，经过激烈争论，波党中央书记处决定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付印交与各级党组织讨论。见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с.223。

〔4〕扬·普塔辛斯基：《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于欣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27—28页；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张金鉴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5—137页。对于当时波兰的社会状况，新华社记者在内部曾有一篇非常详细和生动的报道，见《内部参考》，1956年6月1日，第585—597页。

〔5〕有关波兰危机形成的原因，特别是党内改革力量（普瓦夫派）和保守势力（纳托派）斗争的详细情况，可参见Tony Kemp—Welch，“Khrushchev’s

匈牙利的社会情绪虽然与波兰大体相同，但由于保守派在领导层占有绝对优势，其结局就完全异样了。身兼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和政府首脑的拉科西被认为是典型的“斯大林分子”，在斯大林去世后受到党内外的一致指责，莫斯科不得不考虑对其有所制约。1953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两党联席会议上，拉科西、格罗、法尔卡什和雷瓦伊等保守派领导人受到严厉谴责。会议的结果是拉科西留任党的第一把手（总书记改为第一书记），而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让给立志推行改革的纳吉·伊姆雷，内务部长法尔卡什和理论家雷瓦伊则退出领导岗位。尽管由于阻力重重，纳吉的改革进展缓慢，但匈牙利出现的变化仍然在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正当纳吉及其政府的改革行动开始收到效果，并得到党内改革派和知识分子大力支持的时候，苏联最高权力层出现的分歧使拉科西的势力得以卷土重来。莫斯科一是担心纳吉的改革突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其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被看做是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马林科夫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言论在匈牙利的实践；二是担心匈牙利党内的严重意见分歧破坏政治结构的稳定，而拉科西主张的“整顿匈牙利秩序”则比较符合此时赫鲁晓夫的要求。于是，随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下台，1955年4月纳吉也被指控犯有右倾错误而失去了权力，8个月后又因拒绝承认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但很快，苏共二十大再次激发了匈牙利的改革浪潮，人们不仅呼吁变革，而且强烈要求为受迫害者平反，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拉科西本人。1956年3月底，拉科西被迫承认在斯大林对东欧各党的大清洗中，参与了对持与苏联不同政见的拉伊克的政治陷害活动，之后他便失去了自己大部分追随者的信任。特别是在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后，匈牙利党内外情绪激昂，抗议现行政策的活动有增无减。面对匈牙利官方惊呼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波兹南事件”，莫

---

‘Secret Speech’ and Polish Politics”; A.Werblan, “Czy Chinczycy uratowali Gomulke?”, Polityka, 26 X 1991r.。笔者请陈世泽（前驻波大使）翻译了Werblan的波兰文论文，才得以了解其内容，谨在此表示感谢。

斯科迫不得已在7月决定让拉科西退休，到苏联休养，而让他的亲信格罗接替了其党内职务。然而，与苏联领导人的选择不同，匈牙利党内改革派和社会知识分子共同把眼光投向了虽然在野但并未沉默的改革先锋纳吉·伊姆雷。更大的冲突和风暴正在酝酿之中。[1]

显然，苏联与东欧各国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客观上需要外界的调节，那么中国是否具有参与处理危机的条件呢？对东欧诸国，中共很早就发生了兴趣。如前文所说，还在1948年4月26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就提出“想到东欧和东南欧进行访问，以便研究一下他们的人民阵线工作及其他工作”。[2] 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在1949年7月4日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出了“与东欧各民主国家建立关系及通商”的问题。[3] 在建国之初与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中，毛泽东反复表示了他对与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等国迅速建交的迫切心情，尽管当时中国“甚至不知道他们外长的姓名”。[4] 毛泽东在1949年10月最初提出的访苏计划中，再次安排要在中苏条约签订后到东欧访问一个月。[5]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对东欧的访问始终没有成行，但他对东欧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问题的关注却是十分明显的。不过，斯大林在世时，对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Мусатов В.Л.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с.4—6；Путилин Б.Г.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год 1956—й，с.242—248；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с.28—30、35—40、85—87；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Н.С.Хрущев，Й. 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1，с.12.

〔2〕APRF，f.39，op.1，d.31，pp.45—46。转引自Westad（ed.），Brothers in Arms，pp.299—300。

〔3〕刘少奇给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1949年7月4日，АПРФ，ф.45，оп.1，д.328，л.11—50。

〔4〕罗申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1949年10月16日、20日，АВПРФ，ф.07，оп.22，п.220，д.36，л.48—51，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32—33.

〔5〕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2，№1—3，с.89.

中的责任是有明确分工的——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毛泽东自然不便跨越雷池。况且，东欧国家与中国如何发展关系，完全掌握在斯大林手中，甚至东欧能否与新中国建交、何时建交等问题，都必须经过莫斯科的首肯。[1] 在1950年10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因朝鲜战争而面临危机时，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大大提高了中国在所有东欧国家中的形象和地位。[2] 或许是认识到这一点，多少有些感到力不从心的苏共新领导人开始希望中共关注东欧的问题。1955年底苏共筹备召开欧洲地区人民民主国家的国际会议，讨论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合作及有关东欧国家的国际问题。在12月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做出决定，专门邀请中共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为此，赫鲁晓夫特意致函毛泽东说："非常希望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会议，以便完全和及时了解有关会议活动的信息。"[3] 中共中央派代表出席了1956年1月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成员国秘密会议。[4] 不过，在苏共二十大之前，中国与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没有超出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的范围，而在政治上，只是一般性

〔1〕一个最典型的事例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斯大林指示苏联外交部，只有在苏联报纸上刊登了中苏建交的消息后，才能向各东欧国家发出同意他们与新中国建交的答复。葛罗米柯给斯大林的请示报告及联共（布）中央决议草案，1949年10月2日，АВПРФ，ф.07，оп.22 а，п.198，д.13，л.1—2。

〔2〕中国驻华沙使馆报告了波兰人听到中国出兵的消息后无比兴奋的状况（驻波使馆致外交部电，1950年11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083—03），作为中国首批驻苏联的外交官，荣植先生也曾向笔者讲述过同样的情况（李丹慧、沈志华2000年11月30日采访荣植记录）。

〔3〕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及附件，1955年12月31日，РГАНИ，ф.3，оп.10，д.210，л.1—2、6，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2，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54—1958，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6，с. 168—170。

〔4〕苏共中央主席团第180号会议记录，1956年1月10日，РГАНИ，ф.3，оп.8，д.389，л.41—41 о б，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 86—87.

外交往来，对相互间的国内政策谈不上有何影响。[1]

苏共二十大以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在继续密切注视着东欧发生的事情。[2] 另一方面，中国和中共也越来越受到东欧的注意。《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共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国内开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都在东欧各国引起了极大兴趣。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东欧各国传播以后，一时众说纷纭，思想极为波动，很多人表示要看看中国党如何表态。在波兰各界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诸问题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人们在争论不休时往往说：等着听毛泽东的见解吧！[3] 波兰人还常以羡慕的口气对中国留学生说：“你们中国革命是自己搞成功的，又是大国，斯大林不敢命令你们，你们是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决定政策的。我们是小国，一切都要听从别人。”[4] 还有报道说，在波兰考哲学硕士学位的人，如果没有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就不可能通过。[5] 匈党中央委员、驻苏大使波尔多茨基称：中共八大提出了许多新的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匈党对此很有兴趣，十分重视。匈党中央书记科瓦奇说，中共八大文件中很多东西值得匈牙利学习、研究，特别是中国党成功地把广泛的民主与坚强的集中领导相结合。应当学习中国党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又能广泛团结全国人民各阶层的经验。[6] 如果说过去人们赞赏中共靠自己的力量夺取政权的成就，那么现在也开始关心中国建设社会主

---

〔1〕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44—77页。

〔2〕供中共高级干部阅览的《内部参考》在这一时期连续不断地大量刊登对东欧的报道，就是一个证明。

〔3〕《内部参考》，1956年3月5日，第17—19页。

〔4〕《内部参考》，1956年6月1日，第588页。

〔5〕《内部参考》，1956年3月5日，第17—19页；1956年6月28日，第719—720页。

〔6〕《内部参考》，1956年10月8日，第820—822页。

义的经验了。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主张向中国学习的基本上都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派人士，他们往往拿中国与苏联对比。与保加利亚各界对双百方针所持的保留态度不同，波兰人总是用赞佩的心态谈论这些问题，他们说，中国党和斯大林的做法完全不同。中国党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斯大林的理论是“社会主义越前进，阶级斗争越尖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在波兰非常流行，受到极大的赞赏，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干部中间，简直是家喻户晓。[1] 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则真诚地接受了这样的信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意图的真实反映。这在匈牙利社会激起了广泛的亲华热情和同情心，以致在匈牙利发生危机时，大部分市民都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人们在布达佩斯街头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和我们站在一起”。[2] 据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报告，格罗在解释“部分匈牙利劳动人民，甚至党内人士对苏联表示冷淡的问题”时说，在许多党内反对派看来，“似乎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阻碍了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发展，而中国和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就没有个人崇拜现象”，“所以现在就应该以他们为榜样，而不是以苏联为榜样”。[3] 还有，纳吉被迫引退之后认真研究了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问题，他在阐述自己的纲领时也特别注意到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解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认为，万隆会议的五项基本原则“不能仅局限于资本主义世界或者两大体系之间的斗争，必须扩大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

〔1〕《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4日，第1209—1210页；1957年5月7日，第26—27页。笔者2004年4月17日采访骆亦粟记录，骆亦粟当时在中国驻波兰使馆工作。

〔2〕János Rádvanyi,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Hundreds Flowers Campaign”, The China Quarterly, №43, Jul.—Sep. 1970, pp.122.

〔3〕安德罗波夫致外交部电，1956年10月12日，АПРФ，ф.3，оп.64，д.484，л.64—75，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с.303—304.

营国家间的关系中”。[1] 这与中共后来在处理波兰危机时的主张不谋而合。[2]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处于一种二律背反的矛盾现象中。东欧各党的领导层大体都存在两派，即战争期间坚持国内斗争的本土派和逃亡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的莫斯科派。在1949—1952年东欧各国全盘苏化的进程中，在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支持下，大部分本土派领导人遭到清洗，而莫斯科派则占据了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岗位，这些人都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坚定追随者。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路线的否定和对斯大林本人的批判，引起了东欧的政治混乱。作为亲苏派，现任领导者大都对苏共的做法感到不理解，甚至表示反对，成为政治上的保守派。一些在斯大林时代受到打击和压抑的领导干部是借着苏共批判斯大林而东山再起的，他们坚决支持苏共二十大的新方针，成为各国的改革派，但是这些人一般都具有民族主义倾向，因而也对国内的反苏情绪表示支持或理解。这就是莫斯科在处理东欧问题时左右摇摆、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然而，中国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却没有这些包袱。况且中共既支持苏共二十大的改革路线，又与莫斯科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机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3]

## 中共对波兰危机的看法和立场

中共虽在建国之初便与波兰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由于长期的战

〔1〕Imre Nagy, On Communism, In Defense of the New Course, New York: Frederick Praeger, 1957, pp.20—23.

〔2〕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在8月的一份讲话稿中也提出了这个观点。（程中原：《张闻天传》，第633—605页。）而中共正式提出这个看法，是在1956年10月30日与苏共中央会谈时，并于11月1日见报的。

〔3〕《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99—600页。

争环境和处于非法状态，新中国并没有为外交工作做好准备，特别是缺乏外交和外语人才。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1954年8月周恩来访波时，中国驻波使馆竟无一名波文翻译，给予波兰的外交文件只能译成俄文或英文，再请波兰外交部译成波文。[1] 不过，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中波关系算是最紧密的。例如，1950年建立的中波轮船公司为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立下汗马功劳，波兰船员为此甚至遭到台湾海军的扣留和拘押。[2] 还有，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建交接触和谈判，也是波兰从中牵线搭桥的。[3] 毛泽东对波兰的最初认识大概来自1954年两国领导人的互访。7月26—28日周恩来对波兰的访问，更加深了两国的亲密关系。根据驻波使馆的报告，波兰领导人对周的造访极其兴奋，接待也十分隆重、热情。[4] 随后，9月28日至10月10日波兰政府代表团的访华也受到极为隆重和周到的接待。毛泽东不仅两次接见贝鲁特，而且对波兰党赞赏不已，说中国宪法的制定都是参考了波兰宪法的。[5] 刘少奇、周恩来及各方面领导人也纷纷向波兰代表团介绍情况。贝鲁特显得非常高兴，并表示对毛泽东十分钦佩。[6]

在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了风波后，中波关系又进

---

〔1〕驻波使馆关于周恩来访问波兰的报告，1954年8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7—00385—02。

〔2〕笔者2006年6月26日、7月11日电话采访王砚记录。王砚是中国最早派到波兰的留学生之一，后在驻波使馆工作。

〔3〕波兰大使向周恩来转达墨西哥与中国建交事，1950年7月1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1—00002—01；周恩来关于墨西哥与中国建交事致波兰政府的复函，1950年7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1—00002—02；波兰大使转达墨西哥与中国建交事复函之回答，1950年8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1—00002—03。

〔4〕驻波使馆关于周恩来访问波兰的报告，1954年8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7—00385—02。

〔5〕毛泽东与波兰代表团会谈记录，1954年9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403—01。

〔6〕波兰政府代表团在华活动情况，1954年10月2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403—06。

一步密切了。中共十分关注波兰的动向。中共中央的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后，波兰统一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论坛》在4月8日转载时，删去了有关苏联历史作用的内容，这令苏联使馆“感到奇怪和不理解”。[1] 但是，波兰党对苏联的这种态度很可能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新华社记者报告：自从苏共二十大之后，在波兰社会和党的会议上“掀起了空前热烈的政治思想的大辩论”。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大辩论，它扩展到波兰全国各界、各地和各阶层中。虽然对斯大林和波苏关系多有批判，但记者的结论是：可以相信，“经过这一场异常热烈的政治辩论后，人民的政治热情当会更高，觉悟将会提高，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将被克服，全党和全体人民将会更加团结一致。在讨论中虽然也曾有些不够妥当的，甚至是恶意的言论，也有过于感情激动的现象。但所有这些副作用都将被积极的、健康的主流所压倒，波兰是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的。”[2]

4月底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在文艺界和学术界实行民主和自由。当时这个方针在中共党内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但却在波兰听到了热烈回声。[3] 6月19日余湛代办与波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斯查柯会见，谈话甚为投机。余湛说，周恩来表示非常重视波兰党的意见，并认为“加强两党的联系很重要”。斯查柯介绍了波兰对待报刊上各种言论乃至谬论的方针：“我们不能采取压制的做法，这样做会使人认为我们不容许批评，这将阻碍批评的开展”，需要的只是加强指导和提供更加全面的信

---

〔1〕苏联驻波兰大使馆鉴于波报刊发表的苏共二十大材料和赫鲁晓夫的报告事宜所做的评论，1956年5月14日，РГАНИ，ф.5，оп.28，д.396，л.163，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692—695。

〔2〕《内部参考》，1956年6月1日，第585—597页。

〔3〕关于“双百”方针的提出及最初在中共党内遇到阻力的情况，详见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4—233页。

息。[1] 这与毛泽东正在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颇有异曲同工之处。[2] 这些信息对于毛泽东后来处理波兰十月危机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毛泽东倡导的“百花运动”（the Hundred Flowers——国外一般这样称呼“双百方针”）在中国一时没有结果，波兰的“大民主”和言论自由却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动荡。

6月28日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游行及流血事件，引起了中国的极大关注。后来毛泽东在整风反右谈话中屡次谈到的波兰风波和“大民主”，实际上指的就是波兹南事件，而非十月事件。[3] 事件爆发最初两天，中国使馆和新华社同时向国内报告了情况，根据波兰官方的解释，罢工和游行被说成是受到“破坏分子”的挑唆和利用，“是敌人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经过了长期准备的行动”。由于及时派出军队进行镇压，事情“已经平息”。[4] 按照波兰官方提供的文本，苏联《真理报》6月30日刊载了通讯《帝国主义间谍机关在波兹南的敌意性挑衅》。[5] 同一天，中国《人民日报》报道这一事件的标题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暗藏反动分子在波兹南制造

〔1〕余湛往访波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斯查柯夫斯基谈话记录，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1。经查询，当时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是Józef Czesak，中文译名应是约瑟夫·斯查柯。

〔2〕关于1956年春季波兰的“百花运动”情况，详见Tony Kemp—Welch, “Khrushchev’s ‘Secret Speech’ and Polish Politics”, pp.181—206。

〔3〕关于波兹南事件的详细经过，参见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c.224—225；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第140—141页；刘祖熙、刘邦义：《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第69—70页。特别是当时的波兰领导人奥哈布的回忆：“Rozmowa z Edwardem Ochabem” // Teresa Toranska, Oni, Warszawa: Agencja Omnipress, 1989, s.211—213。感谢陈世泽为笔者翻译了这篇波兰文的采访录。

〔4〕刘若明参赞往访波外贸部副部长巴耶尔谈话记要，1956年6月28日，范国粱随员往访捷使馆三秘杜尔洽克谈话记要，1956年6月2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1；驻波使馆致外交部并外贸部电，新华社华沙分社致外交部并转新华社电，1956年10月28日，驻波使馆致外交部电，1956年6月2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1—02。

〔5〕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c.224—225.

严重骚乱，波兰政府和党号召人民警惕敌人阴谋，城市秩序次日已恢复，肇事者将受到法律惩处。第二天，又长篇转载了波兰通讯社的消息。[1] 此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看法。

7月2日，驻波使馆报告在波兹南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其中包括：工人的工资低下，人民对生活水平不满，以及对波兹南事件的不同看法等。[2] 7月5日，王炳南大使报告了波党中央国际部长和苏联大使对波兹南事件原因的初步分析。他们首先指出了经济问题，即“目前波兰存在经济困难”，造成群众不满，“才使挑拨分子有机可乘”。其次在政治上，“有些报刊文章过分夸大人民生活水平低”，“以致激起群众对提高生活的强烈要求”，而“党在群众中影响弱，党员政治质量不高”。事件暴露出“波方领导上政治警惕不高，对可能发生的问题未能足够估计，因而未加防范”。但结论仍然是：“事件发展成为骚乱，是挑拨分子所为，工人罢工游行只希望提高工资，无反苏反政府性质”。[3]

7月7日，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对王炳南谈到了波兹南事件的两个背景：一是“多年来波兰集中精力发展工业，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问题注意不够，六年计划期间由于国际局势发生变化，部分资金又临时抽调用于国防工业，答应给人民的未能做到”，引起工人群众的不满情绪；二是苏共二十大后，对国内开展的广泛讨论缺乏政治上的“强有力的领导”，公安工作由于受到批评而“失去警惕性”。言谈中对毛泽东提出的“十条方针”（即十大关系）极为赞赏，认为“中国党是第一个就苏共代表大会所提出的问题作出结论的党”。[4]

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虽然指出，“领导机关和领

---

〔1〕《人民日报》，1956年6月30日第2版、7月1日第5版。

〔2〕在波兹南了解的关于波兹南事件的一些言论，1956年7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1。

〔3〕王炳南致外交部电，1956年7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1—04。

〔4〕王大使往访波驻华大使基里洛克谈话记要，1956年7月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18—04。

导人员必须不断地加强自己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的工作，经常了解群众的困难，并且尽一切可能及时地帮助解决，某些人借口生产，不管人民生活的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坚决纠正，以便及时地发现和克服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以免被敌人利用，但标题还是“警惕帝国主义的阴谋和国内反革命活动”。[1] 这说明，直到此时，中国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基本上还是同苏联和波兰保持一致。不过，中国人的关注点很快就转移了。

7月25日，驻波使馆编写了报告“对波兹南武装挑衅事件的看法”，7月28日《内部参考》刊登了驻华沙记者谢文清发出的长篇通讯，分析“波兹南反革命暴乱发生的原因”。这两个文件的意见基本一致，尽管继续认为事件的性质是“非常严重”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的挑唆，但都不约而同地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波兰党和政府所存在的“严重的困难和缺点”方面。首先是人民对政府的不满，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工资低下、个人所得税累进率较高、住房严重短缺、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进一步讨论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其缺陷在于：第一，投资过于偏重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第二，轻工业和农业过于落后导致生活用品奇缺；第三，传统的手工业因课税太重而萎靡不振；第四，企业管理制度问题重重，集中表现为权力过于集中，企业没有活力，奖金制度不合理等。政治方面的问题在于：第一，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现象严重，导致党和政府威信降低；第二，党员质量不高。思想教育不够，没有起到先锋模范作用；第三，舆论宣传工作没有抓紧，党内外出现严重的思想混乱；第四，放松了军队和公安工作。最后，使馆人员和新华社记者的一致看法是，波兰领导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且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克服这些困难和缺点，形势正在好转。[2]

---

〔1〕《人民日报》，1956年7月12日第1版。

〔2〕驻波使馆编：对波兹南武装挑衅事件的看法，1956年7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1—01；《内部参考》，1956年7月28日，第591—604页。

恰在此时，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了七中全会。7月28日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和经济局势和党的主要任务”的决议和关于“1956—1960年五年计划的指导原则”的决议。有趣的是，全会对波兹南事件的分析和评价与中国人的看法不谋而合。决议首先肯定：“煽动者、挑拨分子和坏分子在波兹南成功地利用了斯大林工厂和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们由于迟迟不解决他们的切身疾苦和正确要求而产生的特别不满情绪，挑起了罢工和街头示威的游行。”接着，便着重“深刻分析这一事件产生的根源及其基础”，即党内和国内政治生活和经济政策存在的种种困难和缺点。最后，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各项方针和措施。[1]《人民日报》连续数日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但却没有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即会上出现了改革力量（普瓦夫派）和保守势力（纳托林派）的激烈争论，并最终导致哥穆尔卡重返政坛。到8月初，不仅哥穆尔卡的党籍得到恢复，而且《人民论坛》报还公开宣布取消过去对他的指责。[2]对于波兰社会舆论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国内危机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寄托在哥穆尔卡身上了。然而，对于这一点，无论中国使馆还是新华社记者都没有注意到，个中原因大概是没有得到相关的情报。而在七中全会前，奥哈布则与赫鲁晓夫谈起过哥穆尔卡被释放的情况，赫鲁晓夫当时还表示要接哥穆尔卡去苏联养病。[3]显然，这时波兰与苏联的关系要比对中国亲近些。但是，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迫使波兰人越来越接近中国。

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召开的中共八大对东欧各党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自身的感受和政策的选择都比较相近，波兰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亲密。波党第一书记奥哈布率团参加中共八大前，于9月10日

〔1〕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编印：《人民波兰文献资料选辑》，1985年，第153—182页。

〔2〕关于哥穆尔卡复出的情况，详见普塔辛斯基：《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第40—41页；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c.226；“Rozmowa z Edwardem Ochabem”，s.214—217.

〔3〕“Rozmowa z Edwardem Ochabem”，s.217.

宴请王炳南大使。席间奥哈布谈到，我们这次去首先是表明与中国党的团结一致，其次是传达我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所怀的敬意，第三是想吸取一些经验。从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党对很多问题做出了大胆的决议，虽然这是针对中国情况的，但对我们也会有用，我们也相信这些决议是正确的。奥哈布还表示，由于国内的复杂情况，他可能会提前回国。[1] 这里所说的国内情况复杂，主要是指七中全会后，波党内部的分化日益严重，改革派主张推举哥穆尔卡出面主持工作，而奥哈布也有意在下一届中央全会上让出党的第一书记的位置。[2] 关于这个问题，奥哈布在9月11日途径莫斯科时没有告诉苏联人，却在中共八大期间通知了中共领导人。[3]

中国人对哥穆尔卡的最初了解，大概是受到了苏联提供的情况的影响。在6月与王炳南的谈话中，苏联驻波大使波诺马连科说，波兰的青年人“全都是些民族主义者”，他们在散布对苏的敌对情绪。王炳南问到对刚从监狱中放出不久的哥穆尔卡的看法，苏联大使说，研究了许多哥穆尔卡的材料后，他认为这个人虽有“政治上思想上的错误”，但历史还是清白的。考虑到“哥是维护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者”，波诺马连科认为，他“可以留在党内，但不能担负领导工作”。[4] 或许正是因为知道莫斯科对哥穆尔卡的态度，波兰领导人认为首先应该取得中共领导人的同情和支持。

---

〔1〕王炳南与波党代表团谈话记要，1956年9月1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1。

〔2〕详见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с.226；“Rozmowa z Edwardem Ochabem”，s.214—217。

〔3〕9月11日与苏联领导人会谈时，奥哈布提出的解决双边经济关系的问题和召回在波苏联顾问、专家的问题，对哥穆尔卡复出一事则只字未提。苏共中央主席团第44号会议记录，1956年10月4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5，л.3—40，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 о м 1，с.168—171、962—964。

〔4〕王大使往访苏大使谈话记要，1956年6月6日、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1。

在中共八大期间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奥哈布表示，波兰党希望自己来解决波兰的问题，并谈到有意吸收哥穆尔卡加入领导层，以便加强和巩固党的地位。他感觉到，“中国同志对我们的情况极富同情心”，也深切感到他们对中波两党的关系“充满信任感”。不过，在与毛泽东会谈时，奥哈布没有提到波苏关系问题，甚至有意掩盖这种不平等关系已经出现的危机苗头。直到离开北京之前，大概对于苏联大使寸步不离的监视极为反感，奥哈布暗示中国人，他还有话要讲。于是，飞机在起飞前出现了“故障”，奥哈布得以同朱德单独见面。利用这个最后的机会，奥哈布告诉中国领导人，在波兰出现了反苏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波兰人要破坏与苏联的同盟，他们只是希望在社会主义原则的总体框架内能够自主解决问题。同时，奥哈布又谈到哥穆尔卡复出的问题，并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同哥穆尔卡是一致的”。奥哈布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已经感到波兰可能会受到苏联的干涉，而能够对他们提供帮助的，不是诺沃提尼（捷克斯洛伐克）、乌布利希（东德）或其他东欧国家，而是“独立自主”的中国。[1] 另一位波兰代表团成员米契斯瓦夫·马热茨则回忆了毛泽东关于波兹南事件对中国处理上海工人抗议事件发生影响的谈话。毛泽东强调指出，他向波兰人学到了很多东西，如波兹南就是一种警示：“我们起初曾将上海事件视作反革命事件，但在接到我们驻华沙代表的电话后就改变了看法。我们不得不把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召来出席政治局会议，并做出了考虑工人要求的决定。……第一书记带着新的决定返回上海，落实了工人们的要求于愿望，上海的秩序一夜之间便恢复正常，每当我想起上海就会联想到波兹南，想到安定，想到我们大家都必须与工人阶级保持联系。”[2] 这个说法就更让波兰人感到亲

〔1〕“Rozmowa z Edwardem Ochabem”，s.219—221.

〔2〕Andrzej Werblan，“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Dzis，nr.10/1996，s.128—129。所谓上海事件，大概是指8月发生的公私合营企业职工对政府不满而发生的罢工、请愿事件。详见《内部参考》，1956年8月9日，第146—148页。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尚未公布毛泽东与波兰代表团在八大期间的谈话记录。

切了。然而，波兰日益紧张的局势迫使奥哈布缩短了在中国的行程。

波兹南的罢工和游行先是遭到镇压[1]，随后又被苏联定性为由帝国主义代理人挑起的反人民事件[2]，这在波兰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抵制和不满。在紧张而惊慌的气氛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二届七中全会。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改革派身上，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提出应为哥穆尔卡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甚至邀请他参加全会。[3]这一切很快就实现了，10月12日哥穆尔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4]哥穆尔卡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在讲话中除批评过去的经济政策、提出重新评价波兹南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外，还特别强调必须使波苏关系正常化，因为他充分意识到同苏联关系恶化的危险性。[5]尽管如此，由于改革派在政治局里已占有明显优势，党内外排斥苏联影响的情绪与推进改革的呼声还是同时高涨起来。15—17日的政治局会

---

〔1〕据中国驻波使馆的报告，实行镇压的是波兰军队，波兰外交部6月29日通报，在镇压中38人死亡，270人受伤。（范国梁随员往访捷使馆三秘杜尔冶克谈话记要；1956年6月29日，王大使往访苏联大使谈话记要；1956年7月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1。）7月17日波兰首席检察官透露，死亡的实际人数是53人，这包括了在医院死亡的人数。1981年在波兰出版的《波兹南危机》一书提供了一个新数字，即死亡73人。见Johanna Granville，“Reactions to the Events of 1956”，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 38，No. 2，2003，pp.264—265。

〔2〕Правда，4 июля 1956г.. 新华社发回的报道也称为“波兹南反革命暴乱”，并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代理人、武装间谍和反动组织”的阴谋，只是作为次要原因提到“波兰党和政府有较严重的困难和缺点”。《内部参考》，1956年7月28日，第591—604页。

〔3〕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с.225—226；普塔辛斯基：《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第29页。

〔4〕这与奥哈布转向支持改革有直接关系，与匈牙利的情况完全不同，他是自愿让位给哥穆尔卡的。后来接受采访时奥哈布说：“我根本没有为保持自己的地位而焦虑。”见Teresa Toranska，Them：Stalin’s Polish Puppet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7，p.78，转引自Johanna Granville，“From the Archives of Warsaw and Budapest：A Comparison of the Events of 1956”，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Vol.16，No. 2，Spring 2002，pp.534—535。

〔5〕《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22—24页。

议做出决定，将于19日召开八中全会，改组党的最高领导层，拟定推举哥穆尔卡出任中央第一书记，而在新政治局委员名单中则排除所有保守派以及与苏联有密切联系的人，特别是其中包括了仍保留苏联国籍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元帅。[1] 波党内部的保守派和亲苏势力一方面秘密通知苏联使馆，说波兰当局正在走上反苏道路，一方面准备发动政变，并草拟了约700人的拘捕名单。但是，政变计划被科马尔将军指挥的内卫部队和组织起来的华沙市民挫败，而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转达的赫鲁晓夫的坚决请求——要波兰党政治局全体成员与哥穆尔卡一起去莫斯科讨论局势，也遭到了波兰方面的拒绝，理由是八中全会即将开幕。[2]

10月18日，波诺马连科又通知波兰人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计划于19日晨抵达华沙，并要求推迟波党八中全会的开幕日期，但均遭到拒绝。哥穆尔卡后来向周恩来讲述的情况与此相同，只是补充了一个情况：在苏联的压力下，为避免局势恶化和复杂化，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最后同意苏联代表团来波，并决定前往机场迎接。同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做出两个决定：（1）决定派遣苏共代表团去波兰；（2）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俄国档案显示，通告说：“最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就评价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国内的形势，以及在进一步采取与此有关的措施方面出现了尖锐分歧。这些分歧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党的领导班子组成的根本问题。由于

---

〔1〕罗科索夫斯基1896年出生在华沙，后加入苏联国籍。卫国战争中成为苏联的著名将领，因解放波兰有功获波兰元帅衔。1949年11月被斯大林派往波兰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回到波兰后仍然保留着苏联国籍，后来又兼任华沙条约部队副总司令。因此在波兰人眼中，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对波兰实行统治的象征。详见Gluchowski，“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pp.63—70；Носкова А.Ф. Московские совет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1945—1953г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8，№1，с.109—110。

〔2〕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第142—143页；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с.227；Gluchowski，Khrushchev，pp.38—39。

波兰局势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苏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出现的局势引起我们的严重不安。考虑到这一局势的严重性，苏共中央认为派遣由赫鲁晓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米高扬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去波兰是必要的。”但莫斯科没有发出通告的会议内容是，与此同时，苏联还准备进行军事干预。就在主席团会议后，国防部长朱可夫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在波兰及其边境附近的驻军做好军事准备。[1] 俄罗斯国防部的档案材料证明，10月19日，波罗的海军区和第7空降师108伞兵近卫团已经完成了战斗准备，54架里—2和45架伊尔—12飞机正待命出发。[2]

10月19日早晨7时，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到达华沙，随行的还有华沙条约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参谋长安东诺夫和一大批高级军官。哥穆尔卡与波兰领导人赶到机场迎接时，遭到了赫鲁晓夫气势汹汹的指责和呵斥。经过短暂的争吵，波兰人拒绝了赫鲁晓夫关于延期召开中央全会的要求。双方随后来到代表团下榻的贝凡德尔宫继续会谈。在激烈的争论中，赫鲁晓夫明确说要对波兰进行“强制性干预”，哥穆尔卡则冷静地表示，如果苏方继续进行威胁就中止会谈。因当时波党所

〔1〕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с.228—229；Granville，“From the Archives”，pp.548—549；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Additional Data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Military Occupation”，Györkei and Horváth（ed.），Soviet Military，pp.9；《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26—27、55—82。不过，哥穆尔卡说他当时就表示同意赫鲁晓夫来华沙，恐不是实情。因为苏联代表团的飞机是在华沙上空盘旋了2个小时后获准降落的，哥穆尔卡等人这时才赶到机场“欢迎”（王炳南致外交部并报中央电，1956年10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此外，吴冷西的回忆说，苏联调动军队的命令是17日下达的（吴冷西：《十年论战》，第34—40页），显然也是错误的。

〔2〕TsAMORF，f.32，op.701/291，d.15，pp.131、238，转引自A.Kirov，“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1956”，Györkei and Horváth（ed.），Soviet Military，pp.132。Kirov引用这条史料是要说明匈牙利的紧张局势，但在笔者看来，这是要对付波兰的，因为当时匈牙利的局势尚不足以让莫斯科做出这样的决定。

有中央委员正在另一幢大楼的会议厅等待全会开始，苏联代表团被迫同意波兰领导人先去主持全会开幕式。10点钟大会正式开幕，首先通过了政治局关于增选哥穆尔卡等四人为中央委员的决定，政治局还建议由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然后，奥哈布简单通报了苏共代表团来波的消息，并建议为继续同苏联代表团进行会谈而休会。大会仅进行了半个小时。此后在贝凡德尔宫进行的波苏两党会谈，气氛稍许平和了一些。米高扬阐述了苏联代表团的看法，强调指出苏联在民主德国领土拥有武装力量，因而对八中全会后可能在波兰发生的变化并造成苏联同这些部队联系困难甚至中断的局面表示担忧。米高扬表示苏联方面绝对不能容忍出现这种情况，莫洛托夫则表现出更为强硬的立场。波兰方面解释说，八中全会后所推行的政策和变革只会密切波兰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加强而不是削弱波兰与苏联的关系。尽管如此，苏共代表团还是强烈要求除增补哥穆尔卡外，波党政治局不得作其他人事变动。这一要求得到罗科索夫斯基等保守派的支持，但遭到哥穆尔卡等人拒绝。

此时，波兰内务部开始不断得到苏军从西面和北面向华沙前进的消息，并做好了迎击的准备。不过，波兰人一时无法判断苏联的举动是已经决心进行武装干涉，还是想以此施加压力，迫使波兰让步。在这种微妙的时刻，任何莽撞的决定都只会引起更加复杂和危险的结果。哥穆尔卡没有采取行动，只是向苏方提出了抗议。赫鲁晓夫谎称是以前布置的军事演习，并答应立即停止。会谈继续进行，除了波兰领导层的人事问题，又在波苏关系中一些具体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由于迟迟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下午6时，奥哈布返回全会，向中央委员们作了简要汇报，并建议因需要连夜与苏联人进行会谈，全会推迟到第二天上午再开。晚饭后双边会谈继续进行。这时，并未停止前进的苏联部队还在缓缓向华沙迫近，而为数不多的波兰武装力量部队根据罗科索夫斯基的指示也开始在华沙周围集结，准备配合苏军行动。此前，罗科索夫斯基曾向赫鲁晓夫表示，如有必要使用武力逮

捕那些反革命分子的话，他将随时听候莫斯科的吩咐。与此同时，得到军队行动消息的华沙工人、学生纷纷集会，并游行示威，强烈谴责苏联干涉波兰内政，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改革派，要求贯彻民主化。[1] 苏联使馆及时向赫鲁晓夫报告了这个情况，并断言在华沙即将爆发一场真正的叛乱，示威游行具有危险性和反苏性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关于苏联和波兰军队正向华沙逼近的消息不断传到会场。晚9时，感到受骗的哥穆尔卡向赫鲁晓夫提出强烈抗议，坚决要求苏联立即停止部队调动，否则将通过电台向波兰人民揭露事情真相，同时又责问罗科索夫斯基，波兰军队向华沙移动的目的何在。随后，哥穆尔卡断然中止了会谈，等待苏联人尽快做出决定。其实，波兰改革派领导人早就对危急的形势有所估计，特别是在18日晚得知苏联代表团执意要来华沙时，就已经考虑到苏军可能进行武装干涉，所以已经有了军事准备。华沙军区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成立了两个司令部——军事司令部和地方司令部，其任务是监督苏联部队的调动并及时向政治局报告，波兰的海军和空军也制定了反击苏军的作战计划。内卫部队甚至接到命令：在必要的情况下逮捕苏联代表团。一些工厂和学校也建立起纠察队和自卫队，并得到了武器装备。[2] 此时，必须做出选择的赫鲁晓夫得到了两个情报，第一，通往华沙的道路已被波兰内卫部队阻断，除非进行战斗，否则苏军无法前进；第二，罗科索夫斯基已经失去了对波兰部分军队的控制，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部队可能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于是，赫鲁晓夫一方面命令苏联坦克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待命，一方面决定接受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恢复会谈后，赫鲁晓夫表示可以退让，但如果波兰企图退出社会主义国家阵

〔1〕骆亦粟：《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的回忆》，第38页；《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2日，第1075—1076页。

〔2〕ЦХСД，ф.5，оп.49，д.5，л.102—103，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с.232—233。

营，苏联将不得不进行干涉。哥穆尔卡则再次向苏联代表团保证，他们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波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将会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同时，哥穆尔卡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波苏之间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赫鲁晓夫终于相信了哥穆尔卡充满诚意的保证，双方商定11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解决双边关系问题。会谈到20日清晨结束，苏联的“军事演习”也停止了。苏联代表团离开华沙时，机场上的告别仪式是在正常气氛中举行的。[1]

以上情况说明，赫鲁晓夫决定暂时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使苏联人意识到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扩大为一场武装冲突，二是波兰党的行为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并没有要摆脱苏联的意图。显然，后者更为重要——华沙毕竟没有突破莫斯科的外交底线。新华社后来从波兰方面获取的信息证明，苏联仓促做出的武装干涉的决定，确实是受了错误情报的误导：“据可靠方面说”，就是因为保守派“向苏联大使提供了错误情报，说波兰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所以苏联当时才采取了最紧急的措施，包括军队的集结和调动。但当赫鲁晓夫等同志到华沙谈判后，才弄清楚不是那么回事”。[2]

过去在东欧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是中国阻止了苏联对波兰的武装干涉。根据奥哈布的回忆，波兰有传闻说：“在波兰同苏联关系紧张时，周恩来曾打电话给莫斯科，提醒苏联同志说，他们不同意

〔1〕以上关于苏波会谈的描述，除特别注明外，均根据波兰的档案文献（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28—40、55—63页），赫鲁晓夫的回忆与此基本吻合（见《最后的遗言》，第323—326页）。还可参见：Gluchowski，“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pp.4—51；Granville，“From the Archives”，p.549；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c.230—232。

〔2〕《内部参考》，1957年10月18日，第3—13页；1956年10月23日，第1135—1136页。

干涉波兰”。因此，他本人深信“如果不是中国及时提出了自己的警告”，苏联人“肯定会对波兰进行干涉”。[1] 按照新华社在事后报告的情况，据说波党中央有人透露：“要不是中国党支持的话，我们这次八中全会就决不会这样顺利。”还有人说：“毛泽东不同意苏联使用军队来对付波兰，赫鲁晓夫可以不听波兰人的意见，但他不能不尊重毛泽东的意见。”[2] 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标题就是：“苏联在波兰的克制是由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第一个向哥穆尔卡发出贺电”。[3] 于是，波兰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对苏联干涉波兰持反对态度是“苏联代表团在会谈最后阶段转变立场和意外妥协的原因”。[4] 中国方面也有同样的说法。吴冷西的回忆录说：10月20日上午他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毛泽东说接到苏共中央来电，苏联准备调动军队解决波兰问题，征求中共的意见。吴冷西汇报了当时收到的外国通讯社消息——苏军正在调动，波兰也在积极动员。后又得到消息，苏共代表团已到华沙，正在谈判。毛泽东认为情况紧急，于晚7时召见苏联大使尤金，对苏联的做法大加斥责，并要求他立刻向赫鲁晓夫转达中共的立场：坚决反对和谴责苏联武装干涉波兰。[5]

然而，根据目前已经看到的档案文献，这些说法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中共确实协助莫斯科处理了波兰危机，但与赫鲁晓夫最初做出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没有关系。

如上所述，苏共中央10月19日的电报没有透露任何有关武装干涉

---

〔1〕“Rozmowa z Edwardem Ochabem”，s.217、221. 关于周恩来电话的传闻，中国使馆后来也有报告。驻波使馆致外交部电，1956年10月2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

〔2〕《内部参考》，1956年11月30日，第755—756页。

〔3〕《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7日，第1283—1284页。关于这一传闻还可见驻波使馆致外交部电，1956年10月2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

〔4〕Werblan，“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s.123—124. 笔者2006年10月赴华沙参加“国际关系中的1956年波兰危机”国际学术会议，仍然听到这种说法。

〔5〕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13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35—40页。

的信息。作为刘少奇的翻译，师哲的回忆也说，尤金没有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此时已出动军队，对华沙形成了包围态势。[1] 刘少奇后来回顾事情的经过说：19日尤金只是向他通报了波兰的情况，中共没有发表什么意见。[2] 既然中共中央当时并不知道苏联打算使用军队的情况，自然也就谈不上出面阻止了。中国外交部的档案也显示了同样内容：19日危机发生以后，驻波使馆当天发回电报称：昨晚苏共中央来电话说，拟派代表团参加八中全会，波党表示“希望不来”，但今晨6时赫鲁晓夫等人抵达华沙；传说波党已分裂为两派，一派主张继续民主化，一派反对民主化，“斗争激烈”；群众集会要求自由，与苏建立平等关系，恢复哥穆尔卡领导地位等；“今天还谣传驻德苏军将开进波兰，西里西亚地区苏境苏军亦向波边境集中，此消息虽不可靠，但亦说明一些问题。”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谣传”是否可靠，而在于中国外交部收到这个电报已经是20日17时20分，而翻译并打印出电文则是在21日清晨。[3] 10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来自华沙的新华社19日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简况的电讯。这时，赫鲁晓夫等人早已回到莫斯科了。因此可以确定，赫鲁晓夫在19日夜间决定停止在波兰的军事行动时，毛泽东还不知道华沙的情况，也不可能对此发表意见。

19日晚上在华沙街头的确出现了“我们有毛泽东的支持”的大标语[4]，事后波兰人也确实“众口一词”地说，“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5] 但这些都属社会传

---

〔1〕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1页。逄先知和金冲及的《毛泽东传（1949—1976）》（第601—602页）采用了这个说法。

〔2〕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记录稿），1956年11月10日。关于刘少奇的这个讲话，正式发表的部分内容见《党的文献》1988年第5期。

〔3〕驻波使馆致外交部电，1956年10月1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

〔4〕这是驻波使馆参赞余湛到莫斯科向刘少奇和邓小平汇报的情况。笔者2004年4月17日对骆亦粟访谈记录。骆亦粟当时在驻波使馆工作，并随余湛到莫斯科。

〔5〕《内部参考》，1957年10月18日，第3—13页。

言，并无根据，充其量是表达了波兰人的内心希望。至于美国报纸所说毛泽东的贺电，只是《人民日报》（10月24日）报道了哥穆尔卡10月21日当选波党第一书记的消息而已。因此，上述说法也不能证明赫鲁晓夫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10月20日上午和晚上，王炳南两次拜访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了解到的情况是：波党中央一些人企图摆脱苏联，破坏波苏友好；以哥穆尔卡为首的集团提出的政治局名单，其目的首先是向全世界公布波兰已脱离苏联；目前波兰的情况很复杂、很危险，报纸、电台全都在反苏分子和犹太人的手里；谣传的军队调动事，只不过是几个士兵在各处散步而已；赫鲁晓夫已经来华沙了解情况，正在想办法如何对付哥穆尔卡。[1]虽然这两个谈话记录当时没有立即发往国内，但仅20日新华社和驻波使馆就先后发出了5—6封电报，详细报告了波兰发生的情况。如记者谢文清报告：西伦凯维兹、奥哈布等人在中央占绝大多数，他们主张民主化，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逐渐提高人民生活，并得到全国工人、学生、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拥护；罗科索夫斯基、诺瓦克等人主张排挤犹太人，停止民主化而恢复高度的集中，这一派人数极少，但掌握着军队。八中全会前夕提出的新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没有罗科索夫斯基一派，而增加了哥穆尔卡和莫拉夫斯基。19日晨赫鲁晓夫等突然来到华沙，要求参加波党八中全会，遭到拒绝。当晚工人、学生集会，声称“军队已集结在华沙周围”，要求全市“动员起来”，“保持高度警惕”，“以免反动派制造骚乱和军队借口进行干涉”。华沙群众强烈要求哥穆尔卡参加党的领导，主张主权独立、波苏友好和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对苏共代表团此次到华沙表示非常不满，认为是干涉内政。20日群众集会人数更多，情绪更加激昂，但口号仍是“忠于社会主义阵营”，“拥护党中央的路线”，“反对

〔1〕王炳南与波诺马连科谈话要点、谈话记录，1956年10月20日上午、晚上，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2。

一切外来压力”。人们高呼哥穆尔卡的名字，并“热烈鼓掌”。[1]

王炳南的看法与新华社不同，他报告了与苏、德大使交谈后的个人看法：波党八中全会出现了“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以哥穆尔卡、西伦凯维茨为首的党内右派分子纠合犹太人以及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者正在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一个反苏运动”。哥穆尔卡集团通过他们掌握的报刊和广播，散布“苏联干涉波兰内政”等谣言，到处组织学生和工人集会请愿，提出民主化、要平等、要独立的口号，实际上进行反苏活动，还造谣说“毛主席支持波兰对苏独立行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出现向右转的倾向。据苏大使表示，目前波兰军队已经做好准备，以防事变。有人挑动群众反对军队在华沙周围集结，并组织特别委员会追查此次调动军队的责任。赫鲁晓夫来华沙，飞机在上空盘旋2个多小时才获准着陆，谈判亦未有结果。工人和学生随时会游行，发生流血事件的可能是存在的。苏联希望中国党“能使用影响防止此种错误发展”，而苏联直接应付有困难，“软则助长右派气焰，硬则有可能逼炸”。最后，王炳南请示外交部应如何表态。[2]上述电报外交部均是21日才收到的，而且在这些电报中，有关苏联出兵干涉的说法只是一种推测。

毛泽东所知道的苏联使用武力干涉波兰的确切情况，应该来自外电。新华社转发美联社、路透社、合众社20日电讯的内容是：昨天晚上赫鲁晓夫命令军队包围华沙，扬言要用武力“镇压”波兰方面的“任何叛变”；“苏联军队和八百辆坦克正在向波兰首都开动”，“波兰各地都有关于苏联军队调动的消息”，“波兰的局势十分混乱和紧张”；奥哈布以退出苏波会议和“断绝一切关系”相威胁，终于迫使赫鲁晓夫停止了把苏军调到波兰的行动。这些消息

〔1〕《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2日，第1075—1076、1079—1080页；谢文清致外交部转新华社电，1956年10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

〔2〕王炳南致外交部并报中央电，1956年10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

刊登在22日的《内部参考》上。[1] 当然，毛泽东也可能先行得到了这些情报报告。

无论如何，10月20日毛泽东并没有得到苏联准备或已经使用武力干涉波兰的情报，当然就不可能毫无根据地训斥苏联大使，并要求苏联停止军事行动。事实上，根据《邓小平年谱》的记载，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是在10月21日晚，次日1时紧急召见尤金，表示了中共的立场。会见后继续开会，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应邀赴莫斯科。[2] 此时，华沙危机已经开始平息。

赫鲁晓夫一行回国后对波兰的局势仍然放心不下，接连召开会议讨论。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显示，苏联领导人希望"结束波兰目前的局面"，条件是罗科索夫斯基继续留在波兰。会议研究了在波兰的军事演习问题（但从记录看不出讨论结果），还决定准备从波兰召回苏联顾问的文件，并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处理波兰问题。记录还显示，这时莫斯科已经意识到驻波兰使馆在对奥哈布和哥穆尔卡进行评价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为慎重起见，会议最后决定邀请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代表来莫斯科进行商议，并拟派一位中央委员会代表专门去中国通报情况。[3] 10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19日苏波两党会谈的情况，说"会谈是在党的、友好的坦率气氛中进行的"。同日，新华社发回路透社21日电讯，说"苏军正在撤离华沙"。[4]

10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继续开会，关于是否对波兰进行干涉的问题，鉴于"波兰事件是以尖锐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形式出现的"，"欧洲各党表示极为不安"，苏共决定在23日"召集兄弟党领导人"

〔1〕《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2日，第1091—1097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321页。

〔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6年10月20日，ЦХСД，ф.3，оп.12，д.1005，л.49—5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1—42页。

〔4〕《内部参考》，1956年第10月22日，第1104页。

进行协商。在随后的讨论中，虽然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还在犹豫，但赫鲁晓夫已经倾向于对波兰采取让步政策，他提出："鉴于形势，应该放弃武力干涉。应表现出耐性。"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会议拟定并通过了给波党中央的信，同意撤消隶属于波兰安全部门的苏联顾问机构，召回在波兰军队中的苏联顾问，还说要派一架专机来接中国代表团。[1] 会后，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通了电话，他在谈话中强调，"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止把苏联与波兰之间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所阐述的原则的基础上"。[2] 显然，在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联对波兰的基本政策已经确定，所需要的帮助是如何处理与波兰关系的善后工作，以及如何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局势。[3] 后来的情况表明，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中共代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接到苏联的邀请信后，毛泽东在21日晚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赴苏，其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4] 会后，毛泽东连夜接见尤金，告诉了中共中央的决定。2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

〔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及决议，1956年10月21日，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1—3；оп.14，д.67，л.129；оп.14，д.67，л.1、4、5。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3—48。

〔2〕АВПРФ，ф.0122，оп.40，1956 г，п.336，д.10，л.108，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с.234。

〔3〕刘少奇也回顾说：中共代表团23日晚到达莫斯科时，苏联的态度已经转变，形势已经缓和了。（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刘少奇报告，1956年11月10日。）这里尚待解决的只是罗科索夫斯基的去留问题。但有学者认为，直到23日苏联似乎仍然没有放弃武装干涉。其根据是，按照波兰材料的说法，那时苏军还在向华沙前进（Gluchowski，"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pp.65）。这个说法与俄国档案关于21—23日情况的记载相矛盾，而"波兰材料"究竟是什么，是否可靠，都需要进一步拿出证据。

〔4〕吴冷西：《十年论战》，第44—45页。

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再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里。[1]

这时毛泽东已经确定了中共对波兰问题的立场，并对波兰使馆的判断提出批评。21日王炳南来电说，"据我们观察，苏联对这次波兰反苏各种因素被右派利用事前估计不足，临时又显出仓促应付，并表现了相当激动"。"在这一紧急关头，请中央考虑是否有必要与苏共中央进行磋商"。[2] 波党中央会议通过了以哥穆尔卡为首的领导名单后，王炳南再电：波党右派已"篡夺了党的领导权，这是右派秘密有组织地阴谋活动的结果"。"根据目前情况估计，波兰显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王炳南要求明确指示对波方针。[3] 22日王炳南又急报：苏联大使说，右派"现已开始在军队中进行煽动活动"；明晚苏联大使拟邀各兄弟国家大使吃饭，以示团结；"我们必须主动作工作，不能把波兰让给美国人"；苏联大使对事变的看法同中国使馆完

---

〔1〕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02—603页；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2页。现在可以看出，吴冷西回忆的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不仅时间有误（不是20日而是21日和22日，在内容上也是值得怀疑的（没有训斥的情节）。作为翻译，师哲是直接当事人。

〔2〕王炳南致外交部并报中央电，1956年10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

〔3〕王炳南致外交部并报中央电，1956年10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

全一致，现均采取对外谨慎态度，同波方少作接触。[1] 不仅如此，王炳南还表示不同意新华社记者的看法。22日谢文清在电报中明确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是，今天不存在波兰脱离社会主义而投向资本主义的问题，也不存在资本主义在波兰复辟的问题。""波兰很多人提出口号是民主化，各国人民都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波兰也有它自己的道路。同苏联友好合作，但要自己独立解决自己的事情。很多人对苏共代表团突然到达华沙和与此同时在华沙市外调集军队之事表示极大的愤怒，认为他们是干涉波兰内政，调集军队是粗暴的武力威胁。"王炳南在发出该电时加了按语："这篇报道只代表谢文清同志个人的意见，和使馆的看法有基本差别。"[2] 中共中央的方针确定后，23日外交部致电王炳南，要求他只管收集材料，及时报告国内，"不要人云亦云"。25日电更直接指出，使馆对波兰局势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而肯定了谢文清的意见。[3] 毛泽东未必完全不相信王炳南的分析，但此时他的关注点不在波兰内部的是非问题，而在于如何缓解波兰与苏联的矛盾，使其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在毛泽东看来，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苏联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

赫鲁晓夫似乎已经感觉到中国人将在波苏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和调解作用。10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10月24日11时集体同中国人会晤。[4] 然而，未等集体会见，赫鲁晓夫便抢先单独赶到机场等候刘少奇。中国代表团于23日午后抵达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赫鲁晓夫一路陪同刘少奇来到宾馆，并不断诉说苏联在对波关系中的委

〔1〕王炳南致外交部并报中央电，1956年10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1—06。

〔2〕谢文清致外交部转新华社电，1956年10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

〔3〕外交部致王炳南电，1956年10月23日、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2。

〔4〕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6年10月23日，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5—5 о 6.，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9页。

屈，希望中国党给他出主意，并表态支持他。谈到处理波兰危机时，赫鲁晓夫做了自我批评。据师哲回忆，赫鲁晓夫介绍说，他们最初对波兰事件有一些无端怀疑，认为波兰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采取了粗暴的办法，调动了军队。但苏共代表团到华沙后，同波兰领导人谈了一天，经过激烈的争论，发现自己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新领导人。不过，赫鲁晓夫强调，苏联对波兰不大好讲话，波兰同志对你们比较信任，对你们好，希望中国同志能够劝劝他们，那样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都有好处。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1]

据俄国档案记载，在出席10月24日上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刘少奇首先声明，“苏共中央对波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基本的一条是，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不能有几个中心”。同时也指出，“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有时是强加于人”。刘少奇还批评了过去斯大林对待日本共产党的错误态度。最后，刘少奇表示，保证与苏联团结一致。赫鲁晓夫则表示同意刘少奇的观点。[2]会议记录非常简单，而当事人师哲的回忆则比较详细：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中，刘少奇首先转达了中共中央对波兰事件的意见，表示同意苏共中央对波兰采取的方针，接着分析了危机爆发的原因。刘少奇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有一个处理相互关系要依据什么原则的问题。大国的党，较老的党，最先取得政权的党，理所当然应多承担义务，做出较好的榜样。苏联长期以来诚心诚意地帮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和中国在内，而且帮助很大。但是关系还是搞不好，波兰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匈牙利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因此，就值得研究一下，是不是一切事情已做得尽善尽美，是不是其中还有一些缺

〔1〕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3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第804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03页。

〔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6年10月24日，ЦХСД，ф.3，оп.12，д.1005，л.52，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52—53页。

点或者还有一些错误。请苏联同志考虑：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不是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也是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刘少奇说，有不少苏联同志处理许多国家事务时有缺点，有错误。有些国际会议不是采取认真协商的方式，甚至于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有时也有协商的形式，但明天甚至当天就要通过决议，人家没有时间考虑。事先既没有个别谈话，又不作集体商谈，只有强加于人，就是要别人听你们的话，不听，你们就要整人。在世界工联、世界妇联、世界青联、世界和平运动中，都有这种情况。必须学会同兄弟党、兄弟国家间协商、合作、协同动作：只想到自己，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别人的做法，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会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极大的害处和恶果。刘少奇最后说，无论国际形势有怎样的变化，或者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们保证中共会跟苏共站在一起。国际共运的中心只能是你们。但是，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应该讲清楚。两党的团结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方向。如果我们两党的关系破裂了，帝国主义就要大加利用，大肆进攻。我们正是从这个大局出发，才在会议上举手同意你们的决议。赫鲁晓夫当场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1〕刘少奇回国后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在这次发言中，“批评了他们在国际关系中间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中间的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倾向，并且指出了他们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一些缺点错误。我们算是比较坦率地这么讲一次。”〔2〕显然，通过波兰事件批评苏联，并要求苏共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中共代表团的主要目的。

会谈期间，中国驻波兰使馆派人到莫斯科向刘少奇汇报情况。据参加汇报的骆亦粟回忆，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说：中央决定，这次只批评

〔1〕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3—14页。另参见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第42—43页。

〔2〕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第805页。

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批评多了，怕他们接受不了。还说：苏联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东欧各国的事情，管得越多包袱背得越重，人家离得越远，放开些，反而团结得紧些。邓小平着重询问了八中全会后波党政治局人员的变动情况，特别对哥穆尔卡和罗科索夫斯基问得很仔细。他指示："要多做苏波双方的团结工作，但对一方讲的话，要准备让另一方知道，凡是不能让另一方知道的，不要讲，别看他们现在吵架，要想到将来他们有好起来的时候。"[1] 这表明，中国当时对波苏关系是有清醒认识的，对直接介入波兰问题还是存有戒心的。

从档案文献看，中共对于波兰党也确实有担忧的地方，感到需要去做工作。问题的核心是波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这首先表现在对罗科索夫斯基问题的处理方式。由于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因此波兰党在将其排除出政治局后，还要进一步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这个消息不仅令苏联人不满，也使中国人觉得有些过分。[2] 刘少奇在10月26日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表示，这个问题很关键，哥穆尔卡走得太远了，不应对打击过自己的人搞报复。为此，赫鲁晓夫才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工作。[3] 由于担心刘少奇来华沙是为莫斯科当说客，向波兰施加压力，哥穆尔卡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4] 于是，同波兰人的接触只

---

〔1〕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第41—42页。

〔2〕9月10日谈话时王炳南对奥哈布说，罗科索夫斯基过去两次来到中国，"在中国人民中威信很高"，并表示欢迎他在任何时候访华。王大使与波党代表团谈话纪要，1956年9月1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1。

〔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节选），1956年10月26日，ЦХСД，ф.3，оп.12，д.1005，л.53，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54页；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5页；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第42—43页。

〔4〕据骆亦粟回忆，这个情况是后来刘少奇自己说的（笔者采访骆亦粟记录）。刘少奇的回顾也证实了这一情况。（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刘少奇报告，1956年11月10日。）11月2日赫鲁晓夫与铁托会谈时，也提到他曾劝说刘少奇去华沙，但中国人一直没有得到签证，毛泽东为此很生气。（见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179页。）

能换一个方式进行。或许正是因为刘少奇无法在莫斯科与波兰党沟通，为了进一步让哥穆尔卡了解中国的立场，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

10月27日凌晨2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紧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毛泽东详细了解了波兰局势及哥穆尔卡的个人情况后，首先批评了苏联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并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还特别称赞哥穆尔卡24日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波兰党的“高度智慧”。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中波两党必须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说服苏联同志，但波兰也必须表现出宽容态度，“我们不能容许敌人利用我们阵营内出现的裂痕”。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对波兰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领土的主张感到担忧。毛泽东认为，“撤军问题的性质要广泛、深刻得多”，因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仿效波兰提出同样的要求，例如在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如果出现类似局面，“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严重危险”。[1] 中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波兰人，他们最终对一些棘手的问题做出了决断。得到北京发来的消息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2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宣布罗科索夫斯基休假，临时指派波杰罗夫斯基担任国防部长；通知中国，波兰从未打算要求苏联从波兰领土撤军。[2]

然而，尚未接到波兰的信件，毛泽东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开始改变。据师哲和骆亦粟回忆，10月29日，赫鲁晓夫等人到别墅来看望中共代表团。他们说，最近波兰、匈牙利都要求苏联军队从他们国家退出，而这个问题涉及到整个华沙条约，如果其他国家也要求退出，那么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就垮了，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刘少奇也明

〔1〕基里洛克致哥穆尔卡电，1956年10月27日，Werblan，“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c.124—126。

〔2〕Gluchowski，“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pp.81—82.

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还是要保持华沙条约。他还谈到要保护罗科索夫斯基，以及警惕反革命等问题。这时北京来了电话，刘少奇接完电话后向苏联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感到冤枉。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你们放手，给他们独立平等，他们会更靠近你们，会更拥护苏联。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我们应该拿出勇气，把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时刘少奇提出了一个建议：苏方是否可以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平等，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谈话一直进行到夜里两点。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接受了中方的建议，表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可以放手，也同意起草一个宣言。于是，双方立即就宣言的起草工作进行了安排。[1] 到30日晚8时完成宣言草案。[2] 随后，赫鲁晓夫返回主席团会议。讨论中，赫鲁晓夫表示放弃在罗科索夫斯基问题上的意见，让波兰人自己做主。会议通过了经中苏双方讨论过的宣言草案，题目是《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基础》。[3] 看得出，苏联发表这个宣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劝导和逼迫的结果。

至此，在刘少奇看来，波兰问题算是解决了。不过，最后通过发表宣言解决问题的时机和方式却给处理匈牙利危机带来了麻烦。

---

〔1〕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5—16页；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第43页。

〔2〕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刘少奇报告，1956年11月10日。

〔3〕АПРФ，ф.3，оп.64，д.484，л.25，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317页；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6—14，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с.457—463。公开发表的宣言文本见1956年10月31日的《真理报》和《消息报》，以及1956年11月1日的《人民日报》（第1版）。

## 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中的作用

就在刘少奇为处理波兰问题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布达佩斯的形势突然发生了急剧变化。自从斯大林去世就波澜起伏的匈牙利局势，由于当局处置不当，群众的不满情绪终于演变为一次社会性动乱。不过，与波兰事件相比，苏联在最初处理匈牙利危机时（10月23—24日），反应非常迅速，决策也非常果断。

如果1956年7月拉科西“退休”时，苏联和匈牙利党能够及时选择像纳吉或卡达尔这样的改革派人物出来主政，匈牙利的危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莫斯科接受了拉科西极力举荐的格罗，而格罗的思想路线与拉科西完全一致，其结果使匈牙利的动乱局面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更加剧烈。[1] 格罗执政后的举动令人颇感失望，他当选总书记后不久便跑到苏联去休假，并长达1个月。[2] 回国后不久又带领主要中央领导人去访问南斯拉夫，直到10月22日夜晚才匆匆赶回国。[3] 而手足无措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迫做出的一个又一个让步，总是比情绪激昂的群众运动和舆论要求晚半拍，以致危机步步逼近。

10月6日匈牙利民众为被拉科西大清洗中最著名的受害者、前部长会议主席拉伊克举行了重新安葬仪式，前往送葬的队伍多达20万人。这是人们第一次走上街头表示对现政权的不满，也是民众感到自己有力量对抗当局的重要的心理界线。特别是当新闻影片中出现了纳

---

〔1〕有许多历史文献反映了莫斯科在挑选拉科西继承人时的考虑及决策过程，详见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c.138—139、152—157、172—173、176—182。

〔2〕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c.188.

〔3〕《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6日第5版、25日第5版。

吉参加送葬的特写镜头时，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1] 10月14日《自由人民报》刊载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项决议：为纳吉恢复党籍。尽管决议称纳吉仍是犯有错误的，但同时刊登的纳吉给党中央的信件却使人感到错误不在纳吉，而在党的路线和政策。[2] 从16日开始，布达佩斯等匈牙利各大城市的学生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们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斯大林式的治国方法，坚持按民主原则改革政治体制。学生的口号越来越响亮，要求越来越激烈，而且得到了党内改革派和城市多数居民的支持。19日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制定新的出版法，保证批评自由和给予新闻工作者以豁免权，并致电匈党政治局祝贺恢复纳吉的党籍。[3]

10月22日在建筑工程大学一次有几千人参加的学生集会上，成立了匈牙利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并提出了16条要求，其中包括：立即从匈牙利撤出全部苏联军队，通过秘密投票自下而上地选举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基层、中层和中央机构领导人，在纳吉领导下进行政府改组，罢免在斯大林—拉科西时代犯有罪行的领导人，审判拉科西，在多党制基础上进行全民选举，制订工人最低生活标准，平等对待单干户农民，释放无辜的被捕者并为他们恢复名誉等。[4] 此时，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和学生这三股力量已经聚合在一起了。学生们的纲领没有提出任何进行根本经济变革的要求，但是其主要的政治要求在激

〔1〕山多尔·科帕奇：《匈牙利悲剧》，龚新康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2年，第119页；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с.194；《内部参考》，1956年11月28日，第664页；笔者2004年6月8日采访夏道生记录。夏道生当时任中国驻匈牙利使馆随员。

〔2〕详见《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7日第5版。

〔3〕《内部参考》，1956年11月28日，第673页；Путилин Б.Г.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год 1956—й，с.257。

〔4〕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с.316—318；Kirov，“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Györkei and Horváth（ed.），Soviet Military，pp.134—135.

进程度上却超过了以往几个月以“裴多菲俱乐部”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英和党内改革派提出的口号。[1]

为了表达和宣传自己的纲领，学生们提出在23日下午2时30分举行游行示威，并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支持。刚刚回国的格罗等人担心局势失控，于10月23日12时53分由内务部通过广播电台宣布了禁止游行示威的命令，但是很快就因激起民愤而不得不在集会前几分钟取消了禁令。当天的所有报纸都刊登了声援波兰人抵制苏联的文章，以及各种群众倡议和通告，舆论明显地倾向于民众。于是，游行参加者的人数逐渐增加，成分也发生了变化。下班之后，布达佩斯市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加入了游行行列，工人们也从市郊的工业区涌进城里。游行的规模越来越扩大，喊出的口号越来越激进，愤怒的人群开始行动起来——象征着苏联统治的斯大林铜像被吊车和钢索拉倒了，人们拖着被切割下来的斯大林头像在街上奔跑，情绪十分激奋。白天的和平游行到晚上变成了难以控制的骚乱。[2] 正当人们期待着政府的回答时，格罗在晚8时发表了广播讲话。令人群失望和激愤的是，格罗一口咬定这次运动是“敌对势力”企图“颠覆工人阶级政权”和“破坏秩序”，是“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挑衅活动”。这不啻火上浇油，人们被激怒了，一些青年试图冲进广播电台大楼，宣读游行示威者的纲领性要求，结果与国家安全部队发生了冲突。晚9时以后，冲突过程中第一次出现了枪声和伤亡。这时，抗议行动开始带有武装暴动的性质了，游行示威者从派来增援守卫大楼的部队以及民防仓库和地段警察

[1] 与以往宣传留给人们的印象不同，笔者与匈牙利学者交谈后得知，所谓“裴多菲俱乐部”不是由学生组成的机构，而只是一些激进知识分子松散地组织起来的辩论团体，并没有固定的人员和活动地点。在23日危机爆发以后，“俱乐部”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完全停止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题研究见András Hegedüs, “The Petöfi Circle: The Forum of Reform in 1956”, Terry Cox (ed.), Hungary 1956, pp.108—133。

[2] 俄国档案证实，苏联大使馆有两位工作人员（其中一位是三秘克留奇科夫）是游行的目击者，他们认为，白天的示威游行组织得很好，并且是可以控制的。（见Мусатов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c.10。）

局那里抢夺或搞到了武器。午夜时分，匈党中央下令实行戒严，镇压开始了。[1]

鉴于布达佩斯不稳定的形势，苏联驻匈牙利的华约部队——特别军早就制定了应急预案。1956年7月，华约部队参谋长安东诺夫来到布达佩斯检查部队情况。随后，驻军参谋部在莫斯科的指示和帮助下制订了一份"特别军参加在匈牙利领土内恢复秩序"的绝密计划，代号为"波浪"。10月6日至19日，安德罗波夫与特别军负责人多次举行会晤，研究部署和准备工作。21日特别军领导人又检查了各部队出动前的准备状况，同时在苏联边界也采取了防止匈牙利局势失控的安全措施。[2] 由于10月中旬安德罗波夫和特别军军长拉先科分别给苏共中央和总参谋部发来的关于匈牙利形势的紧急报告，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已经考虑派米高扬前往匈牙利，以及召回正在各地支援秋收的部队进行战备。特别军参谋长马拉申科于10月22日夜晚抵达布达佩斯，了解局势的变化。[3] 相反，匈牙利军队的举措却显得犹豫不决。国防部长巴塔19日下达了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的命令，同时批准了为应付布达佩斯出现社会动乱而制定的计划，但第二天又取消了戒备状态，以致在布达佩斯发生冲突的当晚，很多军官都不知应当如何

---

〔1〕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с.321—323、349—356；Мусатов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с.10；Путилин Б.Г.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год 1956—й，с.258—260；Györkei and Horváth，"Additional Data"，Györkei and Horváth（ed.），Soviet Military，pp.15—19、26—27；笔者对夏道生的采访。关于打第一枪究竟是何人所放的问题，至今没有可靠的证据。

〔2〕TsAMORF，f.32，op.701/291，d.15，pp.131、238.转引自Kirov，"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Györkei and Horváth（ed.），Soviet Military，pp.132。

〔3〕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с.300—309、315—316；Y.I. Malashenko，"The Special Corps under Fire in Budapest：Memoirs of an Eyewitness"，Györkei and Horváth（ed.），Soviet Military，pp.221；Györkei and Horváth，"Additional Data"，Györkei and Horváth（ed.），Soviet Military，pp.7—8.

行事。[1]看来，实行镇压的任务只能靠苏军来完成了。

就目前看到的材料，最先想到出动苏联军队进行镇压的是苏联驻匈军事总顾问吉洪诺夫和大使安德罗波夫。匈牙利国防部上校米克罗什·苏奇在回忆录中说，10月23日下午5时，吉洪诺夫当着国防部众多官员的面与在莫斯科的安东诺夫通了电话，要求准许命令特别军在必要时进入布达佩斯。得到批准后，吉洪诺夫随即命令特别军处于待命状态，并向在场的匈牙利军官宣布，部队将于午夜后某一时刻抵达布达佩斯。[2]另据马拉申科回忆，同样在下午5时，安德罗波夫通过军用电话向拉先科通报了布达佩斯的局势并询问他，能否派部队帮助维持首都的秩序。拉先科回答说，那是匈牙利警察和部队的事情，况且没有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命令，他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然而不到一个小时，特别军便接到了苏联武装力量司令部的命令——准备战斗。[3]还有材料说，苏联喀尔巴阡军区的第128步兵近卫师于19时45分，而驻匈特别军于20时接到了紧急待命的命令。[4]无论如何，在匈牙利正式向苏联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之前，苏联军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5]

---

〔1〕安德罗波夫致外交部电，1956年10月23日，АВПРФ，ф.059 а，оп.4，п.6，д.5，л.88—96；Györkei and Horváth，“Additional Data”，Györkei and Horváth（ed.），Soviet Military，pp.25—26.

〔2〕Miklós Szücs，I was Colonel Miklós Szücs in 1956 with the General Staff，Budapest：Szabad Tér Publishing House，1989，pp.60—62，转引自Györkei and Horváth（ed.），Soviet Military，pp.12—14。

〔3〕Malashenko，“The Special Corps”，Györkei and Horváth（ed.），Soviet Military，pp.222—223.

〔4〕Györkei and Horváth，“Additional Data”，Györkei and Horváth（ed.），Soviet Military，pp.10—11.

〔5〕根据布拉格的档案记载，赫鲁晓夫本人在10月24日向东欧国家领导人介绍说，23日（傍晚）格罗曾与他通电话，说因匈牙利局势恶化不能去莫斯科参加关于波兰问题的会议，但没有提出军事援助的请求。因此，当过后不久朱可夫报告格罗曾向苏联驻匈使馆武官试探给予援助的可能性时，被拒绝了。（见Kramer，“Hungary and Poland”，CWIHP Bulletin，Issue 5，1995，pp.54；Путилин Б.Г.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год 1956—й，с.261。）

23日夜晚，苏联和匈牙利领导人都在紧张地研究应对危机的办法。

据俄国档案记载，在23日22—23时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首先由朱可夫通报了匈牙利的局势，然后赫鲁晓夫提议向布达佩斯派出苏联军队，布尔加宁立即表示同意。但米高扬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没有纳吉就无法控制局势，而对苏联来说，这是代价最小的办法。如果苏联军队开进去，就会自找麻烦。可以先采取政治手段试试，不行再派军队去。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朱可夫、苏斯洛夫认为，匈牙利局势已经动荡不安，与波兰的情况不同，所以必须出兵并宣布全国实行戒严和宵禁。其他主席团成员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谢皮洛夫、基里琴科随声附和。会议还决定派主席团成员米高扬、苏斯洛夫以及苏军副总参谋长马里宁和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去布达佩斯。赫鲁晓夫最后说，可以吸收纳吉参与政治活动，但暂时不担任政府首脑。〔1〕正在莫斯科“休养”的拉科西也被邀请来参加会议。据拉科西回忆，晚10点半左右他被接到主席团会议现场，赫鲁晓夫介绍了布达佩斯的情况后问道，在这种局势下是否需要苏联军队出面干涉。拉科西毫不犹豫地回答，“绝对需要，而且必须立即干涉”。于是赫鲁晓夫接通了布达佩斯的电话，在简短交谈中，格罗扼要地介绍说形势很复杂。赫鲁晓夫告诉他，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苏联愿意给予任何的军事援助，但需要匈牙利政府提出正式请求。此外还通知说，米高扬将连夜赶赴布达佩斯并转告苏联的决定，在此之前不要采取任何重要举动。〔2〕

匈牙利领导人当晚集聚在格罗的办公室，神经更为紧张，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格罗对他的广播讲话所引起的剧烈反应感到非常吃

---

〔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6年10月23日，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4—4 о б。

〔2〕Ракоши М.Людям свойственно ошибаться，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М.Ракоши//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9，№1，с.48—49、79—80.

惊，为了平息民愤，不得不提议请纳吉出来组建新政府，在场的人一致同意。不久，纳吉被请到党中央大厦，并无条件地同意出任部长会议主席。22时22分，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消息：立即召开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这次紧急召开的只有1/3成员参加的中央全会到24日凌晨才结束，会议一致通过由纳吉取代赫格居斯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此外，大家还一致同意格罗的建议，马上给赫鲁晓夫通电话，请求苏联出兵镇压刚刚出现的暴乱，因为匈牙利的军队已经靠不住了——除国家安全部队外，正规军被禁止开枪，除非他们自身遭受攻击，有的士兵甚至投靠到"自由战士"一边。于是，会议决定邀请苏联军队，并发布戒严令。[1] 然而，在此之前，苏军已经开始行动了。[2]

10月23日23时，苏联国防部根据政府的决定向驻匈特别军、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及部署在罗马尼亚的独立机械化集团军发出了战斗警报，这些部队共计5个师31550人，拥有113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615门火炮和迫击炮，185门高射炮，380辆装甲运兵车，3930辆汽车。同时进入战斗准备的还有4个空军师，共计歼击机159架，轰炸机122架。各部队的任务是：特别军主力进入布达佩斯，占领该市重要设施并恢复那里的秩序，同时以部分兵力在奥匈边境担任掩护；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负责占领匈牙利东部各大城市；独立机械化集团军进入匈牙利南部地区。各部队随即展开行动：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在10月23日夜已越过苏匈边界，特别军于当地时间24日2时至4时进入布达佩斯

---

〔1〕赫格居斯·安德拉斯：《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陈之骝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286—298页；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c.349—352；Granville, From the Archives, pp.535—538。

〔2〕据赫格居斯回忆，在讨论邀请俄国军队的问题时，会场很乱，纳吉疲惫地坐在沙发里，没有明确表态。决定通过后，格罗和安德罗波夫认为纳吉已经同意了，并千方百计要他在后来起草的邀请信上签字。但纳吉始终拖延没有签字，直到10月26日，在莫斯科的催逼下，由已经不再担任政府首脑的赫格居斯勉强签了字。（《赫格居斯回忆录》，第286—298页。）

并占领了该市重要设施，独立机械化集团军主力于4时15分至6时20分进入匈牙利领土。歼击机部队起飞掩护陆军行动，轰炸机部队则在机场待命。[1]

从匈牙利局势骤然恶化到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和占领匈牙利其他大城市，前后不足12个小时，在此期间，中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根据俄国的档案记载和师哲的回忆录，23日下午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在其住所与赫鲁晓夫谈话时，格罗来电话说，因国内离不开，无法到莫斯科来开会。赫鲁晓夫答应他可以不来。过了一会儿，朱可夫来电话说，布达佩斯的群众已走上街头，并冲进党政机关大楼。警察拒绝为大楼提供保护，而国防军派去维持秩序的部队被群众缴了械。因此匈牙利国防部长给他打电话，要求苏联派军队给予援助。朱可夫推说这是政治问题，应在两个党中央之间解决。又过了约一个小时，朱可夫第二次来电话。当时赫鲁晓夫表示，出兵问题主席团要讨论，如果是匈牙利政府请求的话，可以考虑。放下电话后，赫鲁晓夫对刘少奇说：匈牙利目前的局势你们完全不知道，现在也来不及征求你们的意见了，明天主席团开会，请你们参加。说完就走了。24日上午刘少奇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介绍了匈牙利的情况，称苏军已经出动，进入了布达佩斯，社会秩序已基本上恢复。只有几个据点没有拿下来，其他问题都已解决了。人民欢迎苏联红军，欢迎苏联的坦克。他希望中国同志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步骤。赫鲁晓夫还强调，波兰是党内问题，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反革命的征兆。因此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跟波兰一样，希望中国同志了解。[2] 看来，赫鲁晓夫只是向中国代表团解释了一下出兵的原

〔1〕朱可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年10月24日，АПРФ，ф.3，оп.64，д.484，л.85—87、88—89，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279—281页。

〔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6年10月24日，ЦХСД，ф.3，оп.12，д.1005，л.52，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52—53页；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3—14页。刘少奇的报告证实了这一情况。（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刘少奇报告，1956年11月10日。）

因，并不需要中国人对此做出评论。[1]俄国的档案文献和师哲的回忆都没有记述刘少奇对匈牙利问题及苏联出兵的反应。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报告说，（23日晚）赫鲁晓夫走后他与毛泽东通了电话，因不了解情况，决定先不表态。[2]

10月23日晚8时和9时，中国驻匈使馆发回两个电报，未加评论地讲述了布达佩斯游行的情况和格罗的广播演说。此后便没有进一步消息了。24日下午4时外交部连续发出3封电报，要求驻匈牙利和其他东欧国家使馆迅速报告匈政治局势（特别是纳吉的问题），“报告时切忌主观片面和人云亦云”，并要求驻匈使馆立即派一名了解情况的参赞和匈文翻译赶往莫斯科（自然是向刘少奇汇报）。[3]但外交部始终没有收到驻匈使馆的回复，其原因是通讯中断。由于中国使馆没有电台和直线国际电话，平时与国内的一切通讯都要经市内邮电局进行。因局势混乱，邮电局停业，从23日午夜起一切国际电讯、电话全部切断，中国使馆的报告发不出去，国内的指示也接收不到，直到25日下午才恢复电讯（电话仍不通）。所以，24日上午使馆报告游行当夜已经“演变成反革命暴动”以及实行戒严和苏军出动的电报，外交部直到北京时间26日凌晨才收到。[4]据使馆人员回忆，一则外交部指示“多听少说，不轻易表态”，二则情况不明，也不便发言，所

〔1〕对来到莫斯科的东德、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赫鲁晓夫甚至连解释也没有，在10月24日与这三个东欧国家代表会谈时，赫鲁晓夫只是通报了处理波兰和匈牙利问题的经过。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6年10月24日，ЦХСД，ф.3，оп.12，д.1005，л.51—51об，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51页。捷克斯洛伐克档案中也有关于这次会议的记载，见CWIHP Bulletin，Issue 5，1995，pp.53—55。

〔2〕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刘少奇报告，1956年11月10日。

〔3〕驻匈使馆致外交部并中央电，1956年10月23日、2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

〔4〕驻匈使馆致外交部并中央电，1956年10月24日、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此后因形势恶化，通讯再次中断，中国使馆与外交部的联络一度只得通过匈牙利外交部和驻华使馆进行。（驻匈使馆致外交部并中央电，1956年10月26日、27日，109—01041—01。）

以，尽管匈牙利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对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友好，但中国使馆对匈牙利的内部事务从不发表意见。从布达佩斯发生骚动一开始，中国大使馆的铁门就紧闭起来，拒绝与匈牙利的任何一派建立直接的联系，即使是那些以前来往密切的朋友。作为前任拉科西政府的官员，这些人希望在中国使馆得到庇护，但郝德青大使通过门卫婉转地请他们去苏联使馆。在危机过程中，出于安全的考虑，中国使馆人员都集中到宿舍大院集体办公，只能通过收听广播和收集街头传单、小报来了解情况。[1]

除10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反革命分子利用学生和平游行制造武装暴乱，匈政府邀请苏联驻军帮助恢复秩序的消息外，直到10月30日之前，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没有对匈牙利危机做出任何表态，至少在目前可以看到的档案文献和已经出版的论著都没有提到这一点。[2]这大概与匈牙利局势发生了变化有关。27日中国使馆报告，“反革命武装力量已基本肃清”。28日又报告，纳吉当日下午发表声明，命令全面停火，宣布重组政府。“纳吉声明后，枪炮声已渐平息”，恢复秩序有望。[3]到28日晚上，当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返回并汇报了最新情况后，苏联领导人的倾向性意见是宣布支持卡达尔和纳吉的新政府（已排除格罗和赫格居斯等），接受纳吉的宣言，同意从布达佩斯和

---

〔1〕郝德青：《外交工作三十年》，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65页；笔者对夏道生的采访。另参见János Rádvanyi，“The Hungarian Revolution”，The China Quarterly，№43，Jul.—Sep. 1970，pp.122—123。

〔2〕据《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刘少奇23日晚上与苏共领导人会谈时听到了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从24—31日，毛泽东连续召开高层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但没有透露具体内容。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04页。

〔3〕驻匈使馆致外交部电，1956年10月27日、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

其他占领地区撤军。[1] 同一天，驻匈苏军司令部下令制订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而由匈牙利军队接管的计划。按照后来制订的计划，接替的部队应于10月29日20时至30日6时进入阵地。[2] 《人民日报》在28和29日两天的报道让人感到暴风雨即将过去了：匈政府限令叛乱者停止抵抗，已有大批暴乱者放下了武器；暴乱分子请求谈判，布达佩斯暂时停火，匈政府和人民正设法恢复和平生活；已经实行暂时停火，正在进行谈判等。[3] 或许正是如此，毛泽东觉得华沙条约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了，从而决定支持波、匈等国要求苏军撤退的主张。[4]

没有人会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更大规模的军事干涉从天而降。但这次苏联军队要对付的已经不是街头“暴民”，而是匈牙利政府、军队和武装起来的市民了。

如果说苏联第一次出兵决策完全是独自做出的话，那么在苏联第二次出兵的决策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意见则发挥了微妙影响和导向性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中苏领导人在后来的政治论战中各执一词：中国方面强调在处理匈牙利事件中，中共“建议苏共中央不要从匈牙利撤走军队，要利用部队镇压反革命叛乱”，否则就要“犯历史的错误，给国际工人运动带

---

〔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6年10月28日，ЦХСД，ф.3，оп.12，д.1005，л.54—61об。据赫格居斯回忆，纳吉于28日11时从苏联使馆回来后，告诉格罗和赫格居斯，苏联人同意改组政府（《赫格居斯回忆录》，第310页）。中国使馆报告，28日晚苏联开始撤离布达佩斯。驻匈使馆致外交部并中央电，1956年10月2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

〔2〕Györkei and Horváth，“Additional Data”，Györkei and Horváth（ed.），Soviet Military，pp.70—71.

〔3〕《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8日、29日第5版。

〔4〕10月27日毛泽东接见波兰驻华大使时，对于波兰要求华约部队撤军还感到担心，认为会在匈牙利和东德引起连锁反应，并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严重威胁”。（基里洛克致哥穆尔卡电，1956年10月27日，Werblan，“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c.124—126。）但是，29日毛泽东就改变了看法，他在电话告诉刘少奇，苏联应该在东欧进一步放手，包括撤退驻军。（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5—16页；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第43页。）

来损失”。苏联方面承认当时中共确曾对苏共中央提出劝告，但劝告的内容与现在所说完全不同。[1]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就目前掌握的史料看，问题的大致脉络是可以说清楚的。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突然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在外人看来很难理解，以致美国驻苏大使波伦认为：纳吉于28日晚上发表的关于苏军从布达佩斯撤退的声明，似乎是一项得到苏联默契的、旨在促使起义者停火的诡计。[2] 甚至苏联军人后来都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军事行动，使苏军能够对匈牙利进行突然袭击”。[3] 但事实并非如此。从29日到31日，苏联在决策时由于内部意见分歧，一直摇摆不定，犹豫不决，而中国的主张则是前后不一，先要求苏联撤军，后又主张出兵镇压。不过无论进退，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坚定，而莫斯科都听从了中共的意见。正是这些看来不容更改的意见，对苏联处理危机的方式和结果产生了导向性影响。

面对已经狂热的人群，迟到的政府改组和让步措施不仅没有起到安抚作用，反而被一些激进的闹事者所利用，匈牙利的局势更加复杂了。10月29日莫斯科接到谢罗夫的报告：8000多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被释放，并从看守人员那里夺到了武器；在一些大城市，居民们被煽动起强烈的反共情绪，有些共产党员遭到枪杀；在德布勒森市，党委已经转入地下，并要求得到军队的支持；很多国家安全机构被解散，放下武器的国家安全人员受到围攻和袭击。[4] 当日晚又收到米高扬

〔1〕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的会谈记录，1960年11月26日，А П Р Ф，ф.3，оп.65，д.610，л.100—120。参见CWIHP Bulletin，Issue 10，March 1998，pp.172—173。

〔2〕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年）》，刘裘、金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518页。

〔3〕Malashenko，“The Special Corps”，Györkei and Horváth（ed.），Soviet Military，pp.277.

〔4〕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转发谢罗夫报告致苏共中央电，1956年10月29日，АПРФ，ф.3，оп.64，д.484，л.151—161，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308—311、447—449页。

和苏斯洛夫的电报，说“群众已经失控”，“反共分子变得愈来愈无耻”，布达佩斯市两个区党委会以及党的机关报编辑部和印刷厂已被市民占领。[1] 当苏共中央得到这些消息时，赫鲁晓夫正在与刘少奇商谈如何彻底解决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说，会谈期间刘少奇通报了毛泽东的意见（主要是针对波兰问题提出的），要求苏联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东欧进一步放开。会谈到29日深夜，苏联终于同意连夜起草一个平等关系宣言，并决定于第二天讨论通过。[2] 赫鲁晓夫的回忆与中方材料大体是一致的，只是多了一个匈牙利问题。据赫鲁晓夫回忆，会谈进行了一个通宵，讨论了匈牙利事件的进程并研究了各种方案。赫鲁晓夫通报了布达佩斯传来的消息，中苏双方在完全信任的基础上反复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一会儿主张出兵，一会儿又决定放弃。正在这时毛泽东关于“进一步放开”的意见来了，于是做出决定，在匈牙利放弃使用武力，让事态自然发展，而把处理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匈牙利新政府身上。[3]

30日，布达佩斯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武装分子凌晨便包围了市委大楼，并于10时发动进攻，战斗异常激烈。由于匈牙利新政府派来援助的部队无所作为，有的坦克甚至调转炮口，市委大楼很快被攻陷，守卫部队和人员遭到残忍杀害。[4] 上午，莫斯科接到米高扬的报告：“党的领导机关感到束手无策，党组织正在解体。流氓分子横行霸道，强占区党委，杀害共产党员。组建党的纠察队的工作进展缓慢，工厂停工，居民闲坐在家，铁路停止运行，无赖大学生和其他叛乱分子改变策略，表现十分猖獗。”广播电台已经被占领，“叛乱分

---

〔1〕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致苏共中央电，1956年10月29日，АВПРФ，ф.059 а，оп.4，п.6，д.5，л.13—14。

〔2〕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5—16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04页。

〔3〕Хрущев Н.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с.359—360.

〔4〕侯凤菁：《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事件真相》，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165—169页。

子发表声明，只有在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才能放下武器”，“匈牙利军队采取观望立场”，“有可能与叛乱分子联合”。米高扬建议，“停止向匈牙利派兵，但继续在苏联领土上集结部队”，“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到那时当然就得从整体上重新考虑全部问题”。他最后表示，“尚未形成对局势的最终看法”，但认为“科涅夫同志须立即前来匈牙利”。[1] 当日14时，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团做出决议：在匈牙利结束一党制。14时28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了这个决议，并呼吁苏联军队立即撤离布达佩斯。纳吉还声明：政府将立即开始与苏联政府就苏军从匈牙利领土撤出事宜举行谈判；政府承认在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地方民主自治机关。[2] 按照28日的计划，苏联军队于16时停止战斗，并开始从布达佩斯撤出。[3] 中国使馆也感到形势恶化，使馆人员和留学生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甚至开始处理内部文件，做撤离的准备。[4]

然而，此时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却把精力集中在讨论刚刚按中共意见起草的平等关系宣言草案上。显然是受此影响，会议在匈牙利问题上也倾向于采取妥协的立场。根据讨论记录，30日的会议刚开始研究米高扬和谢罗夫报告的匈牙利局势时，赫鲁晓夫进入会场，通报了昨晚与刘少奇会谈的情况。赫鲁晓夫说，考虑到苏军驻在国的意见，建议今天通过中共提议的宣言草案，而从人民民主国家撤军的问题将在华沙条约国会议上讨论。所有政治局成员一致

〔1〕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致苏共中央电，1956年10月30日，АПРФ，ф.3，оп.64，д.484，л.122—12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312—314页。

〔2〕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团决议，纳吉的广播讲话，1956年10月30日，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с.470—471.

〔3〕见《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日第6版。关于苏联从布达佩斯撤军的具体情况见Györkei and Horváth，“Additional Data”，Györkei and Horváth（ed.），Soviet Military，pp.71、244—245。其中说，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宣布苏联政府同意苏军撤出布达佩斯是在17时。

〔4〕驻匈使馆致外交部并中央电，1956年10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

表示同意。在随后的讨论中，布尔加宁虽抱怨“中国同志对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但还是同意了准备给匈牙利的呼吁书和宣言。莫洛托夫建议，立即开始关于从匈牙利撤军的谈判，至于华沙条约问题，与其他国家一起讨论。关于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莫洛托夫认为，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应在不同的基础上。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的看法与莫洛托夫一致。但外交部长谢皮洛夫认为：“目前事件发生的过程，暴露了在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方面存在着危机。反苏的情绪在扩大。应该深入地揭露其原因。”他还提出，应“坚持不干涉的原则”，经匈牙利政府的同意后准备撤军。朱可夫赞同撤军，并承认处理匈牙利危机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是有教训的，在民主德国和波兰的驻军问题更加严重，继续坚持下去还不知道会导致什么后果。福尔采娃和萨布罗夫也赞成通过宣言。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大家意见一致，首先应发表宣言。随后，主席团讨论了宣言草案。[1] 傍晚时分，苏方将宣言草稿送给刘少奇看，其内容基本上就是刘少奇讲的话，甚至有的词句都一模一样。晚8时宣言定稿，中共代表团再度出席苏共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宣言。[2] 显然，中共关于发表平等宣言的建议，尽管原先是针对波兰问题提出的，却导致了30日苏联对匈牙利采取和平方针的决策。由此可以判断，29—30日苏联已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对此，中共的影响是有决定性作用的。[3]

直到这时，中苏两方都还没有提出对匈牙利再次出兵干涉的问

---

〔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6年10月30日，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6—14。

〔2〕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6页。

〔3〕在中苏两党论战时，中共中央指责“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64页），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中国研究者坚持这种说法。显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题。此后几小时内，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双方的说法却完全不同。

按照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中央全会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的说法，30日凌晨赫鲁晓夫离开刘少奇回家时，做出的决定是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但回家后看到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新情报，经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一致决定再次出兵干涉。因为已经与中国达成不再使用武力的协议，现在又突然改变做法，所以在31日晚刘少奇回国前，赫鲁晓夫带领整个主席团赶到机场，与刘少奇等举行会谈。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刘少奇对此完全赞同，说这也是中国方面的考虑。[1] 按照这个说法，再次出兵的决定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只是与中国的意见不谋而合。

中方的说法恰恰相反。由于信息不通，中国对匈牙利的局势变化不甚了解。[2] 按照吴冷西和师哲的回忆：10月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最新报告送给刘少奇看。中共代表团看了这个报告后深感意外，整整讨论了一天。经研究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二是苏军采取镇压行动。由于两种办法各有利弊，大家讨论了一天也没有结果。因此，晚上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连夜召集政治局会议研究，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匈牙利事件的性质不同，苏联想在波兰动用军队是错误的，但对匈牙利必须帮助。毛泽东要求赶紧起草电报，告诉刘、邓代表中央郑重向苏共中央提出，中共不赞成从匈牙利撤兵，建议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同时，毛泽东在电话里告诉刘少奇，可以把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跟他们商量。毛泽东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

〔1〕Хрущев Н.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с.359—360；赵永穆等译校：《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第968—971页。

〔2〕中国使馆29日和30日报告局势恶化的电报，外交部直到11月1日才收到。驻匈使馆致外交部电，1956年10月29日，驻匈使馆致外交部并中央电，1956年10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

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为好。当夜，应中共代表团的要求，中苏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议。刘少奇在发言时明确表示，对匈牙利的局势，是不是还有挽救的机会？不要就这样放弃了，放弃了可能要犯错误。邓小平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权，不让政权落后敌人手里。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中共的意见很清楚，匈牙利的问题不同于波兰问题，已经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了，必须想办法加以挽救。但赫鲁晓夫表示非常为难，他说，出兵就意味着要对匈牙利实行全面占领，那样我们就变成征服者了。我们已经考虑过，大家都认为这样很不利，因此一致主张退让。鉴于苏方已有一致意见，中共代表团不好再说什么了。第二天（31日）晚上，刘少奇接到苏方电话，要求代表团成员提前一个小时到达飞机场，同苏方再度会谈。赫鲁晓夫一见面就告诉刘少奇，经过主席团一整天的讨论，有了新的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刘少奇表示赞同，又提醒说，苏联出兵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二是要得到匈牙利群众的拥护。[1] 周恩来在1972年8月1日与外事干部谈话时也说：苏联原来准备放弃匈牙利，最后接受了中共的建议，决定苏联军队不走，这才把卡达尔争取过来。[2]

对比俄国档案中关于30日和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讨论记录，可以对上述当事人回忆的不同说法做出是非评判。根据30日会议的第49号记录，大约在夜晚（即主席团刚刚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和通过平等关系宣言），尤金报告了与中国代表团会谈的情

〔1〕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1—52页；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6—17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04—605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第805—806页。吴冷西所说的时间与别人不同：刘少奇紧急约见赫鲁晓夫不是在30日夜晚，而是在31日。于是，中共代表团离开的时间也不是31日，而是11月1日（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1—53页，《忆毛主席》，第14—15页）。笔者以为，在这里又是吴冷西的记忆错误。

〔2〕周恩来：《战后苏联同我国关系的变化》，1972年8月1日，外交部编：《周恩来同志论外交（内部学习文件）》，1981年7月，未刊，第86—101页。

况。中国人对匈牙利局势表示忧虑，提出："匈牙利是否会脱离我们的阵营？纳吉是怎样一个人？是否可以信任他？"更晚一些时候，赫鲁晓夫和刘少奇进入会场。会议记录表明，刘少奇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军队应该留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而对赫鲁晓夫随后发言的记录是："两条途径。军事途径——占领。和平途径——撤军，进行谈判。"莫洛托夫的讲话似乎是倾向中国的意见："政治局势已经明确。建立了反革命的政府，过渡性的政府。"[1] 这说明30日夜间中共已经表明了新的立场，而苏共还在犹豫。

31日的会议记录显示，苏联领导人已经明确了态度。赫鲁晓夫对匈牙利局势的意见是：必须重新考虑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问题，苏联军队不能从匈牙利和布达佩斯撤出，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来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如果我们撤出匈牙利，就会使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受到鼓舞。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并进攻我们。"接着，赫鲁晓夫指出，不能在埃及之后再把匈牙利送给西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赫鲁晓夫还提出了再次武装干涉的具体办法，如成立以卡达尔为首的临时革命政府，由明尼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如果纳吉同意可以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以及与铁托会谈，向中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通报信息等。主席团一致同意赫鲁晓夫的主张和提议。参加会议的匈牙利前领导人拉科西、赫格居斯、格罗也表示赞同。[2] 以后苏联对事情的处理大体就是按照赫鲁晓夫的以上安排进行的。

显然，档案文献的记载证明师哲的回忆是准确的。这个过程表明，对苏联第二次出兵决策起关键作用的是10月30日晚毛泽东对匈牙利危机态度的转变，更准确地说，是对纳吉政府态度的转变。尽管目

---

〔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6年10月30日，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6—14。

〔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6年10月31日，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15—18 о 6 。

前还无法看到在危机期间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事件的全面分析及其变化，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人民日报》的报道就可以发现，从10月27日第一次刊登匈牙利事件的消息时，中国官方的观点就称之为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的游行及其制造的“武装暴乱”，所不同的只是对匈政府行为的评论。在11月2日之前的报道对纳吉政府比较客观，言辞中还有表示支持的意思，从11月3日开始变调，不断批评和指责纳吉政府的做法。[1] 由于受过去的政治宣传的影响，给人的印象苏联出兵镇压是因为纳吉政府背叛性地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并向联合国求援。实际上，纳吉因阻止苏军向匈牙利逼近未果而宣布中立是在11月1日晚上，而此时苏联早已决定对匈牙利实行军事占领了。[2] 至少在11月4日卡达尔新政府在苏联坦克护卫下进入布达佩斯之前，苏联对纳吉的态度主要是认为他软弱，无法控制局面，所以最初还考虑让他参加由莫斯科组织的新政府，而中国的估计则要严重得多。[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决定纳吉及其政府命运的关键性的一步，是毛泽东首先迈出的，而在危机的关头，纳吉恰恰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11月1日晚10时，纳吉紧急召见中国大使郝德青，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纳吉首先指出：“这次事件是一个悲剧，是党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引起的。”“和平示威运动表示了人们的不满”，但被称为反革命暴动，结果激化了矛盾，而苏联出兵干涉又使事件“趋

〔1〕详见1956年10月27日至11月3日《人民日报》的报道。

〔2〕安德罗波夫致苏联外交部电，1956年11月2日，АВПРФ，ф.095 а，оп.4，п.6，д.5，л.20—22。

〔3〕实际上，从25日晚卡达尔取代格罗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后，直到其突然失踪，包括请求苏联撤军在内的所有匈牙利政府的决定，都是纳吉与卡达尔共同做出的，他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卡达尔到莫斯科后就改变了态度，而纳吉则始终坚持反对苏联出兵的立场。（参见Huszár Tibor，Kádár János Politikai Életrajza（1912—1956），Budapest：Szabad Tér Kiadó— Kossuth Kiadó，2003，pp.301—302。）外交学院教师朱丹丹为笔者翻译了这部很有影响的匈牙利著作——《卡达尔的政治生涯》的片段，谨在此表示感谢。

向极端恶化”。“当然，在这种严重情况下，反革命法西斯分子进行了活动，但只是极少数”。匈政府已无数次地提请苏联当局注意，并整天与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谈判。“他们对事件的估计和论断与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谈到问题的焦点，纳吉说：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愿意谈判，并指出苏军继续驻留会使情况更恶化。但事情并不是如此发展的，根据飞机侦察，“从昨天下午起一直到现在的情况说明，苏军不但没有开始撤退，反而增援两个新的坦克师”。这违反了“匈牙利政府与米高扬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也是“违反苏联政府声明”的。纳吉激动地说：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不堪设想的悲剧发生。“我们是共产党人，政府内阁半数是共产党人，部长会议主席是共产党人，都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但现在情况严重到如此地步，到底是什么原因把我们拖到这种地步”。“我们别无他法，只有把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立即退出华沙条约，宣布中立”。纳吉指出，现在苏军坦克部队离布达佩斯只有60公里，全国机场已被苏联坦克部队占领，这是有计划的军事进攻。纳吉最后深情地表示：如果苏军撤退，我们可以立即收回向联合国提出的控诉。“情况万分严重，请大使转告毛主席和周总理，要求中国政府干预此事，帮助解决苏军撤退问题”。[1]纳吉万万没想到，毛泽东此时已经做出了与他的期望完全相反的决定。对于中国立场的突然转变，不仅苏共领导人感到意外，匈牙利政府完全被蒙在鼓里，就连波兰党政治局听说中国称赞苏军对布达佩斯的行动后，也如堕五里云雾。[2]这就难怪后来东欧学者对中国在苏联第二次出兵镇压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表示怀疑。[3]

〔1〕郝德青电话记录、郝德青致外交部并中央电，1956年11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

〔2〕驻波使馆致外交部电，1957年11月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28—04。

〔3〕2006年10月，笔者赴布达佩斯参加“1956年的危机及其影响”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因宣读《毛泽东与苏联出兵匈牙利》一文而受到普遍质疑，大家都对毛泽东要求苏联出兵镇压的说法感到迷惑不解。

当然，影响莫斯科决定第二次出兵的还有其他外界因素，很多研究者注意到美国的态度。例如，10月2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达拉斯发表演说时称，美国并不把苏联的卫星国当做潜在的军事盟友。第二天，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又把杜勒斯的话重述了一遍。10月29日，美国大使波伦还特意请苏联领导人注意这种说法，甚至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0月31日的电视讲话中又重述了一遍。〔1〕这无异于告诉莫斯科，美国不会出面干涉匈牙利问题。此外，与匈牙利危机同时爆发的苏伊士危机，一方面如赫鲁晓夫所说，使莫斯科不能容忍在中东失去控制后又在东欧丢掉一块阵地，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促使莫斯科下定了决心——西方在集中精力处理中东危机时已经无暇顾及东欧的事情了。〔2〕莫斯科盟友的立场也并非不重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10月30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指出，与匈牙利党和政府的立场不同，意大利共产党仍坚持“把暴动看作是反革命事件”，匈牙利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向着反动的方向发展”。〔3〕同日，苏共中央还接到报告说，保加利亚驻苏大使格拉西莫夫在前一天曾非常尖锐地指出，匈牙利政府的许多行动是不正确的和敌视苏联的，关于苏联军队必须撤出匈牙利的声明则是“完全令人不能容忍的”。〔4〕还有学者指出，匈牙利事件对其他东欧国家，特别是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使克格勃非常担心：这一骚动如果不尽快平息，将

〔1〕Györkei and Horváth, “Additional Data”, Györkei and Horváth (ed.), Soviet Military, pp.31—32；时殷弘：《匈牙利事件和美国的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第97—111、122页。

〔2〕关于这两个危机之间关系的研究见：Terry Cox, “Reconsidering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Terry Cox (ed.), Hungary 1956, pp.1—13; Békés,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Working Paper №16, 1996, CWIHP; Путилин Б.Г.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 год 1956—й, с.271—273。

〔3〕波日达耶夫转交陶里亚蒂信函致苏联外交部电，1956年10月30日，АПРФ, ф.3, оп.23, д.200, л.60—62。

〔4〕米哈伊洛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年10月30，ЦХСД, ф.3, оп.64, д.485, л.2—3。

会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连锁反应。[1] 不过，就影响苏联二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而言，与毛泽东态度的转变相比，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次要的。在这一点，若干年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做出的结论是正确的。[2]

就在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穿梭游说的时候[3]，11月1日，米高扬回到莫斯科。他坚决反对马上采取军事行动，并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在目前的条件下，最好是支持现存的政府”，“不要与（匈牙利）军队闹翻”，“再等10—15天”，“局势一旦稳定下来，事情就会向最好的方面发展”。但是所有与会者都表示反对，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还特别强调：“中国人已经表明了我们不能撤军的意见。”会议决定维持31日的决议，对匈牙利实行占领。米高扬最后提出，“还有3天考虑的时间，同志们可以出出主意”，应该继续与纳吉政府保持接触。[4] 然而，一切都晚了。11月2日，朱可夫已经制定出再次攻占匈牙利的“旋风”战役计划，并得到主席团会议的批准。[5] 11月3日下午，在布达佩斯的50多名中国留学生接到通知，全部到使馆避难。[6] 当晚24时，由科涅夫元帅指挥的

〔1〕Kramer, “New Evidence on Soviet Decision-Making”, pp.370—371；《冷战阴影下的匈牙利事件》，第118—120页。

〔2〕1966年中情局的情报手册说：“10—11月匈牙利革命爆发，在中国人的敦促下，苏联人镇压了这场革命。” 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 CIA, “The Deterioration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1956—1966”, Intelligence Handbook, SC No. 02684/66, Apr. 22, 1966, CK3100443409, DDRS。

〔3〕除哥穆尔卡有些勉强外，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支持苏联出兵的决策。详见Békés,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Working Paper №16, 1996, CWIHP; Волков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c.510。关于赫鲁晓夫与铁托在布里俄尼岛会谈的详情见：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172—182页；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c.235。

〔4〕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录），1956年11月1日，ЦХСД, ф.3, оп.12, д.1006, л.19—22。

〔5〕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录），1956年11月2日，ЦХСД, ф.3, оп.12, д.1006, л.30。

〔6〕笔者2004年4月17日采访朱安康记录，朱安康于1954—1957年在布达佩斯罗兰大学文学院留学，1985—1989年任中国驻匈牙利大使。

12个师、总兵力达10万人的驻匈苏军已经全部完成了战斗准备。莫斯科时间11月4日晨6时，口令“霹雳”下达后，全面占领匈牙利的“旋风”战役开始了。[1]

波匈事件实际上是东欧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与苏联的矛盾和对斯大林模式不满的总爆发，而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就是苏共二十大以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应该说，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便逐步走上了希望变革的道路，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国内的社会压力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交织在一起，使几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看到了改变现状的紧迫性。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召开的苏联最高机构联席会议及其迫不及待的人事变动，充分说明了苏联未来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贝利亚在内务部实行的改革和针对柏林暴动提出的退让政策，马林科夫提出的加强农业发展的方针和对乌克兰问题的处理方式，莫洛托夫起草的解决朝鲜战争的新方案等等，都表明改革或改变斯大林的“既定方针”已经在各个方面悄悄兴起。尽管由于党内继承权斗争接连不断，使某些改革措施没有展开，但当这种斗争趋于平静以后，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感到改革已经是当务之急，而改革的前提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新认识，这就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必然出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然而，保守势力的存在，以及赫鲁晓夫本人的特性（性格暴躁多变，文化素养不高，缺乏政治经验）造成了这次改革的盲目性、随意性、急躁性和不彻底性。其政治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处理斯大林问题的不慎重、不稳妥的方式。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强烈反响，一方面推动了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进程，一方面也在共产党世界引起了困惑、不满和动荡。

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在处理东欧问题时便陷入了一种二律背反的两难境地。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路线，必然要求苏联在东欧国家解放和起用过去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非斯大林分子”，只有这样

---

〔1〕对苏联第二次出兵过程的详细描述见：Malashenko，“The Special Corps”，Györkei and Horváth（ed.），Soviet Military，pp. 244—266。

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步调一致。但是，所有这些东欧国家的新领导人同时又代表了一股反对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力量——这也是社会和民众的呼声，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阵营松散，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苏联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变革力量和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保守力量之间在政治路线上各有主张，而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却是利益一致的。尽管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倾向于和平解决匈牙利危机，但面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安全受到的威胁，他们也无法承担党内分裂的风险。所有这些因素就造成了苏联处理波兰和匈牙利危机时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前后矛盾的状况，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莫斯科需要北京的支持和帮助。

恰如毛泽东所说，对于苏共二十大，中国既支持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这个“盖子”，又担心批判斯大林的方式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甚至瓦解。由此出发，在处理波匈危机时，中共始终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方面是借批评斯大林的东风，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实行独立平等的原则，联合东欧国家一起扫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作风——对波兰危机的处理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这个原则。在这里，与其说是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波兰问题，不如说是中国借波兰危机迫使苏联承认以前的错误并发表了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平等宣言。另一个方面是调和苏东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团结和稳定，坚决排斥和打击一切有可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措施和倾向——对匈牙利危机的处理最明显地表现出这个原则。实际上，中共不仅在匈牙利危机的最后关头表示了强硬的态度，就是在处理波兰问题时也有这种担心。[1] 不少国外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赞成苏军进入波兰，却要求赫鲁晓夫改变原先的

〔1〕事情过去一年以后，刘少奇在与尤金大使会谈时说：当时的情况是严重的，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如果波兰同志不能应付这种情况的话，复辟是不可避免的。АВПРФ，ф.0100，оп.50，д.5，п.423，л.48，Б.Т.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178。

决定，出兵匈牙利？[1] 其答案就在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波兰反对的是苏联的大国主义，而匈牙利反对的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对前者举双手赞成，对后者则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不过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同莫斯科最初对波兰局势的判断失误一样，北京后来对匈牙利局势发展的判断也是错误的。纳吉本人及其政府固然在处理危机时缺乏远见，举措失当，但从来就没有背叛社会主义，至于后来脱离华沙条约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苏联武装干涉的做法逼出来的。

如果说到中国在波匈事件中的作用和影响，那么可以认为，放弃武装干涉波兰和第一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几乎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而在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不过，笔者更注意的，不是讨论在具体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苏联是否听从了中国的建议或主张，而是提出这样一个结论：恰恰是中国所强调的两个处理危机的原则在莫斯科的决策中得到了最终体现。与其说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危机，不如说毛泽东通过处理危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既批判了莫斯科的大国主义，又保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正是因为如此，波匈事件后中国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影响才会进一步扩大，声望才会显著提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有些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看法：在处理1956年秋天的危机中，赫鲁晓夫最关键的行动之一，是将中国带进了欧洲。[2] 开始介入东欧事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莫斯科在共产党世界的领导权则开始遇到了来自北京的挑战。

本章曾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其后中国外交部的相关档案全面开放，
故收入本书时在史料运用方面有较大改动。

〔1〕Edward Crankshaw, The New Cold War: Moscow v.Pekin,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Inc, 1963, pp.54.

〔2〕Crankshaw, The New Cold War, pp.53;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161—162.

第六章

# 周恩来穿梭外交：中国开始介入东欧事务



周恩来访问匈牙利时，与匈牙利政府人员交谈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一路攀升。到1960年代中苏同盟破裂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之前，中共已经从一个在莫斯科指挥下的支部成为与苏共并列的国际共运的领导者和理论权威。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引起局面发生如此变化的重大事件就是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还在中共即将执掌政权的时候，斯大林就与中共领导人达成了默契：苏共负责欧洲革命而中共领导亚洲革命。斯大林去世后，在国际共运中，首先是苏共新领导的个人领袖魅力大为减弱，接着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使苏共整体的领导形象黯然失色。与此相反，中共和毛泽东的地位则蒸蒸日上，其影响所至，不仅遍及亚洲，而且扩大到欧洲。一时间，在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中，悄然刮起了一股中国“旋风”。

中国“旋风”的具体体现，就是中共领导人的两篇文章和三次出访，即《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0月刘少奇和邓小平访问苏联，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苏、波、匈三国，以及11月毛泽东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两篇文章反映了中共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和水平，而三次访问则表现出中共领导人的领袖魅力和领导艺术。如果说刘少奇访苏是中共协助苏共处理欧洲问题的初步尝试，而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表现则证明中共已经与苏共并列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那么，周恩来的穿梭外交则成为连接这两者之间的重要桥梁，并为毛泽东的出访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和外交基础。

1957年1月7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三次会谈，同时与正在莫斯科的东德政府代表团及赶来的匈牙利领导人分别举行了会谈；11—16日周恩来率团访问波兰，与波兰领导人举行了4次正式会谈，与哥穆尔卡进行了两次单独谈话，还出席了几次群众大会并发表讲话；16—17日周恩来率团访问匈牙利，与匈牙利领导人举行了两次会谈，并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17—19日周恩来再次访苏，并与苏方继续会谈。在此期间周恩来还打算访问南斯拉夫，后未成行。显然，周恩来的这次穿梭外交，无论对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对中苏关系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具体材料的短缺，在以往中国、俄国和西方学者中，对这个问题都没有进行专门研究。现在情况不同了，从目前中、俄、波、匈各国公布的档案情况看，除中苏会谈记录至今尚未披露出来（只有摘要和概括性的转述[1]），主要的史料都已经问世。[2]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可以、也应该对中苏关系及国际共运中这次重要活动的历史过程及其结果进行较为详细的讨论了。

## 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动乱的余波

1956年10月，华沙危机尚未过去，布达佩斯便发生了街头动乱。苏军的第一次干涉不仅没有缓解局势，反而引起了匈牙利更大的反抗行动。在中国的建议和支持下，苏联决定再次使用武力解决问题。[3] 11月4日6时15分，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下令实施全面占领匈牙利的“旋风”行动。在华沙条约部队总司令科涅夫指挥下，苏军出

〔1〕据笔者了解，有关周恩来与苏方会谈的俄国档案尚未解密，而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的馆藏中则没有这些文件。

〔2〕笔者在目前发现的大量中、俄、波、匈四国档案中选编了部分内容刊登于《冷战国际史研究》第6辑（2008年夏季号）、第7辑（2008年冬季号）。

〔3〕详见本书第五章。

动了12个师（约15万人）和2000余辆坦克，全线进入匈牙利并重点攻占首都布达佩斯。在匈牙利军队放弃抵抗的情况下，苏军与武装的布达佩斯市民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巷战，终于以死亡和失踪720人的代价取得胜利。在行动开始前，苏联组建了以卡达尔·亚诺什为首的临时工农革命政府，并逮捕了正在苏军基地进行撤军谈判的匈牙利政府所有代表及主要军事领导人。11月11日，随着武装反抗者最后一个抵抗据点切佩尔枪声的停止，苏联以武力镇压动乱的军事行动结束。[1]这次经过周密策划的行动很快就取得了军事胜利，但是却带来了严重的政治余波。

苏联的军事行动首先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应，并掀起一股反苏、反共高潮。11月5日，艾森豪威尔致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对苏联在匈牙利的举动表示震惊，尤其是这次“动用军事力量对付匈牙利政府和人民竟然发生在贵方代表和匈牙利政府代表就撤走苏军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刻”。美国总统要求“苏联立即采取措施从匈牙利撤军，让匈牙利人民享有并实现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对所有民族都适用的人权和基本自由”。[2]西欧各国政府，包括中立的瑞士和奥地利，都发表声明或照会表示抗议。不少地方发生了有议员、大学校长及社会名流参加的示威游行，有的还包围和捣乱苏联使馆，甚至丢手榴弹。许多西方使节拒绝出席苏联国庆招待会，有的国家（如西德）甚至规定下半旗，有的国家（如瑞士）则提出要与苏联断绝外交关

〔1〕朱可夫关于苏军行动的报告，1956年11月4日，转引自Гобарев В. Хрущев и военные：историк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Manuscript i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room，c.39；谢罗夫致苏共中央电，1956年11月9日，朱可夫致苏共中央电，1956年11月9日、10日，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385—387、390、391页。关于战斗的详细情况还见：Мусатов В.Л.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г.：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1，c.18—22；Путилин Б.Г.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год 1956—й，c.277—278；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第128—131页。

〔2〕《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365—366页。

系。西欧主要共产党的机构和活动场所遭到袭击，有的政府（如奥地利）还要以叛国罪起诉共产党。[1] 苏联在国际舞台孑然一身的典型事例出现在挪威，苏联使馆为举办一次盛大的国庆招待会，发出几百张请柬，但出席者只有十几人；驻在国外交部只有礼宾司司长一人出席，而且与迎宾主人握手后转身就走了，使苏联大使十分难堪。[2] 在联合国召开的一系列有关匈牙利问题的会议上，苏联代表始终处于"被告"的席位，而不得不接连对所有的议案投反对票，处境十分孤立和被动。[3]

很多战后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对苏联的行为不满，并把苏军在匈牙利行动与英法入侵埃及相提并论。11月14日，印度、缅甸、印尼和锡兰联合发表外交部长声明，对在埃及和匈牙利发生的以强凌弱的事件表示不安、痛心和强烈不满，要求苏联军队"尽快从匈牙利撤出"，以便匈牙利人民有充分的权利"自己解决自己的未来和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组建自己所希望的政府"。这些国家在联合国讨论匈牙利问题时"所持的观点整体上是对苏联不友善的"，有的（如缅甸）甚至主张通过联合国对苏联采取制裁措施。[4]

波匈事件发生后，在社会主义各国流言四起，谣传不断，并引发了对苏联行为的种种猜疑、不满和反对。据新华社的看法，在波

---

〔1〕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年11月6日，ЦХСД, ф.5, оп.28, д.382, л.163—166；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1月17日，第411—413页。

〔2〕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7—38页。

〔3〕《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0日第3版，11月11日第6版，12月6日第5版，12月12日第6版，1957年1月11日第5版。

〔4〕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的报告，1956年12月28日，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3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04年，未刊，第528—536页。有意思的是，情报委员会注意到：此期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都不错，在匈牙利局势危急的时刻，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总理吴努访华证明了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

兰问题上，与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比较，罗、保、阿的做法有所保留；在苏联出兵匈牙利的问题上，除波兰外，其他东欧国家都表示支持，但谈的不多，罗马尼亚直到11月下旬才直接表态；在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方面也有分歧，保、阿紧跟苏联，罗、南则一直保持平静交往。[1]

欧洲卫星国的情况还算不错，最令莫斯科头疼的是贝尔格莱德态度的变化及苏南关系呈现出的紧张状态。关于使用武力镇压的问题，在11月2—3日布里俄尼岛会谈时，尽管有所保留，铁托还是表示赞同赫鲁晓夫的观点：纳吉实际上为“反革命”扫清了道路，“社会主义成果”受到威胁，因此，苏联的武装干涉是必要的。赫鲁晓夫则接受了铁托的建议，由卡达尔出任匈牙利新政府首脑，取代莫斯科最初挑选的明尼赫。为了使政权尽可能平稳交接，南斯拉夫人允诺劝说纳吉主动放弃权力。然而，11月4日苏军进攻后，纳吉不仅没有辞职，还发表声明谴责苏联的举动，并率领政府成员躲进南斯拉夫使馆，请求政治避难。这令南斯拉夫的处境极为尴尬和微妙，铁托只得一方面向苏联通报，将竭力对纳吉施加影响，使其撤销自己的声明，并表明支持卡达尔政府的立场；一方面指示使馆劝说纳吉，并限制他们的活动。但苏联领导人答复说，鉴于纳吉政府已被取缔，而卡达尔政府也已宣布成立，纳吉的声明就不再需要了。赫鲁晓夫还建议并催促铁托，将纳吉等人交给苏联军队，再由苏联军队交给卡达尔政府。11月8日，铁托致函赫鲁晓夫，竭力说明为了保持自己的声誉，南斯拉夫不能交出纳吉等人，而建议寻找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包括采取赦免的方式。[2]当卡达尔准备与南斯拉夫就处理纳吉等人的问题达成协

〔1〕《内部参考》，1956年12月26日第2088期，第571—577页。

〔2〕有关档案见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8, с.524—533、582、585、587—588、595—596、608—611、622—625，并参见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Н.С. Хрущев, Й. 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1, с.23—25。

议时，11月9日莫斯科表示了绝对不许将纳吉交由南斯拉夫人处理的坚决态度。莫斯科要安德洛波夫大使转告卡达尔："关于纳吉·伊姆雷的问题已成为我们和南斯拉夫同志争论的问题，是重大的原则问题，涉及到匈牙利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根本利益。……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我们应当表现出坚定性和原则性。"〔1〕11日，南斯拉夫拒绝了苏联关于让铁托等人去罗马尼亚的建议，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两个办法：或者让纳吉等人留在匈牙利，但前提是卡达尔要发表声明，公开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或者让纳吉政府的成员到南斯拉夫去避难。〔2〕或许是为了向莫斯科施加压力，同一天，铁托发表了著名的普拉演说。铁托公开指责苏联对匈牙利的"第一次干涉是没有必要的"，"是绝对错误的"，而称第二次出兵是一场"悲剧"。讲演还批评了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斯大林分子"。〔3〕

铁托的讲话，特别是关于"斯大林分子"的说法和提到赫鲁晓夫时没有使用"同志"二字，激怒了赫鲁晓夫。〔4〕莫斯科决心甩开南斯拉夫，独自行动。就在南、匈两国政府反复谈判解决纳吉等人的处理问题期间，苏联于11月17日决定，一旦纳吉离开南使馆即对其实施逮捕并送往罗马尼亚，卡达尔接受了这个方案。〔5〕21日，匈牙利与南斯拉夫签署协议，同意对纳吉等人的安全做出书面保证。〔6〕22日傍晚，纳吉等人在南使馆人员的劝说和陪同下走出使馆，却被守候在

〔1〕苏联外交部致安德罗波夫电，1956年11月9日，АПРФ，ф.3，оп.64，д.486，л.39—42，中译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382—384页。

〔2〕苏斯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致苏共中央电，1956年11月12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01—403页。

〔3〕《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2日第6版。

〔4〕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207—209页。

〔5〕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с.656—657、667—668、669、676—677.

〔6〕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с.679—682.

门外的苏联军人强行带走。[1]尽管南斯拉夫提出了抗议，但莫斯科声称这是匈牙利的内部事务，不再理睬。[2]随后一段时间，苏南开始在各自的报刊上互相指责，批评对方。最令苏联人不能容忍的是12月7日南共第二号人物卡德尔发表的演说，声称："匈牙利事件是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悲剧"；"当匈牙利社会处于这样深刻的内部危机的时候，苏联的干涉根本起不了决定作用。这次干涉不是错误的开始，而是错误的结果"。[3]卡达尔政府的一些做法，也开始受到贝尔格莱德的指责和讥讽。[4]1955年刚刚缓和的苏南关系，再次进入冰点。

波兰与苏联的历史宿怨甚深，特别是苏德秘密条约签订后苏联对波兰的进攻，大规模坑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事件被披露，以及苏军在华沙起义时作壁上观，任凭德军剿灭起义者的表现，波兰人对这一切记忆犹新。在十月危机中，苏军兵临华沙城下，试图干涉波党选举的行为，更引起了波兰干部和群众的强烈反抗。赫鲁晓夫虽然平静地离开了华沙，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匈牙利事件再次激发了波兰人的反苏情绪。大多数人都认为苏联第一次出兵是完全错误的，对于第二次出兵，也有很多人认为除加重流血外恐无济于事，这样做就是把"匈的社会主义建筑在刺刀和坦克的支持上"。报刊上指责苏联的

---

〔1〕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с.668—675、676—677. 卡达尔没有向中国透露处理纳吉问题的实情。见郝德青与卡达尔谈话记录，1956年11月2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33—02，第31—38页。

〔2〕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с.698、721—724；《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21—423页；《赫格居斯回忆录》，第320页；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219—220页；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Н.С. Хрущев，Й. 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1，с.26。

〔3〕《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1日第5版，12月24日第6版，12月25日第6版；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244—245页。

〔4〕苏欧司关于匈牙利近况的简报，1956年12月2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194—03，第31—37页。

文章和报道层出不穷，波兰群众的反苏倾向在日常生活中也能体现出来：订机票、买东西时如讲俄文就没人搭理。波兰官方对卡达尔政府迟迟不表态，报刊上亦无评论，《人民日报》、《真理报》关于匈问题的社论和评论均未见转载。这种不满也反映在实际行动中，波兰军队开始大规模进行高级将领的人事变动，以波兰军官取代了原来就职的苏联军人。[1]

在社会主义各国，中共领导人无疑是莫斯科最坚定的支持者。然而，中国社会对苏联出兵问题也是一片反对声，中共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乃至普通工人和市民都表示疑问和担心。有人认为，“苏联出兵镇压叛乱是个很大的错误”，“匈牙利事件苏联要负全部责任”；有人认为，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干涉内政，是不智之举”，是“大国主义”的表现，“是把小国当作自己的支部”；也有人指出，各国人民有选择社会制度的自由，华沙条约是对付北约的，对付外来侵略的，而不是用来对付内乱的。[2] 甚至在《人民日报》文章发表后，党内和干部中仍有许多不同意见：“援助和干涉仅是字面问题”，“派军队到别国领土去是不正常的事”；“从法律上讲苏联出兵是干涉匈牙利”；“联合国派观察员到匈牙利去为什么不可以？”。还有不少干部表示赞同南斯拉夫的观点和立场，认为铁托和卡德尔的讲话比较有道理，说他们是修正主义不能服人。[3]

苏联政府处理匈牙利事件的做法及其结果在国内也遇到了质疑，并加剧了苏共党内本来就存在的分歧。在苏联采取军事行动当天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明显地形成了以赫鲁晓夫为首和以莫洛托

〔1〕驻波使馆致外交部电、谢文清致外交部并转新华社电，1956年11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第92—93、96—99页。

〔2〕《内部参考》，1956年11月5日第2043期，第127—129、134—142、143—144页；1956年11月6日第2044期，第167—168页；1956年11月19日第2055期，第456—457页；1956年12月12日第2076期，第244—245页。

〔3〕上海市档案馆，A22—2—555，第23—26、31—34张。

夫为首的两派，并发生了争吵。赫鲁晓夫等人赞同卡达尔关于成立新政府的声明，而莫洛托夫却不同意公开谴责“拉科西—格罗集团”，认为“匈牙利正在走南斯拉夫的道路”。[1] 11月6日的主席团会议继续进行辩论，而且更加激烈。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观点受到批评，会议通过了支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呼吁书的决议。[2] 早在二十大前后，苏共领导层就在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赫鲁晓夫趋向激进，莫洛托夫倾向保守。秘密报告引起的苏联乃至社会主义阵营思想混乱，使得赫鲁晓夫陷入被动，并导致某种政策性回归。[3] 波匈事件的发生则是对赫鲁晓夫一派的更大冲击。莫洛托夫对拉科西和格罗情有独钟，而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曾寄希望于纳吉政府。[4] 结果，拉科西等人只是犯有“严重错误”，纳吉却走向了“反革命”，局面对赫鲁晓夫更加不利。赫鲁晓夫希望推出卡达尔的新政府控制匈牙利局势，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右边有南斯拉夫支持的纳吉拒不退让，左边有莫洛托夫支持的拉科西跃跃欲试，再加上国内知识阶层和青年学生在反对“个人崇拜”浪潮中发泄出来的对苏联制度的不满，赫鲁晓夫政权的合理性危机已经显而易见。如果说决心与南斯拉夫翻脸，采用背信弃义的极端手段处理纳吉等人，是赫鲁晓夫在外交领域不得不做出的让步，那么，苏共中央主席团12月19日就《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和制止反苏维埃敌对分子的攻击行动的信函》做出的决议，则表明赫鲁晓夫在政治领域也只能屈从于莫洛托夫等人的强硬主张了。信函指出，最近，在莫斯科等城市“出现了公开反对苏维埃、充满民族主义思想

---

〔1〕ЦХСД, ф.3, оп.12, д.1006, л.34—36 о 6 , 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с.583—587.

〔2〕ЦХСД, ф.3, оп.12, д.1006, л.41—45, 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с.600—604.

〔3〕详见本书第二章。

〔4〕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с.632—636.

的演说”，“在学生中流传着充满反苏内容的传单”。这些言论“千方百计地煽动民族纠纷，赞扬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行动”，因此必须实行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1] 此后，逮捕和审判的浪头汹涌而来，仅在1957年最初的几个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数百人。[2] 有研究者指出，“事件的这种转折，迫使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不得不面对选择：或者承认自己的失败，彻底放弃改革；或者根除保守势力，至少是在上层领导中”。[3] 联想不久后克里姆林宫发生的六月事变，此话颇有道理。[4]

到10月底，随着莫斯科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关系宣言的发表，波兰危机在中共的干预下算是平息了，但哥穆尔卡上台后的日子并不好过。

在苏联卫星国中，波兰是纳吉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后，赫鲁晓夫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服波兰。11月1日在布列斯特，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与哥穆尔卡、西伦凯维茨和奥哈布举行了会谈。目前尚未发现这次会谈的记录，不过从当天布列斯特发回的电报及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可以断定，哥穆尔卡对苏联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匈牙利问题“是内部事情，不应该干涉”。但他承认匈牙利存在“反革命势力抬头”的危险，并同意不公开反对苏联出

---

〔1〕РГАНИ，ф.3，оп.14，д.88，л.54；РГАНИ，ф.89，оп.6，д.2，л.1—13，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с.393—401.

〔2〕Наумов В.П.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7，№ 4. с.33；Наумов В.П. Борьба Н.С.Хруще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с.17—18.

〔3〕Соколов А.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41—1991г.，Москва：Высшая школа，1999，с.203—204.

〔4〕关于这次事变的详情，参见本书第九章。

兵。[1] 11月2日一早，波党机关报《人民论坛报》便发表了告波兰人民书："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在匈牙利捍卫和坚持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成果的问题可由国内力量——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匈牙利人民去解决，而不应是外来干涉"。[2] 同一天，波兰驻苏大使会见苏联副外长佐林，坚持要求说明苏军进入匈牙利领土的情况。[3] 11月3日晚，波兰驻匈大使向郝德青通报了他刚结束的与纳吉的谈话内容，并建议中国党最好也能派负责同志前来了解情况，施加影响，提些建议，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4] 这些情况都表明，华沙实际上反对苏联的军事行动。

苏联出兵后，波兰政府的立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显得十分孤立和尴尬。最初，外长拉帕茨基还向中国大使表示波兰愿意帮助卡达尔政府与纳吉建立联系，并承认"在匈牙利问题上波兰内部有一定困难"。[5] 随着局势的变化，华沙的态度也不得不有所改变。[6] 但是，在苏联和中国看来，波兰的立场始终有问题。苏联认为，受到

---

〔1〕ЦХСД，ф.3，оп.12，д.1005，л.66，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с.510、529—534；Орехов А.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Р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с.235；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Н.С. Хрущев，Й. 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1，с.21.

〔2〕Trybuna Ludu，2.XI.1956，转引自Орехов А.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с.236—237。

〔3〕佐林与列维科夫斯基会谈纪要，1956年11月2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340—341页。

〔4〕波兰驻匈大使与郝德青谈话记录手稿，1956年11月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35—02，第28—31页。

〔5〕王炳南致外交部并中央电，1956年11月1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28—04，第74—75页。

〔6〕如提出纳吉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是离开南斯拉夫使馆和放弃原来的纲领。见郝德青与波兰驻匈大使谈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35—02，第37页。波诺马连科也看到了这一点。见王炳南与苏联驻波大使谈话记要，1957年1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2，第119—120页。

“党内健康势力的影响，哥穆尔卡不能不走向正确道路”。但波兰党内意见有分歧，萨瓦茨基、奥哈布等人是左派（对苏友好），萨姆布罗夫斯基、莫拉夫斯基是右派（倾向南斯拉夫），拉帕茨基、西伦凯维茨以前是社会党人，还有过去的残余思想。所以，整个波兰党，特别是基层组织，非常薄弱。[1] 中国认为，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新领导得到群众拥护，坚持有波兰特点的社会主义，总体是好的。但是“在思想上和对外政策上明显地有着民族主义倾向”，如对苏不满情绪尚未平息，至今还有反苏游行；在匈牙利问题上基本上支持纳吉，很多观点与南斯拉夫一致，在联合国有关匈牙利问题的投票中，竟然两次与南斯拉夫一样投弃权票。在对内政策上则片面强调民主化，忽略阶级斗争。总之，波兰的形势是“表面平稳，内在紧张”。[2]

面对在民主化浪潮中来临的波兰议会选举，更令人有一种雪上加霜的感觉。这次选举与过去最大的区别是候选人不再由中央提名，而是改由地方提名。结果很多老干部、老党员因被看做“斯大林主义者”不在候选人之列，而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很多青年人成为候选人。此外，近期经济情况不好自然也会影响选举。所以，波党领导人十分担心，感到“选举结果，目前尚难预测”。尽管在议会席位分配上统一工人党超过半数，但认为“面临的情况是复杂的，必须进行严重斗争”。[3] 新华社记者也认为，在议会候选人中，统一工人党的绝对数字和百分比均有所下降，而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反动力量和教会力量都很活跃。因此，这次选举的结果不容乐观。[4] 波兰究竟向何

---

〔1〕王炳南与苏联驻波大使谈话记要、余湛与苏联驻波使馆参赞谈话记要，1957年1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2，第119—120、120—123页。

〔2〕驻波使馆致外交部电，1956年12月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1，第1—6页。

〔3〕王炳南与波兰国务委员会秘书谈话记要、余湛与波外交部第五司长谈话记要，1956年12月21日，109—01141—02，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第107—109、109—110页。

〔4〕《内部参考》，1956年12月30日第2092期，第698页。

处去，是否会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前途堪忧。

最大的危险和困难还在匈牙利。由苏联一手扶植的卡达尔及其政府成员虽然乘苏联装甲车进入了布达佩斯，但面对混乱和危局却显得一筹莫展，力不从心。[1] 新政权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

苏联再次出兵一个星期后，匈牙利中心城市的武装抵抗基本结束。据克格勃主席谢罗夫19日报告，安全机关已拘留4700人（其中逮捕1400人），缴获机枪1228挺，其他射击武器178660支，手榴弹63460枚。但局势仍然不稳定，许多企业没有开工，集会还在继续进行。[2] 反抗力量“从公开转入隐蔽，从军事斗争转入政治斗争，继续在群众中进行活动”，他们“制造谣言、散发传单、放冷枪、阻止复工、煽动罢工”，还鼓动群众提出“撤退苏军、宣布中立、自由选举、新闻自由、恢复纳吉职位以及成立全国和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等要求”。直到12月8日，因工人委员会被解散，在几个大城市还发生了示威集会和流血事件，12—13日又发起了全国性大罢工。[3] 在苏联和中国看来，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卡达尔政府软弱无力，不敢斗争，对敌人“放纵”，对落后群众“过于迁就”；一是党组织瘫痪，“在群众中的联系和影响已丧失殆尽”。[4]

---

〔1〕Путилин Б.Г.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год 1956—й，с.278.

〔2〕ЦХСД，ф.89，п е р.45，д.48；АПРФ，ф.3，оп.64，д.487，л.107—110，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с.661—665

〔3〕苏欧司关于匈牙利近况的简报，1956年12月2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194—03，第31—37页；1956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第5版。

〔4〕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с.564—565、638—640、647—649。驻匈使馆致外交部并中央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2—01，第24—28页。罗马尼亚驻匈大使与郝德青谈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35—02，第34—36页。卡达尔掌权后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改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引起了组织上的混乱。苏共中央主席团为此发生了激烈争论，但最后表示支持。见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6年11月6日，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41—45，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с.600—604。

对新政权的威胁不仅来自社会上的不满和反抗。纳吉虽已躲进南斯拉夫使馆，其政府也已垮台，但他们的影响和群众基础仍然存在。据匈官员反映，布达佩斯的枪声停止后，主要问题就是“大部分人民不承认卡达尔政府，反对苏联，要求纳吉重新上台”。[1] 就连驻布达佩斯的中国记者都认为，“纳吉出来参加新政府作为领导人之一的可能性很大”。[2] 即使在纳吉等人被秘密拘捕以后，社会上同情和推崇纳吉的还大有人在，以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的决议中谈到事件的起因时，把拉科西—格罗集团的错误作为首要的“决定性”因素，认为“霍尔蒂法西斯和匈牙利资本主义—地主反革命是基本因素”，国际帝国主义“起了决定性的和主要的作用”，而对“党内反对派”纳吉等人的定位只是“对十月事件的发生及其悲剧性转折起了重要作用”。[3] 显然，作为纳吉昔日的搭档和朋友，卡达尔尽管在暗地里同意了苏联的强硬措施，但是在匈牙利社会面前还不得不顾及群众的情绪和自己的声誉。

比起纳吉，卡达尔更担心来自左翼的拉科西及其支持者的威胁。卡达尔之前的两位匈党第一书记拉科西和格罗被迫离职后，都相继“退休”到苏联疗养，但他们的政治热情丝毫没有减退，特别是在纳吉已经败落而卡达尔陷入困境的时候。拉科西一直不信任卡达尔，认

---

〔1〕胡济邦致外交部并人民日报社电，1956年11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2—01，第57页。

〔2〕驻匈使馆致外交部转新华社电，1956年11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2—01，第54—55页。

〔3〕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决议，1956年12月5日，Csaba Békés，Malcolm Byrne，and Janos Rainer（ed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A History in Documents，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2，pp.460—463，参见雷尼·彼得编：《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经过和历史教训》，赵平生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页。

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对他的执政耿耿于怀。[1] 12月15日，拉科西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长信，指责“目前党的领导成员绝大多数是不坚定分子或纳吉·伊姆雷的支持者”，并对卡达尔的“右倾”错误提出了严厉批评。[2] 由于没有得到答复，1957年1月9日拉科西再次致函赫鲁晓夫，指出匈牙利的情况是“表面向前迈进，暗中向后退步”，反革命正在悄悄复辟，而卡达尔的新党“没有能力完成所提出的任务”。拉科西引用大量证据说明，只有尽快起用他们这些（特别说明不包括他本人）被免职的党员干部，才能挽救匈牙利的局势。第二天，同样在苏联“休养”的前布达佩斯市委书记科瓦奇的长信，更加明确地表示希望早日恢复工作。[3]

在国际社会中，匈牙利新政权的处境也十分不妙。在1956年11—12月期间，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做出了一系列决议，谴责苏联的“侵略行为”，呼吁苏军撤出匈牙利，要求允许向匈牙利派出联合国组织的观察员等。有的国家（意大利）代表打算就派遣“联合国警察部队”到匈牙利提出议案，还有的国家（古巴）甚至主张取消匈牙利的联合国成员国资格。[4] 不仅如此，据苏联的情报，很多匈牙利驻外使节和军事代表在苏联干涉的最初一个时期都举行了示威活动，表示对纳吉政府的支持。有的打碎国徽，撕毁国旗，还有的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试图与西方代表建立联系。[5]

---

〔1〕匈驻华临时代办沙尔致外交部报告，1956年12月27日，MOL XIX—J—1—j，Szobolevszki Sándor，Magyar—Kínai Kapcsolatok 1956—1959，Dokumentumok，Budapest：MTA Jelenkor—kutató Bizottság，2001，o.99—106。

〔2〕А П Р Ф，ф.3，оп.64，д.490，л.38—46，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с.745—752.

〔3〕《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34—443、444—454页。

〔4〕《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0日第3版，11月11日第6版，12月6日第5版，12月12日第6版。

〔5〕苏共中央致安德罗波夫电，1956年11月12日，АПРФ，ф.3，оп.64，д.484，л.108—109，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с.641—643.

此外，令卡达尔政府头疼的还有经济问题。动乱和军事给匈牙利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直接遭受炮火破坏的损失达50亿—60亿福林，间接损失在11月底已达110亿福林。由于企业停产，交通中断，以及持续不断的罢工，匈牙利1956年11月的工业产值只是同年前三个季度月平均产值的10%，12月也才到24%。全国消费品储备已从140亿福林降低到60亿福林。[1]

总之，在危机和动乱发生两个月后，主要当事国苏联、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都仍然处在困难或危险之中，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的阵地受到动摇。这时，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中国。

## 周恩来三国之行急需解决的问题

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机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2]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越来越引起苏联和东欧的注意。《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国国内开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和中共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和关注。

在波兰各界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诸问题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人们在争论不休时往往说：等着听毛泽东的见解吧！[3] 《人民日报》文章在《真理报》转载后，引起苏联普通读者的极大兴趣，“一般的反应都很好”。人

---

〔1〕苏欧司关于匈牙利近况的简报，1956年12月2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194—03，第31—37页；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c.563。

〔2〕《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99—600页。

〔3〕《内部参考》，1956年3月5日第1817期，第17—19页。

们普遍认为“这篇文章有说服力，写得公平，分析得全面深刻，把问题说清楚了”。苏联官方则“准备把全文重新翻译一次，与苏共的文件一起编入一个供全党学习的小册子”。[1] 匈牙利新闻界也一致认为，“这是一篇原则性很强的文章，从头到尾每一句话都有其实际内容，它是一个哲学著作，但是又很容易理解”，对匈人民“是有教育意义的”。[2] 中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理论权威地位普遍得到认可，以至在波兰有人因不了解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的几个论点而未能通过哲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考试。[3] 毛泽东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波兰受到极大欢迎，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干部中间，简直是家喻户晓。[4] 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则真诚地接受了这样的信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口号是中共领导人意图的真实反映。这在匈牙利社会激起了广泛的亲华热情和同情心，在匈牙利发生危机时，大部分市民都渴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人们在布达佩斯街头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和我们站在一起”。[5] 中共八大文件传播后，更加引起关注。匈牙利驻苏大使称：中共八大提出了许多新的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匈党对此很有兴趣，十分重视。布达佩斯市委书记说，八大文件中很多东西值得匈牙利学习、研究，特别是中国党成功地把广泛的民主与坚强的集中领导相结合。应当学习中国党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

---

〔1〕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发王甫对苏联若干情况的报告，1956年4月25日，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第101张。不久，《真理报》出版社确实在对该文进行准确校对后印成了小册子，发行20万册。见《人民日报》1956年7月6日第6版。

〔2〕驻匈使馆致外交部并中央电，1956年4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0—01，第17—18页。

〔3〕《内部参考》，1956年6月28日第1919期，第719—720页。

〔4〕《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4日第2033期，第1209—1210页；1957年5月7日第2211期，第26—27页。另见2004年4月17日笔者采访骆亦粟记录。

〔5〕János Rádvanyi,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Hundreds Flowers Campaign, The China Quarterly, №43, Jul.—Sep. 1970, pp.122.

又能广泛团结全国人民各阶层的经验。[1]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共的态度便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关注的中心。

在苏联出兵问题上，中共的理论和思想准备确实远远高于莫斯科。11月3日、4日、5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篇社论，详细论证了苏联行为的合理性，明确表示支持苏联出兵和匈牙利新政权。5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关于匈牙利事件，要求各单位"拟定统一提纲，有领导地、广泛地向所有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宣传解释"。[2] 同一天，周恩来亲自出面做工作：一方面向印度大使解释出兵匈牙利的理由，为苏联辩护；一方面向波兰大使宣布中共中央的立场和态度，希望波兰支持苏联，支持匈牙利新政府。[3] 6日，周恩来致函卡达尔，祝贺他组成新政府，并控制了匈牙利局面，还宣布向匈政府赠送价值3000万卢布的物资和现金。[4] 这些表现使苏联和匈牙利不得不心存感激。[5]

针对西方世界的攻击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思想混乱，11月14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强调苏联根据华沙条约和匈牙利邀请的出兵行动是"正义"的，呼吁社会主义各国在这次"惊涛骇浪"的斗争中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清醒头脑"，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6] 15日，刘少奇在接见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时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波匈事件的性质不同，"波兰问题是革命内部的问题；匈牙利问题却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因此，对波兰不能用兵而对匈

〔1〕《内部参考》，1956年10月8日第2013期，第820—822页。

〔2〕中宣部关于匈牙利事件的宣传通知，1956年11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2—01，第7—8页。

〔3〕周恩来接见尼赫鲁谈话记要、周恩来接见波基里洛克谈话记要，1956年11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327—12，第1—18页；109—01017—17，第166—169页。

〔4〕周恩来致卡达尔函，1956年11月6），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5—02，第4页。

〔5〕《内部参考》，1956年11月22日第2058期，第524—525页。

〔6〕《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4日第1版。

牙利必须动武。[1] 这样的划分，对苏联既是批评又是解脱，对波兰既是警告又是保护，甚至南斯拉夫也能从批评“大国主义”的言词中找到安慰。这些做法足显中共的高明之处，也为北京赢得了更多的信任。难怪冷眼旁观的美国情报官员会认为，中共观点对东欧“影响的程度可能超出了北平自身的预料”。他们还特别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莫斯科开始带头赞扬中国共产党的创举”。11月18日在莫斯科波兰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指出，有关“苏联、中国、波兰和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到底谁的经验更好”这一争论，不会促进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但是，如果一定要他做出“个人”选择的话，他更为欣赏“我们的中国同志所体现出来的智慧。他们以独到的方式，创造性地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2]

如此看来，无论从感情、理念还是威望的角度讲，社会主义欧洲遇到危难时，自然要求救于这个远在东方的亚洲国家了。

其实，苏联在出兵后不久便萌生了请中国出面协调和帮助的念头，米高扬就曾谈到：中国在处理波匈事件中起了很大作用，发生了很好的影响。[3] 确如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米丘诺维奇所言，自出现危机以来，莫斯科十分强调甚至美化自己得到了中国的支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对俄国人的支持事实上是唯一有意义的支持”。[4]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11月29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口头转达赫鲁晓夫的意见，希望正在阿富汗的周恩来能在结束访问后到莫斯科一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商议后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周恩来到

〔1〕刘少奇接见保驻华大使谈话记要，1956年11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9—05，第1—9页。

〔2〕国务院情报研究署关于北平对共产主义阵营看法的情报报告，1956年12月3日，MF2510408—0717，Main Library，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详见驻匈使馆致外交部并中央电，1956年11月10日、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2—01，第24—28、53页；刘晓致中共中央电，1956年11月28日，福建省档案馆，101/5/819，第1—4页。

〔4〕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219页。

苏联作正式访问是有必要的。[1] 12月3日周恩来回电，同意在访印度后直接去苏。[2]

与赫鲁晓夫传出口信的同一天，哥穆尔卡也提出了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波的要求，而且眼光更高——希望毛泽东访波。[3] 波兰十月危机期间，中国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华沙说话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受到波兰人的信任和依赖。[4] 12月3日毛泽东接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告诉他可以接受邀请，但时间要推迟。因为要前往波兰而不在莫斯科停留是不可能的，而出于外交惯例的考虑，毛泽东又不便在莫斯科停留。波兰大使强调了中国领导人在大选前访波的重要意义后，毛泽东建议可邀请周恩来于1月10日前后访波，基里洛克认为是个好主意。第二天，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说明了波兰邀请访问的情况，并表示中央认为有必要去"帮他们一手"。[5] 12月7日，波兰发出正式邀请。[6] 经协商，确定周恩来于1957年1月11日访苏后赴波，作为时5天的访问，16日离波。[7] 但12月16日毛泽东又来电话，要周恩来12月底先回北京，几日后再访问苏、波。[8] 12月23日新华社发布了周

---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250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1274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44页。

〔3〕萨瓦茨基、哥穆尔卡致毛泽东函，1956年11月2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804—01，第1—2页。

〔4〕详见沈志华、李丹慧：《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3期，第45—58页。

〔5〕基里洛克致拉帕茨基电，1956年12月4日，Andrzej Werblan，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Dzis"，1996r，nr10，s.126—128；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电，1956年12月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805—01，第7—8页。所谓外交惯例，指的是毛泽东曾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访苏，应在苏联元首访华后，再行访苏。1957年4月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后，毛泽东于11月访苏。

〔6〕西伦凯维兹、拉帕茨基致周恩来电，1956年12月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805—01，第1—2页。

〔7〕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电、外交部致周恩来电、外交部致王炳南电，1956年12月8日、1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805—01，第9、10、11页。

〔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47页。

恩来将于1957年1月初访苏的消息。[1]

此前，匈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沙尔曾向政府建议邀请周恩来访匈，闻知周恩来将访苏联后又表示将建议匈政府派代表到莫斯科同周恩来会晤。[2]据匈牙利档案，12月27日，沙尔以私人名义致函副外长塞拜什，提出邀请周恩来访匈的问题。沙尔认为，周恩来在此时访问布达佩斯“具有无比巨大的外交和内政意义，其效果远比政府的某一位领导人前去华沙或莫斯科向他介绍情况要好得多”。在沙尔看来，争取周恩来的访问对匈牙利来讲可谓一举多得：在亚洲提高卡达尔政府的威望，减轻匈牙利在联合国受到的压力，帮助协调苏匈关系，让中国详细了解匈牙利的情况和困难，或许还可以得到一定的经济援助。[3] 第二天，卡达尔请求苏联与周恩来商议，希望他访问波兰时顺道访问匈牙利。[4] 30日，匈牙利使馆正式向中国提出邀请周恩来访匈的要求，表示“即使在匈逗留一天，对匈也是很大的支持”。1957年1月8日在莫斯科最后确定，周恩来在访苏波后于1月16日率领代表团访匈一天。[5]

周恩来三国之行所承担的责任就是稳定东欧的局势，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斗争中的地位。从上述东欧危机的复杂影响和后果看，要达到这些目标，具体的途径是通过协商和沟通，与苏联形成一致意见，说服波兰和匈牙利，从而弥合

〔1〕《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4日第1版。值得提到的是，笔者在外交部档案馆没有发现苏联的正式邀请函。如果确实没有发出邀请，此事还是颇有意味的。

〔2〕苏欧司关于中匈关系简况的报告，1956年12月2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194—03，第27—30页。

〔3〕沙尔给塞拜什的信，1956年12月27日，MOL XIX—J—1—j，Szobolevszki Sándor，Magyar—Kínai Kapcsolatok 1956—1959，o.107—110。

〔4〕拜科夫致苏共中央电，1956年12月28日，APRF，f.3，op.64，d.490，pp.76—77，Csaba Békés et.（ed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pp.485—486。

〔5〕张闻天接见匈驻华代办沙尔会谈话记录，1956年12月30日，外交部致驻匈使馆电，1957年1月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023—01，第3—5、6页。

苏波分歧，加强苏匈关系，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整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完成这些任务的前提是中苏意见统一且精诚合作。苏共二十大召开，特别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流传以后，中共虽有一些不同意见（主要是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但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中苏关系总体趋势是更加友好和密切。[1] 1956年正值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中苏签订了11个重要协定，中国赴苏代表团、考察团共95个（1242人），苏联访华代表团、考察团共77个（762人）；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项目从156项增加到211项；中国派赴苏联学习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共1836人，而在华苏联专家和顾问达3113人。[2] 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密切往来的同时，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协调、合作也十分紧密[3]，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前述中国在匈牙利问题上对莫斯科的强力支持。莫斯科的感激和亲密之情在彭真11月访苏期间表现得特别充分：不仅对代表团高度赞扬，破格接待，热情宣传，而且表现得非常谦虚。赫鲁晓夫一再强调苏联党在过去工作中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希望中国同志能坦率地提出意见和批评，并一再强调要向中国党学习。[4] 彭真报告说，苏联“从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都十分重视中苏团结”，认为中国坚持十月革命道路的提法“是对他们的支持”。对于中国提出的社会主义阵营“以

---

〔1〕对这一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本书第二章。

〔2〕《人民日报》1957年1月20日第4版；谢皮洛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1月4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1卷，第2810—2813页。有关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详细情况可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Филатов Л.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1949—1966）//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1995，№65。

〔3〕详见苏欧司关于最近苏联国内外和中苏关系中的一些主要情况的报告，1956年12月24日，中国外部档案馆，109—00788—01，第1—8页。

〔4〕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6年12月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01—01，第46—49页。

苏联为首”的说法，苏联领导人内心普遍感到满意，并提出“以中苏为首”的说法，不仅一般干部，“连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等同志也这样说”。[1]

值得注意的是，仔细领会波匈事件教训的毛泽东，此刻已经改变了对苏共二十大的看法。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过渡”、议会道路，就是丢掉阶级斗争，放弃十月革命；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毛泽东甚至从原则上做出了否定性判断——苏共二十大搞得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2]应该说，毛泽东正是从这时起开始反对苏共二十大路线的。但是，毛泽东同时又深知：“中苏关系必须搞好，对于苏联为首的领导地位，不能发生动摇，否则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是很不利的。应该肯定：苏联总的方面是好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必须以苏联为首。对于这一点必须向党内外加强教育，很好地讲清楚。”[3]毛泽东的明确态度决定了中国处理中苏关系的方针，同时也决定了周恩来处理东欧问题的立场和方式。

弥合苏波分歧是最大的难题，否则周恩来也不会把全部行程近一半的时间（5天）花在波兰。首先必须消除波兰对苏不满的民族情绪，尽管在这方面莫斯科确实已做了很大努力。11月18日发表的苏波联合公报以及12月17日达成的苏军驻波协议，表明苏联在竭力安抚波兰人，并试图在新的框架内全面改善苏波关系。[4]不过，从哥穆尔卡赴苏前接到上千封劝阻信，并有不少人到机场阻拦的情况看，波兰

〔1〕彭真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1956年12月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01—01，第228—230页。

〔2〕吴冷西：《十年论战》，第60—61页；林克：《林克日记》（手稿），未刊，第16—17页。

〔3〕陶铸传达的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4〕关于苏波会谈及所签协议的情况，详见《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7日第5版，11月20日第1版，11月22日第5版，12月19日第5版。米高扬曾向中国大使详细介绍了苏联对苏波会谈的安排和期望。见刘晓致中共中央电，1956年11月28日，福建档案馆，101/5/819，第1—4页。

对苏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1] 苏波会谈后，苏波关系有所好转，但仍存在很多矛盾，特别是在处理纳吉问题发生后，“又引起群众强烈的反苏情绪”。[2]

其次，需要统一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11月13日，苏联曾计划根据卡达尔的提议，召开一次“兄弟共产党会议”，“根据匈牙利的经验，讨论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相互关系”。[3] 11月17日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又报告说，鉴于目前一些兄弟党国家在匈牙利问题上存在疑惑和分歧，有必要在莫斯科召开一次东欧各国会议，统一认识。[4] 如上所述，在这方面波兰的态度显然与众不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愈加严重。波兰是卫星国中唯一公开表示赞同南斯拉夫立场的国家。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机关刊物《自由论坛》周刊在11月25日发表文章，其中引述铁托的话说，各国共产党对待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有斯大林式和反斯大林式的两种倾向，而南斯拉夫有许多意见与波兰的评价相同。虽然声明并不完全接受南斯拉夫模式，但波兰认为，“国际主义并不妨碍我们按自己的具体条件来建设社会主义”[5]。12月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库兹涅佐夫坚持要波兰参加苏东九国关于谴责美国干涉匈牙利内政的共同提案，遭到拒绝后，苏联只得单独提出。[6] 苏联人对此颇为恼怒，在报纸上发动了对波兰的尖锐批评，

〔1〕谢文清致外交部转新华社电，1956年11月1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第103页。

〔2〕驻波使馆致外交部电，1956年11月2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2—03，第107—109页；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278页。

〔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55号记录，1956年11月13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6，л.49，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208；982—983。

〔4〕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年11月17日，ЦХСД，ф.3，оп.64，д.487，л.124—125，《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3卷，第227—231页。

〔5〕《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1日第5版。

〔6〕张闻天与基里洛克谈话记要，1956年12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17—19，第199—201页。

指责在匈牙利问题上“波兰采取了特别的立场”。结果，又在波兰引起强烈反响。[1] 显然，正是由于波兰的这种顽固态度，1957年1月初在布达佩斯召开的苏联和东欧领导人的会议讨论匈牙利问题时，哥穆尔卡没有被邀请出席。[2] 这一情况，引起了西方的普遍关注。[3]

最后，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是考虑到波兰党内和国内的复杂局面，哥穆尔卡仍然是莫斯科必须支持的唯一对象。1957年1月初，苏联人向北京表示了这样看法：“哥穆尔卡是主张对苏友好的，我们不管他的基础是什么，但表现是越来越坚定了。他的原则只是在平等独立的基础上的友好，我们对这一点也是同样遵守的”；现在波兰党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要“搞好团结”，把“主要力量要放在选举上”。[4] 波兰外长拉帕茨基也明确表示，周恩来在大选前来波，“对波兰沿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将起很大作用”。[5] 此外，从波兰还传出这样的信息：哥穆尔卡已经表示对无政府主义和反苏言论要进行斗争，但“刹车”不能太猛，担心“人们会说又回复到过去斯大林时

〔1〕波诺马连科与波兰记协领导人及华沙新闻界代表会谈记录，1957年1月12日以后，AAN，KC PZPR，V/54，Polski Instytut Spraw Miedzynarodowych（red.），Polskie Dokumenty Dyplomatyczne：1957，Warszawa：PISM，2006，s.19—26。

〔2〕事后，卡达尔向波兰人详细解释了未邀请波兰与会的考虑，但给人的感觉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见波兰驻匈大使关于同卡达尔谈话致外交部电，1957年1月23日，AMSZ，ZD 6/77，w.53，t.689，PISM（red.），Polskie Dokumenty Dyplomatyczne：1957，s.72—76。赫鲁晓夫则向周恩来坦言，他担心哥穆尔卡再次提出不同意见，也估计波兰人不愿来参加这个会议。见周恩来与匈牙利领导人谈话记录，1957年1月16日，MOL，XIX—J—1—j，Szobolevszki Sándor，Magyar—Kínai Kapcsolatok 1956—1959，o.125—133。

〔3〕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周恩来访问苏东以及苏联政策报告，1957年1月30日，MF2510408—0735，Main Library，University of Hong Kong。

〔4〕余湛与苏联驻波使馆参赞卡尔波夫谈话记要，1957年1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2，第120—123页。

〔5〕王炳南致外交部电，1956年12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805—01，第13—14页。

期了”；估计大选过后会采取较强硬的措施。[1] 因此，如何帮助哥穆尔卡在大选中获胜，稳定波兰的社会主义政权，就成为莫斯科的期盼，也是周恩来的重任之一。

解决苏匈之间的问题到1957年初已经比较简单了，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加强匈牙利人对苏联的信任感；第二，支持并促使卡达尔政府采取坚定的立场和强硬的手段稳定国内局势。

卡达尔政府是忠于苏联的，但在党和政府的基层干部中对苏联的疑虑和猜忌很深。匈牙利国防军文工团访华归国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联出兵之际，正值匈国防军文工团应邀在华演出。鉴于团员中流传途经苏联回国时的安全会将受到威胁，沙尔代办在中方的建议下，要求苏联大使当面向文工团做出保证。后来几经交涉，苏联决定在回国途中邀请文工团在莫斯科逗留5天，演出两场。[2] 此外，对于苏军随意逮捕匈牙利人并押解到苏联的做法，卡达尔和明尼赫都表示不安和反对。[3] 显然，周恩来需要进一步安抚心有余悸的匈牙利人。

为了控制匈牙利的局势，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马林科夫、苏斯洛夫和苏共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在很长一段时间坐镇布达佩斯。[4] 此外，苏联还有49位党政工作人员、18位来自克格勃的专家、5位来自内务部的专家以及一批负责经济和财政工作的专家，作为副军事代表或顾问被派往匈牙利工作。[5] 尽管如此，莫斯科对卡达尔的犹豫不

〔1〕《内部参考》，1957年1月15日第2105期，第267—272页。

〔2〕沙尔致外交部报告，1956年12月27日，MOL，XIX—J—1—j，Szobolevszki Sándor，Magyar—Kínai Kapcsolatok 1956—1959，o.99—106。

〔3〕谢罗夫和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电，1956年11月14日，АПРФ，ф.3，оп.64，д.486，л.143—144，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07页。

〔4〕苏共中央主席团主席团决议及给卡达尔复函，1956年11月13日，АПРФ，ф.3，оп.64，д.487，л.126—127，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с.646—647。

〔5〕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1956年11月14日，АПРФ，ф.3，оп.64，д.490，л.1、29，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с.741—742；《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32、433页。

决和左右摇摆的行事方针始终感到不满和担心。特别是12月18日安德洛波夫大使报告的情况，更引起了莫斯科的警觉：卡达尔通知说，匈党中央最近将就一些重要问题做出决议，其中包括扩大政府组成（当时22个部只有6名部长）时拟吸收小农党、全国农民党成员，并不排除社会民主党代表；社会主义工人党将与小农党和全国农民党合作，并组成共同的政治集团等。[1] 对于这种明显意味着认可多党制存在的决定，肯定引起了苏联的注意。但未等莫斯科回复，12月28日卡达尔便将决议的草案交给苏共中央。尽管该决议只允许其他党派成立中央机构，而不得建立地方组织，苏共中央主席团还是立即决定派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前往布达佩斯进行干预。接到赫鲁晓夫的电话通知后，卡达尔要求请捷、罗、保三国党的领导人也来参加会议，并得到同意。[2] 关于1957年1月1—4日召开的五国领导人会议，目前没有发现苏方和匈方的档案文件，不过根据罗、捷两国的简要记录、会后发表的公报和1月6日匈牙利政府的纲领性声明可以看出，通过这次会议，莫斯科基本控制了卡达尔的方针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为选举而建立多党联合集团、“大学自治”等问题虽经匈牙利代表提出，但均未被会议接受；相反，在讨论了拉科西和纳吉的“错误”后，却决定“展开对纳吉案件”的司法调查。至于“工人委员会”，声明虽承认其存在，但要求工人“应该拒绝并且阻止执行工人委员会可能作出的违法决定”。明显的让步只有一项：在限制私人占有土地不得超过15公顷的条件下，允许土地出售。[3] 作为这次会议精神最快的体

---

〔1〕安德罗波夫致赫鲁晓夫的报告，1956年12月18日，АПРФ，ф.3，оп.64，д.490，л.63—66，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с.753—756。

〔2〕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备忘录、赫鲁晓夫与卡达尔通话备忘录，1956年12月29日，Csaba Békés et.（ed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pp.487—488。

〔3〕罗、捷关于布达佩斯会议的记录，1957年1月1—4日，Csaba Békés et.（ed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pp.489—495；《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第1版，1月8日第1版。

现，匈牙利外长在1月5日接见兄弟党报记者时便迫不及待地宣布：匈牙利人民认为纳吉是叛徒。[1] 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匈牙利会后发表的声明，是“匈牙利国内情况根本趋向好转的标志”。[2]如此看来，比起波兰，周恩来在匈牙利的政治负担要轻一些。

不过，在经济援助方面，匈牙利的期望值还是比较高的。为了解决匈牙利的经济困难，各兄弟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到12月初，无偿援助已达2.85亿卢布，还有大量日用必需品和工业原料。此外，匈政府提出了4亿美元贷款的要求（其中苏联10亿卢布，中国2亿卢布，其他东欧国家各几千万不等）。12月3日卡达尔亲自向中国提出了这2亿卢布长期贷款的要求，并希望1956年第4季度应归还的200万英镑再延期两年。为了维持工业生产，匈政府还要求中国在1957年订购匈生产的各种车辆、农业机械、一般机械和成套设备，并提出了可长期提供的成套设备的初步货单。[3] 这些都是匈牙利为稳定局势而有求于中国的。

## 在新的基础上巩固社会主义阵营

自十月革命以来，莫斯科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苏共领导人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即使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依旧执掌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特别是波匈事件爆发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空前的内乱和动摇。周恩来

---

〔1〕《内部参考》，1957年1月10日第2101期，第195—196页。

〔2〕《人民日报》1957年1月9日第1版。

〔3〕苏欧司关于中匈关系简况的报告，1956年12月2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194—03，第27—30页。卡达尔关于请求贷款致中国政府的信，1956年12月3日，MOL XIX—J—1—j，Szobolevszki Sándor，Magyar—Kínai Kapcsolatok 1956—1959，o.106—107。

这次出访的目的就是要重整旗鼓，在新的基础上巩固社会主义阵营。所谓新的基础，是指国际共运系统内领导原则的变化，即由“以苏联为首”客观上变为了“以中苏为首”。而建立起这个基础，并且为周恩来的出访铺平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

在铁托普拉演说发表后不久，毛泽东就有意以中共的名义发表一篇理论文章，后历经月余，数度开会，反复讨论，八易其稿，终于在12月29日完成并发表。[1] 这不是一般的文章，而是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思考的结晶。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苏联赢得了一片赞扬。转载该文当天的《真理报》发行了约2000万份，之后还印发了100万册单行本。许多读者打电话、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表示对文章“非常满意”。一些读者认为，这篇文章“给目前国际形势和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走的历史道路以深刻的马列主义的分析，对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有巨大的意义”。《真理报》总编辑萨丘科夫告诉中国记者，“许多宣传员认为这篇文章是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问题的典范”。参加苏共党史教科书写作的全组人员在读到文章后奔走相告，同声称赞，认为这是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文献，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思想混乱。文章不仅对南斯拉夫而且对苏联都将发生深刻的影响。甚至有学生说，世界上出现了伟大的列宁继承者毛泽东，苏联人民已由斯大林崇拜转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拜了。苏共领导人也为此感到兴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除夕联欢会上，赫鲁晓夫特意走下主席台与中国大使刘晓拥抱、亲吻和干杯，称赞这篇文章“非常好”，他本人“完全同意”，还请刘晓与苏共中央主席团坐在一起。外交部长谢皮洛夫说，文章深刻，思想理论分析正确，是对苏联最好的新年礼物。莫

〔1〕详细过程见本书第七章。

洛托夫、波诺马廖夫等人也纷纷表示赞许。[1]

匈牙利的反响也十分强烈。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发表评论认为，中共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观点，有助于理解匈牙利事件。[2] 匈党宣传鼓动部认为，这篇文章是极重要的历史性文献，具有高度的哲学理论修养，其中对矛盾的分析特别精辟，匈牙利宣传工作者要说的话都已被《人民日报》的文章说出来了。[3] 普通党员读了文章后说，“我们不孤立”，“看到伟大的中国和我们站在一起，给了我们以力量和信心”。党内知识分子说，文章澄清了理论上的混乱，使我们思考了许多问题，从而更靠近党了。[4]

波兰人的反应没有那么热烈，党内多数人认为“文章极好”，有重大意义，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但对有些观点不能完全同意。关于匈牙利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多数波兰人同意卡达尔12月初的看法，强调首先是内因，其次是外因；关于个人崇拜产生的根源，多数波兰人倾向于铁托的看法，认为关键在于斯大林推行的一套“管理方法”。在这方面，波兰外长拉帕茨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不过，总体来看，波兰人对于文章中关于“基本矛盾、次要矛盾”以及修正主义危险的观点还是赞同的，认为中共的批评是“诚恳的，同志式的”，“又是有高度原则性的”。显然，波兰已经感觉到中国对华沙的态度比过去冷淡了，但还是满怀期望等待着中国的

---

〔1〕《内部参考》，1957年1月10日第2101期，第193—194页；1月4日第2095期，第51—52页；1月5日第2097期，第117—118页。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关于各国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反映的报告，1957年1月15日，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84，第1—20张；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22页。

〔2〕《人民日报》1957年1月6日第5版。

〔3〕《内部参考》，1957年1月8日第2099期，第158—159页。

〔4〕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宣传鼓动部关于党内对中共立场反响的报告，1957年1月21日，MOL XIX—J—1—j，Szobolevszki Sándor，Magyar—Kínai Kapcsolatok 1956—1959，o.150—151。

帮助和支持。[1]

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开始他的穿梭外交的。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场面是极其友好和热烈的，《真理报》发表社论，盛赞中国共产党、中苏友谊和这次访问的重大意义。周恩来在机场发表讲话称“苏联是反对战争、反对殖民主义的最坚决的旗手，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强大的堡垒”。[2] 苏联原准备在体育馆举行群众大会欢迎周

---

〔1〕《内部参考》，1957年2月15日第2129期，第202—204页；王炳南与拉帕茨基谈话记要，1957年1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2，第127—129页。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需要特别说明。笔者在中国档案中发现：1956年12月12日，中国驻越大使罗贵波与苏联驻越临时代办波波夫谈话时得知，南斯拉夫国防秘书长曾说，苏联《真理报》对铁托讲话中关于个人崇拜起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说法有误会。铁托说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指某种“方法”，塞尔维亚文中的“方法”在俄文中翻译为“制度”是不准确的。（罗贵波致外交部电，1956年12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972—05，第27—29页。）再查铁托原话，是这样说的：“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这些根源在哪里呢？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在于领导方法和所谓一长制，在于忽视劳动群众的作用和愿望……”（《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2日第6版）不久后卡达尔对此的解释是：“我们所说的政治制度并不是指社会主义，也不是指让群众有可能去影响国家和党的政策的列宁主义苏维埃制度。我们这里指的政治制度是下述这样一些政治形式和方法的总和：这些政治形式和方法隔绝了社会主义劳动群众，不让他们有可能直接影响政权，加强了党和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因素，并且使它们逐渐掌握政权的一些杠杆，结果，政权就会变质而成为不同于工人阶级政权的东西了。”（《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4日第6版。）笔者就这个问题专门请教了塞尔维亚学者周万（Jovan Čavoški），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真理报》的翻译不准确。笔者还以为，《人民日报》刊登的铁托演说，很可能译自《真理报》。如此说来，波兰人的看法与铁托一致就很好理解了——他们并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反对斯大林的统治方法。现在的问题是，罗贵波的电报是12月13日发出的，卡德尔的讲话是12月24日刊出的，因此，中共领导人或“秀才班子”对这个情况应该是知道的。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人民日报》文章指责南斯拉夫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说法就是无的放矢，甚至是有意为之了？

〔2〕1957年1月8日《人民日报》第4版；《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页。

恩来，“但为了更热情隆重改在大剧院举行”。[1]

周恩来访苏前一阶段（7—10日）活动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强调支持卡达尔政府，一个是呼吁团结一切力量。

在对待匈牙利新政权的态度上，中苏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外交活动的进展很顺利。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周恩来便与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东德总理格罗提渥举行了会谈。周恩来主张会见后发表一个简单的新闻公报，不谈别的，就是表明中国支持苏德联合公报、支持匈牙利政府的立场。[2]第二天上午，中苏又商定约请匈牙利领导人来莫斯科会谈，随后周恩来致电郝德青大使，要他和卡达尔、明尼赫共同前来。[3] 1月10日中、苏、匈三国代表团举行会谈，周恩来提出，会谈公报要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谴责西方帝国主义在匈牙利的颠覆活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和镇压反革命。周还鼓励卡达尔说，即使联合国开除匈牙利，也没有什么，这样中国在联合国外就多了一个朋友。最后公报的用语是：“坚决制止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牢不可破的团结和堡垒作用的一切企图”。[4]

周恩来要完成第二项任务就不那么轻松了。为此，周恩来首先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要“以苏联为首”。自苏共二十大特别是波匈事件以后，苏共的威望受到打击，许多国家已经不大提“以苏联为首”了，甚至苏共本身也在考虑，为缓和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尽量避免谈苏联的领导作用，放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

〔1〕驻苏联使馆陈楚与苏外交部远东司长顾德夫谈话记录，1956年12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984—18，第149—159页。

〔2〕张彦给外交部的电话汇报，1957年1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072—01，第62—63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32页。

〔3〕驻匈使馆致外交部电，1957年1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097—05，第25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5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7页；夏道生：《忆周恩来总理1957年访问匈牙利》，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5—26页。会谈公报见《人民日报》1957年1月12日第1版。

营”的提法。[1] 而周恩来在1月8日布尔加宁举行的招待会上，重新提出“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义务。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又再次强调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2] 与此同时，周恩来强调，密切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关键问题在于苏联能够摒弃大国主义作风，这也是刘少奇3个月前在莫斯科力劝苏共领导发表平等关系宣言的主旨所在。在1月8日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就指责苏联对东欧兄弟国家有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搞得赫鲁晓夫“狼狈不堪，举杯不知所对”。[3] 在1月9日的双边会谈中，周恩来谈到争取民族主义国家时又说，为了让这些国家安心，“我们强调反对大国主义”。1月10日的会谈主要谈波兰问题，这也是周恩来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赫鲁晓夫介绍了波兰国内的情况后，周恩来表示，苏共支持波兰党领导、支持哥穆尔卡的方针是对的。同时又强调，要把党内的是非和党外的敌我问题分开；党内问题的解决，主要靠兄弟党自己。这显然是在批评苏联干涉波兰内政的做法。由于苏方参加会谈的只有4位领导成员，所以，周恩来在当天有众多苏联高层干部出席的宴会上又重申了这些观点。周恩来说：处理兄弟党的关系，绝不能有高人一等的思想，再大的党，在各国党面前也是平等的，不要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4] 在公开场合做这样尖锐的批评，令赫鲁晓夫十分难堪。

如前所说，从苏共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态度可以看出，在理论问题上，特别是在对斯大林评价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已经接受了中共的观点。在克里姆林宫迎新年宴会上，赫鲁晓

〔1〕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c.42；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259页。

〔2〕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31—32页；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99—101页；《人民日报》1957年1月9日第1版。

〔3〕李慎之：《关于波兰事件的报道》，1967年11月28日。

〔4〕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1277—1278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7页。

夫不仅颂扬“斯大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且宣称他本人就是“斯大林分子”，“是在斯大林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并以此感到自豪”。[1] 无论这种说法是否出自赫鲁晓夫的内心，这至少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中共的重要地位，并决心向北京靠拢，在政治上与中共保持一致。在欢迎周恩来的宴会上，布尔加宁赞扬中国的经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贡献，并说苏联正在仔细研究中国的经验。赫鲁晓夫则进一步发挥了除夕宴会上的讲话，说“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本人是同伟大的共产党员称号不可分割的”，称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苏共中央还要求《真理报》立即发表这些讲话。[2] 然而，在与波兰关系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却期望中共能够站在苏联一边，因为在他看来，在政治立场上苏共更接近中共，而在苏波关系上，是“大国在为小国作出牺牲”。[3]

鉴于十月事件前东欧传说“中、南、波将组成统一战线反对苏联”，为了争取中共的理解和同情，在周恩来访问前，苏联外交部向苏共中央建议：让周恩来了解苏联驻波使馆发来的密码电报内容；向中共提交有关波苏关系和波兰形势的材料；告诉周恩来波兰报刊对中国关于波兰问题，特别是匈牙利问题立场的歪曲；责成驻波使馆与中国大使“建立密切的、直接的联系”，并帮助他得到“关于波兰局势客观而正确的情报”；建议罗科索夫斯基在合适的时候向刘晓和周恩来通报苏联关于波兰近期事件的观点。[4] 想不到，莫斯科等来的不是支持，而是一通批评，苏联人自然是不服气。尽管在会议上没有进

〔1〕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252—254页。

〔2〕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256—257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21页；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99—101页；杰留辛在“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1997年10月，北京）答复学者提问时的讲话。

〔3〕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278页。

〔4〕《内部参考》，1957年1月17日第2107期，第335—336页。谢皮洛夫呈苏共中央的请示，1957年1月4日，《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1卷，第2810—2813页。

行反驳，但私下谈话时，赫鲁晓夫却坚持为自己辩护。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在电话中说：我们劝他一下就行了，听不进去就算了。[1]

赫鲁晓夫大概不了解周恩来的工作方式，为了缓和苏波关系，周恩来在莫斯科重点是批评苏联，而在华沙，却主要是为苏联说话。周恩来访问波兰非常辛苦，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21次，还两次与哥穆尔卡私下谈话，波兰人十分感动。[2] 除了以中国政府代表团访波的实际行动表示对哥穆尔卡的支持外，周恩来在波兰的活动和谈话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劝说哥穆尔卡以大局为重，搞好与苏联的关系；站稳革命立场，在匈牙利的问题上与社会主义阵营保持一致；团结全党，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周恩来到达华沙后在机场发表的第一次讲话就提出："加强我们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加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3] 在中波领导人的会谈中，周恩来继续进行耐心说服。在哥穆尔卡详细地介绍了波兰局势，特别是苏联干涉波兰内政的情况后，周恩来首先表示支持波党八中全会的立场，同意哥穆尔卡关于平等和主权的意见，接着话锋一转，谈起"苏联的先进作用"。周恩来强调"先进的作用是主要的，平等和错误是次要的问题"，"我们也曾向苏共指出，他们对待兄弟党的态度并不总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需要公开谈论此事，这是为了不削弱苏联。对于那些错误不要谈了又谈，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团结对敌和强调苏联的先进作用"。[4] 当晚，周

〔1〕李越然在"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1997年10月，北京）答复学者提问时的讲话。

〔2〕余湛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谈话记录，1987年7月26日。

〔3〕《人民日报》1957年1月12日第1版。

〔4〕波中政府代表团会谈记录，1957年1月11—16日，AAN，KC PZPR，XIA/31，PISM（red.），Polskie Dokumenty Dyplomatyczne：1957，s.28—55。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55—82页。关于中波领导人的

恩来与哥穆尔卡单独谈话时，继续强调目前承认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起来很重要，这样才能更有力地与敌人进行斗争。哥穆尔卡坦率地说：关于苏联的领导作用，我们有些看法。不可否认，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最强的国家。1948年以来，波兰党整天强调苏联的领导作用，但是现在我们不公开强调苏联的领导作用，因为在许多党员及人民群众心中，领导作用即意味着命令和一切模仿苏联。周恩来解释说，以苏为首不等于要苏联起领导作用。[1] 波兰党内外曾对中国在十月危机时坚决反对苏联干涉的立场充满感激，而这次周恩来的讲话显然让他们感到有些失望。

关于匈牙利事件，周恩来在会谈中明确地说："中国方面认为，苏军的帮助是必要的。当纳吉叛变以后，在匈牙利出现了反革命和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别无选择，卡达尔的行为是革命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支持苏联。"周恩来还表示，希望在中波会谈公报中专门提一下对卡达尔政府的支持，并暗示不要过多提拉科西和格罗的错误而要笼统地谈团结和友谊。与前一个问题不同，哥穆尔卡当即做出回应，表示同意中共关于匈牙利问题的观点，并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只是在讨论公报的用语时可以看出，中波在匈牙利问题上的看法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中国主张写上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而哥穆尔卡坚持只能写"制造混乱"，因为匈牙利事件的内因是主要的。[2]

---

会谈记录，波兰保存有两个文本，一个是记录员整理的正是文件（即这里引用的文本），一个是哥穆尔卡未刊的文件（即《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翻译的文本）。具体说明见Andrzej Werblan，Rozmowy Wladyslawa Gomulki z Zhou Enlaiem w 1957r.（哥穆尔卡与周恩来在1957年的会谈），Dzieje Najnowsze，Rocznik XXIX，nr.4，1997 r.，s.120—121。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8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1279—1281页；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第43页。

〔2〕波中政府代表团会谈记录，1957年1月11—16日，AAN，KC PZPR，XIA/31，PISM（red.），Polskie Dokumenty Dyplomatyczne：1957，s.28—55。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55—82页。

关于波兰党的内部问题，周恩来首先声明，中共支持波党八中全会进行的“正确变革”，“支持波党的领导是我们的责任”。随后周恩来强调，对过去既要看到错误，也要看到成就。至于波兰党内的两种倾向，周恩来指出：“保守主义者已经不构成威胁了”，“当前最重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倾向，它会带来许多危害”。周恩来还提醒波兰要加强党内团结，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办好“党的报刊”。哥穆尔卡在会谈中没有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只提到中国对波兰大选的危险估计过重了。[1] 应该说，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报纸宣传方面，中国依然是积极支持波兰的。[2] 但在内部谈话时，重点还是劝导哥穆尔卡与中苏保持一致。或许是感到对波兰表示支持不够，毛泽东在14日的电报中指出，“波兰党的根本路线应当承认是正确的”，并让周恩来再讲一下团结对敌的重要性。[3]

最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很明显是一个相互妥协、求同存异的杰作：既提倡国际主义，又反对干涉内政；既强调苏联、中国、波兰之间的共同思想和紧密联系，又不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既表示支持卡达尔的工农革命政府，又没有说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性质的。[4] 这种结果与当时中波关系的双重性是吻合的。毛泽东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哥穆尔卡在政治和思想上是共产党内或人民内部的右派和修正主义者，但同时又是民族主义者，在对外政策中反对苏联的大国和大党主义。因此，在党内进行思想教育时，哥穆尔卡往往成为毛泽东攻击的靶子，而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波兰又经常成为中国不可或

〔1〕波中政府代表团会谈记录，1957年1月11—16日，AAN，KC PZPR，XIA/31，PISM（red.），Polskie Dokumenty Dyplomatyczne：1957，s.28—55。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55—82页。在波兰档案中没有中方记录中哥穆尔卡的这样一句话：“周恩来总理的发言中有许多有意思的、有趣的、有益的东西，我们将仔细地研究。”中波两党会谈记录，1957年1月12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1281—1282页。

〔2〕李慎之：《关于波兰事件的报道》，1967年11月28日。

〔3〕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1281—1282页。

〔4〕《人民日报》1957年1月17日第1版。

缺的盟友。[1]

关于周恩来访匈的安排，如前所述，尽管匈方于12月30日正式提出邀请，但中方迟迟没有答复，只是邀集匈牙利领导人到莫斯科面谈。在1月8日中、苏、匈三方会谈时，赫鲁晓夫提出建议，而卡达尔和马罗山则恳切相邀，周恩来这才决定访匈一日。[2] 的确，除了经济援助问题，中国和苏联在匈牙利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对卡达尔政权也是全力支持，所以中匈双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政治问题要商谈。[3] 不过，周恩来访匈的意义不在于时间长短和会谈内容，而在于中国政府领导人出现在布达佩斯这一事实本身，如马罗山所说，其"作用不可估量"。[4]

通观与周恩来与卡达尔的谈话记录可以看出，与中苏和中波会谈相比，中匈领导人之间的会谈要顺畅和投机得多。他们在所有问题上几乎都是未等对方的话说完就表示赞同，或发表相同的意见，可说是琴瑟和谐，相得益彰。[5] 周恩来在群众大会上的一番讲话更是鼓舞人心，他说："匈牙利人民对反革命阴谋进行斗争的胜利，具有世界范围的重要意义，是对整个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匈牙利人民在进行各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的时候，可以指望六万万中国人民的支持"。[6]

不过，在经济援助问题上，由于当时中国自身的困难，"在贷款

---

〔1〕详见沈志华、李丹慧：《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3期，第45—58页。

〔2〕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1282页；PISM（red.），Polskie Dokumenty Dyplomatyczne：1957，s.73—74。

〔3〕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还在周恩来访问之前，匈牙利便已草拟了双方会谈的公报。驻匈使馆致外交部电，1957年1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023—04，第22—25页。

〔4〕夏道生：《忆周恩来总理1957年访问匈牙利》，第25页。

〔5〕周恩来与匈牙利领导人谈话记录，1957年1月16日，MOL，XIX—J—1—j，Szobolevszki Sándor，Magyar—Kínai Kapcsolatok 1956—1959，o.125—133。

〔6〕《人民日报》1957年1月18日第2版。

贸易方面不能完全满足匈方的要求”。[1] 在莫斯科会谈时，对于匈方提出的2亿卢布长期贷款（其中5000万卢布的外汇，1.5亿卢布的物资）的要求，周恩来当面答复卡达尔说：中方“考虑到匈牙利现在急需外汇，而且从中国运给匈牙利物资也不大方便”，决定提供1亿卢布的外汇，并可立即拨付。另外中方还可以提供1亿卢布的物资，如果匈方一时不能平衡，可将差额记账，不计利息。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再谈。匈方误以为这1亿卢布的物资也属贷款，一再催办。后经反复协商双方于5月13日签订协定，中国只提供1亿卢布的外汇贷款，其中还包括9月中方答应的350万英镑在内，年利2%，一次性拨付，自1960年起分十年偿还。[2] 笔者按照当时的外汇牌价粗算了一下，这350万英镑大概合4000多万卢布，也就是说，中方实际增加的贷款只有不到6000万卢布。这恐怕让匈牙利有些失望。

还有一件让匈牙利担心的事就是周恩来的安全问题。当时布达佩斯局势还不很稳定，而周恩来这次出访为了获取政治效果，又必须公开露面，所以确有一定风险。为此，中国使馆再三提请匈方注意安全问题。匈牙利感到责任重大，只得请苏联帮助。1月14日，苏联驻匈大使专程拜会郝德青，商谈苏军协助保卫工作的问题，并对宾馆、会场、宴会场所、沿途经过地点及汽车、食品化验等项保卫工作均作了妥善安排。对周恩来的保卫，由苏军及苏内务部负全责。[3] 周恩来到达后，在中国代表团住地周围，已派有苏联坦克守卫；匈方还从中央车库专门调了一辆防弹车供周恩来使用。[4] 这些防范措施保证了

---

〔1〕外交部对驻匈使馆1956年工作总结和1957年工作计划批复，1957年4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37—01，第16—17页。

〔2〕驻匈使馆致外贸部并外交部电，1957年1月1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097—05，第41—42页；关于中国给匈牙利贷款的谈判经过，1957年6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66—02，第3—5页。

〔3〕郝德青致中央、外交部转总理电，1957年1月13日，驻匈使馆致外交部并中央电，1957年1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097—05，第26、28页。

〔4〕夏道生：《忆周恩来总理1957年访问匈牙利》，第27页。

访问的顺利进行。

1月17日周恩来回到莫斯科，进入了访苏的第二阶段。在这短短的两天时间里，周恩来不顾疲劳，又抓紧机会提出了访问南斯拉夫的问题。南斯拉夫对中国一直持友好态度，尽管中共参与了共产党情报局对铁托的批判，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南斯拉夫是最早提出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卡德尔公开发表谈话说：中国与南斯拉夫发展道路相似，而与苏联形式不同；中国在国内发展方面将沿自己的道路前进，保持对苏平等。当时，中国正在执行“一边倒”的方针，为了保持与苏联的政治一致，只能将中南建交的问题束之高阁。[1] 1954年底苏南关系解冻，中国与南斯拉夫也开始了建交谈判，并于1955年3月互派大使。[2] 不过，中南关系的真正转变，是在5月苏南领导人会谈和南共工会代表团访华并详细介绍了苏南冲突的过程以后。[3] 6月30日，毛泽东接见南大使波波维奇，与他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毛泽东承认，从新中国建立时，“你们就一贯支持我们，这种立场一直没有改变过”。毛泽东还说，他接到铁托的来信后非常高兴，因为这不仅是“国家之间的通信，而且是同志之间的通信”。[4] 1956年底苏南关系再度恶化时，中南关系却保持着良好状态，双方驻苏大使甚至单独进行了“亲切的会晤”。刘晓耐心倾听了米丘诺维奇讲述的苏南之间的分歧，并对有些观点表示赞同，还建议苏南之间应举行会谈，协商解决冲突。[5] 正是由于中南之间保持着这层关系，使得周恩来有可能成为缓解苏南、匈南紧张关系的调解人。

---

〔1〕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93页。

〔2〕《人民日报》1955年1月2日第1版，3月2日第1版，3月10日第1版。中南建交的详细情况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580—01，第49—55页。

〔3〕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296页；邓小平、王稼祥与南共中央委员谈话纪要，1954年5月2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583—01，第1—8页。

〔4〕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14—216页。

〔5〕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250—251页。

早在1月10日晚中、苏、匈三方会谈时，苏匈就表示有意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到匈牙利后邀请铁托也同时访匈，以便中国从中调解关系。周恩来与毛泽东通话后表示，由于时间太紧，这次来不及了，中国准备安排第二次访问东欧。[1]在布达佩斯会谈时，匈牙利领导人又提出希望尽快与波兰和南斯拉夫的同志举行会谈，以免局势更加复杂化，并且期待由中国提出这一倡议。周恩来答应立即报告毛泽东。[2]毛泽东对铁托的看法大体上同他对哥穆尔卡的看法一样，既赞赏铁托的独立精神和坚强意志，又反对他的右倾立场和修正主义观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的论述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中国领导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尽管“在南斯拉夫领导人中有一些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也还有一些修正主义的观点”，对此中国也在报纸上不点名地提出了批评，但应该确认“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以同志态度对待南共”，对他们要帮助并进行合作，“而不是孤立他们”。[3]

关于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解决阵营内部问题的建议，最早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以替代苏共在解散共产党情报局后提出的建立联络局的主张。苏共对此建议正在酝酿之时，发生了波匈事件，事情便耽搁下来。[4]现在，苏联和匈牙利都急于同南斯拉夫、波兰缓和关系，而

---

〔1〕夏道生：《忆周恩来总理1957年访问匈牙利》，第25—26页。参见波中政府代表团会谈记录，1957年1月11—16日，AAN，KC PZPR，XIA/31，PISM（red.），Polskie Dokumenty Dyplomatyczne：1957，s.28—55。

〔2〕周恩来与匈牙利领导人谈话记录，1957年1月16日，MOL，XIX—J—1—j，Szobolevszki Sándor，Magyar—Kínai Kapcsolatok 1956—1959，o.125—133；驻匈使馆1月21日。驻匈使馆致外交部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760—01，第3—6页。

〔3〕波兰与中国两国代表团的会谈记录，1957年1月11—16日，AAN，KC PZPR，XIA/31，PISM（red.），Polskie Dokumenty Dyplomatyczne：1957，s.28—55；彭真致中央电，1957年1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72—02，第20—23页。

〔4〕详见本书第九章。

且希望中共出面安排此事，便把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的问题再次提上日程。不过，原来中共主张苏共作会议召集人，现在考虑到莫斯科的尴尬处境，北京决定与贝尔格莱德联手挑起这副担子。贝尔格莱德对周恩来的欧洲之行非常重视，逐日进行报道，而且几乎都登载在第一版，特别是对于周恩来几次有关加强以苏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团结的讲话，过去从未刊载，而这次全部报道了。尽管在评论中显示出还有不同看法，但铁托看重中国的意见是不言而喻的。[1] 这些情况都有利于中国再次出面协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1月18日晨周恩来与毛泽东通话时是否谈到这个问题以及如何商议的，目前尚无任何史料，但当天上午周恩来就给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打了电话，要他单独会见铁托一次，并指定由伍修权大使亲自担任翻译。周恩来要求彭真转达中共的建议：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问题。[2] 接着，在下午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又特意找到米丘诺维奇，向他介绍了中共关于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想法。周恩来首先提出，应当组织一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目的是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消除妨碍合作和团结的因素。会议可以在2月底或3月初举行。周恩来希望知道，铁托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否有益，以及预定的时间是否合适。周恩来提出，如果铁托同意召开并参加这次会议，他将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现在彭真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已经授权他同铁托商谈。米丘诺维奇提出，为了更确切地向贝尔格莱德报告，他需要了解一些细节，比如召开这个会议的倡议是谁提出的，如果南斯拉夫不能参加，会议是否还会举行。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回答：召开这

〔1〕驻南使馆致外交部电，1957年2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097—06，第65—66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3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10页。

次会议的倡议是中国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整个这件事起源于毛泽东本人。周恩来解释说，会议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共产党之间的新组织，会议也不会做出任何强加于与会者的决议。周恩来还表明，如果南斯拉夫不参加，会议就不会举行。不过，那样就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削弱了，中共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米丘诺维奇对周恩来如此直率的谈话非常意外，并感觉到中共对苏联以前的做法持批评态度。[1]

然而，贝尔格莱德拒绝了周恩来的提议。或许是担心再次出现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群起而攻的局面，在与彭真的秘密谈话中，铁托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南共中央要专门讨论。他个人的意见是：进行双边或者多边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全世界各国党的会议。得到彭真的报告后，周恩来在1月25日致中共中央并外交部的电报中判断，目前举行兄弟党会议的可能性不大。[2] 1月28日南共中央正式通知米丘诺维奇，南斯拉夫将不参加共产党国家召开的国际会议，也不准备签署任何声明，但铁托还是决定邀请周恩来于1957年2月或3月访问南斯拉夫。[3] 不过，彭真路经莫斯科回国时，向赫鲁晓夫通报的消息却是含糊的：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各国共产党会议，只是要求不规定议事的日程，也不要作出约束性的决定。[4]据此，赫鲁晓夫直接致函毛泽东，同意中共“关于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并认为应该由中共筹备和出面主持这次会

〔1〕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267—270页。目前披露的中方史料虽然简单，但可以证实南斯拉夫大使回忆的基本内容。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3—14页。

〔2〕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10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3、15页。

〔3〕南共中央致米丘诺维奇电，1957年1月28日，ACKSKJ（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档案馆），br.55，st.Ⅸ9—Ⅲ/32，1—3。感谢塞尔维亚学者Jovan Čavoški为笔者提供南斯拉夫档案，并讲述了大致内容。

〔4〕РГАНИ，ф.3，оп.14，д.99，л.26，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991；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7页。

议。或许是考虑到持有不同意见的主要是南斯拉夫，而南共的缺席将大大降低召开会议的意义，中共中央只得以“时机尚不成熟”作为托辞答复莫斯科了。[1]

中共不愿此时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苏会谈最后阶段的气氛不太融洽。周恩来访问波、匈后，了解到更多情况，回过头又来做苏共的工作。在1月18日上午的会谈中，周恩来对苏共提出诸多批评，搞得赫鲁晓夫很不愉快。关于批判斯大林问题，周恩来对苏共提出三点批评，即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缺乏同兄弟党协商。还说，揭露斯大林需要勇气，但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好。赫鲁晓夫答曰，对斯大林成就的认识上两党不存在分歧，秘密报告只是没有发挥，没有同兄弟党商量是当时认为没有必要。关于干涉波兰问题，周恩来指出兵临华沙进行威胁，就是武装干涉兄弟国家内政。赫鲁晓夫承认这样做不应该，但否认是犯错误。关于苏波关系，周恩来认为历史上的民族隔阂与现实问题搅在一起，所以波兰人有情绪，不愿接受“以苏为首”的说法，但哥穆尔卡正在尽力调整波苏关系。赫鲁晓夫则强调波兰人民是亲苏的，只有“个别坏分子”反苏，不承认苏联有大国主义错误。总之，周恩来感到，苏共领导的错误基本上是思想问题，苏联利益至上。一方面唯我独尊、利令智昏，既缺乏远见，又不懂人情世故；另一方面又显得信心不足，内心恐惧，采取吓人手段。现在只是迫于形势，承认了一些错误，但并非“心悦诚服”，“彻底觉悟”。因此，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长期而耐心地”对他们做工作。[2]

---

〔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2月2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7，л.1—8，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224，990—991.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7页。

〔2〕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2001年10月；《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3—15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1284—1286页；中苏两党代表团会谈记录，1963年7月8日，《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827—3864。

当天下午为周恩来举办的告别宴会的气氛，直接反映了最后一次会谈的效果。与前几次招待会不同，这次会场显得有些冷清，没有频频举杯的场面，也没有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布尔加宁和周恩来只是宣读了事先写好的祝酒辞，赫鲁晓夫则一言不发。在场的人们均感觉不到欢送周恩来的气氛，以至西方使节四处打听出现如此变化的原因。[1] 看起来，赫鲁晓夫是心中有气。周恩来的观察不错，苏共领导人在联合声明广播文稿上搞小动作的做法也表明，这批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新人确实不够大气，也缺乏勇气。中苏联合声明经双方领导人确认后，苏方抢先广播了俄文稿，还对其中少量文字做了改动，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删去了原稿中“并非完全正常”几个字。经中方工作人员查验证明是苏方有意删改后，苏外交部还强调属忙乱中出错，并要求中文稿也按照俄文播出稿改正。搞得中方无可奈何，只得照办。[2]

周恩来不辞辛苦的穿梭外交取得了重大成功，达到了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这一点，全世界都有目共睹。

西欧国家普遍承认，周恩来访苏、波、匈的最大收获是巩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其表现是中苏更加团结，苏联的领导核心趋向稳定，波兰继续留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匈牙利的革命立场更加坚定，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争论也平息了。[3] 美国的情报机构也评价说，“此次访问加强了阵营内部的团结”，“在弥合因为苏联过去的政策所造成的阵营内部裂痕方面发挥了影响力，并在阵营各成员国之间营造出一种更巩固、更灵活的关系，允许各成员国拥有最大限度的

〔1〕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271、266—267页；Szobolevszki Sándor，Magyar—Kínai Kapcsolatok 1956—1959，o.146—150。

〔2〕李汇川给外交部的报告，1957年1月1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097—03，第48—50页。联合声明全文见1957年1月20日《人民日报》第1版。

〔3〕驻瑞士使馆致外交部电，1957年1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097—06，第92—95页。

主权，而且同时能团结一致的对抗西方”。[1]

的确如此，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苏联对周恩来的访问“非常满意”，作为“一个善意的调解人”，中国“能够使苏、波、匈三国共产党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2] 波兰的干部、群众普遍认为，周恩来的访问“对波兰局势的改善有很大意义”，“对大选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离开华沙不久，波党在大选中的态势便出现了“决定性”好转，并取得大胜。[3] 至于匈牙利方面，据中国使馆观察，“匈方为此极为振奋，尽力所及安排了各项活动，充分动员宣传工具展开了连续突出的宣传活动”；“卡达尔等同志的态度表现很诚恳、很虚心，会谈和共同声明所涉及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不但没有意见分歧，而且在巩固和加深卡达尔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上有重大影响”。总之，这次访问“在打击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全力支持巩固卡达尔政府，鼓舞匈牙利人民战胜困难的斗争信心上都起着巨大作用”。[4]

社会主义阵营的基础是中苏同盟，周恩来的访问进一步密切了中苏关系，这突出地表现在军事援助方面。对于中国提出的帮助研制核武器和导弹的要求，苏联过去一直不积极。[5] 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后不久，情况突然有了变化。3月30日，中苏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在特种技术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的议定书，

---

〔1〕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周恩来访问苏东以及苏联政策的报告，1957年1月30日，MF2510408—0735，Main Library，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268—2269页。

〔3〕王炳南夫人贝鲁特夫人谈话记要，1957年2月12日，王炳南与国务委员会秘书斯克热歇夫斯基夫妇谈话记要，1957年2月5日，王炳南与副外长纳希科夫斯基谈话记要，1957年2月1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41—03，第168—169、149—152、165—167页。

〔4〕驻匈使馆致外交部电，1957年1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760—01，第3—6页。

〔5〕详见沈志华：《援助与限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0—131页。

其中规定，苏联将派遣5名专家到中国，帮助进行教学组织工作，并讲授有关（火箭）喷气技术的课程；按照喷气技术课程制订和提交教育计划和大纲；苏联有关高等学校在1957—1958年教学年度，接收50名中国大学生；提交两枚供教学用的P—1导弹样品及技术说明书。[1] 此外，有关美国将在台湾驻扎导弹部队的消息传出后，赫鲁晓夫立即通报说，如果美国胆敢这样做，苏联愿意帮助中国建立导弹部队，并发表声明支持中国。[2]

周恩来的访问也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南斯拉夫驻苏大使注意到，1957年苏联官方文件列举社会主义国家时的排列方式发生了变化，“苏联和中国排在首位，其他国家是按字母次序列出的”。[3] 中共的威望已经与苏共齐名，并成为各国学习的榜样。不仅波兰党中央派代表团考察中国的党群关系，学习中共的“群众路线”，并在军队建设中采用中国的做法[4]，就连苏共也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的经验。苏联驻华使馆1957年1月初的报告认为，近几年来，中国党和国家在党务工作和文化建设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有趣的组织形式”，其中有些经验值得苏联的相关机构学习，并为此建议苏方应多组织各种代表团访华。[5] 5个月后，苏共中央联络部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当年就派出“以苏共中央书记为首的、由中央机关主要工作人员和地方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组成的党务

〔1〕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05页。

〔2〕周恩来接见尤金大使谈话记要，1957年5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86—13，第95—96页。

〔3〕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305页。

〔4〕笔者对骆亦粟的采访；谢皮洛夫呈苏共中央的请示，1957年1月4日，《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1卷，第2810—2813页。

〔5〕苏联驻华使馆向外交部情报委员会提交的情报资料，1957年1月5日，АВПРФ，ф.5，оп.28，п.122，д.485，л.19—49。

代表团前往中国”。[1]周恩来访苏后，中国与苏联并列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已经成为事实。正如中央情报局后来的分析报告所说：这“标志着又一个重要时代的到来——朝鲜战争的‘胜利’已有所预示——并确定了毛作为唯一健在并能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模范领袖的地位”。[2]

客观地讲，周恩来的这次出访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其影响也并非都是正面的。哥穆尔卡不接受“以苏为首”的说法，在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上仍坚持己见；卡达尔没有得到匈牙利期望的经济援助；南斯拉夫拒绝参加共产党国际会议，不愿与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取得一致立场，这些都是事实，也是令周恩来感到遗憾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周恩来这次访苏对中苏关系也产生了潜在的负面影响。在高喊“中苏团结”响亮口号的同时，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掩盖了他们在聆听周恩来“教诲”时不满和不安的心情。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他对周恩来说话的声调，感到“不大自在”，“有点冷丝丝的”。[3]对于中国人的这次坦率批评，赫鲁晓夫一直耿耿于怀，直到1959年10月中苏领导人发生争吵时终于爆发出来。[4]

问题的实质当然不在于赫鲁晓夫的个人修养不高，而是莫斯科感觉到一种来自北京的压力，感觉到中国地位的上升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权威的挑战和威胁。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已经倒下了。即使中共明确提出了对斯大林评价的不同看法，在中国仍然彻底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很能说明

〔1〕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6月7日，ЦХСД，ф.5，оп.49，д.41，pp.8862，л.16—17，《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1卷，第2838—2839页。

〔2〕中央情报局国际共产主义高级研究组的报告，1960年12月，1961年2月17日，CIA/SRS—15，FOIA，pp.1—33。

〔3〕《赫鲁晓夫回忆录》，第2268—2269页。

〔4〕Зубок В.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2，с.94—106.

问题的一个情况是，《斯大林全集》在1953年10月出版第一卷时，发行66818册，而到1956年12月出版第六卷时，只卖出6849册，下降了差不多十分之九。[1] 其必然结果，一方面是苏联在共产党世界领导地位的动摇，一方面是人们在期盼出现新的领导者，而此时中共形象和影响的凸显，自然会引起莫斯科的注意。还在周恩来出访之前，苏联使馆在一份情报资料中就指出，八大以后，中国有“一股公开自大和民族主义的潮流”，并列举了如下一些“看来不是个别的”言论：“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相比，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更有才智更为正确”；“从现在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转移到中国共产党手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2] 周恩来出访后，连匈牙利的党史研究人员也认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思想领导曾由德国转到俄国—苏联，现在已转到中国了”，中国在“革命实践中解决了许多新的问题，阐明、丰富了马列主义的理论”。[3] 这不能不引起克里姆林宫的警惕和不安。

世界革命和国际共运开始出现了两个平行的领导中心，这种新的领导机制，不仅构成了周恩来外交得以成功的前提，而且还在这次访问后得到加强，直到毛泽东年底出席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时达到了顶峰。然而，“天无二日”，在很大程度上，也恰恰是这种新领导机制的出现，悄悄地埋下了中苏同盟分裂的种子。

本章曾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冷战国际史研究》第6辑（2008年夏季号），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

〔1〕上海市档案馆，A22—2—555，第47—53张。

〔2〕苏联驻华使馆向外交部情报委员会提交的情报资料，1957年1月5日，АВПРФ，ф.5，оп.28，п.122，д.485，л.19—49。

〔3〕《内部参考》，1957年3月11日第2149期，第179—180页。

第七章

# 人民内部矛盾：中共对东欧危机的思考



北京大学学生在校园内购买刊有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人民日报》

1956年11月，东欧的十月危机过去了，华沙和布达佩斯也逐渐平静下来。然而，“波匈事件”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对于社会主义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影响却远未消失。1948年苏南冲突爆发时，社会主义阵营曾出现过一次“地震”，其结果是东欧各国被迫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1] 对于铁托的“反叛”，斯大林可以倚仗其权力和威望发动一次政治围歼战，通过召开共产党的国际组织会议解决问题。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了：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都已不复存在，莫斯科面对的也不是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而是成千上万走上街头的民众。如果不肯让步，那么通过武力（布达佩斯）和武力威胁（华沙）应对危机，似乎就成为苏联唯一的选择。中共领导人并非在原则上否定使用暴力手段，对哥穆尔卡的支持仅仅是因为他反莫斯科而不反社会主义，而当毛泽东认定纳吉已经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时，便坚定不移地提出了武力镇压的主张。[2] 然而，痛定思痛，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中共及其领导人不能不思考：导致“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条件在中国是否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东欧危机会不会在中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共作为执政党该如何应对在中国已经出现的群众闹事现象？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的问题出来后，中共的主要精力在于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调整执政方针和路线。通过召开八大，这些目的已经达到。现在突然又冒出一个“波匈事件”，而且其影响和震动远远大于前者。那么，中共

〔1〕详见沈志华：《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2〕参见本书第五章。

在“波匈事件”中究竟看到和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1]

##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不同声音

刘少奇及其率领的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国后，11月10日，中共召开了八届二中全会。参加会议的共296人，分为9组。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开了6天。[2] 会议由刘少奇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共讲了六个问题：中苏关于“波匈事件”协商处理的经过；发生“波匈事件”的原因；社会主义阵营是否巩固的问题；朝鲜问题；越南问题；中共的方针。

刘少奇首先指出“波匈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广大群众的反苏运动，是社会主义内部的问题”，接着提出这两个事件性质不同：“波兰事件非马克思主义有一些”，而“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取得领导权”。在详细介绍了“波匈事件”的处理经过后，刘少奇对这次“共产主义内部最严重的事件”分析了其发生的远因和近因。远因之一，波兰和匈牙利都是苏联解放的，在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没有把工人和农民阶级组织起来，也没有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知识分子没有思想改造；肃反中犯了错误，整了好人，真正的反革命却没肃清；工农缺乏阶级觉悟；对待民族问题也同样没有阶级观点。远因之二，重工业投资过多，不重视轻工业、农业，人民生活没有改善；领导人有特权，人民生活苦，群众不满。远因之三，搞教条主义，照搬苏联不灵，便失去信心；苏联干涉其内部事务，有大国沙

[1] 关于这个问题，凡是研究1956—1957年中国历史的论著几乎都会有所涉及，例如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但是专门的研究和论述却很少见。

[2]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记录：第一次会议，1956年11月10日。这次会议的报告和发言，除毛泽东1月15日讲话经整理全文发表外，其余都只节选了部分内容刊出或完全没有发表。本章所引相关文件，除注明者外，均为与会者个人记录。

文主义错误，损害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尊严。近因之一，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在党员群众中引起混乱；苏共二十大后控制不住，煽起反苏、反斯大林的浪潮。近因之二，事件发生初期，苏联处置不当，特别是波兰事件。近因之三，南斯拉夫进行煽动。谈到中共的立场，刘少奇说：我们的方针，第一点是中苏两党团结。第二点是做好我们的工作。第三点是给兄弟党提意见要谨慎。[1]

关于如何以“波匈事件”为前车之鉴，以免重蹈覆辙，刘少奇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防止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及各级领导人脱离工农劳动群众，形成新的“贵族阶层”。刘少奇指出：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刘少奇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也有一种条件，产生工人贵族这种阶层？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我想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关于防止新贵阶层出现的措施，刘少奇首先提出的是必须对权力有所限制，对人民实行民主：“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能对反革命阶级、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对人民群众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在人民内部只能实行民主。当然，这是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有些人所讲的大民主、无领导的民主。”其次，“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这包括缩小工资差别，取消特权等。还谈到了取消干部终身制的问题，刘少奇认为在这方面可以参考西方国家的做法，他列举了美国华盛顿、艾森豪威尔、马歇尔的例子，又借用毛泽东的话说：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

〔1〕中共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刘少奇报告，1956年11月10日。关于刘少奇的这个讲话，正式发表的部分内容见《党的文献》1988年第5期；中央档案馆编：《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上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

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最后，刘少奇讲到了经济发展方针的问题，强调说："我们工业建设的速度要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不至于上街游行，不至于闹事，还比较高兴，能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和积极性。"他赞同陈云的意见，也主张经济建设速度宁可"慢一点"，"稳当一点"。[1]

刘少奇的倾向是明显的，即在共产党内部找原因，所谈的预防措施，重点也是改进执政党的某些制度、政策、方法。报告把问题的落脚点锁定在经济方针，把"波匈事件"的教训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联系起来。

接着，周恩来作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周恩来先谈了"波匈事件"的两个教训：第一点，在中国，对周围兄弟国家也有个别大国主义的做法，对兄弟民族也还有大汉族主义倾向，也产生过领导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事情。周恩来特别指出，中国的特殊化和官僚化，是有封建特色的，"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第二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周恩来特别强调后者，提出"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但"如果不关心人民当前的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由此谈到经济建设速度问题。周恩来说，中共八大提出建设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或再多一点时间是恰当的，

〔1〕《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上册，第515—518页。

现在看来，时间可能还要长一点。周恩来委婉地指出：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可以放慢一点，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他以钢产量指标为例：原来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末达到年产3000万吨，照现在的速度不可能实现，所以八大确定的指标是2000万—2500万吨。从减缓工业发展速度的设想出发，周恩来又提出，八大建议的经济指标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都还“只是个建议”，也是可以修改的。周恩来认为：“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

为了制定1957年的经济计划，周恩来认为，应该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正确的评价。周恩来提出了“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而形成的看法：“基本上正确，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周恩来重点讲了错误：“第一次制定五年计划，不可能一下子制定得很恰当。一九五二年提出的五年计划是粗线条的，然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不断修改，而且每年的年度计划还要修改。计划不那么准确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地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1] 周恩来还专门讲了1956年的冒进问题。他说，从1955年年底反右倾保守开始，经济领域就刮起冒进之风，1956年势头更猛。虽然国务院主管经济的领导人一再刹车，效果却不理想。周恩来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说明1956年的计划“总的说是冒进了一些，就是数目打大了”，“各方面要求是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不容易控制”，失去了平衡。

关于1957年的计划，周恩来宣布了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的方针：保证重点，适当退却或适当收缩。周恩来特别提醒说：“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下来，不然站不稳，那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我们应该意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几十万或几千万人站在街上游行等等。”因此，国务院提出了一个生产控制数字，适当收

〔1〕以上引言见《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9—238页。

缩，主要是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还要减少国防和行政支出，冻结编制、预算以及国防和地方的结余，注意平衡物资，安排就业，再大力开展一次增产节约运动。[1]

第三个报告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陈云。11月11日晚上，陈云在全会上作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全会专门提出粮食、猪肉、食油这样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是因为当时这些基本生活品供应出现了紧张局面，并引起社会不安。首先是粮食紧张。陈云报告说，明年粮食将有50亿斤赤字，“明年春天会出乱子，不如现在收缩。”[2]副食品里猪肉供应紧张最为突出。陈云提出，增加生猪生产的方针就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同时采取措施解决饲料问题和适当提高收购价格。陈云还集中讲了对市场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刺激了农民的生产活动，活跃了城乡的物资交流，推动了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机构的改革。尽管开发市场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解决的办法不是收紧，而是在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开价格和管理。[3]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的报告，分别从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触及到现行体制和政策问题。这种触及当然是很有限度的，但执政以来中共领导人还没有如此重视制度的改进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波匈事件”的前车之鉴和国内政治经济的某些紧张现实，不能不使他们担心在中国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出这种忧虑的还不止是刘、周、陈。在分组讨论中，各地方和部门负责人都反映了不少问题——住房短缺、电力不足、钢材和生活日用品供应紧张等，还指出了许多官僚化和特殊化的现象——机关层次和人员应该减少，财务、警卫、用车、看病制度必须改革，干部子女需要教育等。大家普遍对这种局面

---

〔1〕以上引言见中共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周恩来报告，1956年11月10日。

〔2〕中共八届二中全会记录：陈云报告，1956年11月11日。

〔3〕《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26页。

感到担心，朱德说，“现在看起来问题很大”，东欧国家的经验值得重视，搞重工业要注意和轻工业的关系。董必武指出，冒进思想不解决，“二五”计划还会发生问题。西北组在讨论时反映，市场供需有矛盾，兰州衣食供应都紧张，如此下去，难免发生波兹南事件。[1]

仔细阅读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记录可以发现，会上也有不同的声音，这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插话、讲话和总结报告中。

在刘少奇做局势报告时，毛泽东的插话已经表露出某种不同看法。对于“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质的分析，中共中央内部似乎并没有分歧。但涉及到如何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如何处理中共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时，便显露出不同的倾向。比如，刘少奇谈到越南对土改时杀人过多感到“忧虑”，毛泽东插话：“我们杀七十万人，六亿人，千分之一点三。东欧就没有大张旗鼓杀人。革命嘛！”刘少奇谈到积累要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经济建设要稳当一点，右倾比“左”倾好一些。毛泽东插话：那要看什么右。[2]

特别是当周恩来、陈云的报告把汲取东欧国家的教训主要归结为实行稳妥的建设方针和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时，毛泽东感到有必要站出来扭转会议的大方向了。于是，他召集了一次小组长会议，并发表讲话。与周恩来“大冒了一下”的估计不同，毛泽东认为成绩是主流，失误是支流：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工业和轻工业生产都有所增长”。“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此外，对会上提出的改善人民生活问题，毛泽东讲话的重心同刘、周、陈的报告也有不同。他说：“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出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至于1957年的经济计划，毛泽东赞同在某些方面做适当压缩，但是仍然重申：“虽然如此，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是前进的”。最后，毛泽东提到阶级矛盾问题和对民主

〔1〕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简报和小组发言记录，1956年11月。

〔2〕中共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刘少奇报告，1956年11月10日。

的理解，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应注意仍然存在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1〕这显然是针对波兰和匈牙利出现的社会动荡而言的。

全会最后一天，11月15日，毛泽东作总结报告，更明确地表达了对中国应该如何吸取“波匈事件”教训的看法。〔2〕首先是关于经济方针，他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最不满意的地方就在这里。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针对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基本正确，成绩很大，错误不少”的估计，毛泽东说：“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特别是对周恩来、刘少奇有关冒进的提法，毛泽东告诫道：“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有些人曾经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那个时候有个‘促退委员会’。”毛泽东因此建议，把国务院预算报告中“稳妥可靠”的讲法改为“充分可靠”。

对粮食、猪肉供应这类民众生活问题，毛泽东也感到问题很大，要求领导干部好好把粮食问题研究一下。不过，与刘、周、陈主张尽量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态度不同，毛泽东再次强调：“群众要求办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

〔1〕中共八届二中全会记录：毛泽东在小组长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

〔2〕以下毛泽东11月15日的总结讲话，如无特别说明，均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3—329页。

还指责报纸一年来“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接着，毛泽东又突然提到镇压反革命问题：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这个戏，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毛泽东还强调，为了解放生产力，“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这种莫名其妙转化话题的做法说明，即使谈经济建设，毛泽东也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

针对东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已经丢掉，列宁这把“刀子”也丢掉相当多了。就在半个多月前毛泽东还支持波兰人，现在则认为：哥穆尔卡、匈牙利人拿斯大林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他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因此，“波匈事件”的教训就是：“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毛泽东又用很大篇幅专门谈“大民主”和“小民主”问题。“波匈事件”发生后，基层干部和知识界人士议论纷纷，很多人认为，苏联、东欧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革命胜利后没有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中国要避免重蹈覆辙，必须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来。11月初，毛泽东委托他的秘书兼英文翻译林克到新华社，找国际部主任王飞、副主任李慎之等人座谈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情况和问题，他们提出了议会民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分权削权、选举制度以及“大民主”和“小民主”等问题。李慎之还具体提出，应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在小学和中学设立公民课或宪法课；建立宪法法院等，他自以为这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1] 结果呢？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

〔1〕《林克日记》（手稿），未刊，第15页；李慎之：《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一段公案》，《百年潮》，1997年第5期，第47—49页。

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从来就不是一种制度，无论“大民主”还是“小民主”，都不过是阶级斗争和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而所谓“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斗蒋介石、斗地主阶级、土地改革都是“大民主”，私营工商业改造也是“大民主”。不过，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也可以“借用”这种讲法，实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目的是“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毛泽东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赞成“大民主”，甚至指出，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还要加上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游行。他告诫党内：“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

与刘少奇单纯批评“大民主”的做法不同，毛泽东在这里把无产阶级大民主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准备加以利用。不过，毛泽东当时并没有考虑采用这种方式解决执政党的官僚化问题，而宁愿采取整风这种“小民主”的方式。毛泽东郑重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这里所谓“武力”，就是指公开冲突，就是“大民主”。十年之后，毛泽东终于不得不用这种方式开展“文化大革命”了，而在当时，毛泽东以为通过整风就可以克服官僚主义，解决执政

党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是“波匈事件”后中共高层第一次全面讨论如何应对东欧风波在中国的反应。从以上的发言可以看出，对于“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质的分析，党内没有分歧，转到中国问题后，不同的声音便出来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认为主要是解决执政党本身的问题，毛泽东则强调同时也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必须防止执政党发生异化这一点上，大家是一致的，不过刘少奇、周恩来集中谈的是改革制度，而毛泽东更强调加紧思想教育。最大的分歧出现在如何调整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上。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反复提出应减缓发展速度，压缩基建和积累指标，以更大的投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防止出现东欧式的社会动荡。毛泽东对此很不以为然，尽管没有针锋相对地提出不同意见，但他的不满情绪已经溢于言表。

## “波匈事件”和斯大林问题再讨论

“波匈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11月11日，铁托在普拉发表了一篇演说，又在社会主义阵营掀起一阵风浪。与苏共、中共的判断不同，铁托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匈牙利发生的危机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批评匈牙利领导人请外国军队来教训自己的人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认为苏联第一次出兵干涉是“不必要的”，而第二次出兵虽然可能有必要，但却是“错误的”。铁托反驳了南斯拉夫应对匈牙利闹事和事态扩大承担责任的看法，认为这些观点来自“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由此，铁托提出了“斯大林主义”的本质问题。在铁托看来，尽管苏共二十大谴责了斯大林，但其认识却有相当的局限性，实质问题不在斯大林个人，而在斯大林所建立的制度：“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根源就在这里，这就是需要不断地坚持地根除的东西，而这也是最难

以做到的事。”[1]

普拉演说不仅批评了苏联处理匈牙利事件的方式，而且触及到社会主义的制度问题，因此立刻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强烈反响。作为苏共中央喉舌的塔斯社19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铁托的演说同南共联盟领导机关此前不久的相关说法“格格不入”，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的原则相违背的”；演说“流露出一种干涉其他共产党的事务的倾向”；把共产党分成“斯大林主义者”和“非斯大林主义者”的党，在客观上“只会危害共产主义运动”。苏共还特别批评了铁托关于个人崇拜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并将这一观点与西方“反动宣传”相提并论。[2] 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蒙古各国党报群起攻之，意共和法共领导人也相继发文章或做报告，谴责铁托及南共联盟。[3]

中共领导人同样特别关注此事。从11月25日开始，毛泽东接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并通知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着重议论铁托的演说。会议认为，铁托提出反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分子，完全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诬蔑，是西方分裂共产党、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恶毒做法。毛泽东说，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斯大林生前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分子，指的是跟着斯大林走的人。而斯大林是好人犯错误，所以，铁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彻底把他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现在看来斯大林主义还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为它基本上是对的，这把“刀子”不能丢掉。这是我们的资本，跟列宁主义一样。会议认为，如何对待斯大林和犯错误的同志，是一个分清敌我的根本问题。铁托

〔1〕见《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的评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15—37页。

〔2〕原载1956年11月19日《真理报》，见《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的评论》，第39—40页。

〔3〕参见1956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

要把犯错误的人赶下台，把他们当做敌人对待，是完全错误的。[1]

普拉演说后，苏联和东欧各党纷纷表态，对铁托进行指责。为了表明中共中央的立场，11月29日毛泽东提出，中共也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可以叫“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对铁托，对苏联，都要有批评，通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第二天，毛泽东将会议上讨论的意见归纳为四个基本论点：第一，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办法解决各自的问题。各国革命都有具体的民族特点，十月革命本身也带有一些民族特点。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其共性，条条道路通莫斯科。第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有缺点，是难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但苏联的专政基本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第四，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铁托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斯大林和其他与他观点不同的同志，是错误的；把这些同志称为斯大林分子加以攻击，是分裂共产主义队伍。

在12月2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文章的设想和要点：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讲清斯大林主义。应明确地讲，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三、讲清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

〔1〕关于1956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一系列会议的情况，由于当时没有正式的会议记录，而列席会议的吴冷西做了详细笔记，这成为有关会议情况的唯一史料。据说，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的有关叙述，主要也是源于吴冷西的回忆录。此处及以下关于政治局会议的讨论过程和内容，如无特别说明，均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第62—82页。

反对民族主义。四、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要分清两类事件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的反苏反共风潮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要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问题。五、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观点，特别是批判斯大林时的一些论点和采取的方法，否定一切的做法，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要明确提出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六、文章从团结讲起，最后也落脚到团结。关于文章题目，毛泽东考虑也可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最后，毛泽东指定他的两个秘书胡乔木和田家英以及吴冷西起草文章。三人商议分工之后，各写一部分，最后由胡乔木统改全稿。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文章初稿，提出了很多意见。经胡乔木等人修改后，政治局于19日和20日连续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该修改稿。会议提出的问题主要有：一、对匈牙利事件不宜写得太细，不必提是否可以避免的问题。文稿关于群众闹事是可以避免的说法过于简单化，因为“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性质的，但群众是无罪的。回避苏联第一次出兵的问题，而明确肯定第二次出兵是正确的。二、苏共二十大有积极意义，纠正斯大林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结果造成右倾危险和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毛泽东强调，文章的主要锋芒应该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三、毛泽东反复强调：“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对矛盾是基本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从存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矛盾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四、要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的共同道路。

关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集中点”。会议认为，在指出错误的同时，文章应该毫不含糊地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斯大林虽然有肃反扩大化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但其中都有他

正确的一面：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杀对了，只是扩大化而已；在对外关系方面斯大林还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兄弟党，援助社会主义国家的。会议特别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制度不是万能的，要靠人来运用"。毛泽东强调："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对客观的认识正确与否，在这里起着重大的作用。斯大林不同意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转化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分子，"是一种诽谤，颠倒了大是大非"。

这次会议"讨论得非常详细"。归纳起来，中共领导层进一步在思想上明确了以下逻辑链条：苏联以往的错误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斯大林个人的认识问题；但是，又必须为斯大林辩护，因为保护斯大林就是保护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尽管有缺点；苏共二十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搞非斯大林化，才引起修正主义和右倾思潮泛滥；所以，"波匈事件"的关键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镇压和肃反不彻底。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考虑敌我矛盾的大背景。

文章按照这个思路又修改了两天，12月22日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讨论后，认为可以拿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23日和24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采取分段议论的方式，再次对文章提出修改意见。主要有：修正主义思潮的要害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资产阶级民主"；强调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继续明确"以苏联为首"，反对国际共运中的"多中心论"；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毛泽东又讲了两点意见。一是从理论层面解释"波匈事件"的起因，分析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明如果处理不好，非对抗性矛盾可能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二是再次明确指出要为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成就辩护，并强调现在只有中国有资格出来辩护，因为中共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些新的做法"。此外，经过反复考虑，毛泽东决定删去文中有关"和平过渡"问题的一段文字。此时中共对于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主要有两点不同看法，即

斯大林问题和“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大概是想在这篇文章中集中解决前者，而避免引起与苏共的争议。

从12月27日下午到28日清早，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文章最后定稿。毛泽东决定，28日广播，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发表时，题目定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再论》）。[1]

中共最高层如此重视一篇文章，数度开会，反复讨论，八易其稿，除了1945年和1981年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外，在中共历史上实属罕见。原因在于，这不是一篇一般的文章，而是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思考的结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共必须应对苏共二十大、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铁托和陶里亚蒂等共产党领导人，以及西方政界人士和舆论媒体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从理论上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全面阐述。

与《一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相比，《再论》反映了“波匈事件”爆发后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本人思想变化的轨迹。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共高层在议论中虽然也提到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思考的重心在批判教条主义，强调如何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2] “波匈事件”及其引发的国际风波，迫使中共的思路转向，把批判的“主要锋芒”对准修正主义，强调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共同道路”。当然，开创了中国革命道路并且正要继续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毛泽东，并不是要改变自己另辟蹊径的思路，因为很显然，即便是强调“共同道路”，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反对教条主义。问题是，“波匈事件”的震动，铁托“普拉演说”的发表，已经威胁到社

〔1〕关于文章起草和初稿讨论的过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第607—608页）与吴冷西的回忆差距很大。由于看不到原始材料，无从对此作出是非判断。所幸对于讨论的内容，两者的描述大体一致，因此不影响读者对实质问题的理解。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7页。

会主义的发展和国际共运的团结。更为重要的是，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道路本质上同苏俄经验、列宁主义乃至斯大林主义是一致的，而“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否定了苏俄的经验，否定了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也就否定了中共自己所奉行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同沿袭苏联经验、移植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相比，否定苏联道路、抛弃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是更大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中共第一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尽管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界定，但从中共高层的讨论中可以确定，所谓修正主义即否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此后，“修正主义”的概念在中国被官方沿用二十余年，成为著名的政治批判符号。

《再论》发表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普遍反响，各国共产党机关报刊先后转载。反应最为强烈的是苏联。《再论》发表的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就几乎全文转载。在1956年底的克里姆林宫除夕联欢会上，赫鲁晓夫特意走下主席台与中国大使刘晓拥抱、接吻和干杯，称赞这篇文章“非常好”，他本人“完全同意”，还请刘晓与苏共中央主席团坐在一起。其他苏联领导人也纷纷表示赞许。〔1〕苏联民众对《再论》的反应更加热烈。转载《再论》当天的《真理报》发行了约2000万份，之后还印发了100万册单行本。文章刚一刊出，苏联国内就有许多读者打电话、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表示对文章“非常满意”。有读者说：“我参加共产党三十年了，据我评判，这样的阐明斯大林功过问题深刻地符合我们内心感觉，符合每人的心意，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读者说：“我不能不对中国同志表示感激，他们这样公正地评论我党。”一些读者认为《再论》“给目前国际形势和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走的历史道路以深刻的马列主义的分析，对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有巨大的意义”。《真理报》总编辑萨丘科夫告诉中国记者，“许多宣传员认为这篇文章是创造性运用马列主

〔1〕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年1月5日，第117页。

义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问题的典范”。[1]苏联大学生最感兴趣的是关于斯大林和铁托问题的分析，他们完全同意对斯大林问题的分析。有的说，《再论》说出了我们人民心里的话。还有的说，如果斯大林尚在，“波匈事件”不可能发生。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看出中共和苏共在斯大林问题上有分歧，但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结论。[2]

从中国驻苏记者的报道看，苏联各方高度评价《再论》，主要是因为它充分肯定了苏联的基本经验和斯大林，在对匈牙利事件和铁托演说的问题上，保持了与苏联基本一致的立场。在一片反苏的国际舆论中，这对苏联无疑是强有力的支持，正如苏联读者所说，“这对于打击目前反苏叫嚣很有作用”，“是中苏巩固友谊的再一次宣言”。[3]中共在历史上受过斯大林的压制和怀疑，也对苏共的某些做法进行过抵制，而现在既坚持苏联道路和斯大林主义的基本立场，批判反斯大林主义的“修正主义”，又有分寸地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教条主义，给人的感觉是立场坚定、态度公允、目光远大。《再论》的发表，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誉和威信。无怪乎有些苏联人在盛赞的同时，表示出对自己领导人的不满，说赫鲁晓夫应该到中国去学习。甚至有人说，世界上出现了伟大的列宁继承者毛泽东，苏联人民已由斯大林崇拜转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拜了。[4]

尽管中共领导人赢得了如此赞誉，但他们同波兰、匈牙利执政者一样，也需要应对国内的复杂局面和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

---

〔1〕《内部参考》，1957年1月10日，第193—194页。

〔2〕《内部参考》，1957年1月4日，第51—52页。

〔3〕《内部参考》，1957年1月10日，第193—194页；1月4日，第51—52页。

〔4〕《内部参考》，1957年1月4日，第52页。

## 中国社会的反应和"少数人闹事"

"波匈事件"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丝毫不亚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除执政党外，整个国家也在积极思考。就中国社会而言，对"波匈事件"作出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基层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民主党派和私营工商业者。不过，这些人只有言论而无行动。相反，一般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虽然对东欧事变没有表现出兴趣，甚至也不了解，但是对切身利益的关注使得他们中许多人采取了与"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非常类似的举动——退社、罢工、罢课、请愿和游行。这确实给执政的中共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

首先作出反应的是基层干部、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他们对"波匈事件"的反应最为敏感，产生了许多疑问。

人们对波兰、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普遍感到意外——在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也会发生群众暴动和示威游行，并且提出了许多疑问：匈牙利的暴动如果是反动的，为什么有许多群众参加？如果是合理的、正义的，为什么政府又要镇压，苏联军队也出来了？开始报上说是暴乱，后来又说是革命，到底革命对象是谁？纳吉说要保卫革命的果实，是指匈牙利建国以后的果实，还是指这次事件的革命果实？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去波兰是否妥当？匈牙利请求苏军帮助平息叛乱是否合适？波兰和匈牙利的民主化是否做得有些偏激？他们提出要求独立、主权是什么意思，难道苏联妨害了他们的主权和独立？他们提出要求苏军退出波兰、匈牙利，是否会使华沙条约组织陷于瘫痪？如此等等。[1]

在感到意外和疑惑的同时，人们对"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质也

〔1〕《内部参考》，1956年11月5日，第127页；11月2日，第61页。

作出了各自的解释。一种看法认为，匈牙利的党已经被资产阶级篡夺了，党已经变质了，建立了十几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被颠覆了，这都是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打击得太厉害引起的后果。但更多的人认为事件源于苏联对外政策的错误，如果苏联早一些检讨和改正过去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错误做法，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对于苏军在布达佩斯出兵镇压的行动，有人认为有干涉内政之嫌，给帝国主义以借口，而且容易激起匈牙利的民族情绪。清华大学有教授说，"波匈事件"是革命输出造成的后果。上海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问题争论很大，有人认为苏联出兵是"走错了一着棋，很被动"，这样做"不符合华沙条约规定，因为华沙条约是对付外来侵略，不是对付内乱的"，"苏联出兵是把小国当作自己的支部一样"。[1]

无论把事件起因归结为苏共二十大还是苏联对外政策，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被视为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很多人的看法已经深入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乃至制度层面。上海一些职工、干部、工商界人士就认为，波、匈共产党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不关心群众生活，结果"官逼民反"。还有人认为是党内不团结，同中国的高饶事件差不多。更有人挖苦说："天天夸社会主义，夸了半天闹成这样。"[2]

最敏感的议论是，人们从一系列国际事件联想到了中国。尽管不少人认为中国党处理问题稳妥，对于斯大林问题比较慎重，马列主义水平比较高，但还是有许多人看到了国内存在的同样问题。如民主建国会山西省委副主任委员胥以恒认为，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证明党和政府工作上有缺点，这应该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3] 与胥以恒的含蓄相比，北京大学气象系四年级学生胡伯威的批评则尖锐得

〔1〕《内部参考》，1956年11月1日，第3—9页；11月5日，第127—128页；11月6日，第167—168页。

〔2〕《内部参考》，1956年11月6日，第167—168页；11月5日，第129页。

〔3〕《内部参考》，1956年11月1日，第5页。

多，也最具代表性。10月27日，胡伯威致信《人民日报》，指责中国报纸对所发生的国际事件封锁消息，他说："报纸应该尊重自己的读者，将事物真面目不加修改和粉饰地反映出给读者"。"一个能够把自己的思想建筑在对事物的真实情况的了解上的人，才名副其实地是思想有自由的人"，而在中国，"只有报纸来提供这种自由"。他严厉地指责《人民日报》关于波兹南暴动以及"波匈事件"的报道"粉饰现状"，报喜不报忧，"令人作呕"。信中表达了一个善于思考的中国大学生对民主和自由的看法："我坚决相信民主自由的充分发扬，人权和人的尊严得到真正的（不是口头上的）重视，党的宣传工作忠实地遵从这些原则，才能把人民群众真正放到主人翁的地位，这才对社会主义有极大的好处，人民群众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会变得聪明，成熟，有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热爱之情，才能以雪亮的眼睛来防止和消灭种种可能发生的弊病，消灭骑在群众头上的官僚主义和腐朽倾向。"[1] 胡伯威的来信已经超出当时执政党意识形态所能容忍的程度，但还有更为极端的言论。比如，在北京钢铁学院的食堂等几个地方，就出现了粉笔写的标语："反对目前社会制度"，"我们要民主自由"，"中国人民处于悲惨的情况中，青年们行动起来吧"，"支持匈波人民的斗争"。[2]

事实上，知识界和工商界对中共现行政策的不满情绪，在此之前已经有所表露，东欧的动荡不过更加强化和刺激了这种情绪。还在1956年初，自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各部门收到的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来信就大量增加。据不完全统计，至5月底，中共中央及所属机关共收到来信5200件，普遍反映对知识分子政策不满。[3] 工商界很多人则对中共给资本家代理人和小资本家定为资本家成分的政策有意见。无锡市资本家代理人普遍说，资本家已经固定五厘利息，

〔1〕《内部参考》，1956年11月10日，第295—298页。
〔2〕《内部参考》，1956年11月5日，第129页。
〔3〕云南省档案馆，7—1—804，第1—4页。

企业基本上由国家管理，我们在国家领导下工作，靠劳动，拿工薪，再戴资产阶级的帽子，实在冤枉，纷纷要求献出股份、摘掉帽子。南京很多小资本家半年定息只有5元钱，最少的仅一角七分，却为此带上了资本家的帽子。南京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康永仁反映："摘除这些人的资产阶级帽子，对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有好处的。"[1]

如果说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还仅仅是对中共某些具体政策和做法提出意见和建议，那么在"波匈事件"前后中国社会的不安定局面，则主要表现为农民退社、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这些情形在1956年下半年继续发展，甚至日趋严重。

1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报告：数月来，特别是全省大部分农业社转为高级社，并进入秋收和准备年终分配以来，各地不断发生社员闹退社的严重情况。据不完全统计，退社农民已达7万余户，已经垮掉的社有102个，正在闹退社的还有12.7万余户。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与辽宁、安徽、浙江等8个省电话联系，秋收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中，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总户数的1%，多者达5%。正在要求退社的农户比例更大，如浙江省的宁波专区，想退社的占20%左右。另据新华社内部报道，江苏、山东、贵州等省，退社的情况还要严重，有的地区比例高达10%，甚至很多党员都"要求单干"。辽宁、湖北都是农业丰收省份，也同样发生了社员退社的现象。就连新疆、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都出现了大规模农民退社的情况。[2]

关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退社的情况，据辽宁省手工业管理局9月29日统计，已正式被批准退社的社员有524人。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全市90%多的独立手工业者都参加了合作社，但高潮过后就

---

〔1〕《内部参考》，1956年9月24日，第621—622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622、643、649、655页；《内部参考》，1956年10月19日，第1086—1087页；10月24日，第1178—1179页；10月30日，第1337—1338页；11月6日，第178—179页；11月21日，第499—502页；12月29日，第671—672页。

出现了社员要求退社的迹象。这种情况在目前供不应求的缝纫、制鞋两个行业中最严重。另据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的粗略统计，从2月以来，已经批准退社的小业主有535人。有一个五金联社，退社的小业主涉及到50个基层单位，共计398人。[1]

当时还报道了大量工人罢工请愿的情况。如内蒙古森林工业管理局所属的单位，从6月到9月已经发生了6起工人罢工请愿的事件，参加者少则数十人，多则300人。10月29日福州市发生了60多名筑路民工集体向市人民委员会请愿的事情。“波匈事件”发生以后，情况更加严重。到12月上旬，上海轻纺工业已有53个合营工厂1834人因工资和福利问题先后发生罢工、怠工、请愿和其他闹事事件。其中罢工的有10个厂，116人；怠工的有3个厂，60人，请愿的有2个厂，29人，在厂内闹事，包围公方代表，准备罢工、请愿的有38个厂，1629人。[2]

学生罢课、请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9月15日在成都的第二机械工业部所属两个技术工人学校，400多学生开始罢课，要求转学和分配工作。参加者很快增加到800多人，并集体到四川省委和市劳动局请愿，还殴打干涉他们罢课的同学，随意破坏公共财物，甚至与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此外，还有300多人在成都游行示威，向中级法院请愿、控告。至10月底，学校已陷入严重混乱状态。12月下旬，陕西省少数学校的学生发动了集体签名，强硬要求用罢课或绝食等办法对学校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表示抗议。[3]

“波匈事件”后，中国社会的动乱局面确有扩大趋势。1957年3月官方文件指出：“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

〔1〕《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6日，第1258页；10月31日，第1547—1549页。

〔2〕《内部参考》，1956年9月24日，第615—616页；11月15日，第367—368页；12月17日，第342—343页。

〔3〕《内部参考》，1956年10月30日，第1328—1331页；12月26日，第561—564页。

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1]尽管从目前看到的史料，还不能说中国发生的这些事件是直接受到国际风波的影响，但就各地闹事的缘由而论，与波兰和匈牙利出现的危机颇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即都反映了人民大众对执政者的强烈不满情绪，而这种情绪长期受到压抑，一朝爆发，便成烈火之势。

农民和手工业者退社，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管理上的问题比较严重，经济收入不如入社之前。至于工人和学生的罢工、罢课、请愿、游行，基本上也都是因为工作条件、生活待遇问题没有解决好，或者是出于对基层管理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满和反抗。[2]纵观各方面的材料，所有事端的起因都是个别的和局部的“琐事”，就每个具体事件看，规模并不大，程度也不算严重，与波兹南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无法相比，所以当时被毛泽东称为“少数人闹事”。但是，这些事件涉及不同的地区和人群，却有着大体相同的起因。综合起来看，问题的存在是带有普遍性和全局性的。中国社会底层的各种困惑、不满、骚动，与“波匈事件”的震撼和反响交织在一起，在1956年下半年构成了一种虽不过分紧张，但又令人不安的局面。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确实有些担忧了。

## 中共采取的各种让步和安抚措施

各地发生的“闹事”和社会问题，中共在召开八大时已经有所察觉。这一点，在中共八大的各项报告以及大会发言中均可看到。[3]对于前述一些地方党委的报告，中共中央也及时作了批示和转发。如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54页。

〔2〕《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4日，第1178—1179页；10月26日，第1258页；10月31日，第1547—1549页。

〔3〕详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

9月29日、10月15日，中共中央分别批转新疆区党委和福建省委的报告，要求各地参照这两个报告，贯彻中央关于整顿干部思想作风、克服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精神。[1] 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实际上也是要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

八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又批转了一些地方报告，并发出一些相关指示或通知。1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各农业合作社在当年秋收分配中，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对包工包产不合理、劳动报酬定额不够准确的问题加以清理，在实行超产奖励、减产处罚的制度时，采取多奖少罚的原则；对入社生产资料作价不合理的问题，也要好好清理一番，把社员应该交纳的股份基金计算清楚，欠交的应该尽力补交，多余的应该分期偿还；对农业社干部的报酬，应该根据本社的具体情况和合作社章程规定，对于不合理的部分加以适当的调整。[2] 11月30日、12月24日，中共中央分别批转河北省委、广东省委的报告，在批示中告诫各地党委，"急急忙忙"让富裕中农入社"本来是不策略的"，因此让一部分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对坚持退社的手工业者和其他行业从业人员，可以允许他们退出，不必勉强把他们留在社内。批示还注意到合作社内困难户的问题，要求从公益金中给予适当补助，必要时可暂时给以土地报酬。[3] 时近年末，中共显然希望通过调整年终分配方案和有限度地放开退社的口子，平息各地的退社、分粮、请愿风潮，缓和农村基层的矛盾。

在解决农村问题的同时，中共还着手解决城镇手工业合作社社员退社的问题。1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手工业合作社社员退社，一方面是自由市场放开后，个体手工业营业"突然

〔1〕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第622、630页。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413—421页。
〔3〕《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第640、648页。

兴旺起来”，这对合作社社员是“很大的刺激”，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后，手工业社社员收入减少了。文章更多地是批评某些合作社组织，“没有认真执行党和政府关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在分配上先积累，后工资福利，把积累额定得过高，致使社员收入下降；在生产上不顾客观条件，把不该集中的也集中起来，甚至高度集中，社员的积极性不能发挥，业务不能开展，给群众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在小业主的使用上，没有量才录用，或者给以适当安排；在技术手段上，追求机械化、工厂化，把公积金定得过高，处处向现代化工厂看齐。文章提出要对手工业合作社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在检查中发现积累比例偏高的，要适当降低；不该集中而又已集中起来的，要迅速分开；对小业主和辅助劳动力安排得不合理的，要加以调整；工资不合理的，应当适当调整；管理机构庞大的要精简；对其它不合理的经营管理制度，也要按照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加以改变”。[1]

与退社现象相联系，1956年下半年，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一个新现象：一些原私营工商业户开起了“地下工厂”、“地下商店”，个体手工业生产也日趋活跃。9月份上海市手工业个体户为1661户，从业人员5000多人；10月份就发展到2885户，从业人员8100多人。广州市9月份一个月内，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增加1100多人。武汉市合作化后，个体手工业者只剩2000人，到9月份又增加到将近8000人。天津、北京、青岛、郑州、成都和广西等省市，个体户和从业人员也是成倍增加。有人认为，这种情形的产生，是因为八大后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自由市场，直接刺激了个体手工业的发展，使原私营工商业“死灰复燃”。有些干部担心“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又要泛滥了”，这样下去会妨碍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2]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看法和态度却有所不同。

〔1〕195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
〔2〕1956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12月7日，毛泽东与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批评了中共内部“左”的空气：“我们一些同志对资产阶级只批评不鼓励，不认识资产阶级这几年有很大的进步，对资产阶级应该采取又批评又鼓励的方针。”毛泽东承认，公私关系上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跟不上，不能怪下级，只能怪上面”，还说：“资产阶级中，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是个别的，整个阶级不能说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现在有些文章太‘左’了。合营了，没有对抗了，合营前已经没有对抗。民建、工商联、民主党派同我们是合作的，看不到对抗。”说到“地下工厂”时，毛泽东指出：目前中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但自由市场和地下工厂能够发展起来，这说明“社会有需要”。应该“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毛泽东以制衣业为例，主张私营工厂与合作社竞争，并把这叫做“新经济政策”。“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工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第二天，毛泽东再次同工商界人士谈话，肯定“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们感觉熟悉了，更加靠拢了”。还说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对与会者提出的许多问题，毛泽东说对他帮助很大，而且承诺政府会和他们商量，协商一个办法，凡是能够解决的总要解决。[2]

12月17日，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也说：各地地下工厂不少，天津就有200多。有些资本主义或小生产者，有什么不好呢？这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29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上，副委员长黄炎培发言提出私人开厂的问题时，刘少奇又说：“有一些资本家，他每年分的定息很多，有分到百把万元、几百万元的，他一家子一年用不了这么多钱，如果他们要盖工厂，是否可以准

〔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67—170页。
〔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74—177页。

许他们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1] 刘少奇的话同毛泽东的谈话如出一辙，甚至比毛泽东更放开。一个细小却涉及实质的差异是，毛泽东认为自由市场的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刘少奇则认为私人工厂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不过在当时，这样的差异还没有影响到中共领导人对私人开厂的看法。《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公开表明对个体户的态度。社论肯定手工业个体户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增加了市场的商品供应；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城市的就业人数”，“这是对国家有利无害的事情”。[2]

三个月前，中共八大刚刚宣布“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现在又说“可以开私营工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而且“十年、二十年不没收”，这不能不说是政策性的重大调整。

缓解社会紧张，平息各地“闹事”，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解决国民生活问题。1955年起，由于过分偏重国家基本建设，日用品生产受到挤压，加上各地争抢高速度，导致物价上涨，商品供应紧张。以大城市上海为例，“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所带来的生产建设高潮，特别是发展农业四十条纲要草案提出以后，全国农业的生产劲头很大，纷纷购置各种生产资料和文教卫生用品，带动整个工业生产的发展，对上海市场提出了大量需要，原来上海认为积压的一些商品，很快定购一空，成为紧张商品。”当时国营商业部门曾想了不少办法开辟货源，满足生产方面的需要。下半年，上海的生活消费品供应也跟着紧张起来。八九月间，全国范围内在提高工资基础上的工资改革陆续结束，增加工资后的社会购买力，很迅速地集中投入消费品

[1]《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82、383页。
[2] 1956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市场。再加上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上半年定息也在这一时期发放，更增加了对消费品市场的冲击。呢绒、绒线、针织品、家具等供不应求，部分高级消费品如自行车、无线电、手表、钻戒等，也畅销起来。工业消费品市场十分活跃和紧张。副食品的供应也很紧张，特别是猪肉来源较紧，减少了供应量，居民发生排队抢购的现象。[1]

面对压力，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在安排计划时强调注意人民生活。12月18日，因周恩来出访而任代总理的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提出了“在照顾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民生条件下来搞建设”的观点。他主张“保证必需的民生，有余再搞建设”，还提出要找出一个“民生和建设正确关系的标准”。[2]虽然很难说这是要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方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便作为权宜之计，国民生活也已经被国务院摆在了基础的位置。其主要的做法就是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国民生活。八届二中全会前，各地上报汇总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为243亿元，全会决定调低到135亿元。陈云对这个指标仍有疑虑，于是在12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提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削减。[3]会后，国家经委经过仔细计算，果然认为基本建设投资还可以削减。12月27日、30日，陈云两次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主张将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削减到114亿元，还说“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陈云意味深长地指出，这样做“可以避免犯东欧国家的错误”。[4]

为了解决企业职工提出的问题，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工人阶级问题十人小组（以下简称“十人小组”），由刘少奇主管。12月17日，

---

〔1〕《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29—430页。

〔2〕《陈云文集》第三卷，第134—135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065页。

〔4〕《陈云文集》第三卷，第141、143页。

刘少奇召集“十人小组”和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负责人开会，座谈劳动调配、工业基础、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等问题。刘少奇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如工厂用人可以考虑采取“劳动合同”的方式；“建立新工业基地，要研究轻重工业的配合问题”；企业管理可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管理委员会，“它又是领导，又是监督，主要是监督，是权力和监督机关”，并且不无担忧地指出，这些问题“不解决要出乱子”。刘少奇还告诉与会者，中央要“全面讨论”工人问题，要求各种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能解决的应作出决定加以解决，不能解决的要有交代。[1]

做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自然也是安定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上半年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即在内部系统开始了一次检查工作。从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的反映看，不仅对中共各级统战部门有意见，而且对各单位内部许多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更多。于是，中共中央在12月26日作出指示，要求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重点转移到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部队，主要检查这些单位中的中共党员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中共承认，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是，在党派关系上，我们的许多同志不承认或者不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平等地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或者加以歧视和排斥；在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内部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上，很多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想积极工作而不可得；在民族关系上，许多同志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自治权利”。指示要求各地和各单位“一边检查，一边解决检查中发现的问题”。[2]

总的说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以后，对各地“闹事”和社会实际问题，中共和政府的主旨显然是调整原有政策，采取了某种“让步”

〔1〕《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81—382页。

〔2〕《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一册，第546页。

的姿态。不过，还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波匈事件”后的社会思想动态。对此，毛泽东看得比较严重。

##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

1957年1月18日至27日中共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思想动向问题。[1]

毛泽东在1月18日的讲话似乎非常严厉，他一开头便指出：“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首先出现在党内，如争名夺利、贪图享受的思想在党内有所发展，一些领导干部对农业合作化优越性有怀疑态度，反映富裕中农思想的单干风有所抬头。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学校里学生闹事的背景，一是学生中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富裕中农家庭者占80%，一是受国际事件影响，“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毛泽东特别指出：“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随后，毛泽东便用主要篇幅专门讲国际风潮对党内和国内的影响，从尖刻的言词中可以看出，对于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他是毫不留情的：苏共二十大“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

---

〔1〕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15页。以下引言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0—362页。

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子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接着，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中共的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都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这里闹一下，那里闹一下，要搞大民主。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他们无非是要推翻共产党，结果就暴露出来。“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对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最后提出：“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1月27日的讲话，毛泽东重点谈了“闹事”问题。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分析，认为闹事就是对立面的斗争：地主、资本家闹事是因为他们心怀阶级仇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议论纷纷是因为他们都讲唯心论，大学生闹事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至于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发生的少数人闹事的原因，一方面是“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是“工作方法不对头”；一方面“是反革命和坏分子的存在”。由于对立面的斗争是永远存在的，“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对待“闹事”的态度，毛泽东主张既不提倡，也不害怕，要有充分的准备和积极的态度，这是一种“领导艺术”。他以匈牙利为鉴

说："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成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闹得对的，就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闹得不对的，就驳回去。既"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也"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不能学段祺瑞"。应该耐心地做大多数闹事者的分化、引导和教育工作，而"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至于那些没有行动，只有言论的人，毛泽东主张后发制人的策略："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总之，毛泽东最后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学问，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看，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毛泽东的这番讲话，已经蕴含了他后来发动"反右派"运动的思想基础。不过，笔者并不认为此时毛泽东已经在设计"引蛇出洞"的"阳谋"。显然，当时中共急需解决的问题不在这里。从"波匈事件"后中共召开的几次会议和应对国内局面采取的方针可以看出，作为执政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共面对着三个问题，即中共各级领导人的官僚化和特殊化，这是引起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

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普通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由于中共政策方针的偏差可能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不过，工农大众不会反对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会随着执政党自身的作风改变和政策调整而得到解决；党内外知识界（包括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的“奇谈怪论”，这些言论本质上是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但由于建国以来阶级斗争搞得比较彻底，所以他们的力量和影响都有限，不会闹出大乱子。因此，要避免中国社会出现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危机，首先要解决的是前两个问题。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思考，毛泽东提出了他的著名学说——“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以此作为开展党内整风的指导思想。

本章曾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
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第八章

# “开门整风”：毛泽东决心整顿共产党




1957年，整风运动中游行的队伍

在共和国史研究中，1957年最受国人关注的就是整风反右运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意见认为："整风和反右实际上是一回事"，发动整风就是为了反右，而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设计了"引蛇出洞"的策略。[1] 但笔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毛泽东确实设想并发动过一次整风运动。就打击的对象和运动的方式而言，整风和反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而且，整风本身在不同的阶段，其内容差别也是十分明显的。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希望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打击共产党内脱离人民大众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接着想要借助党外知识界的力量完成这一任务。后来转入反右派运动，却变成以"急风暴雨"的方式打击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上一切对执政党不满的言论和行动，而运动后期的整风，则是在整个社会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党内整风转为全民整风。其中只有一点是贯彻始终的，即所有这些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本章的研究，旨在说明1957年整风运动的缘起。

## 毛泽东着手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波匈事件"，特别是在匈牙利出现的动乱，使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已经取得胜利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这种危险的国

〔1〕最有代表性的论述见李慎之的《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114—115、124—125页）、章立凡的《风雨沉舟记》（《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第45页）等。

际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国外的反动势力，他们企图鼓动和利用国内的反革命力量推翻共产党政权；国内根源则在于人民大众对执政党脱离群众的作风和某些方针政策的不满和对立情绪。至于在中国，毛泽东和中共认为，经过镇反、肃反，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因此不会出现与国外反动势力结合的危险。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于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决定以此作为指导思想，采用民主的方式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早在苏共二十大提出批判斯大林问题以后，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中共就感到有必要在党内开展以学习理论为主要形式的整风运动了。1956年6月，中共中央在一个通知中提出：为了“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有必要在党的干部、研究人员和高等学校毕业班学生中，“分期分批”开展一次学习运动，“到1957年7月结束”。[1] 尽管还没有直接提出整风，但其意图是明显的，即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批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不久，批判对象又加上了官僚主义。[2]

这一阶段，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中陆续披露出党内工作作风的严重问题。如湖北省襄阳专区在夏收预分中“发现许多农业社干部有严重的贪污行为”。长春市企业领导机关“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平时只顾完成生产任务，不关心工人疾苦，妨碍了职工的积极性。内蒙昭盟地区干部“严重违法乱纪”，仅据八个旗县的

〔1〕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汇编（1949—1956）》，北京：学习出版社，1993年，第1153—1154页。

〔2〕见彭真：《克服官僚主义作风》，1956年8月16日，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6）》，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652页。

材料，一年多来就发生非法逮捕拘留事件152起，预审及监所管理违法乱纪事件32起，非法搜查与捆打公民70起，因工作方法不当而造成的严重事件13起。由于干部在工作强迫命令的做法和无视百姓生活的错误，浙江省宁波地区连续发生“群众自杀事件”，仅慈溪县就有91起，宁海县有78起，涉及的乡镇达60%—85%，而且“自杀者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1]这不能不引起执政者的密切关注。

中共八大召开前，毛泽东在第一次预备会议上就提出：“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2]在八大开幕式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3]在此前后，报纸上开始报道各地开展整风运动的消息。[4]刘少奇甚至向印度共产党代表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整风经验”。[5]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最初提出的整风方式主要是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而且是在党的内部进行，这与后来开展的邀请党外人士对共产党提出批评的整风运动是有重大区别的。第二，之所以选择“学习文件”和“思想教育”的方式进行整风，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中共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与苏共相比，虽然也有，但

〔1〕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5月30日，第557页；7月3日，第19—20页；9月13日，第320—323页；9月17日，第450—452页。

〔2〕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

〔3〕《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7—10页。

〔4〕1956年9月1日、10日、12日、16日《人民日报》。

〔5〕《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75页。

是并不多。[1]不过，毛泽东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防止“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11月15日，毛泽东在全会最后一天作总结报告时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接着又郑重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至于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和风细雨”。[2]正式提出的整风，除了“学习文件”，又增加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容。但有研究者注意到的，“全会公报的用词表明”，开展整风只是毛泽东“个人的呼吁而不是官方的指示”。[3]可以印证这种判断的是，胡乔木11月23日在社会主义学院讲述八大的基本精神时，反复讲到反对官僚主义和实行民主化，对整风却只字未提。[4]甚至几个月后，康生在作报告时仍然认为：“二中全会主席提出准备开展整风运动”，只是一次“新的学习运动”。[5]这就是说，中共中央当时尚未就开展整风运动问题形成一致意见，更没有做出决议。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3个月后再次提出开展整风运动的主张时，把启动日期推迟了半年。

---

〔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01—102页；《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5—8页

〔2〕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12—613页。

〔3〕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276页。公报的用词是“毛泽东同志号召”：“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1956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

〔4〕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7—91页。

〔5〕云南省档案馆，7—1—867，第28—33页。

在对执政党工作作风表示担心的同时，作为“波匈事件”的另一个教训，毛泽东也在密切注意社会上的思想动态。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重点讲到了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及少数人闹事的问题。对于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他用词尖刻、毫不留情：“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子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不过，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对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时毛泽东确实也谈到了斗争策略：“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1]

鉴于毛泽东的这种说法，有不少人认为，从这时起，他就在考虑用“引蛇出洞”的策略发动反右运动了。笔者以为，这种理解过于简

〔1〕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原记录稿见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69，第1—4页。

单化了。在“波匈事件”中，毛泽东看到了对中共政权可能造成威胁的三种情况，即党内外知识界的“奇谈怪论”、群众闹事和党员干部的官僚化和特殊化，其中最令人担心和关注的是后两者。尽管谈到有人（特别点名是民主人士）可能会反对中共政权时言辞尖刻，但那毕竟只是极个别的情况，因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而所谓“后发制人”的策略，则是毛泽东在处理这类问题时的一般方法和思维逻辑。从长期的发展看，人民内部矛盾将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执政党的工作中心应该转入如何正确处理大量出现的新问题——群众不满情绪引发的社会动乱和干部的官僚主义、腐化堕落，况且后者往往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

情况确实如此。据新华社的报道，当时中国社会上大量出现的罢工、罢课、退社和游行请愿等现象，究其根源都在于执政党本身的错误和问题。特别是“波匈事件”以后，关于中共干部官僚化和特殊化的报告骤然增加。如“江苏省少数基层干部作风恶劣、横行霸道”，“内蒙古农村干部强迫命令非常严重”，“沧县专区部分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命令主义倾向”，“河北省各地基层司法机构中存在的问题”，湛江市部分机关和干部“官僚主义十分严重”，江苏省少数机关“强占民房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兰州市一些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官僚主义很严重”，河北省县级以上机关、企业部门“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天津国营工厂“干部的命令主义、惩办主义作风严重”。[1] 进入1957年后，情况更加严重。新华社福州1月12日讯，中共莆田县委召开三级扩大干部会，与会的504名区、乡主要干部中，70%左右都有强迫命令、贪污腐化的情况，致使党群关系十分紧张。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也暴露得更多。江苏省震泽县没有

〔1〕《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6日，第1258页；10月30日，第1328—1331页；10月31日，第1349—1350页；11月13日，第331—332页；11月28日，第683—685、685—687页；12月7日，第136—138、138—140页；12月11日，第215页；12月12日，第239—240页；12月25日，第521—522、第527—528页；12月26日，第561—564页；12月27日，第598—599页。

一个统战对象，却设有统战部；江都县没有山林地区，但却设有林业科；淮阴专区有些县没有工厂，也成立了工会，还要收会费。浙江省吴兴县部分乡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已经发展到违法乱纪的程度：如乡干部捆绑、吊打群众，私设监牢和公堂，任意关押村民，甚至游街。[1]还有报道说，湖北省部分农村干部中存在较严重的“六比四怕”思想，即比地位、比待遇、比名利、比享受、比阔气、比排场；怕下乡、怕进落后社、怕进山、怕劳动。[2]

现在，毛泽东不得不把注意力重点转向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问题。

## 整风动员引起两种根本对立的反应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作了一个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试图用“两类矛盾”这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哲学语言，解释国内发生的种种问题，并给执政党提供指导性方针。毛泽东本人说，他这个讲话所谈的问题已经“在心里积累了很久”。[3]

毛泽东首先指出，匈牙利事件不会在中国重演。在这个前提下，毛泽东开始谈论人民内部的种种问题。诸如对合作化的评价问题，资本家的思想改造问题，青年学生的政治学习问题，以及关于工商业者安排、失业人员就业、中小学毕业生升学的问题。既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不同矛盾，就必须予以解决，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采取与以往革命不同的方式予以解决。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

〔1〕《内部参考》，1957年1月12日，第227—228页；1月22日，第425页；2月22日，第325页；2月26日，第381页。

〔2〕《内部参考》，1957年3月14日，第251—253页。

〔3〕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纪要（记录稿），1957年3月10日。

督”这几个口号，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考虑到这两个方针自1956年春天提出来以后党内存在的疑虑，毛泽东强调，“百花齐放”就是有香花也有毒草，“百家争鸣”就是也可以讲唯心论，但是这没有什么要紧的，对毒草和错误言论批评就是了。令毛泽东担心的是，许多党的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1] 毛泽东估计的不错，后来北京市委在一个报告中承认，对于中央提出的这些方针，直到最高国务会议前，“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讨论，党内干部包括我们在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很不深刻的，并且还有许多糊涂思想，许多同志对这一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的”。[2] 因此，在3月1日下午作总结报告时，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毛泽东指出，政府有缺点应该批评。批评得当，当然好，批评不当，也没有什么，言者无罪。人民内部的事情，人民有批评权；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久，民主党派就有多久；“监督”就是要批评和建议，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的主要的方法。有人提出，说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但又说可以罢工罢课，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毛泽东答，大民主就是群众运动，阶级斗争。过去我们好些做法是这样，如肃反、土改。现在社会改变了，遗留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改造，是小民主。有人说这个“小”不够，再来一个小，就是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比较好。毛泽东解释说，现在我讲的是有些机关、工厂、学校、合作社连那样的小民主、小小民主都没有，就只有官僚主义，这样就逼出一个大民主，所以出来罢工罢课了。宪法没有罢工的条文是不好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提倡罢工罢课。我们是提倡用批评的方法解决问题。只有对那些个别的、严重的、顽固的官僚主义，才用罢

〔1〕参见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2月27日。

〔2〕《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第245—251页。

工罢课来解决，首先还是反官僚主义。[1]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党内整风的动员。会后4天，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便在报纸上公开宣布，中共要“安排一次全党范围的新的整风运动”。[2]毛泽东似乎觉得言犹未尽，决定再讲一次。于是，又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与以往不同，这次会议邀请了科学、教育、文艺、新闻、出版各界160多名非党人士参加，比例达全体与会者的五分之一。[3]会议的议题是传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连续召集了几次小范围的座谈会，一边听汇报，一边谈意见，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想法。在谈到整风的打算时，毛泽东说：“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没有展开。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这也要酝酿一个时期。决议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来。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哪种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还不一致。要整风，那时就好批评了。”[4]显然，毛泽东不断地开会、讲话，就是要统一党内的思想。3月12日下午，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到会发表讲话，讲了七个问题，可以看做是对会上讨论的众多问题的总结。归纳起来要点如下：一、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这个变动比过去更加深刻。全国各个阶级相互关系都发生变化，所以各种不同思想都有所反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大变动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新制度要经过好几年才能巩固。二、知识分子中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有敌对情绪的只是极少数，90%以上是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其中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不习惯，有怀疑，所以对知识分子要进行思想改造，但不能强迫他们接受马列主义。三、有些人好像讲阶级斗争为主就舒服一点，讲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就不大舒服，不那么

〔1〕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日。

〔2〕1957年3月5日《人民日报》。

〔3〕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30—631页。

〔4〕毛泽东同文艺界的谈话（记录稿），1957年3月8日。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49—255页。

过瘾了。八大作了结论，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了，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都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四、关于放和收，中央的意见是不赞成收，就是要放。有些人怕乱，乱也好，乱才有办法，乱然后治。中国不会出现匈牙利事件，就是出了也不怕。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又没有，连小小民主都没有，那就非逼上梁山不可。五、共产党准备整风，中央决定今年准备，明年普遍展开，党外人士可以自愿参加。主要整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整风的方法和延安时一样，就是学习文件，自我批评，也可以批评，用小民主，和风细雨。最后，毛泽东肯定，这次会议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是有益处的，开得很好。他说：我们有两种会，一是党内的会议，一是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会议，这次会议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来开，是第三种会，是好的形式。〔1〕党内整风邀请党外人士参加，这个说法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来的。

或许是受到与党外人士轻松谈话时的乐观情绪影响，或许是受到党内外联合召开会议的新形式的启发，这时毛泽东感到共产党整风需要来自党外的帮助和推动。不过，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对于他所倡导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中的整风运动，党内外的反应却截然相反。

对毛泽东讲话反应最热烈的是知识界和民主人士。《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回忆了在政协礼堂听到毛泽东讲话录音后的感受："从录音里听到他在讲话时，不时引起哄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马寅初等同志插话，真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2〕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也是"兴奋

〔1〕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2日。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82页。

〔2〕徐铸成：《亲历一九五七》，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18页；《徐铸成回忆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62—263页。不过，徐铸成说在录音中听到刘少奇插话，这里有误。刘少奇没有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因此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不在场。

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名义进行了传达，民盟还印发了讲话记录稿。章伯钧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评价甚高，认为“老毛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虽是矛盾论的延续，但有其创造性。这个概念还是一把时代的钥匙，运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方式”。《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看到讲话的传达稿后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1] 翻译家傅雷当年在给家人的信中把自己的感觉和理解讲得更加具体：“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2] 章诒和对此有一段精妙准确的评述：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和章、储二人一样，他们的内心渴望着一种承担的机会。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需要。而毛泽东的讲话，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渴望和需要。[3]

毛泽东的讲话传达下去之后，反响更大。3月6日至20日，全国政协召开二届三次会议，3月下旬至4月中旬，各民主党派也先后召开会议。与会者中有不少人直接或间接听过毛泽东的讲话，反应极为热烈。大家众口一词，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讲话。[4] 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双百”方针：哲学家冯友兰称赞这一政策可以“保证我国学术的正常发展”。[5] 民盟副主席罗隆基认为，这是“扫除党与非党间隔膜，加强团结的对症良方”，“不仅可以减少郁积，消除隔膜，并且是是非愈辩愈明，真理愈争愈显，百川异流，总是同归于海”。[6] 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说，毛主

〔1〕章诒和：《最后的贵族》，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第12、42页。

〔2〕《傅雷家书》，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58页。

〔3〕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第42页。

〔4〕详见《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7号，第30—49页。

〔5〕1957年3月16日《人民日报》。

〔6〕1957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席讲人民内部矛盾时，常常“反求诸己”，在知识分子本身来说，也要有“反求诸己”的精神。作家王蒙也认为参加这次会议是“胜读十年书”，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新的课题。[1]上海各界的普遍反映是：听了这个讲话以后，对目前国内生活中的许多矛盾现象，都得到正确的解答了，眼界打开了，对今后的事业也更加充满了信心。“好些过去不肯说话或不多说话的人，这次都解除顾虑，滔滔地畅所欲言。好些座谈会上都有激烈的争论”。这种讨论已成为“上海知识界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给初春的上海，更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气”。[2]正像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所说：“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3]

上述很多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名人都是在听到毛泽东那番激动人心的讲话后，决心投入整风运动的，但其中多数人在后来被打成“大右派”。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此时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究竟是真心实意，还是预设圈套？这里不妨再听听当事人的感受。亲自聆听过毛泽东讲话的作家舒芜认为，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引蛇出洞”的想法，“因为我亲自听了他的讲话。一个人假也不能假到那个程度吧，何况是毛泽东。这种感觉只有到了现场才会有”。[4]当然，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人们的感觉，而是要搞清一个问题，即毛泽东此时提出整风的目的何在，是要打击党内的有害作风和腐败现象，还是要批判党外的错误或反动言论？从前引（当然不是后来修改的）毛泽东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看，答案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事实上，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是执政党失去人们的支持，整风的矛头也是对准党内的。因此，应该说毛泽东这时是诚心要请党外人士

〔1〕《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0号，第22—24页。

〔2〕1957年4月16日《人民日报》。

〔3〕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

〔4〕转引自谢泳：《杂书过眼录》，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262—263页。

帮忙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主张在党内遇到了重重阻力。

《人民日报》曾报道，许多著名学者专家认为：毛主席的讲话已经引起了党内外知识分子、干部和群众的普遍重视，但在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这些方针上，仍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障碍，而其中最大的障碍是来自党内和领导机关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1]这种看法符合事实，因为大多数党员干部对毛泽东的讲话抱着怀疑的态度。

在3月25日召开的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很多干部对毛泽东的讲话表现出忧虑和怀疑。讲到“双百”方针，“大家都赞成放，但仔细地研究一下，有些人仍然有种种顾虑”，他们“怕天下大乱；怕以后工作不好做，不好领导；怕放了毒草，群众会中毒”。有人说：“百花齐放，放就是收，放了紧接着要收。”有人说：“收是绝对的，放是相对的。”不少人直截了当地提出：“毛主席说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不好，但是我看了这篇文章，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好。”[2]湖北省委的报告说，毛泽东的讲话传达以后，“有些党的干部（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大吃一惊，他们怀疑人民内部是否存在着矛盾，他们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认为人民群众闹事要“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负主要责任，是不公平”。对于在基层单位放手发扬民主和执行“双百”方针顾虑重重，怕“放”出错误的东西来难得收场，说“放”也可以的，但是“要首先解决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3]甘肃省委报告，对中央的方针“党外比党内接受的快，情绪高”，党内则受到“很大震动”，部分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还有程度不同的怀疑和顾虑、甚至抵触情绪”。在高级干部中，“思想基本搞通”的只是少部分人，大多数人“是原则上

〔1〕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2〕《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第162—169页。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文章对“双百”方针提出后文艺界的形势和倾向提出了批评。

〔3〕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72，第3—5页。

通了，也认为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正确，表示拥护。但遇到具体问题，特别是与本单位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具体问题时，就不通了”。还有极少数人“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革命几十年都没叫人监督，现在革命胜利了反倒要叫人监督了，真想不通”。甚至有人说，“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现在更嚣张了，不把他们整下去总不甘心”。[1] 山西省委的报告更加具体：毛泽东的讲话在各级干部中传达后，“争辩之多，是空前的”。“多数人表示拥护，但对若干原则问题抱有怀疑和抵触情绪”，他们提出，如此强调扩大民主“是否会助长极端民主化？”“现在已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再要扩大民主，事情就更不好了”。又认为“闹事没好人，好人不闹事”，“不承认闹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也有个别人“公开表示怀疑和反对”，他们提出“这次毛主席报告的精神是否右倾了”，认为“毛主席的报告替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资本家和过去的地主、富农说的话太多了，而替劳动人民说的话太少了”。“大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于剥削家庭，他们毕业后都将当干部，难道毛主席就不怕重复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吗？究竟还要不要专政？谁专谁的政呢？这真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2] 就笔者看到的资料，上述情况，在黑龙江、广西、四川、广东、浙江等省委的报告中，都有普遍的反映。[3]

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怀疑、抵触和反对的情绪更加激烈。很多人都质问：“这个报告是否是毛主席起草的，是否传达错了。”有人说：“过去听了传达毛主席关于合作化的指示，日日印在心里，今天听这个报告实在听不进去”，甚至认为“毛主席这个报告太右倾了”。大多数基层干部都不同意把这个报告再向下传达或贯彻。关于

〔1〕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72，第15—18页。

〔2〕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72，第19—21页。

〔3〕《内部参考》，1957年4月28日，第9—11页；5月17日，第3—5页。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72，第10—12、12—15、18—21页。

两类矛盾，有的支部书记说：合理提意见的是内部矛盾，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就是敌我矛盾。还有人认为，成分好的人闹事是内部矛盾，富农和政治上有问题的人闹事就是敌我矛盾。对于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普遍反映是：对农民能用，对富农、反革命分子不能用；对贫农能用，对富裕农民不能用；对先进地区能用，对落后地区不能用。至于“双百”方针，认为城市可以实行，但农村不能贯彻。由于感到“党给群众撑腰，不给干部留脸”，不少基层党员干部工作消极，想躺倒不干，甚至有的提出退党。〔1〕

至于毛泽东提出的党内整风，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既然说整风运动是一年以后的事情，3月26日吉林省委下发的一个通知就把正在开展的“学习八大文件，检查思想作风”的工作与将要开始的整风运动断然区别开来。通知明确说：“这次检查虽然是以整风精神进行，但不等于就是一个整风运动”，而只是“整风的思想准备”。〔2〕在他们看来，整风并非当务之急，到底怎么搞，目前还提不上议事日程。

所有这些材料，无论是来自上层还是基层，无论是党内报告还是新闻报道，反映的情况都是一致的。面对如此难堪的局面，毛泽东感到，必须亲自出马，再次进行动员。

##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不同关注

仔细品味，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其实提供了两个新的信息：一是对党内多数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不满，他们没有意识到共产党执政遇到了新问题，对中央提出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方针有强烈的怀疑和抵触情绪；二是大力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

〔1〕《内部参考》，1957年5月21日，第7—9页；5月25日，第20—22页。

〔2〕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39，第19—22页。

互相监督”的方针，试图通过整风运动解决党内的思想和作风问题。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相辅相成。为了促进整风运动的开展，毛泽东需要同时进行两方面的工作，既要说服党内干部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又要鼓励党外人士解除顾虑，敢于向执政党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通过这种新式整风运动，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前进，所以他关注的是“思想动向”，主张首先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解决问题。但党内多数领导人认为，整风主要还是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在于具体政策的调整，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解决影响执政党面临的问题。

毛泽东好像有个习惯，只要心情不快或办事不顺，就往南方跑。这次，毛泽东选择了津浦线。临行前，毛泽东审阅并批准了《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其中特别讲到：“这次宣传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开会，这不但对于密切党员与非党员的团结有好处，对于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讨论和研究问题，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也是很有好处的。”指示要求各地“应该同样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并且像中央召开的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一样，吸收党外的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界人士参加”，会议“应当充分发扬民主，特别要让党外人士讲出内心的话”。[1]从3月17日到4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了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所到之处，都要召开座谈会，对当地党员干部发表讲话，走一路，讲一路，毛泽东自己说他“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2]这次沿途演讲，实际上成了全党整风的思想发动。[3]

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在天津说到，整风没有什么可怕，就是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396—397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131—134页。
〔2〕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省、安徽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20日。
〔3〕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42页。

学习和检查，对错误严重的同志要帮助他改正，但不用开大会斗争的方法。今年准备试行，明年再正式开始，党内这么做，党外自愿参加。[1] 到济南又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人民内部矛盾就发展起来，解决思想问题，正确的方针不是收起来，而是还要放，现在还放得不够。共产党政府有工人、农民作基础，有马克思主义指导，是批不倒的。批倒的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那一套东西。共产党有时候还要借党外的力量帮个忙，叫做内外夹攻，把官僚主义这些东西吹掉一些。“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2] 在南京，毛泽东说：“这些年知识分子还是有进步的，应该肯定这一点”，“民主党派都是知识分子”，所以提出“双百”方针和“长期共存”，这些方针应该坚持下去。“如果我们身上有官僚主义，有缺点，首先让党内批评，然后党外批评，批评我们的缺点，把我们的官僚主义改一改，把缺点改一改，不就好了吗？会不会倒呢？不会倒的。”对于民主党派，毛泽东主张“要同他们讲真心话”，“不要党内一套，党外一套”。“关于政策的事情，都可以讲，党内是这样讲，跟党外也是这样讲。材料都可以看，有一些材料，譬如讲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暴露我们官僚主义的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发给他们看。他们平时看不到，这样一来，反比较好。有时可以开两个党共同的会议，党内党外同时参加。”[3]

到了上海，毛泽东重点谈群众闹事问题。他说，凡是有官僚主义的地方，人民就可能闹事。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类事情，应该看做正常现象，并且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关于整风，“中央还没有做出正式决定，准备这样做。今年准备，明年、

〔1〕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7日。

〔2〕毛泽东在山东省级机关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8日。部分内容发表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84—285页。

〔3〕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省、安徽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20日。部分内容发表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85—287页。

后年两年实行，以三年时间”，“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用适当的方法加以批评”。毛泽东强调，整风只会增加共产党的威信，共产党要民主党派进步，首先自己就得进步，共产党把作风整顿好了，取得了主动，党外人士就会自愿参加，进行自我批评和整风。他们中的左派和中间派会来参加，右派恐怕就不干。现在问题是，在相当多的地方“党内党外隔一层”，“沟太深”，应该“把沟填起来”。最后，毛泽东强调，批评共产党的缺点，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扩大民主是为了加强民主集中制，这是原则。但是还要有灵活性，不能碰到罢工罢课，碰到错误的言论，就拿“破坏党的领导”当挡箭牌。这样，“我们国家的文学、艺术、科学就可能希望繁荣、发展起来”，“我们的希望就可能达到”。[1]

此行最后一站是杭州，毛泽东在这里召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市委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有关思想动态的汇报，并针对党内提出的问题，发表了一些很有针对性的看法。如上海干部反映：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百家争鸣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说，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线，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接着，毛泽东谈到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的问题：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再如浙江干部反映：“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毛泽东警惕地问：“党外兴奋，党内呢？”听说省委准备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又追问：“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接着又不满地

〔1〕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21日。

质问随行的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声不响。"听说很多人过去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有同感，毛泽东更加生气了："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1]

这次南方之行对毛泽东的触动很大，并引起了他新的思考。他了解到，对他在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党内外的反响完全不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反应积极，虽然对鸣放还有顾虑，但普遍表示拥护和赞同。而在党内，从各地汇报的情况看，大多数干部还是对"双百"方针的提出是否正确、是否适时有怀疑，不敢放、不愿放、不想放。党外传播迅速，党内传达迟缓，党外报纸反应强烈，党内报纸一声不响。这种反差表明，党内的思想认识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变化，甚至落在民主党派的后面。对于这种状况，毛泽东十分不满。

刘少奇同样非常关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认为，"人民内部闹事是个新问题，我们不想好办法，将来要吃大亏"。[2] 为此，他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从2月18日到4月14日，刘少奇沿京广线一路南下，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临行前，他向随行人员说明了出行的目的，就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闹事问题。刘少奇说，"群众怪我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敌我矛盾。"因此，"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刘少奇的调查范围包括学校、合作社、工矿企业，涉及农业、工业、商业、教育、城市生活等各个方面，并多次同学生、教师、社员、职工、技术和管理人员，

---

〔1〕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54—661页。参见毛泽东在听取上海、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市委负责人汇报时的插话（记录稿），1957年4月4日至6日。

〔2〕刘源：《刘少奇与新中国》，香港：大风出版社，2005年，第119页。

以及地方党政干部座谈。值得注意的是，与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不同，刘少奇此行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几乎没有涉及。[1]

社会分配是农民、工人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刘少奇对此特别关注，他提出：“所有制解决了，生产关系的问题出在分配上，表现得很尖锐复杂”，“真正做到分配公平，讲清道理，人民是不会闹事的”。[2] 在河南新乡，刘少奇听取地委负责人汇报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对该地实行包工包产到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十分赞赏，肯定这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3] 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刘少奇指示：“要很好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等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4]

农业、手工业改造后，生产经营单位普遍过大，也是农业社和手工业社社员产生不满的原因之一。刘少奇同新乡地委负责人谈话时说：“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刘少奇还谈到劳动方式，认为“社员劳动一定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体化了不行”，可以“实行分组分户小包工，分给社员的农活只要求他几天完成，随便他什么时候上地，有个劳动自由。有很多小活适于个人劳动，不能完全否定个体劳动。和工业一样，农业也可以实行个人负责制”。在河北、河南等地，刘少奇明确提出农业社要放弃集体喂养牲畜的方式，并指出：分散喂养并不是倒退，只是经营管理方式改变一下。[5]

---

〔1〕《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86—400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第812—823页。

〔2〕《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87页。

〔3〕《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88页。

〔4〕《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91—392页。

〔5〕《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88、389、39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28—329页。

商业、服务业过于集中经营，给城市生活造成不便和紧张，是引发市民不满的重要原因。刘少奇在听取地方汇报后，主张实行国家、集体、个体几个方面同时经营。在长沙，刘少奇提出：市政建设的大项目，如自来水、电站、下水道等等，需要由国家投资；那些零零星星的项目，如市民住宅、理发馆、商店、电影院等，应该发动群众，可以由群众自己办。在广州，刘少奇批评说："国营商业部门机关化、官僚化，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私商小贩做生意能赚钱，国营商业为什么就不行？"他要求国营商业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如下乡采购、晚间营业，搞好对市民的蔬菜供应等等。刘少奇很看重自由市场的作用，认为自由市场对国家有利，可以暴露国营商业的缺点，补充其不足，方便人民。〔1〕

工矿企业的职工住房紧张，也是各地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刘少奇视察株洲湘江机器厂时谈到了解决职工住房的问题。他说，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基建投资大，职工住房问题，国家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今后，集体宿舍还是应该由工厂解决，家属宿舍工厂不能再盖了。凡是青年职工要结婚的，都要他们参加房屋合作社，自己盖房子。工人自己盖的房子，一辈子不用出房租，房子属于自己所有，将来如果调动的话，还可以出卖、出典、出租，本钱可以捞回来。〔2〕

中小学的办学、中小学生升学和就业，是刘少奇此行关注的又一个问题。他听取湖南省领导人汇报教育工作后，要求放手让群众办学。刘少奇提出，在农村是社员办学，而不是合作社办学；在工厂是工人办学，而不是工厂办学。"现在除了国家办学校以外，还可以集体办学、互助办学，也可以由一些自由职业者办私塾。"对于升学和

〔1〕《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90—391、393、395页；《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45—346页。

〔2〕《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92页；《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42—344页。

就业问题，刘少奇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和青年组织对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采取负责的态度，分别情况，作好统筹安排：除了再办一些小学、中学，组织学生自学的办法外，还有就业的途径。除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可以招收一部分中学生，城市里的服务行业和手工业需要增加一部分学徒和职工外，刘少奇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生的主要方向。[1]

在刘少奇调查研究的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在积极制定和颁布各种旨在解决社会生产、生活问题的政策和规定。1957年1月11日，陈云便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职工生活方面若干问题的指示》。14日，陈云又出席全国农村自由市场会议并讲话，提出要对市场物资供应紧张暴露出来的矛盾加以研究并找出办法。[2] 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肯定限制私商措施的同时，指出由于对市场管理过严过死，带来一些副作用，强调开放农村自由市场对于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刺激农业生产、改善国营和供销社商业的经营管理，都起了很大的推动和刺激作用。[3] 2月6日上午，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要求制定若干主要农产品的比价，解决好收购和零售差价过大的问题，适当改变偏远地区某些农产品收购价偏低的现象。当天下午，陈云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1957年面临巨大就业压力，需研究解决办法。要建立退休制度，除少数必要外，职工到60岁应该退休，女职工可以更早一些（大约55岁）。会议还讨论了发展养猪生产的问题。[4] 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提高生猪收购价格，要求各地农村贯彻执行生猪“私有、私养、公助”的方针，并在供应饲料和收购价格上合理兼顾

---

〔1〕《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90、391、394页；《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30—331页；《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77—294页。

〔2〕《陈云年谱》中卷，第361—362页。

〔3〕1957年1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

〔4〕《陈云年谱》中卷，第366—367页。

社员个人利益和合作社集体利益，以改变生猪生产下降的趋势。[1] 2月7日，陈云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特别讲到不能把人民闹事“看成反革命”，对人民闹事问题的处理方法：提出要求凡是对的，都应满足；不对的，要批评；有困难的暂时解决不了的，要讲清楚，说老实话；除现行反革命以外，一律不抓、不开除。[2] 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农业社必须坚持民主办社的方针，按时公开财政收支，包括产品分配、银行存款、国家预购款、国家的贷款及用途、生产资料和用具的购置、干部的补贴、社员的预支、国家的救济款等，决定社队问题要同群众商量，干部要参加生产。[3] 3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指示，允许合作社将小型役畜转给社员私有、私养、私用，或几户社员伙有、伙养、伙用，满足社员家庭副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对畜力的需要；同时适当调整菜牛和牛皮的收购价格，以刺激农民养牛的积极性。[4] 同日又发出有关春耕的指示，其中要求并社和转高级社的工作应该停止；过大的社可以根据本地本社的具体情况和多数社员的意见，采取简便方式进行必要和适当的调整。[5] 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承认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并指出，防止这类事件发生的根本办法，“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6] 4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透露中央准备在年内召开中央会议，专门讨论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问题；职工生活问题；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和教育问题；企业中党、工会、青年团组织的工

〔1〕《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7号，第75—77、87页。

〔2〕《陈云年谱》中卷，第368—369页。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128—130页。

〔4〕《陈云年谱》中卷，第373—374页；《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8号，第76—78页。

〔5〕《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8号，第70—73页。

〔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154—163页。

作问题。[1]

所有这些表明，在中共最高决策层，对于当时普遍出现的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现象，关注点是不同的，解决问题的主张也是各有侧重。同样是处理“少数人闹事”，同样是整顿党风，毛泽东显然更倾向于开展思想教育运动，从意识形态方面下手，而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则比较重视调整政策，强调解决人民当前利益、处理好人民生活问题。这一点，从上一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就已经可以看出。[2] 不过，这并不说明中共高层存在着原则性分歧。国外有研究者认为，自1956年下半年以来，刘少奇便与毛泽东有严重分歧，并抵制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猜测和推论得出的，而缺乏文献的依据。[3] 仔细研究刘少奇这一时期的言论可以看出，其实他对两类矛盾问题也有深入的思考，同毛泽东一样，刘少奇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问题，群众闹事的主要根源在于党内的官僚主义，而且还有过全面而精辟的论述。[4]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并不在这里，而在于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和着眼点。当然，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整风运动，刘少奇和其他领导人都不可能在原则上表示反对。但是，刘少奇一直强调整风是一次学习运动，批判和自我批评也限于党内的和风细雨方式。笔者逐一查阅了刘少奇此期的讲话和报告，发现他几乎就没有谈到过“双百”方针，更不用说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了。甚至到5月7日整风运动已

---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166—173页。

〔2〕参见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刘少奇报告，1956年11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3—329页。

〔3〕参见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295、323—327、366—368页。例如，作者突出地指出，对于整风的目的，毛泽东强调的是批判官僚主义，而刘少奇始终把主观主义摆在第一位。其实，毛泽东有时讲话也把主观主义排在第一，而刘少奇有时讲话则重点批评官僚主义。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92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251页。

〔4〕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95—309页。

经全面开展起来以后，刘少奇在高级党校的谈话中仍然认为，整风就是“联系个人思想问题，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同时也要“进行同志间的互相帮助和互相批评”。刘少奇严厉地批评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但强调应采取“妥协性的办法”处理，还特别指出，“凡是党内的矛盾，都是非对抗性的，但如加上挑拨离间、破坏党的活动，也可以把这种矛盾搞成对抗性的。”[1]毛泽东明明说，这次整风是解决党群关系，解决党与非党之间的矛盾，并且邀请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一起整风，刘少奇却在这里强调“党内”的矛盾，强调“同志间”的批评。毫无疑问，刘少奇的这种态度和观点代表了当时党内多数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心声，而恰恰这一点，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毛泽东下定了决心。

## 毛泽东决定提前进行“开门整风”

面对党内普遍的消极情绪，毛泽东决定拿《人民日报》作为突破口。《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长时间对“双百”方针没有进行主动宣传，报道也很少。特别是1月7日发表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后，一直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甚至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后，也迟迟没有动静，直到4月4日才在第7版发表了一篇通讯，内容只是各地关于此文的报道情况和读者来稿来信。关于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的这两次会议，《人民日报》的报道异常简单。最高国务会议开完后，《人民日报》刊登了来自新华社的一条不足200字的消息，还是安排在一篇关于经济问题的社论后面，位置并不显要，而对毛泽东的讲话只提了一句。至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报上连个消息都没有发。[2]这就是毛泽东在杭州质问陆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250—251、258页。

〔2〕1957年3月3日《人民日报》；《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7号。

定一的原因。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怒气未消，决定对《人民日报》“动手术”。4月9日晚上，毛把胡乔木找来谈话，严厉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兼社长邓拓说：“《人民日报》违反了党中央的政策方针，为什么三令五申后，至今三月有余一直避不表态。《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上，一直不声不响，完全没有领导，领导权被别人拿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党外很活跃，党外报纸或青年报纸很活跃，唯独党的报纸保持沉默，有异己倾向，己是马克思主义之己。新华社不知怎样？是否报导了这方面的消息，谁领导。我早说过，邓拓要走路，到别的地方，现在没有其他办法，只好让人走路。”[1]

胡乔木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天一早，《人民日报》便登出了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当天看过报纸后，就把中共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和报社负责人召集到中南海自己的住处，还特意请来了社论的执笔王若水。毛泽东一上来就大发雷霆：“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还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邓拓赶紧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毛泽东紧追不舍：“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

〔1〕《林克日记》（手稿），第30—31页。

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

毛泽东对邓拓发了一通火后，把话题转向了知识分子问题，说：“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还说：“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最后，毛泽东又批评党报不如非党报纸：“《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这次出去看一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毛泽东还给几家报纸排了队：“《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1〕

指责《人民日报》“抵触”中央方针、同中央“唱反调”，未免言过其实。不过，党报4月10日以前很少宣传毛泽东提出的新方针，

〔1〕以上内容出自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等谈话记录，1957年4月10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64—665页），并参见王若水：《智慧的痛苦》，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第319—327页。

却是明显的事实，而这恰恰反映了党内多数干部的情绪。毛泽东迁怒于《人民日报》，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南巡时的感受使然。党内多数干部对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冷漠处之，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本来就有一肚子火，看见《文汇报》、《新民晚报》以及《光明日报》这些非党报纸接连发表文章，赞同鸣放，针砭时弊，感觉到“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积郁的不满才爆发出来。胡乔木回忆说：毛泽东“到上海以后，一看《文汇报》、《新民晚报》搞得很热火，《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按兵不动，他就火了，就说要搞大鸣大放”。[1]

毛泽东当然不只是发火而已，为了推动整风，他回到北京后一口气亲笔起草了几个中央文件。

4月9日，毛泽东审阅和修改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7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1958年全面开展，大约在二至三年时间内完成。毛泽东在修改时特别加了一句：“此件以早发为有利”，同时又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试行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急迫心情，一目了然。不过，这个决定（草案）和通知后来都没有下发。[2] 其原因就在于通知中确定的整风开始时间——1958年，已经不能满足毛泽东的要求了。

4月17—19日，毛泽东连续三次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开会。[3] 会议的内容目前尚无史料说明，但很可能就是讨论整风问题，因为4月19日这天，毛泽东亲笔拟了一个党内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检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并把讨论中“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各级领导的意见及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写成报告”，在15天内用电报

〔1〕胡乔木：《胡乔木论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4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421—422页。

〔3〕《陈云年谱》中卷，第377页。

（外地）和书面报告（北京）送中央。[1]在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中，调查之广泛、详细，要求之严厉、急迫，足见毛泽东急于打开党内局面的心情和决心。目前没有资料显示这几天中共高层的活动，不过，从周恩来4月24日在浙江省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要立即开始整风的想法已经得到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认同。周恩来说："正确地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首先要把共产党搞通"，为此"我们主张从现在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整风主要是三个口号，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2]

不等各地、各部门的汇报到手，毛泽东已经开始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新指示了。25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3]4月27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这一文件。[4]同日，毛泽东还亲笔起草了一个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作为吹风，发至基层党委。文件指出："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5]4月28日，毛泽东又对整风指示稿作了修改，并批示："准备5月上旬或中旬公开发表。"[6]29日晚，毛泽东再次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专门讨论有关开展整风运动的问题。[7]与此同时，毛泽东继续关注并鼓励党外的鸣放。看到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很满意，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432—433页；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72，第1—2页。

〔2〕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1329—1330页。

〔3〕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70页。

〔4〕《陈云年谱》中卷，第378页。

〔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94—295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451—452页。

〔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06—607页；《陈云年谱》中卷，第379页。

并为该文重新拟了一个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代《人民日报》写了编者按。按语说："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1]

中共中央办公厅于30日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文件，紧接着又第二次发出修改稿，只做了几处文字改动。[2] 文件首先批评党的许多干部，"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文件指出，毛泽东的两个讲话传达以后，"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文件最后还特别指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3]

尽管在文件中没有明确表露开门整风的意图，而只是提出欢迎非党人士参加整风，但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开始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453—454页。根据毛泽东的建议，5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2〕陕西省档案馆，123—43—1，第11—16、17—19页。

〔3〕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党整风了。就在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当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议题就是整风动员。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主要领导人和26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这次讲话，毛泽东显得情绪激昂，比前几次更加放得开，重点在于鼓励非党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整风即将开始，毛泽东有些得意地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讲到大鸣大放，毛泽东更加乐观："现在报纸天天在讨论矛盾问题，有人担心人民政府会被推翻，但已经二、三个月了，政府并未被推翻，而且越讨论，越发展，人民政府就越巩固。现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厉害，越攻越好，把矛盾分一下类。攻就趁此机会，只要找出证据，就能站住脚，几年甚至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辩论，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可以解决。"至于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毛泽东说："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这个说法，与整风指示中说的方式已经有些区别了。为了鼓励党外人士站出来讲话，对于当时正在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教授治校"，"共产党有术无学，不能领导科学"等，毛泽东或多或少表示他本人是赞同民主人士的意见的。〔1〕比起中共中央的文件，以及毛泽东本人以前的历次言论，这番讲话更具鼓动性和影响力。不过，积极起来响应的还是在党外，而不是党内。这就难怪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虽然说是共产党整风，但真正积极参与其中的却大都是知识界的非党人士。

---

〔1〕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4月30日，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70—673页。

5月1日，中共中央的指示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1]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党整风运动便开始了。如上所述，毛泽东决心对执政党发动一次整风运动的思维逻辑是：经过“三大改造”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反革命虽然还有，但是不多了，旧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大多数虽然还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他们对政权已经没有威胁，而思想改造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党内，在执政党本身；只要通过整风，改变执政党的作风和形象，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政权就会巩固，就会发展。然而，一旦这个逻辑的前提发生变化，他的估计和自信受到打击，所谓整风就必然会转向另外一场斗争。

本章曾以论文形式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
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的注解说“根据1957年4月27日《人民日报》刊印”（见该书第226页），似有误。

第九章

# 莫斯科会议：走到顶点的中苏同盟关系



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期间与伏罗希洛夫交谈

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汇聚莫斯科举行会议，并发表了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签署的《和平宣言》。在国际共运史上，这是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诞生以来，全世界共产党人召开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1〕但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一历史过程，尤其是这次会议究竟是如何筹备、如何召开的，在中国、俄国和以前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缺乏专门的研究。〔2〕

以往，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莫斯科会议得以召开，是由于苏共的倡议，并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党的支持和响应。〔3〕这个

---

〔1〕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68个党，其中4个党（如美国共产党）由于在国内所处的特殊环境，没有公开亮相。〔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8—99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23页。〕1960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虽有81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但中共领袖毛泽东没有出席，且此时中苏两党已经是面和心不和，凑在一起，不过是对内吵架，对外装装门面而已。无论如何，这次会议与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不可同日而语。

〔2〕关于莫斯科会议及中共在会议中的作用和影响，除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外，目前很少看到有专门的研究成果。逄先知和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设专节讲述了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活动，引用了不少中国档案，很有史料价值，但主要是毛泽东的一些谈话，其他涉及不多。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一书也有一章讲莫斯科会议，但重点在分析会议中争论的问题，而对会议筹备和进行的过程语焉不详。莫斯科会议究竟是怎样提出的，如何召开的，至少目前在各国的研究论著中还没有说清楚。

〔3〕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09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5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24页。还有研究者认

印象是错误的。最近披露的档案和回忆史料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1] 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协商会议，以及在会议上发表一个共同宣言的主张，都是中共提出来的。不仅如此，在会议准备和召开的过程中，毛泽东本人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独特的作用，在莫斯科扮演了不是主人的主人角色，成为这次会议的幕后总导演。

如果说在波匈事件期间，中共还只是协助苏共处理东欧问题，那么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共已经与苏共平起平坐，并列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1957年底，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达到了顶峰，这次会议无疑就是中苏两党紧密配合的经典之作。[2] 但是，笔者还注意到，莫斯科会议过后不久，中苏同盟便出现了裂痕，并很快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引起争论和分歧的，恰恰是对共同宣言的不同理解；中共和苏共首先指责对方的，也恰恰是对莫斯科会议路线的背叛。[3] 这就是说，莫斯科会议成为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为什么会是这

---

为，恢复各国共产党联系的倡议，最早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于1957年提出的〔罗宾·艾莉森·雷明顿：《华沙条约》，上海师大历史系世界史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46页〕。在西方学者中，没有人注意到1957年莫斯科会议最初是谁倡议的问题。吕德量在其新作中提到，1957年6月，“赫鲁晓夫曾向铁托建议与他面谈组织一次全体共产党会议的问题”，“只是在遭到铁托拒绝后，在莫斯科会议前一个星期，苏联人才转而去找中国同志”。见Lorenz Luthi，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p.75。这些描述都与事实相去甚远。

〔1〕本章使用的资料包括：俄国档案，主要来自《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草稿》（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中国档案，主要来自毛泽东在会议之前和期间的谈话记录、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的档案；大量的中苏双方当事人的回忆录。

〔2〕与中国学界传统的看法不同，笔者认为，从1954年10月开始，直到1957年底，中苏关系一直处于最佳状态，即“蜜月”期。参见本书第二章。

〔3〕参见《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关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若干问题》等文，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2—464页。

样？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这次会议产生和召开的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

## 毛泽东主张开会解决问题

赫鲁晓夫入主克里姆林宫，特别是召开苏共二十大之后，努力摆脱了斯大林的阴影，但莫斯科立即就面临着如何协调和统一各国共产党的尖锐问题。

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言，1943年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至少预示了两个重要变化：第一，为了融入国际社会，继续苏联与西方的战时同盟关系，斯大林正式放弃了“世界革命”战略；第二，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作为一种统一领导各国党的国际性机构已经不复存在，各国的共产党在形式上可以独立开展活动了。[1]此后，为了在冷战对抗中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斯大林感到必须重新把各国共产党组合起来。但是，为了避免过于刺激冷战的对手，在形式上斯大林并没有把共产党情报局建成一种国际性的统一机构，而且范围也仅限于欧洲9个国家的共产党。[2]后来由于苏共强迫大家批判南斯拉夫和铁托，并直接参与和指挥对东欧各党的清洗，情报局在社会主义各国名声极坏。到1952年，即在斯大林去世前一年，情报局的活动就基本上停止了。[3]

---

〔1〕详见沈志华：《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争鸣与探索》，2008年第2期，第31—40页。

〔2〕详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3〕斯大林的最后一次努力是计划在1951年初再次召开情报局会议，并提议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但遭到陶里亚蒂的拒绝，设想中的会议也未能举行。参见Адибеков Г.М. Почему Тольятти не стал генеральным секретарем Коминформ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6，№4，с.156—161。

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针和新思路，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也确实“捅了娄子”，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动荡和组织混乱。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固然需要清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也应该得到纠正，但是各国共产党总还是需要建立一个平台，解决他们之间需要沟通、协商和统一的问题。于是，如何稳定局势，采取什么方式把社会主义大家庭重新组织起来，莫斯科和北京都在用心思考。

**毛泽东否定了苏共重建情报局的设想**

鉴于情报局浓厚的斯大林色彩，在苏共二十大期间，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通过了解散情报局的决定。在讨论各国共产党今后如何开展活动的问题时，米高扬建议成立一些区域性的情报局组织，并继续出版杂志或报纸，这个建议被多数人接受。赫鲁晓夫则提出这个机构的名称可以叫做“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委员会”。会议委托赫鲁晓夫等人与原情报局成员国代表及中国代表会晤，听取意见。[1] 苏共在大会期间是否与各国党商谈过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史料。只有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米丘诺维奇回忆说，3月29日赫鲁晓夫与他谈话，介绍了苏共中央关于建立区域性共产党组织的设想：国际形势本身要求为各国共产党的合作而建立四个新的地区性组织，欧洲两个，亚洲一个，美洲一个。赫鲁晓夫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组织起来，联合行动，还说目前欧洲各党正在协商，米高扬则到亚洲各国去商谈。他特别提到要去中国，因为对这件事“中国人有什么想法是十分重要的”。[2]

毛泽东的确有自己的想法，他曾经对情报局一类的机构很感兴

〔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6年2月22日，РГАНИ，ф.3，оп.8，д.389，л.67—69，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106—107、927。

〔2〕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34—37页。

趣。当1947—1948年中国内战爆发而中共已经决定与苏联结盟时，毛泽东对共产党情报局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支持，至少在苏共看来，中共可能有意搞一个“东方共产党情报局”。[1] 1949年春，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共产党给中共中央写信，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但毛泽东认为内战尚未结束，时机还不成熟，没有答应。[2] 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提出了中共参加欧洲情报局的问题。斯大林的回答是“根本没有必要”，但认为东亚各国的情况与中国类似，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3] 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此事又耽搁下来。到斯大林去世，特别是1955年中国紧随苏联之后与南斯拉夫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时，情报局在欧洲已经无人理睬。[4] 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重提建立类似情报局的共产党组织，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苏共的这个建议被中共轻易地否定了。

1956年3月，米高扬访问印度、缅甸后来到北京，他在会谈中说，苏共中央建议各国联合出版一个刊物，还提到要成立联络局。毛泽东明确表态：不赞成办刊物和设立机构。毛泽东说，过去情报局搞刊物，结果并不好，第三国际和情报局给人的印象都太不好。如果现在搞联络局，那么害怕的就不只是西方，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会害怕。毛泽东的建议是：“有事开会商量”，召集人当然是苏联比较

---

〔1〕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1948年1月23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73，л.1—37。

〔2〕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8），2003年7月，第188、189页。

〔3〕Sergei Goncharov，John 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71—73、232—233；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13—414页。

〔4〕关于东方情报局的研究，详见沈志华：《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亚洲革命主导权的转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27—37页。

好。“你们召集会议我们到，有事开会，无事不开。”[1] 显然，中共虽然也主张各国共产党应该协调行动，但活动的方式不是建立机构和办刊物，而是开会解决问题。目前看到的史料没有显示苏共对此做何反应，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当时苏共因批判斯大林引起的混乱而面临窘境，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建立联络局和创办新刊物的设想都是无法实现的。

尽管还没有商量好如何继续开展活动，但取消情报局却是大家的共识。4月13日，苏共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关于停止情报局活动的通报。[2] 4月18日《真理报》发表公报宣布：由于形势的变化，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无论就其组成成员来说，还是就其活动内容来说，都已经不适应新的条件了。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在1947年成立的情报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此，经过相互协商后决定，结束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活动，停止出版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公报还提出，在新的条件下，能够和应该找出建立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和接触的新的有效方式”。《人民日报》立即转载了这条消息。[3]

情报局是解散了，但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还是必要的。在4月13日给东欧一些党关于解散情报局的信中，苏共中央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接触和联系的方式问题，应该在近期举行的会晤中得到解决。[4] 为此，6月22—2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相互接触的

〔1〕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1957年11月6日、11月15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2001年10月。

〔2〕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933.

〔3〕1956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关于情报局解散过程的研究，详见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 По новейшим архив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4，с.131—152。

〔4〕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933.

形式问题。[1] 6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草案》。鉴于此前出现的问题，决议对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做了许多限制性解释，同时提出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性："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这样的工人阶级国际组织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这决不是说，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革命的兄弟政党的国际团结和接触的必要性已经失去意义。"恰恰相反，现在"各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团结和兄弟般的团结尤其是必要的"。[2] 这一点不仅苏共和中共看得很清楚，其他各国共产党也有这方面的要求。如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在十四大的报告中表示，情报局停止活动后，各国共产党日益仔细地考虑各自国家的民族特点，但必须加强联系，以解决"国际工人运动的方向问题和各共产党之间的团结问题"。[3] 正在苏共中央紧锣密鼓地与各国共产党协商的时候，爆发了波匈事件，事情只得拖了下来。

**中共再次主动提出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

风暴过去以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团结和统一显得更加必要了。毛泽东和中共对波匈事件非常关注[4]，在危机处理中也施加了重要影响，帮助莫斯科化险为夷，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中共在社会

---

〔1〕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143、947.

〔2〕РГАНИ，ф.3，оп.14，д.39，л.30—34，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с.352—368。1956年7月2日《真理报》和7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决议。

〔3〕1956年7月31日《人民日报》。

〔4〕据不完全统计，从10月20日到12月底，毛泽东主持中共高层会议达26次之多，认真研究了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问题。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第9页。

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特别是对欧洲事务的发言权。[1] 毛泽东决定再次推动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由于苏联方面对中共提出的“开会解决问题”的建议没有积极响应，在1957年初到莫斯科帮助苏联处理波匈事件善后事宜期间，周恩来一方面继续同苏共就这一问题“交换了意见”[2]，一方面又在私下鼓动南斯拉夫共产党参与会议的发起工作。

1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特意找到米丘诺维奇，向他介绍了中共关于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想法。周恩来首先提出，应当组织一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目的是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消除妨碍合作和团结的因素。会议可以在2月底或3月初举行。周恩来希望知道，铁托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否有益，以及预定的时间是否合适。周恩来提出，如果铁托同意召开并参加这次会议，他将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眼下彭真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已经授权他同铁托商谈。米丘诺维奇提出，为了能更确切地向贝尔格莱德报告，他需要了解一些细节，比如召开这个会议的倡议是谁提出的，如果南斯拉夫不能参加，会议是否还会举行。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回答：召开这次会议的倡议是中国提出的。又强调：更确切地说，整个这件事起源于毛泽东本人。周恩来解释说，会议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共产党人之间的新组织，会议也不会做出任何强加于与会者的决议。虽然不是很坚决，但周恩来表明，如果南斯拉夫不参加，会议就不会举行。不过，那样就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削弱了，中共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周恩来还说，会上将研究创办各

---

〔1〕详见本书第五章。对于刘少奇访苏和周恩来的穿梭外交，赫鲁晓夫感到“非常满意”，尽管他对中共的批评有些耿耿于怀。见Хрущев Н.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1997, с.361—363。

〔2〕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7页。阎明复的这篇回忆录非常重要，因为他在写作时不仅查阅了中央档案馆的大量材料，还核对了俄国档案。

国共产党新的报纸的问题，但中共反对这样的做法。米丘诺维奇对周恩来如此直率的谈话非常意外，并感觉到中共对苏联以前的做法持批评态度。[1]

在此期间，根据中方的材料，周恩来确与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通过电话，要求他临时拜访一次铁托，并指定由伍修权大使亲自担任翻译。于是，在1月29日的单独会谈中，彭真向铁托转达了中共的建议，即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的问题。铁托表示，关于召开各国党代表会议的问题很重要，南共中央要专门讨论。他个人的意见是进行双边或者多边的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全世界各国党的会议。[2]但是，据南斯拉夫的档案，在1月29日铁托与彭真的会谈记录中，没有任何关于召开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内容。[3]当然，很有可能这种十分机密的谈话内容没有记录，或者还有另外一次谈话。无论如何，铁托的态度是明确的。因为在此之前，1月28日，米丘诺维奇就已经接到一封经铁托本人校订过的南共中央的电报。电报指出，南共决定不参加各国共产党会议，也不会在相关的声明上签字。电报还让米丘诺维奇邀请周恩来2月或3月访问南斯拉夫。[4]周恩来自然不会做这种肯定毫无结果的访问，但是中共也不愿意把这个结果告诉苏联人。在回国途径莫斯科时，彭真只是含糊地向赫鲁晓夫通报说，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各国共产党会议。[5]这里传递的显然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信息，以至后

---

〔1〕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267—270页。目前披露的中方史料虽然简单，但可以证实南斯拉夫大使回忆的基本内容。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3—14页。

〔2〕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10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3页；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第10页。

〔3〕ACKSKJ（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档案馆），Ⅳ—60/Ⅱ—1—61.

〔4〕AJBT—KMJ（铁托档案馆），Ⅰ—1/588.

〔5〕关于彭真的通报，当事人的回忆不尽相同：李越然（彭真的翻译）回忆说，彭真只讲了东欧的局势已经稳定的情况，赫鲁晓夫提出重新组织共产党国际

来莫斯科一直对铁托参加会议抱有希望。

### 赫鲁晓夫同意用召开会议的方式解决问题

在莫斯科看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最重要的成员，第一是中共，第二是南共，而如今这两家的意见已大体一致，苏共只能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开会解决问题。〔1〕为此，2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召开会议讨论。鉴于南共的态度有些勉强，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通报各国共产党会议的问题时不要表现出强迫态度和过分热心，可先进行双边会晤。会议认为应同中共商议召开会议的时间问题，并委托苏斯洛夫和谢皮洛夫准备给中共中央的信函。2月7日，主席团批准的给中共中央的信函表示，苏共同意中共关于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认为应该由中共筹备和出面主持这次会议，并希望把有关筹备情况及时通报给苏共中央。信中还说，对于苏共领导人来说，会议在1957年3月底到4月初进行比较适宜。〔2〕

莫斯科来信提出由中共出面召集会议的建议，着实令中共吃惊。苏共并不知道中共曾建议由中、南两党召集会议的情况，而来信却说："根据已经获悉的协议"，应该由中共中央主持会议的筹备工

---

机构的问题，彭真表示会向中共中央报告。〔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09页。〕阎明复（周恩来的翻译）回忆彭真通报的内容是："铁托当时表示同意召开这样的会议，但是要求不规定议事的日程，也不要作出约束性的决定。"〔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第7页。〕但无论如何，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莫斯科当时从彭真那里得知的情况是："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拟定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见РГАНИ，ф.3，оп.14，д.99，л.26，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991。

〔1〕中国外交部报告：波匈事件之后，中国在苏联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显得更加突出，苏联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苏友好关系的新做法"。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91—01，第2—7页。

〔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2月2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7，л.1—8，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224，990—991。

作。对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颇感疑惑，并追问缘由。当事人断定，可能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与彭真的通话被监听了。[1] 面对如此被动的局面，毛泽东一改原来的设想，答复苏共中央说：中共中央不准备筹备和主持这次会议，会议应由苏共中央筹备召开。中共中央同时认为，会议应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召开，建议不要匆忙地开会。[2] 莫斯科只好耐心等待。

过了4个月，苏共中央再次催促中共同意召开会议，并建议在7月就召开一个秘密会议，同时提出，会议可以遵照南共的意见，不规定日程，由参加者自己来决定会议的性质和程序。这一次不好再推脱了，中共中央表示可以召开会议，但建议为开好这个会，应事先经过商量，可以先提出一个文件草稿，发给各兄弟党征求意见。一致的意见就写上，不一致的就不写。考虑到这个文件要公诸于世，中共主张会议之前要在共产党之间充分交换意见。草案要经过讨论、修改，一致同意后再开会。中共认为，这样做可能时间会长一点，麻烦一些，但是，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是有好处的。[3] 然而，就在会议筹备工作开始进行时，苏共内部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六月事件。这次事件的结果再次使中共占据了主动地位，赫鲁晓夫对毛泽东也更加言听计从了。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领导层内部逐步形成了两个派别集团。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构成了赫鲁晓夫的反对派，并在主席团内形成多数。而赫鲁晓夫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的主席团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他的支持者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到1957年夏天，双方的矛盾因主席团改选日期临近而开始激化，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继续贯彻二十大路线。6月18日，在违背赫鲁晓夫意愿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大多数成员坚持要求由部长会议主席布

〔1〕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第10页。笔者在中国外交部新解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彭真与铁托会晤的文件，可见此事极为隐秘。

〔2〕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第7页。

〔3〕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第7页。

尔加宁主持会议，而剥夺了本应该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权力。会议对赫鲁晓夫提出了大量指责，并以7比4的票数通过了免去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面对这预先策划的突然打击，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苏斯洛夫、米高扬等人采取了拖延战术。赫鲁晓夫在第二天继续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从各方面检讨自己，暗中却布置国防部长朱可夫、克格勃主席谢罗夫紧急动用军用运输机，将一批中央委员运到莫斯科。这些经过专门挑选的约200名中央委员强烈要求参加主席团会议，并召开中央委员会讨论第一书记和书记处的改选问题，朱可夫甚至扬言可能会动用武力来迫使主席团就范。面对突变的形势，莫洛托夫等人被迫让步，中央委员会非常全会于6月22日开幕。在持续了8天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在12次全体会议上，有60人发言，其他出席者均提交了书面发言或声明，一致谴责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党行为”。会议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

赫鲁晓夫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遭遇到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在苏共基层讨论中央全会决议的过程中，参加者非常踊跃。据统计，仅在俄罗斯联邦就有84.6%党员和预备党员总计371.15万人参加讨论，在会议上发言的有71.35万人。尽管像一般党的会议一样，多数发言者都表态支持中央的决议，但提出疑问和问题者也不在少数。相当一批党员和群众在发言中表现出惊慌和怀疑的情绪，他们很难理解所发生的事，很多党组织都把这看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不少地方在开会

〔1〕Наумов В.П. Борьба Н.С.Хрущё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с.10—31；Пихоя Р.Г.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в совет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1945—1958г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6，с.3—14。有关档案文献见：Ковалева Н. и т.д. сост. Молотов，Маленков，Каганович. 1957，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н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ФД，1998。中译本见赵永穆等译：《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

时争吵激烈，气氛紧张。有人要求让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在广播或报刊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人甚至当场宣布，宁愿被关进监狱和开除党籍，也不同意中央的决议。还有一些单位的讨论超出了党所规定的范围，很多大学的党员提出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必修课程的考试，人们还对社会生活方面的一系列政策表示出强烈不满，甚至发生了砸汽车和跳楼自杀的事件。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有些州党委不得不建议让国家安全委员会出面进行干预。〔1〕

赫鲁晓夫的麻烦不只来自国内和党内，继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苏联又发生如此惊天动地的事情，也引起了各国共产党的猜疑。尽管东欧各党大都在报纸表态拥护，但据中国使馆发回国内的报告，“在波兰的反应一般是冷淡的”，捷党“多数表示不理解”，“整个保加利亚人也很难理解”，很多人甚至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持批评态度。〔2〕中共基层党组织的反应更加非常强烈，其讨论的热烈程度丝毫不亚于苏共党员。上海市党内外的普遍反映是：“从苏共中央决议揭发的事实来看，反党理由是不足的”，主要是“属于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对党内分歧这样处理“会给帝国主义利用”，“帝国主义一定会借这个问题挑拨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甚至中国的右派分子也会“混水摸鱼”。天津市委会机关干部听到消息后，连夜讨论，第二天上班后仍然议论纷纷。许多人对苏共中央这种做法表示怀疑、惊讶和不满，有人甚至提出希望中共中央进行干预。山东省级机关党内外干部的思想波动也很大，普遍怀疑苏共决议，认为赫鲁晓夫“小题大做，恐怕是以宗派反宗派，以教条反教条，以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广州市干部为苏共中央决议可能引起的后果而

〔1〕Пыжиков А. Хрущевская《оттепель》, Москва：ОЛМА—ПРЕСС, 2002, c.66—67；Отклики трудящихся на решения июньского（1957.）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Архи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2000, №1, c.10—20；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年7月12日第2255期，第32—33页。

〔2〕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138—01，第1—9页；109—01124—08，第91—94页。

感到焦虑不安，他们认为莫洛托夫等人是老布尔什维克，革命一辈子，想不到竟落到如此下场！苏共二十次党代会批判斯大林的结果是在东南欧和全世界引起了大混乱，这次会不会重新引起混乱？[1] 中国驻苏使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也认为："反党集团事件是苏共中央使用组织手段处理党内思想分歧的事件，就其政治实质来看是属于党内是非之争，从公布的材料看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论证该事件有反党的性质。"苏共对马林科夫等人"作了如此严重的组织处理是值得考虑的"。"这次事件继斯大林事件和波匈事件之后第三次严重地打击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威信。"[2]

赫鲁晓夫很清楚，为了巩固苏共新领导集团在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他在莫斯科的举动需要得到各国党的支持，其中特别是中国党和毛泽东的支持。[3] 中央全会结束后，7月3日，苏联立即向各共产党国家使节介绍了全会的情况，又专门向中国使馆进行了个别通报。[4] 同时，苏联驻华使馆还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紧急约见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临时代办阿布拉希莫夫时只表态说，毛泽东不在北京，情况可以转告，又说，对一些老同志犯了错误，能否采取别的办法处理。[5] 7月4日，《真理报》刊登了会议决议和新闻公报，同时刊出的还有一些党支持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公开表态。[6] 但是，包括中共在内的大部分党没有表示自己的立场，这引起了苏联的注意。在当天的一次宴会上，《真理报》总编辑问中国记者，中国报纸发表了什么。当时中国的反应确有举足轻重的作

---

〔1〕上海市档案馆，A77—2—404，第1—3页；《内部参考》，1957年7月4日第2248期，第15—18页；7月5日第2249期，第5—6页；7月8日第2251期，第76—86页。

〔2〕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49—51页。

〔3〕据中国大使刘晓回忆，自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党内两派都频繁与中国使馆接触，寻求中国党的理解和支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50—51页。

〔4〕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49页。

〔5〕阎明复：《代序》，《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1—2页。

〔6〕1957年7月7日《人民日报》。

用，莫斯科一些大学生的言论很说明问题，他们说：对于苏共中央的决议，“毛泽东不发表意见，我们也不发表意见；现在只有毛泽东说的才算对的”。[1] 但此时莫斯科对中共的态度还一无所知，赫鲁晓夫显得非常焦急，于是派米高扬立即飞往中国，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

其实，中共中央对此事十分重视，7月4日夜便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了研究。会议讨论的内容，目前不得而知，但有材料说，第二天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传达了中央的基本方针：从承认事实、分清两派是非观点出发，对新的苏共领导机构只有支持”。[2] 7月5日晚，毛泽东在杭州会见米高扬，谈了整整8个小时。米高扬详细介绍了情况后，毛泽东发表了几点意见：莫洛托夫的错误在于思想守旧，企图破坏党的领导；苏共这样解决问题很好，加强了党的领导；中共原来有些人认为最好把莫洛托夫等人留在中央委员会，现在看来只能如此处理；肃反问题主要是取得教训，不可太追究个人责任，要注意团结。毛泽东最后表示，这次事件对中共也有些震动，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召开会议，决定公开发表意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议。[3]

7月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米高扬汇报说，开始中共反对采取把莫洛托夫等人开除出中央的严厉措施，但最后“中国朋友对中央全会的决议感到满意”，“认为做得非常好”。主席团会议因此一致认为，米高扬对中国的访问是“有益的和必要的”。[4] 毛泽东的表态如雪中送炭，使赫鲁晓夫如释重负。同时他也感到，召开一次共产党会议的事情，一方面不能再耽搁了，另一方面更需要依赖中共

---

〔1〕《内部参考》，1957年7月12日第2255期，第32页。

〔2〕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2页。

〔3〕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1957年7月5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4〕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7月8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7，л.59—59 о б.，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259。

了。[1] 7月9日，阿布拉希莫夫再次约见刘少奇，转达了苏共中央关于尽快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回答说：开这样的会应该取得大家一致同意的结果，要事先和各兄弟党商量，搞出一个共同的看法一致的文件来。[2] 中共的答复给赫鲁晓夫吃了定心丸，苏共开始积极进行准备。在莫斯科看来，只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其他党的意见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毛泽东提出要认真准备一个会议文件**

波匈事件后苏南关系有些紧张，为了进一步搞清铁托的态度，苏共派专人去南斯拉夫商议。8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自贝尔格莱德发来电报说，与卡德尔、兰科维奇等人会谈的结果是，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不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也不接受共同宣言，他们的理由是担心南斯拉夫的国际处境因此而复杂化。[3] 苏共中央主席团于当天召开会议，决定将已经起草好的宣言草案寄发原共产党情报局各成员国，其中特别要求驻波兰大使亲自向哥穆尔卡通报。会议还确定，只要这些党认为适宜，即使南斯拉夫拒绝，也要召开协商会议。[4] 很可能也是在此时苏联决定，利用各国党代表团来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庆典活动的机会，召开协商会议。第二天，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便致函毛泽东，正式邀请他赴苏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同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

---

〔1〕是年9月苏联终于同意向中国提供核技术，并于10月与中国签订了核援助的协定，应该被看做是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回报。详见沈志华：《援助与限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0—131页。

〔2〕《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405页。

〔3〕АПРФ，ф.3，оп.23，д.63，л.64—71，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1018.

〔4〕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10月18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8，л.18—19，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274、1018。

和若干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信中还说，为了把这个会议开好，苏共将把准备提交会议通过的文件，交给中共中央征求意见。[1] 对此，毛泽东欣然接受。[2] 而中共有意在9月初就向各兄弟党透露出毛泽东将亲自率团前往莫斯科的消息，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暗示将在庆典期间召开重要会议，并且希望各党“也派遣自己的第一号人物来莫斯科”。[3] 10月6日、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商量了访苏代表团的问题。[4]

10月22日，周恩来向苏联使馆通报了访苏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和动身日期。[5] 但此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即苏共起草的宣言草案尚未经过中共认可。直到10月28日，苏联大使尤金送来了赫鲁晓夫给毛泽东的私人邀请信及苏共起草的会议宣言草案。尤金称，这份宣言草案已送南共中央征求意见，南共领导人不同意这份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将草案翻译后，分送有关领导人。胡乔木看后认为需要修改，毛泽东又问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也认为必须修改。于是，毛泽东指定胡乔木动手修改，并指示，在文字上尽可能保留苏共中央的草案原稿，但重要的问题还是要表明我们党的观点。胡乔木用两天时间对草案做了较大改动，有的部分几乎重新写过。根据中国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粗略统计，中方对草案的修改约100多处，较大的补充有20余处，删节30余处。胡乔木所增加的重要内容主要有：和平力量的增长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而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硬要发动战争，则必然会在战争中自取灭亡；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

〔1〕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09页；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第12页。

〔2〕1956年苏联曾两次邀请毛泽东访苏，均遭拒绝。1957年5月伏罗希洛夫访华时再次提出邀请，毛泽东表示还要研究后再答复。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第11—12页。

〔3〕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416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84页。

〔5〕周恩来与尤金谈话记录，1957年10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87—18，第79页。

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毛泽东看过修改稿后表示同意，并特别欣赏最后一段表述。[1]

10月29日晚，毛泽东会见尤金大使。毛泽东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苏共中央送来的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文件，有些初步意见。总的来说，草案需要大量删减，只保留主要的、原则性的内容。草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中共还有一些个别意见。第一，关于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中共主张要同时提出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第二，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应该更一般性，不应当仅仅突出地提出同右翼社会党人团结的问题，而是要找这样一种提法，以便能把社会党人、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和进步力量都包括进去。第三，关于反党集团的问题，毛泽东希望在宣言中就不要指名道姓了。最后谈到莫斯科会议文件的形成问题时，鉴于南斯拉夫，可能还有波兰，不同意宣言的内容，中共提出三个方案。第一是经过事先充分讨论后通过并发表宣言，即使有一、两个代表团反对，宣言也要通过。毛泽东倾向于这个方案，并说：这样“天下不会大乱”。第二是经事先讨论通过一个简短的宣言式公报，其中只表述一些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问题。第三是只由中共和苏共两党发表声明。毛泽东请尤金尽快将这些意见转达给赫鲁晓夫，以便苏共中央主席团了解中共代表团将带着什么问题去莫斯科。[2]

---

〔1〕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3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第7—8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24页。阎明复原来回忆说，苏共草案是10月25日交给中共的，后来的回忆又改为28日。见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第13页。

〔2〕尤金致苏共中央电，1957年10月30日。《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2卷，第2863—2868页。另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24—727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第9页。

10月3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宣言》草案。鉴于需要商议和修改的地方较多，决定毛泽东提前去莫斯科，到那里起草一个稿子，提交苏方讨论。政治局会议还批准了10月29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关于代表团的方针的决议。〔1〕11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尤金10月30日电告的毛泽东谈话内容。会议做出决议，否定了只搞一个简短公报的方案，而接受毛泽东的第一方案：即使南斯拉夫人不签字，也要发表共同宣言，同时，也可以搞一个中苏两党的声明。最后，会议要求苏斯洛夫等人参考中共的意见进行修改，尽快提交主席团。〔2〕当天，毛泽东率领一个庞大的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 中共为开好会议所做的努力

召开这次共产党国际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至少有一点是中共和苏共共同追求的目标，那就是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10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把这次莫斯科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赴苏代表团的方针是：对苏共“以保为主，以批为副”，“以斗争求团结，协商一致，求同存异”。〔3〕从后来的结果看，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主要需处理好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弥合苏联与波兰的关系，调解南斯拉夫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其中对应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是：1. 中苏之间对和平过渡问题的观点分歧；2. 波兰不同意“以苏联为首”的

〔1〕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第16页。杨回忆说，中方的修改稿当时就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了。〔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3页。〕这大概是记忆有误，详见下文。

〔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11月2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8，л.26—27，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279—280，1021—1022。

〔3〕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6—97页。

提法；3. 南斯拉夫拒绝参加执政党会议和在宣言上签字。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起草一个令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宣言，处理的原则就是求同存异。

### 中苏在和平过渡问题上达成妥协

莫斯科会议的整个过程，实际上主要就是一件事：起草和通过《莫斯科宣言》。从11月3日中苏两党开始交换意见，到10日基本达成一致，然后又交给各党代表团讨论，并成立起草委员会修改，直到会议的最后一天（19日）完成定稿，进行报告和签字。在此期间又决定，分别召开两个会议，执政党（南斯拉夫不参加）单独签署《莫斯科宣言》，全体共产党、工人党另外签署一个《和平宣言》。各种不同意见的交流，不同看法的争论，苦口婆心进行说服，想方设法达成妥协，所有这一切求同存异的努力都是在起草和讨论宣言的过程中完成的。正如毛泽东所说，重要的问题是与大家商量搞出一个会议文件，“开会实际上只是一个形式而已”。[1] 但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中共代表团颇费了一番周折。

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当天，赫鲁晓夫登门拜访。毛泽东说，我提早到来就是为了宣言草案。我们要搞一个好的宣言。我们党也准备起草一个稿子，供你们考虑。[2] 11月3日晚，中苏两党举行会谈，首先讨论了起草文件的问题。关于会议是否要通过一个共同宣言的问题，赫鲁晓夫说，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关于苏方的草稿，赫鲁晓夫说，正在根据中共的意见修改，比如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得短一些等。毛泽东表示，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中方都同意。他建议由中苏共同研究和修改宣言，并指定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

[1] 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2]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7—98页。

加。毛泽东还提出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以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会谈中，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还提到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仍然表示不赞成，他说："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的情况很难，评价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指亚非国家。"毛泽东提出，还是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会议召集人。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毛泽东主张他们不在宣言上签字，宣言中可以提一句：对文件中的各点，12个执政党（不含南斯拉夫）必须执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只是作为建议提出。[1]

中共代表团从11月3日晚上即开始修改草稿，由陆定一、胡乔木和陈伯达分头执笔，邓小平主持讨论修改，毛泽东最后审定，到11月5日完成。同日，苏共中央也提出了一个修改草案。11月6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分别由邓小平和苏斯洛夫领头开始会商。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团的草稿为基础，进行修改、补充。[2] 11月8日中午，中苏双方代表再次会商，就宣言草案交换了意见。双方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和平过渡的问题上，分歧依然没有解决，决定各自再行考虑，10日继续会谈。[3] 关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问题，是苏共二十大首先提出的。苏共认为，目前国际局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制度和平共处，因此出现了和平过渡的新的前景，其中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指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的过程，一个

---

〔1〕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28、733页；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第20—22页。

〔2〕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第10—11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7—99页。

〔3〕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89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第10—11页。

是指取得政权后对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这里发生争论的是前者。苏共最初宣言草案中的说法是："由于国际舞台上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从而为各个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新的前景。工人阶级追求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里，共产党员力争通过与社会党人结盟和争取议会中牢固大多数，以及深入地开展大规模的非议会的革命性阶级斗争的途径，把人民的绝大多数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之下，把资产阶级的议会变成真正体现人民意愿的，并能够摧毁反动势力的抵抗和确保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这种愿望的实现，将会给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经过修改的第二稿，在这一点上基本没有改动。[1]而中共的看法是必须提出两种可能性，并且应该强调武装斗争的前景。

为了说服苏共，毛泽东决定主要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工作。11月7—9日，毛泽东分别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会谈一次，与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高兰会谈两次。毛泽东在谈话中反复指出，在革命道路的问题上，是否坚持十月革命的普遍原则，是否坚持和平过渡和革命战争两种可能性，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区别。必须准备革命的两手，不宜过分强调和平过渡。这几个西欧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都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可以在宣言上提出两种可能性。其实，西欧各党的立场也是有区别的。法共倾向于武装斗争，意共更强调议会斗争，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为此还在莫斯科吵了起来。英共则认为，在英国下一届政府可能是工党上台，这对和平过渡更有利。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谈话中没有过多强调武装斗争的问题，而中共提出的两种可能性的说

---

〔1〕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1022；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58—60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7—98页。

法，则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折中方案。[1]

11月10日中苏两党会商前，各自分别召开会议研究对策。赫鲁晓夫主持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11月11日把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准备的大会报告分发给各兄弟共产党代表团。关于宣言草案，委托苏斯洛夫等人与中共代表协商，继续完成宣言文本的制定工作。会议特别指出，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要"坚持自己的立场"。[2] 中共代表团认为，苏共的主要顾虑是，如果改变对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就无法与苏共二十大的提法衔接，这样很难向苏共、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交代。估计到苏共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为了维护团结，又坚持原则，邓小平提出，是否可以就和平过渡问题向苏共提交一个书面的意见提纲，全面阐述中共对和平过渡问题的看法。同时，在宣言草案中，照顾到苏联的观点，对和平过渡问题有所阐述。毛泽东同意这个建议，指定陈伯达、胡乔木起草这份意见提纲。[3]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的同时，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代表团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方的宣言草案和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当日下午，中苏两党起草宣言的小组再次会谈。邓小平首先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双方经过磋商，终于就全部草案达成一致意见，并决定以苏共和中共两个代表团的名义将草案提交各国代表团讨论。[4]

1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宣言草案，授权代表团定稿。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也听取并通过了关于宣言草案的修

---

〔1〕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33—734页；毛泽东与多列士谈话，与波立特、高兰谈话，1957年11月8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06—107、133—134页。

〔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11月10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8，л.28—28 о 6，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280—281。

〔3〕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第10—11页。

〔4〕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第10—11；《杨尚昆日记》上，第290页。

改意见，确定由起草委员会直接与中共代表商议定稿。在此期间，中苏两党代表团还商定，建议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不列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于14日召开的会议，以免增加他们国内工作的困难。经与各党交换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在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会议之后，再召开世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议。这个会议的文件，即《和平宣言》委托苏联和波兰党的代表起草。[1]

至此，中苏之间一个最大的分歧意见得到解决。与苏共的草案相比，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按照中共的意见，有两点重要修改：一、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没有使用“和平过渡”的字眼）的同时，还指出了非和平过渡道路，并强调“在每一个国家里，哪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具有现实可能性，决定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二、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稳定的多数时，同时提出应在议会外开展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条件。[2] 至于中共的书面提纲，当时只提供给了苏共，既没有在大会上公开，也没有提交给任何其他党的代表团。直到1963年中苏大论战时，这个文件才公布于众。实际上，中共《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在原则上与宣言的提法没有分歧，只是又增加了两点：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争取同社会党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但不能模糊同社会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原则界限。[3] 邓小平后来在八大二次会议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对于我们的观点，苏联同志没有

〔1〕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第11页；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11月12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8，л.29，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281，1022。

〔2〕1957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3〕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96—99页。

表示不同意见。”[1]可以看出，中苏之间真正的分歧还有更深层的含义。

就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而言，当时中国的外交方针与苏共的观点，特别是经过修改的宣言中的提法，基本是一致的。[2]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宣言修改草案的当天，周恩来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了一个报告。周恩来说，现在世界上存在着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形成，并且不断强大起来，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定要衰亡下去。这是肯定的、必然的趋势。因此，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就是敢于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进行和平竞赛，通过和平竞赛可以使帝国主义一天天削弱下去。我们提出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的政策，但并不怕、也不会疏忽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要警惕战争的危险。关于国家的过渡，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四五年来，国际形势一般地说是趋于和缓的，但是并不排斥在个别问题、个别地区、个别一段时间内会有紧张。[3]这说明，中共代表团在和平过渡问题上坚持不同意见，核心的考虑就是应该强调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即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苏联坚持和平过渡的提法，主要也是为了与苏共二十大路线衔接。如果在共产党国际会议上按照苏联提法表述这个问题，就等于确认了苏共二十大的国际意义，说它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那么中共的革命经验将置于何地？吴冷西的这个感受是十分准确的——这就是中苏分歧的深层含义。中共代表团表面上争论的是“和平过渡”的

---

〔1〕邓小平：《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1958年5月5日。吉林省档案馆，1/1—14/59，第78—84张。

〔2〕讲到具体问题时，毛泽东并不否认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如在与陶里亚蒂谈话时毛泽东就说，意大利资产阶级比较弱，所以将来意大利有可能先经过一个过渡阶段，第一阶段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到第二阶段才是无产阶级专政。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11—112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95—96页。

提法，实际上是不愿意在共同宣言中提到苏共二十大。[1] 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宣言已经按照中共的要求在谈到“和平过渡”时提出了两种可能性，而在起草委员会上中共代表团还是声明：“中国党对这一段文字是有不同意见的，既然许多同志都表示同意，我们就不坚持了”。[2] 当然，为了中苏团结，毛泽东最后还是做出了妥协和让步。但恰恰是这种求同存异的做法，为日后中苏争论和大论战留下了伏笔，中共为此后悔不已。[3]

**毛泽东提出“以苏联为首”的口号**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公开讲话和私下会谈中，说的最多也最引人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以苏联为首”。自1956年初以来，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和威信受到严重打击。中共意识到，苏联不仅是列宁主义的故乡，也是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且长期担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首领。因此，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阵地，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维护苏共的威望，坚持“以苏联为首”。当然，在毛泽东眼里，赫鲁晓夫政治经验不足，马列主义不强，苏共新领导集团在处理国际共运事务中也捅了不少“娄子”。但至少在目前，无论就国家实力还是国际影响来说，只有继续把苏共推上领头羊的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

〔1〕为此，中共甚至反对苏方草案的如下提法：“苏共二十大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中共八大、法共和意共的代表大会也表示出对马列主义的忠诚”。中方表示在宣言中无需提到中共八大，各党代表大会是各党自己的事，不需要国际会议批准。见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第32页。

〔2〕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39—140页。看起来，中共不得不同意的那段文字应该是指宣言中的苏共二十大“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这句话。〔见1957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后来，在1960年底的莫斯科会议期间，中苏之间争论最大的还是在会议宣言中要不要提苏共二十大的问题。参见《杨尚昆日记》上，第610—611页。

〔3〕李丹慧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考察，并撰写了长篇论文《最后的努力：中苏在1960年的斗争与调和》（《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以此反观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很有启发。

营的稳定和统一。毛泽东在1957年初谈到中苏关系时讲：中苏之间矛盾不大，主要问题上比过去更靠近些，但还有一些问题。因为历史习惯不同，他们思想、做事的方法不同，要等候，要做工作。思想不同要谈心，有事要商量，要开会。形势会压迫他们有所改变，而且已经有些改变了。只能逐步地改变，不要忙，并且帮助他们。矛盾总是有的，只要大体过得去，求同存异，不同的将来再说。〔1〕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党内通知也指出："社会主义各国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共同的指导思想，因而在原则问题上是有一致的基础的；即使在某些问题上发生不同意见，也是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逐步取得一致。并且会进一步改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增进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2〕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党内这样谈"以苏联为首"，多少有些居高临下的姿态，似乎是以一个国际共运指导者的姿态来维护苏联的形象。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提法，尽管在中国的报纸上一直频频出现，但从波匈事件以后，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已经不大使用了，甚至苏共本身也在考虑，为缓和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尽量避免提到苏联的领导作用，放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表述。〔3〕因此，在苏方最初起草的宣言中，按照苏共主席团的建议删去了所有提及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用语。赫鲁晓夫回忆说，当时他的考虑是，在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后，这类词句还写进国际宣言，有可能被理解为试图恢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斯大林式的领导方式，试图重新确立苏共对其他兄弟党的领导权，进而有

〔1〕《杨尚昆日记》上，第278页。这里所说"已经有些改变"是有根据的。1957年3月9日驻苏使馆报告：波匈事件发生和中国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苏联对斯大林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赫鲁晓夫的讲话和苏联报刊上的文章，"有意地"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纠偏"。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719—01，第3—7页。

〔2〕福建省档案馆，101/5/982，第25—29张。

〔3〕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42.

可能被理解为试图改变各国共产党现在建立在平等合作原则基础之上的新型相互关系。看到中共起草的宣言里提到“以苏联为首”，苏共中央感到出乎意料，不好理解。于是，赫鲁晓夫提出，是不是提“以中苏为首”。毛泽东说，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但在为首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跟你们平起平坐，我们还差得远。如果以我们两个为首，我们是负担不起这个责任的。[1]

对于“以苏联为首”的提法，波兰、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党在讨论宣言时曾明确表示反对，其他很多党的代表内心也不赞成，只是保持了沉默而已。[2] 所以，毛泽东除了劝告苏共接受这个口号外，还要说服其他各国共产党。在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在发言中就专门谈了“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毛泽东首先讲到需要有一个党为首的理由，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毛泽东接着讲到为什么要以苏联为首，他说：“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而“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40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尽管苏共也犯过一些错误，但目前还是它的实力最强，“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至于过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毛泽东指出，那主要是斯大林的错误，“应

〔1〕《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二），马贵凡译，《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1辑（1999年9月），第192—193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31—132页。据中国驻苏使馆汇报，早在1955年2月，即赫鲁晓夫访华后，在苏联就出现了“以苏中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969—01，第1页。

〔2〕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31—132页。

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毛泽东最后做总结说，“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1〕

然而，各方的意见并没有平息。11月11日，宣言草案发给各国代表后，便收到了不少反馈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意见来自波兰代表团。〔2〕于是，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讨论和修改中苏两党提交的宣言草案。15日起草委员会讨论了一天，争论很激烈。主要的反对意见还是来自波兰代表团，他们认为不宜提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此外，还不同意美帝国主义或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等一些提法。下午5点半休会时，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些情况。毛泽东决定立即去波兰代表团住所，同哥穆尔卡当面交换意见。〔3〕

在会谈中，毛泽东与哥穆尔卡先讨论了一些枝节问题，并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如“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改为“美国的某些侵略集团”，“复辟资本主义”改为“进行颠覆活动”等。但是在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上，会谈陷入了僵局。哥穆尔卡态度强硬地说，在共同的文件中只能包括大家都同意的东西，而目前文件中还有些东西是波兰不能同意的，如果需要少数服从多数，那么波兰就不准备参加会议了。毛泽东好言相劝说：大家都作些让步，这次会议与以往不同，苏联党有了很大进步，让苏共当召集人的意见是中共提出的，召集人并不决定任何问题。不管毛泽东怎么劝说，哥穆尔卡坚持反对在原则上确定苏共为以后各国共产党会议的召集人。波兰人后来退了一步，提出是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25—628页。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在1956年12月24日的报告中指出，苏联正在“积极调整同兄弟国家的关系”，并一再强调，对于苏联党过去工作中“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希望中国同志坦率地提出批评”。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788—01，第1—8页。

〔2〕《杨尚昆日记》上，第292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8—99页。

〔3〕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第11—12页；《杨尚昆日记》上，第293页。

否可以搞一个内部决议，委托苏联召集会议，但不写在宣言上。毛泽东不再坚持了，最后表示：我们应该帮助赫鲁晓夫等同志，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兄弟，帮助他们，支持他们。[1] 从会议记录看，毛泽东的劝说起到了一些作用。现场翻译李越然认为，哥穆尔卡接受毛泽东的说法是很勉强的。[2] 另一个会谈参加者杨尚昆的感觉是，“似有好转，双方意见已较为接近，明天可能达成协议。”会谈后，毛泽东连夜约见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等人，转告哥穆尔卡的意见，并讨论了第二天如何开会的问题。[3]

11月16日上午，起草委员会再次开会，完成了宣言的起草工作。下午召开全体会议，首先由苏斯洛夫报告了宣言草案的修改情况，然后是毛泽东带头发言，表示同意宣言的内容。毛泽东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毛泽东最后断言：“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4] 在毛泽东具有影响力的表态之后，各国代表团均发言表示拥护宣言，哥穆尔卡也在其中。会议决定基本通过草案，交起草委会作最后的修正。[5] 在后来发表的宣言中，保留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而没有再提“会议召集人”的问题。这显然又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反复强调“以苏联为首”，自然是为了社

〔1〕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1957年11月15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2〕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66页。

〔3〕《杨尚昆日记》上，第293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28—630页。

〔5〕《杨尚昆日记》上，第293页。哥穆尔卡在17日大会的发言中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39页。

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说法，特别是11月18日的即席讲演，也给人留下了另外一种印象。第一，每个阵营必须要有一个头，他用了一句中国的俗话，叫做“蛇无头而不行”；第二，目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的力量最强，所以“这个头就是苏联”，而中国只是政治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还没有这个资格；第三，苏联当这个头是需要帮助的，中国还有句成语：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笆篱三个桩。“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1]按照这个逻辑，目前以苏联为首是因为只有他们可以担负起这个责任，一旦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为首的就理当是中国了。在1959年10月中苏两党会谈发生激烈争吵时，赫鲁晓夫在情急之中叫嚷了一句：只许你们指责我们，不许我们批评你们，说什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对苏共中央的观点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2]赫鲁晓夫后来体会到：“如果所有其他党都承认一个党可起带头的作用，那么这个头其实也可以更换，今天一个头，明天另一个头。我们认为，中国人在为自己准备条件，将来要担任这样的角色”。[3]

赫鲁晓夫的感觉是不错的。实际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后，中共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和地位明显提升，甚至已经远在苏共之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发表后，受到各共产党国家的高度赞扬。匈牙利党的机关报发表社论认为，毛的讲话提出了新的、创造性的观点，指导着整个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捷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也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及时认识到社会变化的历史意义，及时认识到在新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必然性和正确解决这些矛盾的必要性，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来领导各社会阶层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39—640页。

〔2〕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59年10月2日，《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3卷，第3210—3222页。

〔3〕《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二），《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1辑（1999年9月），第192—193页。

前进——这一切都保证了中国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强大的、日益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党中央机关报总编辑卡斯曼则说：中国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里，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应用。[1] 据新华社报道，毛泽东的讲话刚发表，苏联《真理报》便以三个整版篇幅刊载了全文，还准备出版单行本。人们争先购买当天的《真理报》，以至在报刊零售点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不少大学自发地把这篇讲演列为试题之一。苏联哲学界普遍认为，“毛泽东同志不但概括了中国经验，而且概括了苏联经验”，讲演是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2] 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甚至对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中国同志们的文章为大家指出了方向，非常有利。我们党的斗争正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3]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基层干部也普遍认为中共应该取代苏共来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了。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报道了许多这类的言论：“中共虽成立只有三十六年，但从1935年以后就正确了，苏共成立虽比我们久，但老出问题”。“南斯拉夫对苏联发表文章不同意，但中国的文章一出来，铁托就不叫了，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混乱现象也澄清了”。“苏联马列主义的发展已落后于中国，为什么中国还要说以苏联为首”。“苏共已经不配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了”。“社会主义阵营不一定要以苏联为首，而应以中国为首”，如此等等。[4] 所以说，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里，实际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指

---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595—596页。

〔2〕《内部参考》，1957年6月26日第2240期，第16—17页；1957年7月3日第2246期，第15—30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中（109—01714—01、02）保存着近200页苏联各界人士给毛泽东的信件，其中充满了赞美和崇拜的言词。毛当时在苏联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3〕毛泽东与多列士谈话，1957年11月8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4〕《内部参考》，1957年7月4日第2248期，第15—18页；7月5日第2249期，第5—6页；7月8日第2251期，第76—86页；10月25日第2342期，第6—7页；10月29日第2351期，第7—10页。

导者是中共，毛泽东只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强，因此暂时还不能直接出面承担起领导责任罢了。[1] 但无论如何，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人为首这个原则是需要确定下来的。

**毛泽东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情有独钟”**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还有一个角色很值得注意，就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南共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不同寻常，且颇有些微妙。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主动向铁托道歉，努力恢复苏南关系，同时要求各国共产党积极与南共联系。1955年3月，中国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两党也恢复了联系，尽管当时毛泽东本人并不信任铁托和卡德尔，甚至认为南斯拉夫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2] 经过一年的努力，南斯拉夫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新被社会主义国家接纳。1956年9月，南共派代表出席了中共八大。毛泽东在接见南共代表团的谈话中，对斯大林的大国、大党主义进行了全面批判，并一再称自己也被斯大林看作是半个铁托，表现出对南共的极大同情。[3] 但是好景不长，在匈牙利事件中，苏南之间因处理纳吉问题引发了矛盾，铁托的普拉演说更令苏共不满，双边关系再度紧张。[4] 中共也出面批评南共，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矛头明确指向铁托的普拉演说。对此，苏联方面表示极为赞赏。[5] 不过，当时毛泽

[1] 后来中苏论战时，中共中央提出，所谓以苏联为首，“仅仅意味着苏共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313页。

[2]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备忘录，1955年3月8日，《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2414页。

[3] 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59—262页。

[4] 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55—468页。苏南在匈牙利事件中的矛盾详见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Н.С.Хрущев，Й.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1，с.10—29。

[5] 《内部参考》，1957年1月2日第2093期，第3—4页。

东还是把南共的错误看作是阵营内部的问题，主张对铁托既讲批评，又讲团结。[1] 中共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兄弟国家"。"我们批评铁托和卡德尔，目的是要帮助他们纠正错误，希望澄清事实和进行合作，而不是孤立他们"。[2]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中共很重视南斯拉夫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

尽管1957年6月以后苏南关系有所缓和，特别是苏共六中全会后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表现出格外热情，但铁托仍坚持不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当10月2日苏共中央向南斯拉夫使馆通报十月革命节庆典活动及召开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安排时，得到的答复是，南共将派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但铁托因病不能前来。至于南共是否参加共产党会议的问题，双方都没有提及。[3] 不知是有所担心还是寄以希望，这个情况苏共没有向中共通报。后来苏共只通知中共，南共表示不能接受苏联起草的会议宣言。10月25日，中共从苏联大使的通报中得知了这一消息，对于南共是否来参加会议非常关切。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一见到赫鲁晓夫就问铁托来不来。赫鲁晓夫答，我们发了邀请，但是他不来。毛泽东说，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了，肚子里能没有气？并问，铁托不来，别人来不来？赫鲁晓夫答：卡德尔来，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是出自他的手。毛泽东说：那好啊，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4] 但赫鲁晓夫却没有毛泽东这样的气量。

以卡德尔、兰科维奇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于1957年11月5日抵

〔1〕就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发表后不久，刘晓在中国使馆举行晚宴，与米丘诺维奇举行了亲切会晤。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250—251页。

〔2〕周恩来与哥穆尔卡谈话记录，1957年1月11日，Andrzej Werblan，Rozmowy Wladyslawa Gomulki z Zhou Enlaiem w 1957r.，Dzieje Najnowsze，Rocznik XXIX，1997.4，c.119—144。

〔3〕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424—423页。

〔4〕《中苏外交亲历记》，第161—162页；李越然在1997年10月北京"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

达莫斯科，苏方的接待和安排非常冷淡。第二天苏南两党举行了正式会谈，气氛自始至终十分紧张。在会谈中，赫鲁晓夫一开始就宣布，这次在莫斯科将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并且已商定，即便南斯拉夫人不参加，也要发表一项共同宣言。赫鲁晓夫严厉地指责南共接受美国的援助，违背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精神，认为苏南关系再次紧张的责任在南斯拉夫。卡德尔坚持南斯拉夫的不结盟政策毫不退让，他说，南共认为，把世界划分成集团是人类的不幸，这样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南共的主张是解散两极对立的集团，取缔作为政治手段的战争，实行积极的和平共处，各国人民有权为自己选择社会发展的道路。至于接受美国的援助，这与当时的冷战状况和苏联的立场有关系，应当对此承担责任的不是南共，而是在1948年攻击南斯拉夫的那些人。南共代表团还表示，无论如何不能签署共同宣言，南斯拉夫将以一切手段捍卫自己的独立。会谈很不愉快，言词越来越尖锐，赫鲁晓夫还讲了一些侮辱性的话，但对结果却无可奈何。[1]

在11月9日的晚宴上，赫鲁晓夫试图再次说服南共代表团，建议他们赞成宣言的实质，而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这个建议同样遭到了拒绝。11月12日，卡德尔与赫鲁晓夫举行第二次会谈。卡德尔解释了南共代表团不能在宣言上签字以及不能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原因，但又说可以在报纸上表示支持宣言中南共所同意的一些观点。赫鲁晓夫似乎已经估计到这次会谈的结果，对卡德尔的讲话既没有感到意外，也没有再发火，只是在讲话中继续指责南斯拉夫的选择是一种分裂行为。最后，他希望南共再斟酌一下。14日，大会开始前，南共代表团在使馆召开会议，最后确定了他们在莫斯科的行动：只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全体代表会议，并在各党

〔1〕爱德华·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李代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168—170页；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443—444页。

都同意签署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这个决定得到了铁托的完全支持。对于南斯拉夫的顽固态度，赫鲁晓夫显得有些气急败坏，对南共代表团采取了某种抵制行动。由于苏联的冷淡态度，许多代表团都有意回避南共代表团，使他们在莫斯科的处境极为尴尬。同其他代表团的热闹活动相比，米丘诺维奇感到，南共代表团“在列宁山可以说度日如年”。[1]

毛泽东对南共代表团的态度显然要宽容和轻松得多，他不像赫鲁晓夫那样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之，既没有批评南共的立场，也没有试图劝说他们同意共同宣言的观点。毛泽东似乎早已打定主意不需要南共及西欧几个党在宣言上签字。他在了解了意共、英共和法共代表团的态度后，11月9日，再次与英共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向赫鲁晓夫同志提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不参加签字，会更有利一些，更便利你们的工作，否则资产阶级又要攻击你们，说你们接受了莫斯科的命令。法国和意大利的党已经决定不签字。南斯拉夫的党也不签字。宣言只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签字。我们现在正在说服波兰，如果波兰不愿意签字，我们准备由11国签字。”[2] 虽然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一直没有与南共代表团直接接触，但在最后阶段却表现出十分热情的态度。

在11月18日的即席发言中，毛泽东在讲到团结的问题时，专门提到了南共代表团，他说：“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国宣言上签字，使十三国缺少了一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南斯拉夫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字好了。将来若干年后，我想他们是可以在另外一个宣言上签字的。”[3] 这段话似乎打动了南共代表团，大会休息

〔1〕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445—455页。

〔2〕毛泽东与波立特、高兰谈话记录，1957年11月9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39—640页。

时，卡德尔走到毛泽东跟前说，他对中共同志能够谅解他们很满意，他很感激毛主席这番讲话。[1] 对于孤独的南共代表团来说，这大概是莫斯科会议期间撒向南斯拉夫人的唯一一缕阳光。而这恰恰给了毛泽东进一步向南共阐述自己看法的机会。

就在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卡德尔提出，南共代表团希望对毛泽东进行礼节性拜会。南共对此并没有抱很大希望，他们以为毛泽东很可能会因为南共代表团没有签署宣言而拒绝接见。令南斯拉夫人意外的是，刘晓大使迅速给予了答复，说毛主席很高兴立即接见南共代表团，以至米丘诺维奇感觉毛泽东似乎正在等着他们提出拜会的请求。作为东道主，毛泽东非常亲切和热情地与卡德尔等人会谈了近两个小时。更令南共代表团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对他们没有签署共同宣言竟没有表示丝毫的不满和责备。当卡德尔说明拒绝在宣言上签字的理由时，毛泽东只是说，这不是什么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共也不接受任何一个国家乃至苏共的领导，但由于“俄国人现在喜欢，而对我们也无害”，因此中共不反对这一点。当卡德尔谈到南斯拉夫的发展成就，并列举了钢产量数字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如果俄国人的钢产量赶上美国，中国人赶上英国，南斯拉夫人赶上意大利的话，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2] 南共特别注意到，尽管他们没有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但在中共眼里，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19日苏共的告别宴会上，毛泽东特意走到米丘诺维奇身边祝酒，提议为中南友谊干杯，又对卡德尔开玩笑地说：“你们和我们的区别只是在于，你们长胡子，我们不长胡子。”按卡德尔的理解，毛泽东这是在表示“愿意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他颇为深情地对毛泽东说，铁托同志很希望能够见到毛主席，希望中南两党加强联系。[3]

---

〔1〕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23页。

〔2〕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456页；《卡德尔回忆录》，第172—176页。

〔3〕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457页；《卡德尔回忆录》，第172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23—124页。

在对待南共的态度上，毛泽东无疑比赫鲁晓夫更表现出一个领袖的风范，而他做出如此努力的目的，自然是想把南斯拉夫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尽管这个愿望最终未能成为现实。

当然，莫斯科会议上的分歧和矛盾并不只是上述三个方面，不过在宣言中都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处理了。如意共对“在目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说法不满意，于是就在宣言中加了一句：“对于每一个共产党说来，哪一种危险在某一时期是主要危险，由它自己判断。”再如，苏共坚持还要办一个共产党的国际刊物，有些党不同意，最后达成口头协议，将来刊物办起来，只刊登相同意见，不刊登分歧意见，不搞批评和争论。[1] 经过毛泽东的百般努力，确实搞出了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共同文件，达到了求同存异的目的。然而，其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实际上，《莫斯科宣言》没有任何约束力，文件虽经大家签字，但模棱两可的用语处处可见，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这就难怪会议之后各党依然各行其是，而后来发生争执时，又都援引宣言的观点来指责对方。仔细品味可以发现，其实莫斯科这一纸宣言，从内容到形式，都真实地反映了中苏关系的性质、特点和实质，是中苏同盟关系最典型的写照。

毛泽东确实非常重视这次会议，虽说是“以苏联为首”，但中国人的操心出力一点儿也不少。[2] 关于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所起的作用，杨尚昆回国后在一次报告中有如此评价：“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在各方面起了决定作用。当然，同苏联协商那是没有问题的。但

〔1〕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35、149—150页。1958年1月31日，苏共中央来信征求中共对出版一个国际性理论刊物的意见，苏共建议这个杂志可作为各党联合刊物，只进行宣传和研究马列主义，交流各党经验。2月27日，中共回信表示赞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97—98页〕。《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于1958—1991年期间，在布拉格用34种语言出版，并在145个国家发行。

〔2〕有一个细节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重视：毛泽东为这次访苏准备的礼品共396件，其中仅赠送苏共中央领导人的礼品就差不多装了整整一个车皮。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107—01，第4页。

是，许多问题，许多意见是主席提出来的，经过协商以后，他们接受了。”[1] 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需要补充的是，在毛泽东的种种努力背后，隐含着他对国际共运领导地位的觊觎。当然还必须看到，毛泽东的有些观点和做法是别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的，而这些恰恰也隐含着未来分歧的基础。

## 毛泽东在莫斯科“指点江山”

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机构领导和指挥的历史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而这无疑是毛泽东的一个创举。[2] 正因为如此，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成为最引人注意的中心人物。

###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特别礼遇

首先在接待规格上，中共代表团就显得与众不同。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到来特别重视，提前两天就派苏共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和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专程到苏联国境第一站伊尔库茨克去准备接待工作，并且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事前毛泽东一再提出，不要搞大规模欢迎仪式，中途停留时他也不准备走出飞机，免得感冒；除在莫斯科机场发表谈话外，沿途不要组织欢迎，因为天气太冷，他和宋庆龄都不能乘坐敞篷汽车。对此，赫鲁晓夫一一照办，迎接的礼遇规格很高，但仪式很简朴。[3] 抵达莫斯科后，所有来宾都住在莫斯科市

〔1〕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60页。

〔2〕在后来的国际共运中确实遵循了“开会解决问题”的原则，如1960年12月的莫斯科会议，1965年3月的莫斯科会晤，1969年6月的莫斯科会议。

〔3〕参见《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2卷，第2863—2868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107—01，第6页；109—01100—01，第9页；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第153页。

郊别墅，只有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被安排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在郊外还有两处备用别墅）。赫鲁晓夫讨好地对毛泽东说：这里“离会议厅很近，有条走廊与会场乔治大厅相通，很方便”。而毛泽东本人将“住在沙皇的寝宫里，我们为您选择了最好的房间”。为了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赫鲁晓夫还专门为他特制了木板床，甚至把寝室卫生间的马桶都改成了蹲式的。[1]

毛泽东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立即成为关注的中心。据杨尚昆记载，在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上，毛泽东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毛泽东讲话开始和结束时，也是全场起立鼓掌。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只鼓掌没有起立。在红场举行庆典活动时，游行队伍不断高呼毛泽东的名字，表示致意。游行结束后，参观庆典的群众一哄而上，围着毛泽东欢呼。“据苏联同志说，这种情形是前所未有的。”[2]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的发言方式也引起了许多当事人的注意。所有来宾都是事先准备好经本党中央批准的发言稿，在会上照稿子念，而将俄文译稿发给与会者。只有毛泽东，三次发言都是即席讲话，这使苏方会务工作人员感到非常为难。特别是在11月18日大会上，所有发言的人都是站在讲台上作报告，只有毛泽东坐在那里讲。[3]

毛泽东离开莫斯科前，苏共中央主席团还特意为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组织了一次与苏联各界著名人士200多人的会见，苏共领导人几乎全体出席作陪。会见进行了将近两小时，毛泽东与出

〔1〕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第158—159页；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9页；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第19—20页。

〔2〕《杨尚昆日记》上，第287、288页。

〔3〕Сидихменов В.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Новое время，№2—3，1993，с.38—39；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16—126页。对此，毛泽东的解释是他害过脑贫血病，站着讲话不方便。

席会见的人们进行了亲切愉快的谈话。[1]这个场景也是其他所有代表团没有机会遇到的。[2]

不过，最令研究者感兴趣，并引起争议的，是毛泽东在11月18日大会上的长篇即席发言。他在发言中不时讲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和不易理解的话语，使得听众惊诧不已。

### 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

毛泽东一开场就提出了一个后来被众人传诵的著名论断：“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围绕这个命题，毛泽东讲了十件大事，从反法西斯战争、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伊士运河事件，直到解除叙利亚危机、苏联卫星上天、英国退出亚洲和非洲、荷兰退出印尼、法国退出北非。总之，国际形势已经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3]在11月8日与英共代表的谈话时，毛泽东又讲了这十件大事，并总结说：“我总有一个印象：社会主义国家走在前边，资本主义国家落在后边。我觉得，资本主义国家永远落在后边了”。[4]11月17日，对中国留学生讲话时，毛泽东说得更为简明：“现在，苏联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开

---

〔1〕《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1日。

〔2〕毛泽东也有一些要求是赫鲁晓夫无法接受的。如在讨论中苏双方会见的时间安排时，毛泽东提出，会见要在凌晨三四点钟进行；在谈到团结的问题时，毛泽东希望赫鲁晓夫学习中共八大在中央委员会保留王明的做法，也把莫洛托夫选进苏共中央委员会。这些都令赫鲁晓夫十分反感。见杰留辛在1997年10月北京“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44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30—638页。

〔4〕毛泽东与波立特和高兰谈话记录，1957年11月8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1]

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这在当时确实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说明苏联的科技水平，特别是在导弹发射技术方面，已经走在了美国的前头。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的聚会，也显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古未有的盛况。但是，就此断定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变化，恐怕是过于乐观了。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论断，赫鲁晓夫在私下交谈时，已经多次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就目前来看，苏联在军事和一些其他科技项目里是领先的，但美国潜力是不能低估的，特别是他们的科技力量非常雄厚。[2] 哥穆尔卡与毛泽东谈话时也提出：“自从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后，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他们是落后了，但假如有人以为他们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成就那就看错了。我想他们早晚也会有像火箭这样的成就的。”哥穆尔卡指出，问题是在目前情况下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政策。他认为“采取的政策不应使紧张局势更趋尖锐化”。[3] 他哪里知道，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本意就是想强调社会主义不必担心、也不必反对国际局势的紧张状态。

### 毛泽东公开评论苏联党内斗争

毛泽东的另一个惊人之语是关于苏联党内斗争的。在讲到团结的问题时，毛泽东突然插了一段关于莫洛托夫集团的话：“我赞成苏共中央解决莫洛托夫问题，这是个对立面的斗争，事实证明它是不能统一，它是一方排斥一方。莫洛托夫集团举行进攻，乘赫鲁晓夫同志到外国去，措手不及，来一个突然袭击。但是我们赫鲁晓夫同志也不是一个蠢人，他是个聪明人，立即调动了队伍，举行反攻，取得胜利。

〔1〕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57页。
〔2〕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第9—10页。
〔3〕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记录，1957年11月6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莫洛托夫同志是一位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但是这一件事他是作错了。苏共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带着对抗的性质，因为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一个排斥一个。处理得好，可以不出乱子。处理得不好，有出乱子的危险。”[1]

毛泽东的本意是对苏共中央处理六月事件表态，是支持赫鲁晓夫的，自然也有劝告苏共要懂得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的意思。但是，第一，毛泽东在此前曾一再告诫苏共中央，对莫洛托夫等人不要“指名道姓”，而自己却在大会上公开指责莫洛托夫，这就很让人怀疑他的动机。第二，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大会上公开评论苏共的党内斗争问题，而且用别人不熟悉的语汇“两条路线斗争”把苏共领导中“两个不同集团”等同起来——至少通过翻译后人们是这样理解的，这就更让人坐不住了。据米丘诺维奇描述的现场情况是：毛泽东讲这段话时，“有几百人在场的格奥尔基大厅变得死一般的寂静。米高扬示威性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一副决不是友好的表情，站在那里，把目光投向发言者和对称地坐在苏联代表团对面的中国人。……俄国人当中谁也没有对他说不要这样做，也没有人请他坐下。整个大厅都看着这一场面”。[2] 这大概是毛泽东绝对没有想到的结果。说的是以苏联为首，而毛泽东却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毫无顾忌地随意评论苏共党内的分歧和矛盾，这能不让苏联人恼火？难怪卡德尔在毛泽东讲话时传给南共代表团成员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俄国人同中国人在国际工运中争当意识形态首领的斗争开始了。”[3]

---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43页。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未加任何说明却删去了这段话。

〔2〕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453—454页。

〔3〕《卡德尔回忆录》，第175页。

**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15年内超过英国**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有一处也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即提出中国将在15年后超过英国的口号。在11月6日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的讲演中，赫鲁晓夫在列举了一系列统计数字后说："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苏维埃国家在今后15年内不仅能赶上，并且能超过目前的美国。自然，在这段时期，美国的经济也可能有所发展。但是，只要考虑到我国工业发展速度比美国快得多这一点，那么可以肯定，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在和平竞赛中赶过美国的这一任务是完全现实的，是完全可以实现的。"[1] 听了赫鲁晓夫这番话，毛泽东显得有些受刺激。当天晚上与哥穆尔卡谈话时，毛泽东就试探性地提出："再过15年苏联能超过美国，中国有可能超过英国。"哥穆尔卡当即直言不讳地指出："苏联能超过美国这点无疑问，但中国能否超过英国这点很难说。"毛泽东仍然坚持说："如15年时间太短，则可延长些，先超过英国，然后再超过美国。"[2]

大概是为了取得可靠的依据，在会议期间与法共和英共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又特意谈到经济问题。当多列士告诉他法国的钢产量为1200万吨时，毛泽东随口就说，"我们有两个五年计划就能超过法国，三个五年计划超过英国。"在向波立特和高兰详细询问了英国的金融、工业和军事状况后，毛泽东肯定地说："中国在15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52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12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2000—2500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15年之后，将是4000—4500万吨。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2000万吨。你们看，15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3500万吨吧！"法国人和英国人没有哥穆尔卡那么直率，对毛泽东的豪言壮语都是点头称赞。[3]

---

〔1〕《人民日报》1957年11月8日。

〔2〕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记录，1957年11月6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3〕毛泽东与多列士谈话记录，1957年11月8日；毛泽东与波立特、高兰谈话记录，1957年11月9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于是，在18日大会的发言中，毛泽东郑重地宣布："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再过15年，可能爬到年产3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1〕格奥尔基大厅里的听众大概没有多少人把毛泽东这些外行话当真——单单一个钢产量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但是，赫鲁晓夫赶超美国的时间表后来遭到苏联经济学家和多数主席团成员的质疑和反对〔2〕，而毛泽东的这句话却吹响了1958年中国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的第一声号角。更重要的是，在超英赶美的口号背后，毛泽东的本意实际上是在经济上赶超苏联，因为只有这样，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才更有发言权。〔3〕

**毛泽东对核战争及其后果的名言**

在毛泽东18日讲话中最引起争议的是他关于核战争及其后果的一番论述。中共代表团回国后，赫鲁晓夫在11月27日出席中国使馆招待会的致词中就表示了对毛泽东发言的不满，他暗示毛泽东有些讲话是多余的。〔4〕据赫鲁晓夫回忆，毛泽东讲这段话时，除了宋庆龄发出会意的笑声外，"整个会场一直是死沉沉地一片寂静"，会后许多代表的反应都十分强烈。捷共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说：中国有6亿人口准备损失掉3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哥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35页。
〔2〕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肖庆平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150—151页。
〔3〕详见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
〔4〕郑文瀚：《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214—215页。

穆尔卡也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愤慨。[1] 参加会议的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舍穆勒·米库尼斯回忆当时的印象是：毛泽东热衷的话题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老是翻来覆去地讲。他认为大战不可避免，对此人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我甚至敢斗胆地讲，他是根据这场大战来安排生活和思考问题的，俨然是大战已经开始了。[2] 那么，毛泽东究竟讲了一些什么话会给人们留下如此印象？

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直到后来中苏论战苏联攻击中国的核政策时，中国政府才在声明中引用了这段话，而全文是在1992年发表的。毛泽东是这样说的："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有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3]

苏共在后来与中共的大论战中拿出了当时苏方的速记记录，根据这个记录，毛泽东的原话是："是否可以估计一下，未来的战争会导致多少人死亡？也许会死掉全世界人口二十七亿的三分之一，也就只有九亿人。假如真的摔原子弹的话，我认为这还少说了。当然，这很

〔1〕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394—395页。

〔2〕转引自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第157—159页。

〔3〕《人民日报》1963年9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35—636页。

可怕。但是，即便是损失一半人也不是那么的糟糕。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们要这么做，而是他们，是他们将战争强加给我们。假如我们打起仗来，那么就会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我个人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将会遭受这样的灾难，那时人类将会损失一半，也许，一多半。我问过尼赫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在这个问题上情绪要比我悲观得多。我对他说：假如人类的一半被毁灭，那么还会剩下一半，但是帝国主义将会被全部毁灭，并且整个世界将只有社会主义存在下来，而在半个世纪或者一个世纪里，人口又会增长，甚至增长一半多。中国还没有真正展开建设，假如帝国主义者将战争强加于我们，那么我们准备停止搞建设；让我们先比试一下武力，然后再回过头来搞建设。”苏共由此认为、“实质上，这是一条搞军事冲突，用军事手段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方针。”〔1〕

尽管无法判断谁更准确地记录了毛泽东的原话，但对比一下中苏双方发表的文件，就发言者所要表达的内容来说，没有本质的区别。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毛泽东的话。这里除了翻译上的问题外，恐怕主要是在场的外国听众不大熟悉和理解毛泽东那种哲人的思维和诗人的语言。〔2〕其实毛泽东不过是重复了他说过多次的话：原子弹是纸老虎，既不要怕，又要认真对付。至于谈到核战争的后果，这里也不过是“极而言之”，从最坏处出发考虑问题。毛泽东的话惊吓了东欧一些小国领导人是可以理解的，但苏共在论战中以此为由指责中国好战和蓄意挑动核战争，无疑是有意歪曲。苏共1957年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至少在表面上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就在毛泽东讲话的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11月14日赫鲁晓夫接受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的谈话记录。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记者问：“您认为，如果打起原子战争

〔1〕Правда，21—22 Сентября 1963г..

〔2〕见过该讲话的俄文速记记录的俄国学者库利克说，“这份文件显然没有经过文字加工，而且俄文的翻译水平也很差”。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217。

和氢武器战争，世界能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吗？”赫鲁晓夫答：“自然，将会有很大的损失，人类将要经受很多灾难，但是人并不会从地面上消失，社会将存在，并且继续发展。”[1]

毛泽东发言的本意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难理解，问题是他采取即席演说这种随意的方式，来讲一个在欧洲人看来是如此严肃和敏感的话题，再加上仓促的翻译，就难免引起误解和怀疑。[2]不过，毛泽东之所以用如此刺激的语言来阐述他的思想，也是有其用意的。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在召集政治局常委介绍莫斯科会议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总的来讲，这次会议是成功的，十二党宣言是好的，大家都比较满意。但是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讲，一个是和平共处的问题，一个是社会党的问题。毛泽东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然是对的，但是苏共二十大把和平共处作为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就错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这里还有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还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3]而支持世界革命，自然就有一个如何看待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问题。鉴于对核武器的新认识，苏共二十大提出应通过和平而不是战争走向共产主义。但毛泽东一向反对核战争将会毁灭人类的看法，他从莫斯科回来后在一次党内会议上又重复了关于核战争的讲话，而且说得更加透彻：“要准备对付大战，帝国主义有疯子，扔原子弹。头一次大战不过死了1000多万，第二次大战死了3000多万。打原子战，没有经验。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27亿人，还有9亿人，有9亿人也好办事，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换来

---

〔1〕《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0日。

〔2〕毛泽东有一些私下谈话更叫赫鲁晓夫目瞪口呆。如谈到未来的战争时，毛泽东告诉赫鲁晓夫说，如果帝国主义发动进攻，你们不要还击，可以先撤退，一直撤到乌拉尔，那时中国会帮助你们。Хрущев Н.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с.332—333；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395—397页。

〔3〕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50—153页。

了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1]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话有一个解释，他说：苏共二十大“只讲和平不讲战争，这是很不好的。只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不讲战争来了怎么办。莫斯科宣言解决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莫斯科就是讲这个”。[2]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也是毛泽东没有说出来的与赫鲁晓夫的重大分歧所在。

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是北京与莫斯科共同建立的解决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问题的平台，也是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显示其存在的一种方式。赫鲁晓夫虽然在二十大会议后不得不解散共产党情报局，但是苏共从传统观念出发，还是想要重建一种国际机构来保证各国共产党能够协调行动。毛泽东对莫斯科在国际共运中决定一切的领导地位一向深恶痛绝，更不愿在斯大林之后再有一个“太上皇”，因此坚决主张各国共产党应通过开会的方式进行协商和沟通。虽然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后处于被动地位，但一开始并不愿接收中共的主张。波匈事件使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更加尴尬，再加上中共帮助平息这次事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赫鲁晓夫不得不听从毛泽东的意见。与南斯拉夫恢复关系以后，中苏都很看重南共的作用和影响，并都试图借助这支力量提高自己的地位，但铁托为了保证南斯拉夫的独立和不结盟政策，并不想再次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解决了反党集团事件后，赫鲁晓夫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的支持使他更加信任和依赖中共。在中苏共同召集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关键的问题是起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文件。为此，双方紧密合作，几番磋商。《莫斯科宣言》是中苏协商和妥协的结果，苏共接受了中共的几乎所有修改意见，中共也默认了把苏共二十大路线写入宣言——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他们必须迈出这一步。虽然在会议期间双方是平起平坐，但就中苏两党

〔1〕吉林省档案馆，1/1—14/59，第6—8张。
〔2〕吉林省档案馆，1/1—14/126，第16—35张。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影响而言，中共显然处于上升状态。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受到的特殊礼遇，以及他在会上引人注目的种种表现，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而毛泽东强调“以苏联为首”、对苏联党内斗争公开进行评判、提出在经济上赶超英国，以及对南共代表团表示关心和支持等等做法，则表明中共确实有意取代苏共来“指点江山”，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作为结果，总体来说，中苏双方都认为莫斯科会议是非常成功的。会议刚结束，苏共就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学习讨论，报刊上连续集中报道了一个多月。[1] 苏共中央12月全会决议满意地指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现代国际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的结论和原理得到了兄弟共产党的完全支持，这就证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一致和团结”。[2] 中国国内此时正忙于整风反右，对这次会议无暇组织广泛的学习讨论，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也认为，“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会议和所通过的两个宣言，开辟了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给了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进步的力量以极大的鼓舞”。[3] 然而，在这个成功的背后，却暗藏着一种危机。

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同盟关系发展的最高峰，也是中苏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这个特点也同样反映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个人关系方面。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打开了中苏关系发展的新局面，苏联开始对中国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使得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产生了极大好感和感激之情；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开始

---

〔1〕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812—01，第5—17页。

〔2〕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72—273页。在实际宣传中，苏联已经不再提“议会道路”，同时强调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812—01，第5—17页。

〔3〕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1958年5月23日。吉林省档案馆，1/1—14/75，第8—10张。

对赫鲁晓夫的政治观点和经验感到担心，认为中共应该站出来维持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1956年10月波匈事件的爆发，令毛泽东进一步对赫鲁晓夫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能力产生怀疑，于是决心出面干预欧洲事务，并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发挥某种引导作用。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感觉恰好相反。由于苏联党内以及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关系不断出现的危机，特别是毛泽东在几次关键时刻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的政治表态，使得赫鲁晓夫越来越依赖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也越来越感到必须与毛泽东联手，来共同领导社会主义阵营。这两种趋向在1957年底的莫斯科会议期间汇聚到一起，开始出现了碰撞。[1]

危机并不在于中苏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和矛盾——在任何盟国之间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在一般情况下，求同存异的确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方式。但1957年底的状况却非同一般，莫斯科会议准备和召开的过程表明，中苏关系在其“蜜月”的最高峰却面临着一个由谁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中共的成就和影响如东风劲吹，蒸蒸日上，大有取代苏共而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架势。而苏联也恰在此时恢复了元气，党内斗争结束后国内政治趋于稳定，农业连年丰收预示着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两颗人造卫星上天及核潜艇试航成功则标志着军事科技开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 在这种情况下，当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受到来自北京的挑战时，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无论如何也无法再“求同存异”了。

---

〔1〕有关这个发展过程的详细描述，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2〕中国驻苏使馆报告说，1957年苏联的工业生产“获得更稳步的发展”，农业生产“迅速增长”，人民购买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前8各月的商品流转额增长，“为过去40年所未曾有过”。〔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720—11，第150—158页。〕1956—1958年苏联农业生产增长数字见李仁峰主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51—52、137、140页。苏联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于1958年12月下水试航的情况见Симонов Н.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c.245。

在冷战对抗的大背景下，在对外政策方面，对帝国主义究竟是要缓和还是斗争？在对内政策方面，到底谁的经济增长更快，谁的发展道路更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里是一定要争出个是非曲直的。道理很简单：真理只有一个，谁掌握了真理，谁就有能力和资格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于是，莫斯科会议胜利闭幕半年之后，这些隐含的分歧和矛盾便暴露出来，并引起了中苏之间的争执。结果，莫斯科会议在最充分地显示出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状态的同时，也成为整个冷战国际格局发生变化的起点。

本章曾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附录一

# 征引和参考文献

## 一、档案馆、数据库、图书馆原始文件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


105—00327—12
109—00083—03
109—00403—01
109—00403—06
109—00580—01
109—00761—01
109—00761—02
109—00761—04
109—00761—06
109—00762—01
109—00762—02
109—00762—03
109—00766—02
109—00788—01
109—00804—01
109—00805—01
109—00969—01
109—00984—18
109—01017—17
109—01017—19
109—01018—04
109—01033—02
109—01037—01
109—01042—01
109—01091—01
109—01138—01
109—01141—01
109—01141—02
109—01812—01
111—00002—01
111—00002—02
111—00002—03
117—00385—02
203—00023—01
203—00072—01
203—00097—03
203—00097—05
203—00097—06
203—00194—03
204—00054—04


### 福建省档案馆


101/5/819
101/5/982

吉林省档案馆

| | | |
|---|---|---|
| 1/1—1/14 | 1—11/1—1955.161 | 1—13/1—1957.39 |
| 1/1—14/126 | 1—11/1—1955.55 | 1—13/1—1957.72 |
| 1/1—14/59 | 1—12/1—1956 | 1—13/1—1957.84 |
| 1/1—14/68 | 1—12/1—1956.100 | 1—13/1—1957.99 |
| 1/1—14/75 | 1—12/1—1956.101 | |
| 1—11/1—1955.139 | 1—12/1—1956.129 | |

上海市档案馆

| | | |
|---|---|---|
| A22—2—515 | A23—2—232 | C1—1—187 |
| A22—2—516 | A77—2—404 | C1—1—189 |
| A22—2—555 | B163—2—279 | C48—1—113 |

陕西省档案馆

| | | |
|---|---|---|
| 123—40—1 | 123—43—38 | 123—43—472 |
| 123—40—15 | 123—43—38 | |
| 123—40—43 | 123—43—466 | |

云南省档案馆

| | | |
|---|---|---|
| 2—1—2736 | 2—1—2743 | 7—1—867 |
| 2—1—2741 | 2—1—2745 | |
| 2—1—2742 | 7—1—804 | |

АВПРФ（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 | |
|---|---|
| ф.0100，оп.42，п.288，д.19 | ф.059 а，оп.4，п.6，д.5 |
| ф.0100，оп.48，п.393，д.9 | ф.07，оп.22，п.220，д.36 |
| ф.0100，оп.49，п.410，д.9 | ф.07，оп.22 а，п.198，д.13 |
| ф.0122，оп.40—1956 г，п.336，д.10 | ф.5，оп.28，п.122，д.485 |

АПРФ（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 | |
|---|---|
| ф.3，оп.23，д.200 | ф.3，оп.65，д.589 |
| ф.3，оп.64，д.484 | ф.3，оп.65，д.610 |
| ф.3，оп.64，д.487 | ф.3，оп.83，д.117 |
| ф.3，оп.64，д.490 | ф.45，оп.1，д.328 |

РГАНИ（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原ЦХСД）

| | |
|---|---|
| ф.3，оп.10，д.210 | ф.5，оп.28，д.415 |

РЦХИДНИ（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

ф.17，оп.128，д.1173

ЦХСД（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当代文献保管中心

ф.3，оп.12，д.1005

ф.3，оп.12，д.1006

ф.3，оп.14，д.67

ф.3，оп.64，д.487

ф.5，оп.28，д.308

ф.5，оп.28，д.382

ф.5，оп.28，д.407

ф.5，оп.49，д.41

ACKSKJ，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档案馆

Ⅳ—60/Ⅱ—1—61

ACKSKJ，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档案馆

br.55，st.Ⅸ9—Ⅲ/32，1—3

AJBT—KMJ，铁托档案馆

Ⅰ Ⅰ—1/588.

Mai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香港大学主图书馆（缩微胶卷）

MF2510408—0717

MF2510408—0735

MF2524607—0807

## 二、档案文献集（含非正式出版物）


《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关于反冒进的文献四篇》，《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

《关于苏联专家对我国“二五”计划草案意见的一组文献》，《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1期，第18—22页。

《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的一组文稿》，《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的评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

《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文献选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

《周恩来关于反冒进的文献五篇》，《党的文献》1988年第2期。

《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

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6）》，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

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

李仁峰主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

美国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编：《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五十年代后期“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历史资料专辑》第二十二辑（第二、五、八分册），洛杉矶，2003年。

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

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0、11、12、13、15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04年，未刊。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8），2003年7月。

沈志华编：《关于朝鲜停战的俄国档案选编》，《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4期。

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3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04年，未刊。

沈志华编：《中、俄、波、匈四国关于波匈事件的档案文献》，《冷战国际史研究》第6辑（2008年夏季号）、第7辑（2008年冬季号）。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6、12、15、22、23、25、26、28、30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外交部编：《周恩来同志论外交（内部学习文件）》，1981年7月，未刊。

赵永穆等译校：《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印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1956年1月，未刊。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究编：《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续编（社会文化时期）》，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印行，1986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七、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汇编（1949-1956）》，北京：学习出版社，1993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一、二十二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

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资料室编：《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内部读物），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

中央档案馆编：《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上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编印：《人民波兰文献资料选辑》，1985年。

A. Werblan, "Rozmowy Wladyslawa Gomulki z Zhou Enlaiem w 1957r.", *Dzieje Najnowsze*, Rocznik XXIX, nr.4/1997.

Csaba Békés, "New Findings on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Bulletin*, Issue 2, 1992.

Csaba Békés, Malcolm Byrne, and Christian Ostermann (eds.), *The Hidden History of Hungary 1956: A Compendium of Declassified Documents*,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1996.

Csaba Békés, Malcolm Byrne, and Janos Rainer (eds.),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 History in Documents*,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2.

Imre Nagy, *On Communism*, *In Defense of the New Course*, New York: Frederick Praeger, 1957.

Janos Rainer, "The Yeltsin Dossier: Soviet Documents on Hungary", *CWIHP Bulletin*, Issue 5, 1995.

Mark Kramer, "New Evidence on Soviet Decision-Making and the 1956 Polish and Hungarian Crisis",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1996/1997.

Mark Kramer, "The 'Malin Notes' on the Crisis in Hungary and Poland, 1956",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1996/1997.

Polski Instytut Spraw Miedzynarodowych (red.), *Polskie Dokumenty Dyplomatyczne: 1957*, Warszawa: PISM, 2006.

Szobolevszki Sándor, *Magyar-Kínai Kapcsolatok 1956—1959, Dokumentumok*, Budapest: MTA Jelenkor-kutató Bizottság, 2001.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Артизов А. и т.д. (сост.)*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Документы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Март 1953—Февраль 1956, Том 1, Москва: МФД, 2000.

*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8.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урашко Г.П.*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 Т.2, 1949—1953,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Григорьев А., Зазерская Т.* 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Сталина, 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П.Юд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5.

*Зубок В.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1, №2.

*Ковалева Н. и т.д. сост.* Молотов, Маленков, Каганович. 1957,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н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ФД, 1998.

*Наумов В., Сигачев Ю.*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1999.

Отклики трудящихся на решения июньского (1957.)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Архи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2000, №1.

*Рейман М.* Решение январского (1955г.)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о Г.М. Маленков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9, №1.

*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

*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 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2，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54—1958，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6.

## 三、专著和论文集

《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年。

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张金鉴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 。

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

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

杜蒲：《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赵敏善等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国务院办公厅大事记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送审稿）》第3、4卷，1991年，未刊。

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王弄笙等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何晓明：《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

侯凤菁：《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事件真相》，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

胡舶：《冷战阴影下的匈牙利事件：大国的应策与互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胡乔木：《胡乔木论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黄秋耘：《风雨年华》（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姜长斌主编：《斯大林政治评传（1879—1953）》，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金春明主编：《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拉齐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夏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雷尼·彼得编：《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经过和历史教训》，赵平生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李丹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李捷：《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

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

林克等：《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刘国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

刘源：《刘少奇与新中国》，香港：大风出版社，2005年。

刘祖熙、刘邦义：《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

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罗宾·艾莉森·雷明顿：《华沙条约》，上海师大历史系世界史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翻译组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肖庆平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

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述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

尼古拉·津科维奇：《权力与争斗》，郅友昌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钱临照、谷羽主编：《中国科学院》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

山多尔·科帕奇：《匈牙利悲剧》，龚新康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2年。

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

沈志华：《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

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石仲泉、沈正乐、杨先材、韩钢主编：《中共八大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

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王逸舟：《波兰危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郭家申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谢泳：《杂书过眼录》，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局编：《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的反革命阴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局编：《匈牙利事件中的反革命势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

扬·普塔辛斯基：《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于欣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

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章诒和：《最后的贵族》，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Huszár Tibor, *Kádár János Politikai Életrajza (1912—1956)*, Budapest: Szabad Tér Kiadó- Kossuth Kiadó, 2003.

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 (eds.),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Johanna Granville, *The First Domino: International Decision Making during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1956*,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4.

Lorenz Lu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Sergei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Terry Cox (ed.), *Hungary 1956——Forty Years On*,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7.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Зубкова 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политика и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1945—1953,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0.

*Козлова В.А. и Мироненко С.В. (пот. ред.)* Надзор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рокуратуры СССР по делам об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й агитаций и пропаганде, март 1953—1991, Москва: МФД, 1999.

*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ИДВ РАН，2000.

*Пыжиков А.*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Москва：ОЛМА-ПРЕСС，2002.

*Симонов Н.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е годы：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структура，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6.

*Соколов А.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41—1991г.，Москва：Высшая школа，1999.

## 四、论文

董志凯：《156项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

董志凯：《毛泽东在“八大”前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设想》，《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

龚育之：《毛泽东和傅鹰》，《百年潮》，1997年第1期。

龚育之：《毛泽东与八大党章的两个特点》，《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

龚育之：《周恩来和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韩钢：《“八大悬案”释疑》，《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

胡绳：《谈党的“八大悬案”》，《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

黄一兵：《马哈伊斯基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之缘起》，《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

金观涛、刘青峰：《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

孔寒冰：《苏联经济模式是如何在中国确立起来的》，《俄罗斯研究》2000年第1期。

黎汉基：《金岳霖的思想改造》：（台湾）《新史学》第13卷第1期（2002年3月）。

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1954—1960）》，李丹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

李丹慧：《最后的努力：中苏在1960年的斗争与调和》，《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李捷：《从同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李丹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

林蕴晖：《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中的矛盾及其逆转之原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林蕴晖：《苏共二十大与毛泽东走自己的路》，《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

牛大勇：《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李丹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

逄先知执笔整理：《关于毛泽东思想提出的历史过程》，《文献和研究》，1982年第1期。

逄先知、李捷：《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诞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形成过程》，《党的文献》2002年第4、5、6期。

裘实编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三种俄文版本》，《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87年第2期。

沈志华、李丹慧：《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3期。

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

沈志华：《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牛大勇、沈

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沈志华：《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亚洲革命主导权的转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沈志华：《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争鸣与探索》，2008年第2期。

沈志华：《援助与限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施肇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理论观点的修改始末》，《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

时殷弘：《匈牙利事件和美国的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苏利军：《西方关于新中国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述评》，《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4期。

汪裕尧执笔：《关于〈论十大关系〉的产生、整理和发表》，《文献和研究》，1982年第8期。

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3期。

王善中：《论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2期。

王双梅：《刘少奇与中共八大政治路线的确立》，《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

王文：《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共党史资料》总第66辑（1998年6月）。

王先俊：《建国初期的社会变迁与党对思想文化的整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王真：《50年代中期我国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闻言实：《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

武力：《论八大对苏联工业化模式认识的深化及其历史局限》，《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6期。

谢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始末》，《党的文献》1997年第5期。

刑和明：《1956年中共对苏联模式认识的转变及启示》：《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12期。

熊华源：《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提出的时间》，《党的文献》1992年第4期。

熊华源：《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的探索》，《党的文献》1988年第2期。

熊华源：《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情况介绍》，《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

杨凤城：《1949—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杨奎松、陈兼：《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的兴衰》，李丹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

杨奎松：《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李丹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

翟志成：《冯友兰的抉择及其转变》：（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0期（民国九十一年）。

张秋云、郑淑兰：《一篇反冒进社论的由来》，《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

章立凡：《风雨沉舟记》（《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

A. Werblan and J. Stepien, “Rozmowy kierownictwa PZPR z delegacja KPZR. Nieznane dokumenty z pazdziernika 1956r.”, Dzis, nr.4/1995.

Csaba Békés,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16, 1996.

János Rádvanyi,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Hundreds Flowers Campaign", The China Quarterly, №43, Jul.-Sep. 1970.

Johanna Granville, "1956 Reconsidered: Why Hungary and Not Poland?",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80, No.4, October 2002.

Johanna Granville, "From the Archives of Warsaw and Budapest: A Comparison of the Events of 1956",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16, No. 2, Spring 2002.

Johanna Granville, "Reactions to the Events of 1956",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8, No. 2, 2003.

Leszek Gluchowski, "Khrushchev, Gomulka, and the 'Polish October'", CWIHP Bulletin, Issue 5, 1995.

Leszek Gluchowski, "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 The Situation in the Polish Internal Security Corps", CWIHP Working Paper, №17, 1997.

Mark Kramer, "Hungary and Poland 1956: Khrushchev's CPSU CC Presidium Meeting on East European Crises, 24 October 1956", CWIHP Bulletin, Issue 5, 1995.

Matthew Evangelista, "Why Keep Such an Army?: Khrushchev's Troop Reductions", CWIHP Working Paper, №19, 1997.

R.J.Service, "The Road to the Twentieth Party Congress", Soviet Studies, Vol.33, №2, April 1981.

Shen Zhihua and Li Danhui, "The Polish Crisis of 1956 and Polish-Chinese Relations Viewed from Beijing", Jan Rowinski (ed.), The Polish October 1956 in World Politics, Warsaw: PISM, 2007.

Shen Zhihua, "Mao and the 1956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János M. Rainer, Katalin Somlai (eds.),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Soviet Bloc Countries: Reactions and Repercussions, Budapest: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Hungarian State Security, 2007.

Tony Kemp-Welch, "Khrushchev's 'Secret Speech' and Polish Politics: The Spring of 1956",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8, No.2, 1996.

Vojtech Mastn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Warsaw Pact in 1955", Niels E. Rosenfeldt, Bent Jensen, and Erik Kulavig (eds.), Mechanisms of Power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Y. Smirnov and V. Zubok, "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 Moscow Enters the H-Bomb Ag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 4, fall 1994.

Адибеков Г.М. Почему Тольятти не стал генеральным секретарем Коминформ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6, №4.

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XX съезд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2.

Аксютин Ю.В., Пыжиков А.В. 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закрытого доклада Н.С. Хрущева XX съезду КПСС в свете нов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2, №2.

Афиани В.Ю. Иванов Н.С.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Суэц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ЦХСД, 复印自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room保存的手稿。

Барсуков Н. Как создавался 《закрытый доклад》 Хрущева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1/02/1996.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 По новейшим архив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 4.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Н.С. Хрущев, Й. 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1.

Зубкова Е. Кад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чистки в КПСС, 1949—1953//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9, №3, №4, №6.

Зубкова Е.Ю. Маленков и Хрущев: личный фактор в политике 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4.

Катасонова Е. Советско-японс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1955—1956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3, №5.

Медведев Ж.А. Загадка смерти Сталин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0, №1.

Мусатов В.Л.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г.: 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1.

Наумов В.П. Борьба Н.С.Хрущё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2.

Наумов В.П.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1953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5.

Наумов В.П.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 Н.С.Хрущев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4.

Наумов В.П.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7, №4.

Носкова А.Ф. Московские совет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1945—1953г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 №1.

Обичкина Е.О.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и война в алжире, 1954—1962гг.,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МИД РФ//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0, №1.

Орехов А.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

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

Пихоя Р.Г.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в совет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1945—1958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6.

Путилин Б.Г.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год 1956-й//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

Пыжиков А. XX Съезд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00，№8.

Пыжиков А.В. Истоки диссидентства：Молодёжь после XX съезда КПСС//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03，№12.

Пыжиков А.В. Проблема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в годы хрущевской оттепели//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3，№4.

Пыжиков А.В. Советско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хрущевских рефор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2.

Пыжиков А.В. 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в годы 《оттепели》//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03，№6.

Рейман М.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и конфликты в советск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3，№3.

Сидихменов В.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 Новое время，1993，№2-3.

Филатов Л.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1949—1966）//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1995，№65.

## 五、回忆录和日记

《傅雷家书》，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二），马贵凡译，《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1辑（1999年9月）。

爱德华·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李代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年）》，刘裘、金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

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年。

葛佩琦：《葛佩琦回忆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郝德青：《外交工作三十年》，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

赫格居斯·安德拉斯：《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陈之骝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

黄秋耘：《中国作协的几番风雨》；牛汉、邓九平主编：《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纪希晨：《在风口上——从反右派到反右倾》；季羡林主编：《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

黎之：《文坛风云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李锐：《1958年那条“总路线”形成前后的党内斗争》，《炎黄春秋》

1996年第8期。

李慎之：《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一段公案》，《百年潮》，1997年第5期。

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86年。

李新：《反“右派”亲历记》，《中共党史资料》总第67辑（1998年9月），第34—43页。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

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

林克：《林克日记》（手稿），未刊。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

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李海文整理，《百年潮》1997年第2期。

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1995年。

王炳南：《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的回忆》，《国际问题研究》1981年第1期。

王光伟：《周总理与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怀念周总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王若水：《智慧的痛苦》，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

韦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百年潮》1998年第2期。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达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夏道生：《忆周恩来总理1957年访问匈牙利》，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

萧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徐铸成：《亲历一九五七》，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阎明复：《我随李富春访问苏联》，《炎黄春秋》2005年第4期。

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1999年。

赵仲元：《1956年随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

## 六、采访记录

《邓力群谈有关中共八大到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重大事件》，1998年4月16日。

《余湛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谈话记录》，1987年7月26日。

李丹慧、沈志华采访荣植记录，2000年11月30日。

沈志华采访李越然记录，2001年10月。

沈志华采访骆亦粟记录，2004年4月17日。

沈志华采访朱安康记录，2004年4月17日。

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2，№1-3.

## 七、报刊

《人民日报》，1955—1956年。

《内部参考》，1955—1957年。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3.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

附录二

# 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

这里不包括来自中文资料且无法查出原文的外国人姓名。

阿布拉希莫夫，П. А. Абрасимов
阿尔希波夫，И. В. Архипов
阿里斯托夫，А. Б. Аристов
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
安德洛波夫，Ю. В. Андропов
安东诺夫，С. Ф. Антонов
奥哈布，E. Ochab
巴枯宁，М.А. Бакунин
巴塔，Báta István
巴乌金（帕乌金），Н.А.Паутин
巴耶尔，Czeslaw Bajer
巴伊巴科夫，И. К. Байбаков
拜科夫，Vladimir Baikov
贝利亚，Л. П. Берия
贝鲁特，Bierut Boleslaw
别尔乌辛，М. Г. Первухин
波波夫，Попов
波波维奇，V. Popović
波尔多茨基，Boldoczki János
波杰罗夫斯基，Jerzy Bordzilowski
波立特，Harry Pollitt
波伦，Charles Bolen
波诺马连科，П. К. Пономаренко
波诺马廖夫，Б. Н. Пономарев
波日达耶夫，Д. П. Пожидаев
波斯佩洛夫，П. Н. Поспелов
布尔加宁，Н. А. Бурганин
杜尔洽克，Durcak
杜勒斯，Allen Dulles
多列士，Maurice Thorez
法尔卡什，Farkas Mihaly
费德林，Н. Т. Федоренко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伏罗希洛夫，К. Е. Ворошилов
福尔采娃，Е. А. Фурцева
甘地，Indira Gandhi
高兰，John Gollan
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
格拉西莫夫，Герасимов
格罗，Gerő Ernő
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
葛罗米柯，А. А. Громыко

赫格居斯，Hegedüs András
赫鲁晓夫，Н. С. Хрущев
基里洛克，Stanislaw Kiryluk
基里琴科，А. Кириченкр
基洛夫，С. М. Киров
吉洪诺夫，Тихонов
加里宁，Гаринин
卡达尔，Kadar Janos
卡德尔，Edvard Kardelj
卡尔斯基（师哲），Карский
卡冈诺维奇，Л. М. Каганович
卡斯曼，Leon Kasman
科马尔，Waclaw Komar
科涅夫，И. С. Конев
科瓦奇，Kovács István
科兹洛夫（柯兹洛夫），Ф. Р. Козлов
库尔恰托夫，И. Курчатов
库利克，Б. Т. Кулик
库兹涅佐夫（苏军情报局），Ф. Ф. Кузнецов
库兹涅佐夫（外交部），В. В. Кузнецов
拉科西·马加什，Matyas Rakosi
拉帕茨基，Adam Rapacki
拉先科，P. Lashchenko，П. Лащенко
拉伊克，Rajk László
兰科维奇，Alexander Rankovic
雷瓦伊，Révai József
列宁，В. И. Ленин
罗多斯，Б. В. Родос
罗科索夫斯基，К. К. Рокоссовский
罗申，Н. В. Рощин
罗文斯基，Jan Rowinski
吕德量，Lorenz Lüthi
马克思，Karl Marx
马拉申科，Malashenko，Малашенко
马里宁，М. С. Малинин
马林科夫，Г. М. Маленксв
马罗山，Marosán György
马热茨，Mieczyslaw Marzec
马歇尔，George Marshall
麦德维杰夫，Ж. А. Медведев
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
米高扬，А. И. Микоян
米哈伊洛夫，Михайлов
米库尼斯，Shmuel Mikunis
米丘诺维奇，Veljko Micunovic
明尼赫·费伦茨，Münnich Ferenc
莫拉夫斯基，Kazimierz Morawski
莫洛托夫，В. М. Молотов
纳吉，Nagy Imre
纳希科夫斯基，Marian Naszkowski
尼采，Paul Nitze

尼古拉耶夫，Л. Николаев
尼赫鲁（驻华大使），L. K. Nehru
尼赫鲁（总理），Pandit Jawaharlal Nehru
诺瓦克，Zenon Nowak
诺沃提尼，Antonin Novotny
潘克拉托娃，Панкратова
萨布罗夫，М. З. Сабуров
萨林，Д. Е. Салин
萨姆布罗夫斯基，Roman Zambrowski
萨瓦茨基，Aleksander Zawadski
塞拜什，Sebes István
沙尔，Száll József
沙图诺夫斯卡娅，О. Г. Шатуновская
斯查柯，Józef Czesak
斯大林，Й. В. Сталин
斯克热歇夫斯基，Skoreschevski
苏斯洛夫，М. А. Суслов
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
铁托，Josip Broz Tito
托洛茨基，Л. Д. Троцкий
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
西季赫梅诺夫，Василий Сидихменов
西伦凯维茨，Jozef Cyrankiewicz
谢尔巴科夫，И. С. Щербаков
谢罗夫，И. А. Серов
谢皮洛夫，Д. Т. Шепилов
亚戈达，Г. Г. Ягода
叶利钦，Б. Н. Ельцин
伊里因，Ильн
尤金，П. Ф. Юдин
周万，Jovan Cavoski
朱可夫，Г. К. Жуков
佐林，В. А. Зорин

# 后　记

这部著作实际上是一本论文集。2000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访学期间，受金观涛、刘青峰、陈方正几位朋友委托，在国内组织一批学者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经过几年的讨论、交流，到2009年，这套10卷本的国史稿已有7卷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我担任写作的第三卷《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这套书出版后，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不少人希望能在大陆出版和发行，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于是，广东人民出版社提出，希望我能够把本人所写与第三卷内容有关的在大陆已经发表的论文合集出版。

我虽表示同意，但一则手头事情太多，没有精力编辑论文集。二则也不知费了半天劲到时是否能够出版，便将自己所发表过的论文统统交给出版社，由他们去挑选、汇编、送审，我只是写了一个导言。合同签订后，我就没再过问此事。未曾想，三年后出版社通知我说，该书已经通过审查，经过修改便可以出版了。这样，我就不得不投入编辑工作了。

编辑工作并不复杂。所选9篇论文，都是在大陆发表过的。由于时间有限，再加上书稿已经审查，不宜有大的改动。我做的编辑工作主要有两点：一是按照写一部专著的要求，对全书章节标题和书写形式进行了调整，内容基本未改动。由于原来是单篇论文，出于叙事逻辑的考虑，有些同样的史料会在不同的文章中使用。这样，汇编在一起，就有少数地方在史料的使用上会出现重复。二是对全书的注释进行了核对和梳理，纠正舛误，统一格式。有些文章发表的较早，这些

年又有一些新研究和新史料出现。不过，总体看来，对于本书的观点和史实描述，未发现有重大冲突，我基本上没有吸收。以上两点，还望学界同仁谅解。

最后，我要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

沈志华

2012年9月